

蒙外的日今



著

司公器儀吉國寺科國中
行 印

1732 36

254

3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6752 622

登錄號 32513

潘公昭著



今日的外蒙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印行



3 0662 8039 1

代序（一）

本人奉命赴外蒙古參觀公民投票，今即以當時觀察所得的情形，作一次遊歷式的敘述。

我們知道外蒙遠處邊陲，地接蘇聯，政治上時常發生問題。中央准許外蒙當局舉行公民投票自決，並派大員前往實地觀察，以示宣慰之意。國防最高委員會對於擬派人員，曾經詳細商討，最後決定派本人為代表，並由國防會、內政部、外交部、軍政部、蒙藏委員會、航空委員會等機關各派代表參加。一行十五人，在臨行前，蔣主席特予召見，面授機宜。並接受本人之請求，召見代表團全體人員訓話，剴切指示。我們到外蒙以後，又接主席電報，指示應對之方針。精密周到，無微不至。由此可見最高當局對外蒙問題的重視和注意了。

我們一行在外蒙古的首都庫倫住了六天，除了參加公民投票以外，還參觀了庫倫方面的各種建設。現在根據庫倫一角所見到的各種情形，對於外蒙的現狀和將來，作一點客觀的論斷。當然，庫倫不能代表整個的外蒙古，但因為庫倫是首都，至少足以代表外蒙古的精華所在，所以以「從庫倫看外蒙古」為題，分為下列數段，順次報告。

我們代表團一行十五人，於去年國慶前一天，由重慶乘機飛北平，住平週餘，製備行裝，然後再由北平飛庫倫。但受限於飛機載重十二人，餘三人留駐北平，以為聯絡。兩段航程各為五小時。從重慶飛北平，一路上見到山川起伏，阡陌縱橫，草木蔥蔥，炊煙裊裊，真是錦繡河山，逗人愛戀。從北平飛庫倫，但見遍地沙漠，萬里無煙，真是地曠人稀，荒涼不毛，此種塞外景物，與關內之繁榮錦繡，正是一幅絕對相反的對照。我們愛我們關內錦繡河山，同時我們也決不輕視這片塞外大地，我們深願此行能有重大的成就。儘管讓外蒙在政治關係上是獨立了，但是要獨立後的外蒙民族，追念與我們的歷史淵源，在國際關係上，永遠為我國的盟友，讓這片不毛大地，分而不割，與我國共存共榮。這是我們當時最初所感想，想來也是大家所同情的。

我國內地與外蒙，在民初還有往來，以後彼此隔膜。我去外蒙以前，看了七八種關於外蒙的評判，（多是外國文的，因為關於外蒙革命後的中文書籍極少）。並訪問了幾位到過庫倫的朋友，他們都忠告我多帶衣服，說那邊天氣奇寒，侵入肌骨。但是到了庫倫，我們見到光天化日，天氣很好，雖然那時已是秋末冬初，庫倫已落過雪，結過冰，並不如傳說的奇寒。真出人意外，我們留在庫倫期間，天天晴朗，帶的橡皮鞋，準備下雨穿的，也沒有用。我們想蒙古變了，天氣也變了，大家都驚奇着。

我們一行十二人飛抵機場，外蒙政府早爲我們準備了十一輛小汽車迎接。我們坐在汽車裏，瞻望車外，只見一路平坦。並不崎嶇。遙見喇嘛廟上，秋陽反照，金光燦爛，相映成趣。歡迎我們的人員，有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的代表，外交部次長，牧農部長，內政部長，庫倫市長等。我們以爲蒙古人一定是土老土氣，那知他們西裝革履，落落大方，與我們握手爲禮，互道寒暄，也很合度。他們引導我們到外賓招待所，所內設置很精緻，男女侍者多着西裝，精神活潑。內部裝有冷熱氣管，且有控制器，可以調度冷熱。門窗靡均用美氈花邊綢布。所內除客廳、餐廳、寢室外，還有交誼室、彈子室、理髮室各種設備，應有盡有。吃的方面有羊奶、馬奶、牛奶，每日三餐用俄國餐，營養很好。我們只住了六天，回來時，大家都說我們胖了許多了。

庫倫在民國初年，很少現代建築，市內房屋多半爲喇嘛廟，普通人民多住在蒙古包內，街道又窄又髒。今日庫倫市內都是新式樓房，有玻璃門窗，有地板，有電燈電話，甚至有地毯及很精緻的窗簾，巷道也很寬敞，整齊，所缺少者僅自來水與柏油路而已。

我與外蒙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兼大元帥喬巴山晤談多次。他在外蒙革命時是亡命之徒，曾在俄七年，懂政治也懂軍事，待人和氣與我們言談，不亢不卑；頗有領袖風度。其他各級官員，也頗有政治人物的風範。這也是值得報告的一點。我們分組參觀公民投票，一組到離庫倫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龍桑姆，一組在庫倫城內，一共參觀了幾十個投票處，投票的人很踴躍，庫倫各處電燈輝煌，如同白晝，但沒有收音機等，情形非常熱烈。喬

巴山曾經於正式投票前很自信的對我說，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民，投贊成票。結果不出所料，足見他們組織嚴密，控制徹底了。

外蒙的文化建設，庫倫人口僅十餘萬，是新興的都市。我們參觀投票後，並參觀他們的文化事業，我們參觀過庫倫大學、高等政治幹部學校、中小學聯合實驗學校、中央劇院、中央馬戲院、印刷局、博物館等。庫大的設備相當充實，洵屬不可多得。高等政治幹部學校為特種學校，相當於我們的中央訓練團，為供大學生或公務員研究之所。規模很好，且很整潔。這兩個學校的校長和教授，都有學者風度。學生也佩證章，着制服，精神飽滿。外蒙的政府官員，三四十歲的大都不懂我國國情，他們的學生，當然更是茫然。可是他們對我們，絕不輕視，無論大中小學學生，見到我們都鞠躬，彬彬有禮。我覺得庫倫的青年，比我們江浙的青年，並無遜色的教育程度，已相當提高了。關於印刷方面，其中央印刷局內各種新式設備如捲筒機等都有，報紙印刷很精美。博物館分歷史與物產兩部門，佈置得都整齊有意義，他們沒有商業區，却有合作社，惟供應品不很多。各種工廠如酒精廠、製革廠、電燈廠、毛織廠、麵粉廠、磚瓦廠都有。他們自認為科學不很發達，各種技術人員還不够，故多半須由友邦（蘇聯）供應。總之，外蒙原是我國文化落後的地方，現在一切都出乎我們想像的進步了。外蒙革命後，喇嘛教徒打倒，因此庫倫城裏的喇嘛廟並不多。民族也變了質，從前蒙古人民是遲鈍的，現在都敏捷。一般平民，以游牧為業，平時所住的所謂蒙古包，包裏就是一戶人家，男女老幼少雜處，羊羣馬羣散在包外，等四週的草吃光了，便拔包他移。土地不是私有的，因此外蒙的土地不成問題，容易接受蘇聯的制度，實行共產主義。外蒙的政治最高權力機關為大國民會議，在閉會期內，由小國民會議，即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其職權。政府的高級官吏如國務總理及閣員等，均由其推選。國務總理以下設各部，以牧農部為最重要，牧農部長兼副總理。外蒙現分為十八省一市，省稱「艾馬克」，省以下為縣，縣稱為「索蒙」。省政府亦設各

廳。外蒙對衛生很注意，在中央設部，在省設廳。這是因為外蒙人民多住蒙古包，通常不分尊卑男女，合住一包，且河流稀少，用水缺乏，洗衣沐浴，殊屬罕見，因此多花柳病，影響民族健康至鉅。故外蒙政府現對醫藥衛生極為注意。外蒙的王公貴族及喇嘛教徒，在革命的初期，猶如蘇聯的白俄，不能享受選舉投票等公權，迨至最近，因為他們一方面受了革命的洗禮，一方面外蒙當局的政權已經鞏固了，修改了憲法，規定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喇嘛教徒也得參政了。

不言而喻的，外蒙與蘇聯的關係很密切。外蒙與蘇聯接壤，其交通線多通蘇聯。與我國交通，以有大沙漠之隔離，反不便利。因此他們的政治發展，自然容易受蘇聯的影響。經濟方面，更是非依賴蘇聯不可，蘇聯與蒙訂有友好條約，自民國二十六年起，即訂有軍事同盟，蘇聯在外蒙有公使及軍事代表，人均甚幹練，足見蘇聯對外蒙關係的重視了。同時外蒙的外交人員，也很精悍，他們的才識經驗都不錯。他們與我們週旋，處處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態度，其修養之深，於此可見。除蘇聯與我國外，其他各國尚無與外蒙發生外交關係。所以此次聯合國大會，外蒙請求加入，以英美不贊成，未得通過。

外蒙問題為中蘇邦交中複雜問題之一，外蒙獨立，為既成事實，我國承認其獨立，便直接足以影響中蘇關係。今既承認了，中蘇糾紛，可以因此解決大半。同時外蒙人民，與我無爭奪，可能與我們保持好感。古人說「愛人者，人恒愛之」，現在外蒙與我們關係尚好，未始不是承認其獨立的後果。所以我們承認外蒙獨立，在表面上看，如有所失，實際上是有利無害的。

最後，從外蒙的建設看來，我們得到一個深刻的感想，就是在荒涼的地方，也可建設為現代的都市，我國邊疆問題還多，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把我們的邊疆，分別建設起來。

代序(二)

(「現代蒙古」序)



遺書付印的動機如下：

由於下文所述的時代的要求，一九一九年春天在西伯利亞活動的「消費合作社全俄國中央聯合會」的一部分爲着這個聯合會要向蒙古承辦輸出事宜而實際上尚無任何經驗，而且如果要草擬廣泛的經濟上的新計劃，其先決條件就有對蒙古的產業、社會狀態、政治情勢及風俗等進行調查研究的必要。所以，受到中央聯合會關於對蒙事業的委託的人們，當然首先要求關於蒙古參考資料的。然而，關於蒙古的專門書籍，說起來真是「寥若晨星」，他們蒐集這一方面的資料的努力，終歸失敗了。至於M·波戈萊夫氏的「一九一〇年莫斯科商業探險記」、M·索朴萊夫氏的「俄蒙貿易事務」及A·B·波洛巴恩氏的「現代通商經濟關係上的蒙古」等現存資料，又都是歐洲戰前時代所著的陳舊文獻，不能從這裏去認識今日的蒙古。因此，就有人倡議進行專門性的實地考察，到蒙古去進行新的調查工作。中央聯合會託本人擔任這個考察團的指導工作，本人也就欣然接受了。這個考察團的基本任務，是從事蒙古（正確的說是北部蒙古或自治蒙古）的經濟調查。然而，由於我國關於蒙古的資料，一般說起來非常缺乏，所以同時又把蒐集些可以闡明蒙古國家組織、政治狀態及風俗文化的資料，作爲這次考察團的附帶的任務。

考察團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從伊爾庫次克出發，同月十五日經恰克圖，越過自治蒙古的國境，先以庫倫作爲最初的根據地。考察團在這裏完成了編組等等準備工作，並且在這裏獲得自治蒙古政府一九一八年開始調查編成的關於喀爾喀族人口及家畜調查統計等等，這些是研究蒙古經濟狀況的珍貴的資料。考察團於七月十一

日從庫倫出發，經過三個月之久，遍歷埃爾德尼都、三音廈比、穆林庫倫、哈特斐爾、杭愛、契遜戈爾、烏里雅蘇台、杭格里居克，旅程約二千俄里。十月下旬，考察團在杭格里居克河畔張列冬營，在這裏多蒙 A·V·布爾德可夫氏的好意，提供天幕，並獲得極其豐富的圖書，可以作為研究蒙古的資料。

在冬季，考察團進行科布多地方的調查，完成了中央聯合會所委託的任務。後來就從事於所蒐集的資料的整理。這本書，也就是在杭格里居克河畔的冬營中執筆的。考察團歸途經過哈特斐爾及蒙達而至伊爾庫次克。這樣，考察團已經過自治蒙古境內歷時十六個月，跋涉旅程約達三千俄里了。

團員人數不多，除本人被推為團長之外，尚有我的助手兼任攝影及會計工作的 A·I·卡里尼可夫氏、主管食品 and 用度的 I·V·葉朴夫氏，譯員 E·B·巴哈諾夫氏，以及管理行李馬匹的雇傭工役三四名。過去，有許多蒙古調查家，常常嘮嘮叨叨地訴說語言通譯上的種種困難，但是我們，這一層却相當順利。因為我們得到一位對我們調查上貢獻很大的富有教養與經驗的庫倫蒙古學校教師 E·B·巴哈諾夫氏為翻譯，對於巴氏和其他團員協同一致的努力工作，衷誠感激不已。此外，對於在科布多地方的調查上，給我們以許多幫助的中央聯合會科布多分會會員 F·E·基塞里官夫氏，也必須深表謝意。

考察團在蒙古使用的交通工具，種類很多，從恰克圖到庫倫是有俄國車夫的出差馬車，從庫倫我們駕駛四部自用馬車出發，(本人則一直騎馬)，到了烏里雅蘇台，車子的一部份壞了，所以到杭格里居克一路，混用馬車和駱駝。渡科索戈爾湖時，使用中央聯合會的「蒙古」號江輪。冬季的旅行則大部份時間在駱駝背上。歸途到哈特斐爾大家都騎馬。我們這次旅行考察，每天平均旅行三十至四十俄里，在三音廈比、哈特斐爾、烏里雅蘇台等重要地點，大都留居七天至十天。所以，我可以下一結論，就是在蒙古使用交通工具，主要的以夏天騎馬，冬天用駱駝為最便利。如果蒙古的運輸沒有根本的改革，那麼，我不能不摯誠地向今後的蒙古調查家提供上述交通方法。

關於資料的蒐集，我們到處用各種方法進行，俄國領事館、旅蒙的俄僑、中國商行、蒙古官衙、蒙古寺院、各王公官吏、喇嘛及一般居民，都會對我們的調查工作有許多貢獻，我會盡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期獲得各方面的情報。我特別用心和努力的，是要從蒙古人本身蒐集直接情報，而實際上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得到許多優良的成績。當然，根據艱苦的經驗，我們對於蒙古人所提出的情報，也必須經過充分的檢討批判，才能斷定它是否可靠。我對當地居民（俄國人和蒙古人）蒐集資料，同時也把合作社的實際及其目的給介紹他們。我對俄國人把從伊爾庫次克帶來的關於合作社的書給他們，對蒙古人則另外給他們一些蒙文的小冊子，這是由考察團在庫倫所印行的記述合作社的理論、形式和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的實際情形的。這種小冊子會分送城市及鄉鎮一切蒙古官署，此外也分發給蒙古境內一切中央聯合會的合作社。

考察團不能在極其不利的客觀境內進行自己的工作。在一九一九——二〇年間，俄國在自治蒙古的一切「權勢」幾乎掃地以盡了，結果不免大大影響了中國人和蒙古人對蒙古的俄國人的態度，對於俄國的旅行家（例如P. K. 卡士洛夫上校），各「旗」都舉行盛大的歡迎，搭起特別的天幕，殺了幾十隻羊，唯恐歡迎應接稍有不週，這種時代是曾經有過的，但今天已經是過去了。對於我們，縱使不被看做敵國的人，至少也是旅行在沒有好感的國家，不能不隨時依靠自己的保護。蒙古當局的援助云云，固然只是夢想，就使親切的招待也可說是不充分的。差不多所有蒙古的商人對於俄國的考察團的態度都帶有二重性。最初俄國商人靠着中央聯合會的援助，在工作計劃上對考察團表示好意，希望獲得相當的便利，後來因為我們的期待看起來已經落了空，就馬上把好意的假面具拉了下來。當然，也有例外的事，我們這個考察團能够順利地完成使命，就多靠P. A. 烏伊支台氏、A. I. 柴布拉洛夫氏及A. V. 布魯德可夫氏等的好意，提供珍貴的資料，確是難能可貴，值得感謝。同時，送給我們許多鉛筆畫的「蒙古人」的速寫的M. D. 哈姆特夫氏，也須特表謝忱。

其次，應該一述關於考察團所蒐集的資料的整理。我們以往關於蒙古的研究，似乎偏重在專門的蘊奧而為

一般民衆很難了解的事物。例如 N. M. 浦爾贊瓦里斯基氏、M. K. 卡士洛夫氏、P. V. 潘夫卓夫等諸氏，專心一意地埋頭於蒙古的地理學，G. N. 朴太寧氏則致力於地理及人類學，A. M. 朴支德尼也夫氏以對宗教的興味爲主，M. I. 波戈萊朴夫，M. N. 索朴萊夫、A. B. 波洛巴恩，及一九一〇年的莫斯科商業考察團，又單純致力於經濟上的研究，至於把所有蒐集得來的資料全部認真地加以研究的，至今尙屬罕見。不單如此，過去研究家們所提供的著述，差不多完全不適用於非專家的一般讀者的。至於普通旅行家的日記，或是瑣碎的原文，或是大部份已經竄改（這種方法爲浦爾贊瓦里斯基、卡士洛夫、朴太寧、朴支德尼也夫等所採用）而後印刷的，單調無味，同一事件反復了數十遍，出現在日記的每一部分。雖然也有曾經研究家相當的修訂或整理，但是終不免學究氣，使普通讀者一看到就給嚇退了。

學問專家們發表真實的「學術」，都帶有野蠻的形式之傾向，實際上這種形式，無非爲着滿足自己的利慾，以知識作商品，保持智識爲「有學問」的少數人的專利時代的遺風，這也只是固守褪了色的過去的惰性的形式而已。十九世紀中有許多大學者，用非常優美的表現法，把深奧的學理通俗化。我們一提到波凱里、托爾克斯、及賴薩爾等的名字，就可以充分明瞭了吧？然而，那些學問上的商人們，却嫉視新進的學者。

我們原有的關於蒙古的書籍，一般的對於民衆具有非常傲慢的態度，所以這次在着手整理考察團所蒐集的資料之時，我會儘可能努力避免歷來研究家所有缺陷。本書的特點，也就在乎此，第一，本書必須把極重要的內容，用極淺顯的文筆寫出來，本書所說的不是考察團的事實而是蒙古，也不是說蒙古的某一部分而是全面地論述蒙古概況。從這種見地，我不僅斷然抽出考察團的日記（日記，我只把它當做一種資料）而且把統計表也放在卷末作爲附錄。同時，本書的中心，雖然放在考察團的主眼的經濟問題，但是對於國家組織、宗教、風俗和地理也相當注重，因而儘量利用我們這次考察團所獲得的資料，以及從前蒙古研究家所蒐集的資料。我們對讀者所提供的，不是全體的某一小部份，而是希望看到作爲全體的蒙古。如果說這一部幸能實現自己的希望

，那就非常可以欣慰的了。

我並不忽視本書的缺點，本書也像別人的作品一樣，有不少脫漏缺陷之處，但是對於差不多不知道統計的國家的報道，對於沒有正確的數字來獲得滿意答復的許多問題的地方，實在只有請讀者諒解。今後我只有希望儘可能地獲得更完全的資料，並且希望像中亞細亞研究家諸氏對於本書編纂之一再訂正先輩的錯誤一樣，來改正我的缺陷和錯誤。這是學術發達上極自然的途徑，學術研究的後裔是站在先輩的肩上的，他們一進入某一時代，又只有讓自己的子弟和後輩來改訂自己的錯誤和缺陷，像自己對父祖們所做的一樣。

蘇聯·斯基

自序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獲得蘇聯與我國的正式承認，從蒙古民族本身說，不能不算是二百多年來艱苦奮鬥的偉大成功，也就是蒙古民族走向獨立、自由與富強的前途的第一步。從中國說，表面上對於漠北一大塊疆域的恢復，似乎不免有依依之情，然而從一百多年來特別是最近數十年來成爲邊境兵連禍結的因素之一的蒙古問題，現在一旦獲得比較合理——特別是符合當代中國最進步的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原則的解決，切實些說，對於中國，並沒有什麼禍害。而且這種解決之有利於今後中蒙民族之間的瞭解與合作，有助於今後遠東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我國對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承認，並不是說我們對蒙古間關係的終結，相反的，這倒可說是中蒙關係的新出發點。從消極方面來看，中國和蒙古間國家的劃定，中國和蒙古間原有紛爭的解決，東北蒙族內蒙和西北蒙族今後可能的動向，以及中蘇蒙古三國關係等等，涉及兩國利害的地方太多了，怎樣合理地解決舊時存在的紛爭和怎樣有效地防止在在可能發生的紛爭，今後一定要比較以前無交涉的封鎖時代更成問題。而且還要特別重視的，是在積極方面，怎樣增進中蒙兩大兄弟民族之間的互相瞭解，怎樣發展中蒙之間政治上防衛上乃至一般經濟、貿易、社會、文化事業上的合作，怎樣鞏固中蘇蒙古之間的國際友誼，以促進遠東北部永久和平與安全，而貢獻於全人類文明與繁榮？這一切問題，如果不注意及準備，前途確是大可憂慮的。

如果這種觀點沒有多大錯誤，那麼，一切的先決條件，就在中蒙兩大民族的互相瞭解。但是，可惜得很，由於滿清王朝差不多二百年間，對於蒙古民族的專橫的統治，由於民國初期十餘年間北京政府，安福系及奉系軍閥對蒙古的錯誤政策，由於最近數十年來中國內憂外患迫所造成對外蒙古的隔絕狀態，更由於長期壓抑及列強影響下蒙古民族對漢族的情感上的憎惡和猜忌，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新聞消息互相封鎖政策，中

蒙民族之間的認識和瞭解，簡直太缺乏了。當然，這種認識與瞭解的缺乏，是兩大民族之間一切不幸和禍患的主要來源，而國際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曾爲着自己對蒙古及全中國的侵略的野心，不斷地製造出關於外蒙古及蒙蘇關係的種種虛構的消息，什麼「外蒙赤化」「外蒙加入蘇聯聯邦」，「蘇聯分割外蒙」等等，這樣更加深化了中蒙民族之間的不瞭解不信任，甚且在世界上造成各種錯覺，而便利了帝國主義者侵略政策的推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已經崩潰了，但是潛藏的日本帝國主義、其他帝國主義者、國際野心家，還在繼承的宣傳和虛偽的報道，而相反的，在我國貧弱的出版界和新聞界，却缺乏關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正確的介紹。這不能不說是中蒙兩大民族所同感的憾事。

本書的問世，不敢說足以彌補這種缺憾，但希望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向這一方面多多努力，那麼，也許不久的將來，這種缺陷終會被彌補的吧。至於著者所希望在這本書裏完成任務，扼要說來：在消極方面，矯正關於蒙古尤其是外蒙古一般不正確的傳說和報道，因爲不論是帝國主義者其代言人惡意杜撰謊言，或是中國學者記者們無意傳播的調調，不僅有害於中蒙兩國的利益，而且也有害於任何欲知真相追求的意志，在純粹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也必須加以廓清的。在積極方面，全面的正確的報道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真相。所謂「全面的」，就在報道這個新生國家的全部——，從它創造獨立國家的歷史原因，國際環境，內政形勢到全體人民的要求，民族、地理、社會、經濟一直到政治與文化，作全面的檢討的介紹，而不以某一部份的某一時期的現象作突出的強調而把另一部份或較大部份的史實與現實加以抹煞。所謂「深入的」，是從歷史的演變，和從民族社會經濟內部現實，把蒙古的一切作切實的報道，而不是根據一時的表面的現象作武斷的論列。所謂「正確的」，就是不憑藉一己的情感或意志，不依據片面的或捏造的報告，而按照實際情形，按「真是真非」的基本原則來說明蒙古的全部，現實，不揚惡而隱善，也不隱惡而揚善，惡還是惡，替它隱瞞是不必要，（而且對蒙古與中國都無利），也不可能的；善還是善，替它隱瞞是不道德的行爲，對蒙古對中國都無利益。但是，由於著者

見識的簡陋，和環境限制，特別是由於實地調查報道與參考資料的缺乏，上面這三點，深愧未能完全做到，也許還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希望有識者多多指示。

本書內容，包括（一）史地概觀（地理形勢，民族歷史，居民概況），（二）國民經濟（經濟結構，財政與金融，交通，運輸，郵電），（三）資源和產業（畜牧，農業，鑛產，森林，狩獵，水產，工業）（四）商業與貿易（國內商業，對外貿易），（五）革命過程（自治運動經過，人民革命經過，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成功），（六）政治建設（民主建國的鬥爭，政治機構，政黨組織），（七）國防、社會文化（人民革命軍，國防設備，社會和文化），（八）獨立和富強的路（中蘇蒙古關係的發展，獨立富強的前途，革命及政治領袖）。此外並有附錄：「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對於蒙古人民共和國，讀此似乎可以獲得一般的認識了。不過由於現實資料的難得，未免尚有遺漏或錯誤的地方，務請識者指教及提供正確資料，以便再版時訂正。

這裏尚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本書卷首的插圖，一部份承蒙蘇商時代日報社姜椒山先生提供，校閱方面承蒙嚴希純張子梁二先生指點及協助，不能不在這裏提出，以誌感謝。「代序」是雷法章先生的講稿。雷先生奉命到外蒙古去參觀全國公民投票，最近在浙江省會杭州發表這篇公開的演講，對於外蒙古，就雷先生實地所見所聞，作公正而坦白的說明，簡明扼要，不但是一篇忠實的報告，可以看出最近外蒙的實情，而且也可作中國當代政治家民族政策最得當的解釋，更有深刻的意義。所以特別轉載在這裏，相信必為雷先生所允許的，願此致謝。此外，蘇聯著名民族問題專家及外交家邁斯基的「現代蒙古」一書，雖早已出版，而在今日中國，尚有翻譯的必要，本書一部份材料，還是取自該書（原書為俄文），因此特別譯出他的原序，附列卷頭，使本書的價值更加明顯些。

最後要說明的是當本書付印作序的今天，適（內子安妮（趙淑芬女士）以腦痛歸天。著者近年埋首腐心於中國邊疆及世界弱小民族問題之研究，如果說幸而稍有成就，大部份實在出於安妮女士之賜。因為近年中國

，一直在戰亂與黨爭之中，作爲一個窮學者而不甘忘自菲薄的著者，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幾乎無一日不在危險和困苦之中。自一九三九年結婚以來，即迭遭大故：父親兄弟，都在敵僞毒手恫嚇毆辱下致死，而著者又遭失業，新婚數月，即顛沛流離於港越西南各地，後更歷經陪都大轟炸及香港之戰，破家蕩產、精力交瘁。當避難瀕瀆之時，著者得以閉門著書，脫稿數百萬言，實在全靠吾妻安妮的艱苦支撐。就因爲她當時軋米軋煤，賣書賣衣，遭受欺凌侮辱，驚懼刺激，強加忍耐，絕不向我訴說。積勞積憂，致患腦痛，而扶病苦幹，務以笑容使我安心研究及寫作，不爲威脅利誘的數度襲擊而稍遷就，祇待勝利後稍吐一口冤氣。勝利一年多了，物質的艱苦依舊，原在意中，而精神上的安慰也因內戰而化泡影，當時編著各稿，大部份仍無法出版，然仍吾妻的勉勵安慰，不發牢騷，繼續埋頭苦幹。著者日夜聞見她承受頭痛慘狀，痛楚幾無一分鐘間歇；而著者以稿費付醫藥，仍感不足，不能認真治療。她亦毫無怨言，不願著者向所識權豪降志乞憐，一似在淪陷時期。直到她血肉全爲毒痛侵蝕以盡今天最後斷氣，一直勉勵著者，爲一個真正的好基督徒，堅持爲真理爲民主爲弱小民族及天下無告的弱者而奮鬥到底。她這樣一個三十二歲的女人，爲了窮困和志氣，終於拋棄她三個幼小的女兒，及天看到自己理想的實現，在大家正需要她的時候，十分不願意地回去了。爲著使她這種未竟的志願更深入人心，著者在描畫這部弱小民族解放成功的小冊子出版之時，略述她的志行，並誌我對她的感激（沒有她當時苦撐相助，這書無從脫稿），大概一定能邀讀者的鑒諒的吧？

潘朗（公昭）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圖略國和共民人古蒙

蒙古文寫法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蒙古文寫法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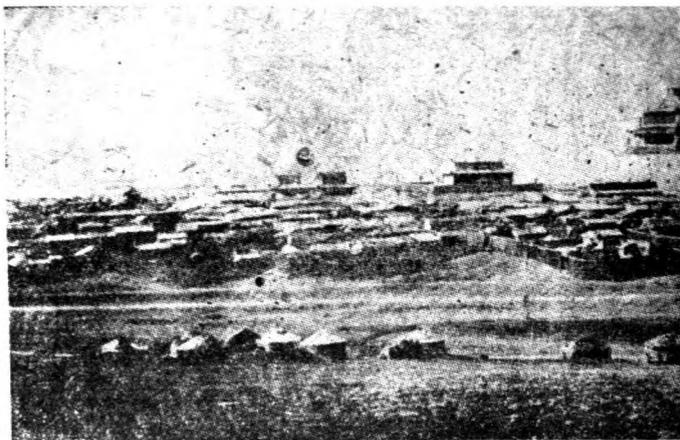


內戰時代「蒙古之王」白俄領袖溫甘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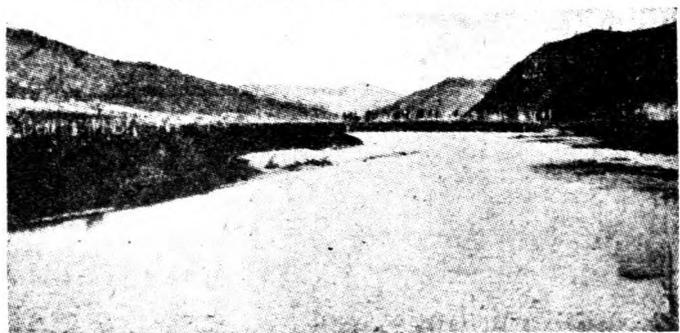
蒙古人
共和國總司令
希巴山元帥



蒙古蘇聯國境風景
(西北邊境阿爾泰附近)



景遠（倫庫）爾都巴倫烏「城之雄英色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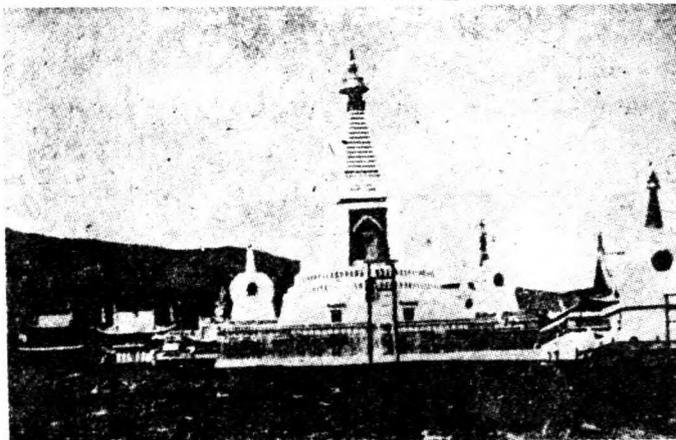
部一之河格楞色——江長的古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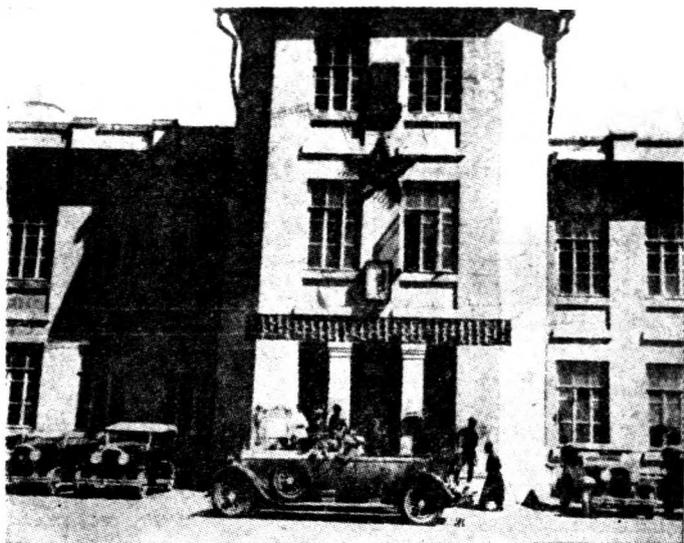
廠工興新之古蒙



蒙人革命軍野營生涯
 (左上古蒙人共國郵票·像為蒙古人共國元勳
 (蘇赫巴都魯氏) 為號「之古蒙列審」)



蒙古民族文化公園
 (舊喇嘛大寺院改造)



門大府政國和共民人古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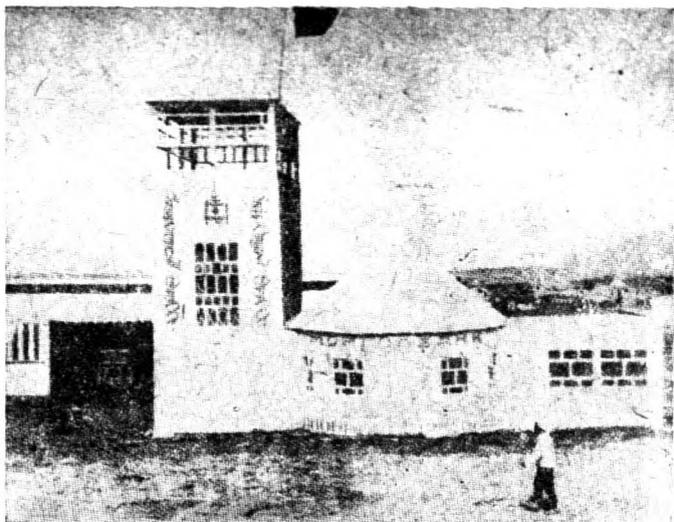
館物博史歷古蒙
(殿宮佛活古蒙前)



羊毛工廠勞工散工外出



蒙古村落小學兒童



行銀古蒙的代時創草



馬其及師騎年少古蒙的團馬賽

675.2
622



目次

史地概觀

地理形勢

境界和面積

地勢

地層

灌溉

氣候

植物

動物

第二章 民族歷史

第一節 中亞細亞的蒙古原始住民

第二節 蒙古人的出現

第三節 遊牧國家的勃興和沒落

第四節 成吉思汗帝國

第五節 種族的離散和對滿族的從屬

第六節 清朝時代的蒙古民族

今日的外蒙 目次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一一
一一三
一一五
一一七
九
八
七
五
四
二

32513

第七節 二十世紀的新蒙古……………二〇〇

第三章 居民概況

第一節 人口及其密度……………二一〇

第二節 人種的構成……………二一三

第三節 蒙古人的典型……………二一四

第四節 生活和習俗……………二一六

第五節 蒙古文化生活中的宗教意義……………二二一

第二部 國民經濟

第四章 蒙古的經濟結構

第一節 國民經濟的基本形態……………二二三

第二節 經濟和社會上的階級關係……………二三四

第三節 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二三七

第五章 財政與金融

第一節 財 政……………二二九

第二節 貨幣制度……………二四四

第三節 金融機關……………二四七

第六章 交通・運輸・郵電

第一節 交通運輸政策的演進……………四四九

第二節 運輸工具和主要道路……………五一

第三節 牛車和駱駝……………五三

第四節 運輸機械化……………五四

第五節 驛道和鐵路……………五七

第六節 水運·航空·郵電……………六〇

第三部 資源和產業(上)

第七章 畜牧

第一節 國民經濟的基礎——畜牧……………六三

第二節 游牧和牧業……………六六

第三節 家畜的分布狀態……………六八

第四節 畜牧業的動態……………七七

第五節 畜牧改革政策及其前途……………八〇

第四部 資源和產業(下)

第八章 農業

第一節 人民革命以前的農業……………八五

第二節 人民革命時期的農業……………九〇

第三節 極左政策時代的農業……………九一

第四節 實施新政策以後的農業……………九三

第五節 農業地區……………九四

第九章 工礦及其他產業

第一節 蒙古工礦業總論……………九五

第二節 礦產資源及其開發……………九七

第三節 外蒙古鑛業的動態……………九八

第四節 森林資源……………一〇〇

第五節 狩獵業……………一〇一

第六節 水產業……………一〇二

第七節 工業一般情形……………一〇三

第八節 工業聯合組織……………一〇四

第九節 從業員的培養和勞動條件……………一〇六

第十節 外蒙古的手工業……………一〇七

第五部 商業與貿易

第十章 商業與貿易概況

第一節 蒙古市場的特殊性……………一〇九

第二節 蒙古的中國商業……………一一〇

第三節 蒙古的俄國商業……………一一三

第四節 蒙古探險隊和「中聯」……………一一五

第五節 蒙古市場上的蘇聯國營商場……………一七

第十一章 國內商業

第一節 革命與商業……………一八

第二節 初期的「蒙生可普」……………一九

第三節 極左政策時代的「蒙生可普」……………二一

第四節 實行新政策以後的國內商業……………二三

第十二章 對外貿易

第一節 革命前期的貿易……………二四

第二節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貿易……………二七

第三節 極左政策和外國貿易……………二九

第四節 實施新政策後的對外貿易……………三〇

第五節 蘇聯在外蒙古的貿易機關……………三一

第六節 蒙古對蘇貿易的動態……………三四

第七節 蒙蘇貿易的內容……………三六

第六部 革命過程

第十三章 外蒙古自治運動

第一節 外蒙古怎樣和中國分離……………四一

第二節 外蒙古的「自治政府」……………四四

第三節 泛蒙古運動和漢人回蒙 一四五

第十四章 人民革命的經過

第一節 反革命的溫甘倫軍 一四八

第二節 民族革命的成功 一五一

第三節 民主建國的開步 一五二

第四節 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一五五

第十五章 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

第一節 建國初期叛亂的肅清 一五七

第二節 初期叛亂及其肅清的總結 一六一

第三節 有組織的反革命勢力的肅清 一六三

第四節 日本侵蒙計劃的徹底失敗 一六七

第七部 政治建設

第十六章 民主建國的鬥爭

第一節 民主鬥爭的出發 一七三

第二節 人民政府的民主政策 一七五

第三節 和左右極端派的鬥爭 一七八

第四節 外交活動的成就 一八一

第十七章 政治機構

第一節	憲法	一八六
第二節	議會	一九〇
第三節	政府	一九二
第十八章	政黨組織	
第一節	蒙古人民黨的簡明歷史	一九八
第二節	人民黨的組織機構	二〇二
第三節	人民黨的黨章綱領	二〇六
第四節	蒙古革命青年同盟	二一〇
第八部 國防・社會和文化		

第十九章	人民革命軍	
第一節	人民武裝的發展過程	二一三
第二節	蒙古建軍的方式	二一七
第三節	軍隊的構成與裝備	二二〇
第二十章	國防實力	
第一節	人民軍的戰鬥能力	二二四
第二節	組織・統帥和給養	二二八
第三節	國防地位與蘇蒙互助	二三二
第二十一章	社會和文化	

第一節 教育事業的進展	一三〇
第二節 文化與藝術工作	一三九
第三節 人民革命與宗教	一四二
第四節 社會生活的改善	一四四
第九部 獨立和富強之路	
第二十二章 中蘇蒙古關係的發展	
第一節 蒙蘇關係的發展	一四九
第二節 中蒙關係的發展	一五九
第二十三章 獨立和富強的前途	
第一節 中蘇合作與蒙古獨立問題	一五九
第二節 公民投票一致決定獨立	一六一
第三節 中蒙友好關係的新時代	一六四
第四節 蒙蘇友好的關係的新發展	一六六
第二十四章 革命及政治的領袖	
第一節 開國元勳——蘇海·巴都魯	一六九
第二節 現任總理——喬巴山元帥	一七〇
附錄：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	

今日的外蒙

(蒙古人民共和國)

第一部 史地概觀

第一章 地理形勢

第一節 境界和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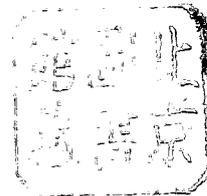
蒙古位置在中央亞細亞的東北部北緯三七·三一度至五三·四五度，東經八五·二〇度至一二四度之間。蒙古在地理學上說，是相當高的高原，這裏距離海面達四千六百呎。蒙古高原的四面，包圍着的山脈，自然形成這個國家的天然形勢和人種上的境界。俄羅斯阿爾泰各山脈、唐努嶺及肯特山脈，和它的東北方面支脈鄂嫩達布，造成蒙古北面的圍牆。大興安嶺是蒙古的東部境界，蒙古阿爾泰或戈壁阿爾泰的大山嶽，構成西部和西南部的境界。

圍繞蒙古的這些連綿高聳的山岳地帶，只有東南部有斷絕部分，而突出於蒙古高原之邊境的陰山，差不多和萬里長城交界，東部是華北平原，西部和鄂爾多斯沙漠接壤。

蒙古的境界線總延長約達八千六百俄里，其中西部及北部從蒙古蘇聯國界線到出現於烏梁海地方的杜芬共和國的境界線，共為二千九百俄里，和中國本部、東北、阿爾泰地方及新疆省，所有東南邊境為五千七百俄

第一章 地理形勢

772.36
754
3



(南)

里。(每一俄里Versta合一·〇六七公里)

上面所說蒙古境界，包括有廣袤二百七十八萬方公里的地域。約當戰前德國面積的五倍，或歐洲全部的分之一。

第二節 地勢

蒙古在地勢上可分為三區，換一句話說，可分為：西北蒙古或蒙古山岳地帶，東南蒙古或蒙古平原，及戈壁沙漠之一部分的鄂爾多斯。這一廣大的地域，大體上成為向南方傾向的廣闊的山岳地帶。西北蒙古的平均高度為五千呎，東南蒙古為三千七百呎，而戈壁蒙古不過三千一百呎。

這個國家的西北山岳地帶，給一些平行的邊境山脈的支脈和高聳的台地從西北向東南隔斷了。這些山脈差不多一樣，都超過了降雪線，離開海平面一萬五千呎，這裏有蒙古阿爾泰山脈裏的泰平博格達山峯可為標準。在唐努山到鄂爾渾河之間四百俄里以上的北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帶，除了邊境諸山脈的支脈之外，橫互着火山性的獨立的國內山脈——杭愛山。向東到烏布薩湖畔蜿蜒二百五十俄里的杭柯柯山嶺，和杭愛山的北面比鄰相接。

西蒙古高原之中心地區的各大山脈，給比較狹隘的盆地和低地切斷了，這裏奔流着蒙古江河的急流，這裏也有澄清的山地湖沼。

北蒙古高原的西南部，是一片連互的蒙古的戈壁沙漠即大戈壁，——這是中央亞細亞廣闊無邊的沙漠地區的典型，連互數十俄里的戈壁的北部，到處現出分岐的砂丘。這裏有查普與河和杜爾加湖之間寬達三十俄里的沙洲地帶，還有「富爾琴·戈壁」等等。

在西北蒙古，除了沙漠之外，往往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花草繁茂的大草原地帶，這種地方往往有數十俄里

之間找不到一點水，要經過這種「綠地沙漠」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國學者A·卡里尼可夫（註）早在一九一九年經過這種大草原時，曾經在日記上寫道：「綠地沙漠躲在可以燒燬蒙古那樣的太陽的炙熱下面。一丈多高的繁茂的雜草，一點風的氣息兒也沒有，投給旅行者的只是灼熱。灼熱的空氣和十惡不赦的太陽，弄得人困馬乏，四周是那麼令人乾渴的靜寂。除了奇怪的野兔子那樣刺耳的尖銳的鳴聲，一切都像死了一樣。恰像住在德倫哈爾那樣酷熱的曠野。」

（註）他在一九一九年參加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為調查蒙古經濟而到蒙古去的邁斯基調查隊。

東南蒙古是在肯特山和杭愛山系東及東南地區。從這一地區的地勢的特質來說，由於低地層和特異的山巔，到處有間斷的波狀平原。波狀的起伏帶為其中央的水平地，一面是大興安嶺、陰山及肯特山南方傾斜的山麓，直到這個國家的東部境界，是極好的牧場。

蒙古戈壁地區，沒有草原地區的雜草，更沒有樹木，只是一片曠野，從東北到西南，互長達一千公里，而從西北到東南，則約有五百公里。這一大片面積，位於這個國家最深入的中心地區。蒙古戈壁和具有兩倍以上的廣袤的中央亞細亞的大戈壁沙漠相連，這片大沙漠從帕米爾一直到黃河中流，一面從崑崙崙及阿爾金山迤邐到天山及格里山諸山脈。

噶爾賓戈壁沙漠，在蒙古阿爾泰山脈之東南端和陰山山脈之間，是從蒙古戈壁到大戈壁的荒涼的曠原的門戶。A·卡里尼可夫在一九二〇年曾經貫穿庫倫和中國一大都會——戈壁的最南端、中國本部的張家口——之間的東端，作一次蒙古戈壁的旅行。長達八百俄里以上的全部旅程，都用汽車通過了。東部戈壁的砂礫質的地層，可以駕着汽車，暢行無阻。至於駱駝隊商，最快也得走上二十五天至三十天；這一大曠野，由福特式的汽車，開足速度，那麼只要兩三天就夠了。

蒙古的戈壁，並不就是所謂沙漠。這個地層的大部分，是由石英、瑪瑙、肉紅玉髓及玉髓之細片分化出來

的砂礫和紅色的砂屑所構成的。有時完全是砂，所以在沒有江河的荒涼地帶，也會偶然看到砂洲。蒙古戈壁的大部分，有短而軟的雜草所掩蔽，但是由於那些足以妨礙其他草木之類的發育的戈壁颱風，這些雜草也沒有法子生在戈壁壁上生根。所以蒙古戈壁的風景，可以用單調兩個字描寫完結，但是也不失其特別的美和雄壯。旅行這種荒涼的曠原，往往幾個星期至幾個月，所接觸到的事物永遠是一樣的。在那些山地、小灌木林、罕見的草類、砂丘、斷崖及峽谷等等中間，簡直和廣漠的北海海岸的波濤一樣的單調，都是這些東西的一貫的連續。偶然在砂丘之間，也會發現蒙古人稱呼為「古德伽爾」的多分含有砂石的鹽沼和窪地。戈壁上所有動物，完全靠着這裏吸取必要的鹽分。

陰山的東南部是鄂爾多斯高原。這是占有十萬平方公里的四邊形的高原，世界最大江河之一的——黃河，三面繞流，它的南面有萬里長城遮蔽。鄂爾多斯高原是從俄羅斯阿爾泰和薩彥山脈高地向中國平原傾斜的臺地的最後的層丘。

在鄂爾多斯高原，有許多突出在不少砂原與湖沼的平原的地平線上面約十呎至三十呎的丘陵。

鄂爾多斯砂洲繞黃河而至西面甘肅省的曠野，延長達五百俄里以上。

第三節 地層

蒙古的地層，是由原始時代的第一期要素即片麻岩及花崗岩，和石英、石灰岩、火成紀片石、玄武石等熔岩之後期成層構成的。早在地面尚無任何生物存在的太古時代，原始海洋的波濤，掩蓋住現在已成戈壁的曠原。在北部蒙古高原，是在現今葉尼塞與阿爾貢兩河之間的初期大陸的南端。據地質學家們說，原始海的乾涸，是從以前白堊時代告終之時開始的。當第三期時代中期，北冰洋和原始海還是彼此連結的，從那時起，位於現今騰格里山脈的海峽，才開始最初期的乾涸。乾涸中的大海，就說現在吧，在蒙古西北部依然在繼續乾涸之

中——例如烏布薩湖、基爾格斯湖等，已變成幾個大鹹湖了。

蒙古西北部地方，以砂性土壤、砂岩、粘泥及粘土質的地層占有壓倒的多數。砂質的粘土地是因為許多大河流經而構成的，但是因為缺乏黑土層，爲着開發農業，必須改造最優良的土壤。

在蒙古東南平原的地層，是小石和砂屑構成的，而在戈壁地帶，則是由北部許多山嶺從好幾世紀以來自然風化而沉降的硅石質的粉土黃土性粘土所構成的。

土壤層在蒙古任何地區都很薄，不出兩至四俄寸（Вершок，合四·四四五公分）。地層在蒙古西北若干地方，還只在構成期，一方面，地表面現在也只不過漸漸由小石和砂礫所鋪成的了。

第四節 灌溉

蒙古西北部山岳地帶的灌溉，分爲江河和湖水二種，其中大部分流入北冰洋。色楞格河（由倭帖爾河和德勒格爾·穆陵河合流而成），集中了蒙古的河水的大部分。這個流域中最大的河——色楞格河注入貝加爾湖，再經安加拉河和葉尼塞河而注入北冰洋。蒙古境內的色楞格河的流長達九百俄里，其流域包括支流在內，圍繞了四十萬平方俄里以上的曠野。色楞格河的寬度，在倭帖爾與德勒格爾·穆陵合流之地約七十俄尺（每俄尺約二·一三四公尺）。

色楞格河的右邊的支流有鄂爾渾河及其許多支流，如土拉河、伊羅河、哈拉戈爾河等等。至於從庫蘇古爾湖流出的葉琴戈爾河，則由左面注入色楞格河。

蒙古西北境內，除上述之外，尙有在國內排水的好幾條江河。其中大部分是向科布多地方各湖泊灌注的江河。蒙古國內排水最大的河——帖斯河或台新戈爾——發源於杭愛山，會合許多小河，注入周圍約達二百俄里的廣大的烏布薩湖。

基爾格斯鹹湖在烏布薩湖的西南，通過五俄里的支流，有淡水湖阿伊里克湖。基爾格斯湖城周圍百俄里，阿伊里克四十五俄里。連結這兩個湖的水路，是柴普亨及昆地這兩條河。柴普亨發源於泰爾博克達，而在它的中流和下流，每當夏季，常常合併了改變河床的若干支流。

哈拉烏斯和杜爾伽湖，在基爾格斯與阿伊里湖更要南面的地方，經過了阿拉克湖，有一條小河使兩方互相溝通。淡水湖哈爾烏斯，挾有從蒙古阿爾泰的冰河降落下來的激流的溪澗，注入柴普亨河的小河，多從杜爾加鹹河下流，所以科布多地方所有湖水自成一個體系，其流域和注入該河各支河共約三千平方俄里。

庫蘇古爾湖周圍一百二十俄里，寬三十俄里，四面都有山圍住，在離開薩彥山系的主脈十俄里的地點，當蒙古國境最北部。庫蘇古爾是淡水湖，保持相當的澄清，湖中有許多魚類棲息着；就在湖水深底，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庫蘇古爾湖平均深二百至二百五十俄尺，所以極便於航運。而湖水滄滄，山光秀拔，風景之美，也不讓瑞士各湖；只在秋天暴風雨季節，這裏的湖水彷彿又回到海洋時代了。

蒙古東南部的灌溉，差不多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在這廣袤的平原上，灌溉情形是極不平衡的。國境山脈附近的邊境，興安嶺山麓的草原地帶，頗受灌溉的天惠。蒙古平原最大的河——克魯倫河，發源於肯特山脈，其流長約達一千俄里，向東南流，流入呼倫湖，而另有小河——海拉爾則發源於此湖。還有一條在蒙古境內流域約達七十五俄里的奎屯河，在氾濫時期和克魯倫河合成一體——成爲流入太平洋的江河。

小湖泊在蒙古東南的草原地帶，幾乎觸目皆是，而尤以興安嶺的南麓爲最多，湖水在蒙古平原的東部地區爲淡水，西部則概爲鹹水。

蒙古戈壁地區的灌溉非常不夠。這裏沒有淡水湖，也沒有其他別的江河。但是這裏却有地下水以補灌溉不足。在戈壁的東部地帶，如果要用水，可以掘下五至十呎，就可以充分獲得。而從庫倫至張家口全部旅程上，有所謂「胡德卡」，就是特別的「沙漠中的綠洲」的水泉，周圍自青色繁茂的原野之草「台里斯」，到處湧出

砂泉。

鄂爾多斯的灌溉，大體上和大戈壁的情形相同，水是太少了，太不充分了。除了繞流於鄂爾多斯三面的黃河之外，差不多完全看不到什麼水源。雖然有幾個湖泊，又都是鹹水的。

第五節 氣候

蒙古的氣候，恐怕要算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了吧。除了極高的山岳地區之外，從全體來看，這個國家在夏天，有如蘇聯南部地帶一樣的猛烈的酷暑，夏天的氣溫也在列氏四十度以上。

但是，可為蒙古氣候的特質的，是氣溫激烈的變化，不單是因四季而異，就是在一晝一夜之間，也有極大的變化。如果在六、七月間旅行蒙古的時候，白天只穿一件繭綉的襯衫還以炎熱為苦，可是一到夜裏，却要穿皮毛的外套了。

照慣例，蒙古只是在冬天下雪，受着西北寒風的影響，雪在蒙古的山野是積不起來的。而乾燥的風，却使嚴寒的蒙古之冬，實在有點令人難以忍受。

蒙古的氣候，從全體來看，以天氣之極度的乾燥，為其顯著的特質。蒙古的降雨降雪是非常稀少的。高聳國境方面的崇峻的山脈，把從大洋方面吹來的暖氣擋住了。最大的降雨是在七、八月間。往往會是一落數天的暴雨和大雷雨。

蒙古的東南平原上，在北部和西部的邊緣地方，是薰風（即印度洋方面吹來的季節風）地區。夏天在這地方容受太平洋的風，使氣候多少為之暖和一些。

春天在蒙古，是從五月開始的，但早在八月中秋，夜裏已開始下霜了。九月起就常常會下雪，十月起，就完全是冬天的世界了。而北蒙古的常年平均氣溫為零下二度，和科爾格也夫島，潘爾姆斯卡亞灣等蘇聯最北地

方的氣溫一樣。

據一九二九年一二月份的「蒙古經濟」雜誌所載，首都烏倫·巴都魯·霍泰（意為「紅色英雄之城」，即庫倫）。的一年間的氣溫（列氏表），大致如下：

一月	負二四·五	七月	一九·一
二月	負二〇·一	八月	一五·五
三月	負九·四	九月	八·九
四月	二·四	十月	負一·四
五月	九·三	十一月	負一二·四
六月	一五·九	十二月	負二四·〇
全體平均	負一·七		

大體上和蘇聯的伊爾庫次克地區的氣溫類似。

第六節 植物

蒙古的氣候乾燥，從全體來說，幾乎是不適合於任何植物之生長的。森林地帶只在蒙古西北部山岳的北方斜面那些低地上可以看到。這些森林，一般的都不很大，而且不會擴展到四十八緯度線以上。樹木以松柏科的西洋杉、落葉松、樅、松等為主。闊葉樹有高山楊柳（不到一丈的矮柳），阿卡西亞（小灌木），石南類，接骨樹，虎耳，醋栗樹類等等。

至四八緯度綫以南戈壁為止，都是草本植物的世界，這裏完全是「雜草世界」。雜草茂生於山的斜面和谿谷之間，高與人腰相齊。所以一般中國人都叫蒙古為「草地」。蒙古那些彩色紛紜的草，種類很多，大部分是

藜苜蓿、附子花、大麥、野生葱等等。

這個國家的南部和東南部，因為受到溫暖的季候風和多量的雨水的影響，生長着極其豐富的草本植物，而雜草在這裏也特別豐富，青草蓬勃，可以隱藏牛羊人馬。這裏也有樹木類，有如楓、榆、白樺、白楊、野生李、及野生桃等等。

在蒙古戈壁粘土性及砂礫性的土地上，差不多連雜草類也不見生長，由於戈壁風的不斷的吹襲，只有一些生就像鉛絲那樣的地下莖和枝幹矮小的雜草，才勉強能夠在這裏生存。

第七節 動物

蒙古的動物界和中央亞細亞的一般動物界可算是大同小異。在蒙古的西北部，棲息有狂暴的熊、鹿（小鹿）、野猪、紅狼、狗、土撥鼠的一種，以及羚羊之一種「德賽羚」等等。西北蒙古還可以看到別的野生的驢子，即所謂「庫蘭」的行列，有些地方還有山貓、野生貓、栗鼠、穴熊及其他無名的野獸。

在蒙古東南部，普爾什瓦爾斯基把它看做具有「另一個動物界」的特質的地區，有六十七種野生哺乳類和十一種家畜類。

鳥類界在蒙古也相當豐富，據普爾什瓦爾斯基考證，共有二百九十種鳥類。其中分布最廣的，是鶻、鸞、鶴、野雁、鳩等。水鳥方面尚有野生鵝、鴨、白鳥、山鵲等，夜間活動的鳥類，有梟及大鴉鵂等等。

爬行動物以棲息在戈壁方面的為主。這裏大約有二十五種蜥蜴類。大蛇在蒙古比較少見，分布最廣的要算是庫頁島蝮蛇之類。

蒙古的家畜有馬、駱駝，有大有角獸、山羊、羊及犬等，都以蒙古土產著名。

蒙古的江河湖泊中，也有相當豐富的魚類，主要的是鮭，即狗頭魚，「哈里烏斯」(Harius, 學名爲Salma

otymalus。爲鮭之一種），西烏卡（梭魚之一種）等等。

第二章 民族歷史

第一節 中亞細亞的蒙古原始居民

現在蒙古人的地盤——北起唐努烏梁山脈，貝加爾湖及鄂爾渾河，南至萬里長城及西藏高原，這廣闊的地域，從太古時代起即爲亞洲的遊牧國家的搖籃之地。中亞細亞的突厥族和通古斯族，在這裏成敗興亡，經過整整的十二世紀。自公元前三百年興起至公元一世紀告終的匈奴帝國，是其中最有勢力的。突厥·奧古斯的勃興，是從第四世紀開始的，短期間完成了對中亞全境的支配。突厥·奧古斯帝國的國境，東起太平洋，西至歐洲，北至貝加爾，南達西藏，而且，它的遠征隊，又往往侵入亞速海，又和君士坦丁堡訂立同盟。

八世紀的初期，突厥與古斯帝國爲它的北方之鄰同爲突厥族的回紇（即今新疆最大民族維吾爾族）所滅亡，接着是暫時在中亞大草原及高原上稱霸的吉爾基斯人（即黠戛斯人），自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代回紇而起。

第二節 蒙古人的出現

蒙古人繼吉爾基斯人而出現。蒙古人在十二世紀以前，在中亞細亞的民族史上，並沒有什麼令人注目的事業。他們最初的遊牧地，是在今汗·亨第盟之東北至嫩江與鄂爾渾河上遊，克魯倫河沿岸一帶。

關於蒙古人的初期的歷史資料，可以從公元六百十八年至九百〇七年間君臨中國的唐朝歷史「唐書」中看到。這部年代記裏指蒙古人爲「望羣蒙兀」。十世紀至十一世紀的宋朝的年代記「宋書」裏，已簡單地稱之爲

「萌骨」、「盲骨子」及「蒙古里」。蒙古人自己關於古代歷史，沒有留下什麼紀錄。只知道他們最初遊牧之地是在克魯倫河畔。蒙古人把自身的起源，用宗教的傳說和故事來加以粉飾。有一種傳說，蒙古人始祖是由灰色的狼和牝鹿交合而誕生的。而另有一種傳說，則把一個和天上的「騰格里」（聖靈）發生神祕的結合的寡婦阿倫姑嫜所生的布·騰札拉，作為蒙古人的先祖。後來這個布·騰札拉的第八代後裔——也速該巴都魯率領許多種族在廣闊的領域上從事遊牧。因為成吉思汗這個名字而更加出名的鐵木真，是這個——也速該的兒子，蒙古人的名聲轟動了全世界。

今日蒙古人的歷史，是從成吉思汗的時代開始的。成吉思汗在十二世紀後半期，誕生於克魯倫流域的平原。也速該臨死時，他只有十三歲。這個十三歲的少年，就不能不幫助母親，把父親死後叛離了的各種部族團結起來。種族的團結，在一二〇六年完成了，於是成吉思汗自號「大汗」，並且把混合各種族而成的自己這一民族，正式稱為「蒙古人」。

第三節 遊牧國家的興盛和沒落

中央亞細亞各種族，從這時期開始，再度躍進強盛的運動。比較平穩地居住在克魯倫及鄂嫩河畔一帶的蒙古人，經過了緩慢的國民財富的蓄積過程，這種粗笨的牧畜業成為中亞細亞國民全體的國民經濟的中樞。遊牧民族生活上必要的一切，都寄托在自己飼育的馬羣和一羣羣大大小小的家畜上面。馬是遊牧民族的交通工具，肉是糧食，又能提供牝馬的乳及其製品；又如牛，兼為糧食、衣服，而且往往又能供給便於移住的輕量的住宅的建築上重要的材料。

畜牧是最基本的。畜羣的滅亡，意思就是這一家族和這些遊牧經營者滅亡。話雖如此，遊牧民對於畜羣，却並不見到怎樣善於看護。例如妨礙牠們的增殖。又當停留的地方，家畜的自然的飼料——草被吃盡了的時候

，又不得不去追求新的飼草地，到那尚未踏毀食盡的地方去，人們追隨在畜羣的後面。

這種粗笨的畜牧制度，對於不斷地移動的游牧民族和他的畜羣，必須有極廣泛的遊場。在這種經濟制度中，平均要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必須有大約四分之三平方公里的牧地。由於住民和家畜的逐漸增加（外部的及內部的傾軋或由於自然力而發生的災難，曾經加以抑制），同樣又引起了所占領的土地的不足，結果無法飼養增加了的畜羣。牧民遭遇到這種所謂相對的人口過剩的襲擊，必須增加牧地的面積，擴張自己的游牧地，這時提出了改變畜牧為集中經營的方式，或轉向農業經營的矛盾條件。關於前者的解決辦法，倒是單純而容易的，因此就展開了侵略主義和各游牧民族之集體的活動。相對的人口過剩這種不可抗的過程，成為貫穿十二世紀的中央亞細亞游牧帝國史的主要原動力，又成中央亞細亞大游牧國家猛烈興隆的原因。

各種族把他們的游牧地的領域，擴大到大帝國的限度，那裏暫時可以排除牧地狹隘的困難。但是這種牧地狹隘化的災難，在排除後不久又會發生。這樣周期性的恐慌的襲擊，使一個民族往昔的精力和勇敢逐漸衰退，開始像崩潰一樣地失勢了。自然經濟的框子，除了武力，沒有別的可以獲得擺脫它的法子。大帝國這雙種子逐漸腐爛，以致陷入崩潰的命運，另一方面又以相對的人口過剩的壓力，不得不受到努力擴張牧地的隣國的打擊。發展的第一個循環就此告終，一方面向自己的領土獲得擴張的新的種族，基本上還是逃避不了這種緩慢的國民財富蓄積的經濟過程的影響。牧地的狹隘，又以人口的增加而激烈起來。後來，這種相對的人口過剩，和一切跟着而發生的各種結果，對於激烈化的牧地問題，又不得不開始新的暫時解決的辦法。

在中亞細亞廣漠無邊的曠野裏互相交鋒爭鋒的匈奴帝國，突厥（土耳其）奧古斯的運動的勃興，回紇（維吾爾）及黠戛斯（吉爾吉斯）民族游牧國家等等之擴張牧地，這些民族鬥爭，無非都是為此而發生的。

以上所說出的，是沒有排除那些促進了中亞細亞諸游牧國家之興亡的一連串的原因，對於粗笨的畜牧經濟時代，相對的人口過剩，根本上還是存在。甚至十八世紀內從突厥·奧古斯族到滿洲族一切民族的集團的運動

，恐怕也完全由此而發生的。

第四節 成吉思汗帝國

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民族的運動，是由於擴張牧地的熱望而捲起的，蒙古族自一二〇六年至一二一三年，併吞了鄰國回紇、高麗、唐古特、金及東土耳其斯坦諸民族的領土。蒙古的大軍，由成吉思汗統率着，在一二一三年秋天，對中國北部實行第一次勝利的遠征。一二二〇年——一二二四年間，蒙古民族又從布哈爾及霍拉茲姆，征服了霍羅薩恩、伊拉克及亞美尼亞，一面又到達印度河、波斯灣及高加索，支配了廣大的領土。這個民族的一部分，還從這裏出亞速夫海沿岸之大草原而侵入南俄羅斯，在卡爾克河和俄羅斯諸侯激戰，打败了波羅威茲人。但是成吉思汗自己却在不久之後（一二二七年）死了。

成吉思汗不單是當時的英勇的統帥，而且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在多數從屬民族與種族中出來的國家中，實行了嚴格的秩序和內部的各種組織。這些被蒙古族所轉屬的一切種族，構成軍人的身分，而在平時又服從各種義務。隸屬於蒙古族的一切領土，爲着更大的治績，分割王公的領土，成吉思汗把這些領土分配給自己的子弟們。

蒙古人的侵略運動，在成吉思汗逝世以後，仍舊繼續進行。人口過剩的不可抗的壓力，刺激了蒙古族。對中國北部的侵略，由成吉思汗的後繼者窩闊台代他完成了，金國因之滅亡。一二三七——一二四〇年間，蒙古族在西部也把自己的領土大大地擴展了。蒙古族的大部隊，蒙古族的大部隊由窩闊台的姪兒拔都統率，征服俄羅斯，劫掠波蘭和匈牙利。後來因爲窩闊台的逝世，使他們的西進運動，逐漸中止。蒙古人的領導者，都爲着參加新皇帝的推選，不得不從中央亞細亞的草原歸去了。

都市喀喇和林，是當時蒙古的首都，它位居鄂爾渾河畔蒙古領地的中心，是由中國工匠們替窩闊台建設起

來的。當時世界政治的一切系統，都集中在這裏，決定一切隸屬於大征服者的無數民族及種族的運命。一二四七年，有奉使喀喇和林的羅馬教皇的使節浦拉諾·喀魯賓，一二五四年又有訪問喀喇和林的聖柳德維克的使節僧魯布爾克維斯，至一二九四年又有歷史上著名的旅行家馬哥布羅，盛稱宏大無邊的蒙古帝國首都喀喇和林的稀有華麗和整齊。

喀喇和林是當時文化與文明的中心地。俄羅斯及英吉利的建築家、巴黎的黃金工匠職工等，都會服務在蒙古大汗的宮廷裏面，並且還集中了藝術家、美術家、醫師、數學家、天文學者及各國的旅行家們。魯布爾克維斯訪問喀喇和林的時，那裏共有十二座異教徒寺院、二座回教寺院、一座基督教會。

成吉思汗後第四代的大汗忽必烈時代，蒙古族又征服了中國，攻略越南及西藏。忽必烈把首都遷移到新的地方——中國的燕京。一二一七年，忽必烈建立了蒙古王朝或燕京王朝的基礎，宣布自己是中國皇帝。

蒙古族不只是勝利的征服者，而且是極巧妙的支配者。他們一直到十四世紀告終，保持着他們的隸屬民族，種族和龐大的領土。但是，由掠奪方法蓄積起來的財富的增進，逐漸腐敗了偉大的征服者的勢力和統一。精悍的遊牧民族，慢慢地流為柔弱遊惰了，性格已經腐敗，蒙古人以往的活動力已經衰弱了。同時，到了這個時候，用武力來抑制的複雜的民族混淆的內部的各種矛盾，也逐漸增加了。成吉思汗帝國的沒落過程，跟着開始了這個帝國結合力的脆弱化。

金帳汗國最先叛變，接着波斯也分裂出去了。而漢族到了十四世紀，也起來把燕京王朝趕出中國，建立起新的漢族統治——明朝。

蒙古族的歷史，從這時起，差不多已開始踏進完全的現在蒙古領域的限界了。不過蒙古大汗一直到十四世紀初期，不斷地和繼續着來的明朝戰爭，結果被趕回蒙古舊時的領域，放棄對中國的主權，把王朝的命名燕京也遷回以前的「大灘」。

第五節 種族的離散和對滿族的從屬

西部蒙古民族或所謂衛拉特，到了公元十五世紀，就從一般蒙古族的集團中分離出來。由於相對的人口過剩的影響而動搖了的衛拉特開始東進，在短期間席捲蒙古全境，俘擄中國皇帝，再三給中國以殘酷的打擊。

最傑出的衛拉特的皇帝葉賽恩逝世的一四五四年以後，領導權才再度回到東部蒙古民族的手裏。以王公領土為中心的蒙古國家的分裂抗爭和蒙古人之南北分離，也就是從當時開始的。因此，中亞細亞大草原，到了十五世紀後半期，形成五大支派的蒙古游牧民族——即北部的喀爾喀派、南部派和西部的衛拉特派——對立互爭的局面。

南部蒙古，在一五八二年分裂為二部，一方面是把四十二個王公領地再度分割的西南派，又一律喪失其獨立性，向中國中央開始朝貢。

十七世紀，從北部出來的新的征服者——滿洲民族，打倒了察哈爾汗賴克頓，宣誓要把東南蒙古人放在自己的統御下面，滿洲族把察哈爾及其他南部蒙古族土默特人編成綠旗軍，利用以征服明朝皇帝，並藉以強化中國的軍隊。

西部蒙古族即衛拉特族，那時會有長期間的孤立。十七世紀初，霍休扈特族就從這個部族中分離出來，去征服了阿姆德及西藏中央區。土爾扈特族則轉向葉姆巴、烏拉爾及伏爾加諸流域取得新游牧地，後來就定居在伏爾加河畔的大草原上，以卡爾姆伊克族出名。

北部蒙古即喀爾喀部，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間，只有依據族長制度的血屬關係而互相結合的五十二個各自獨立的王公領地或「旗地」。這個時代的喀爾喀族，因為失去統一而分裂和衰弱，還不斷地形成周期性的爆發對衛拉特部的鬥爭。

到了十六世紀，喇嘛派佛教開始侵入喀爾喀族，這些傳教師們受到喀爾喀族的部族長的庇護。一五六八年，第一所喇嘛寺院——葉爾頓圖，在距離從前的喀喇和林不遠地方的鄂爾渾河流域建立起來了，不久之後喀爾喀全族所居各地，已經充滿了大大小小的寺院。

和衛拉特人不斷進行的鬥爭，一到十七世紀末葉，再度緊急起來了。衛拉特族在平定了準噶爾（天山北路）全體在噶爾丹氏的統率之下，對喀爾喀族進行了好幾次殺戮的掠奪。喀爾喀族因為沒有自衛實力，到一六九一年就投降了滿洲族。當時的滿洲族，完成了侵略大明王朝的軍事，已經在中國打定了所謂大清或滿洲王朝歷史出名的二十二代王朝的基礎。

滿洲族在十八世紀後半葉，出動對衛拉特的準噶爾族的征服戰，至一七六六年，就因連戰連勝而打敗了他們，衛拉特最後一個部族長阿穆爾薩那敗死之後，滿洲軍隊就長驅進攻準噶爾，這裏的居民，大部份都慘遭屠殺。衛拉特族的運動，就在用侵略主義打破相對的人口過剩，以圖挽救不可抗救的末運。衛拉特族因為牧地非常缺乏，不得不企圖向東方擴充牧地，但是因此不得不和新興的滿洲民族的勢力發生衝突。滿洲的軍隊有若干技術集團參加，因此保障了他們的勝利，在戰場上完成了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等的城塞設備，又在鄂爾渾、卑達利克及拉都斯河畔，完成了一些小城塞設施。城塞設備不單是為了防止衛拉特人的侵入，以保障滿洲族的勝利，而且作為滿軍漢軍對西方活動的根據地了。

衛拉特族對滿洲軍的優秀的技術和軍務進行了七十年的英勇的戰爭。直到後來阿穆爾薩那的失敗，騰格里亞方面一族兩大部分慘遭覆沒，才漸漸收兵。衛拉特的游地經此慘敗之後，一部分為吉爾基斯人（即古時黠戛斯人）和從伏爾加河流域回到故鄉來的土爾扈特、卡爾姆伊克人所占據，殘餘的衛拉特人因為在十八世紀擴張牧地運動失敗了，大部分開始轉向而從事農業，至今還在騰格里亞方面生活。別的衛拉特族，即杜爾伯特、額魯特、明基特、札哈欽恰興、特羅欽、及土爾古特，則在唐努山南斜面向阿拉善及青海一帶大曠原地各一綠洲

「地區從事游牧。

第六節 清朝時代的蒙古民族

中央亞細亞的歷史的局面，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慢慢地却是根本的轉變。滿洲人和漢族的勢力，一天天的強大了。大清朝、滿洲人的政府和漢族的商業資本，對蒙古人進行猛烈的榨取時代，是從十八世紀的開頭十年開始的。

滿清政府當喀爾喀屬歸的初期，爲着鎮壓中國方面對大清朝的謀反，曾經保持蒙古人的武力，禁止漢人居住北滿一帶，並且在喀爾喀支持具有歷史的複雜的王公統治的根本方針。

喀爾喀實行歸屬滿洲的時候，世襲王公和成吉思汗的子孫所支配的二十四「旗」——王公領地，已經消滅了。各「旗」成爲依據各該「札薩克」（支配者）最近的血屬關係，而擁有「汗」的稱號的各盟之主所主宰的特殊的領地羣所合併成的「盟」。各「旗」相互間的結合，在歸屬滿洲的時候，已經比較衰弱，但是凡遇有關全盟的事情，通常還是要召集全盟會議——即各該盟的各旗首長的全體會議。滿洲政府對於蒙古的行政組織的大綱，不採干涉主義，但是爲削弱各盟的統治者的地位而實行有計劃的政策。即增加「旗」數達八十八旗，各別劃定一定的領土，從大「汗」到小小的「札薩克」，一律和王公的權利平等。此外，並制定對一切王公由北京國庫發給一定的俸給。由於這種方策，把蒙古一切王公完全操在自己手裏了。用官位、勳章和表章等等對蒙古王公的褒賞制的規定，只在作爲懷柔政策，而爲越發加強這種隸屬關係計，滿洲王朝又規定了蒙古人一直保持的遞降式的六級王公的稱號，即（一）親王（二）郡王，（三）貝勒，（四）貝子，（五）土錫公，（六）公。所有這種王公稱號，都用帽子上所佩用的玻璃製的頂子的色彩，作表面的識別。

規定稱號的懷柔政策，曾在蒙古王公中間捲起了極大的混亂，以爭取中國皇帝的寵幸爲中心，開始展開了

陰謀，相互嫉視及鬥爭。

懷柔的慣用手段之一，就是由滿洲宮廷的公主出嫁給最有勢力的蒙古王公，那時就可以賜與名譽的「霍賽夫」（駟馬，即皇塔）的尊稱，還給與充分的物質上的享受。

此外，滿清王朝又對各「旗」的統率者給與一定的尊稱，而且這是世襲的。至於沒有名譽和稱號的王公，則保持「札薩克」的名稱，即沒有旗地的王公的近臣和王公，也得分爲四級的「台吉」的尊號。

總之，蒙古境內王公制度全體，明白地具有軍事的性質。各「旗」更分設「區」（蒙古音「索蒙」），就是各有騎兵一百五十名的騎兵連，因此每戶即須派出一人爲騎兵。「盟」（蒙古音「阿伊馬克」）和「軍圍」相當，各盟的統治者「汗」，由大清政府從「盟會」中最有才幹的王公裏面推舉而任命。王公最初在其「旗」的內部的統治上，具有相當廣泛的自治制度。大清政府爲着監督一般的政務的進步，任命「總督」，在烏里雅蘇台設總督府，在科布多及庫倫設副總督——「阿姆巴尼」二名。

大清政府考慮到在蒙古具有廣大的勢力的，佛教徒的強大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勢力，以喇嘛爲佛教會的君主而加以庇護。當北部蒙古歸順滿洲之時，溫圖魯·甘肯（活佛）、著名的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里的一代復興者，就是喀爾喀的喇嘛教寺院總管。中國是皇帝高宗，盡力於喀爾喀諸院的維持工作，他先和溫都魯·甘肯訂交親密，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例如在大清和衛拉特作戰之際，爲使北部蒙古人不覺衛拉特族打仗，曾經極力利用喀爾喀各寺院的勢力。

當時蒙古居民的主要構成階層，除了王公和「阿爾巴圖」（納貢者）以外，喇嘛也是這一時代多數住民中有勢力的集團。喇嘛和納貢者夏庇那爾，對滿洲王朝可以免納一切捐稅，並且不服軍役。例如哲撤因·甘肯、葉爾台尼·朋第泰·呼圖克圖等極負物望的「夫庇爾康」們，逐漸與王公和納貢者「夏庇那爾」等糾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領土上宗教上的領主了。

後來滿洲族和比較高度的中國文化的勢力，日益趨於同化，大清王朝對蒙古的政策，也由滿洲民族政策轉變成中國民族政策了。中國語文成爲大清國的官方及日常用語，並且撤消禁止漢人移居蒙古的禁令，政府開始極力擁護南蒙方面的中國殖民地化了。因此，在南部蒙古即內蒙古方面，組織起以漢族官吏爲省長的一般中國式的行政單位，南蒙古王公的許多權利，就此轉移了。

另一方面，對於準備實行非常的抵抗的北蒙王公又採取決定的手段。從一七一九年開始採取強力的彈壓，公布取締蒙古人和外國人擅行交通的法令。爲着監督這個法令的實施，從這一年開始，設置負有監視喀爾喀人和俄國人往來的特殊任務的政府特殊機關。

還有關於判處死刑以上的刑事上的事務，也剝奪各「旗」王公原有的主權，對於各「旗」一切公務的執行，又命令蒙古人使用他們所不熟悉的滿洲語。王公們關於最重要的刑事上的一切事務，勢非移交中國政府無法決定。

王公的重要性減少了，而且每年還得到宮廷裏去伺候一番。從蒙古的「旗」地到北京這一路上，朝貢所費的數目是很大的，這一筆費用當然要成爲各「旗」居民重大的負擔。

然而，中國在蒙古二百年的統治權的支柱，却是中國的商業資本，它以驚人的規模，對蒙古民族的原始經濟，進行有系統的破壞。財富的蓄積，在這個國家已完全不可能了，居民中幾個較大集團，陷於僵住的狀態。而牧地原野的潤澤，又麻痺了向上進步的一切刺激。蒙古變成廣闊的「歷史的墓地」化了。曾經好幾次使歐洲人聞而戰慄的亞洲的驕傲的好戰的征服者，變成和平的柔順的牧奴，二百年間，差不多毫無不平地甘心忍受中國的統治。

佛教對於這一層，當然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它壓制了一切創造性和向上進步的志向，鼓舞些兒觀念論的思維術和完善主義。佛教的僧徒，對此更起了較大的作用，一直成爲使蒙古人對中國專制王朝表示順從的政治

的武器。

中國專制王朝這種削弱蒙古支配者階層的實力，使成爲隸屬的順從的家奴，這種政策，首先就在於獲得喇嘛寺院的援助，以對蒙古人民從精神上加以抑制，他們又在南部蒙古促進了強力的殖民地化的商業資本之破壞的奴役的活動，一直到二十世紀最初十年，在這二百年間，也成爲中國專制王朝對蒙古民族統治權的有力的保障勢力。

第七節 二十世紀的新蒙古

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年，是全世界進入人民革命的時代，專制君主政治制度開始動搖和崩潰，人民自主的共和政治勢力逐漸在世界各地抬頭。這種運動在東方國家更加明顯，中國俄國都展開了人民大眾的革命。在中國兩大國家動亂的革命巨浪之中，蒙古開始不再是柔順的任宰割的羔羊了。中國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開始提出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革命的口號，然而那時蒙古還繼續遭受帝俄不斷的殖民侵略，在俄國大革命中，帝俄餘孽又勾結日本帝國主義而企圖把蒙古作爲反革命的東方總根據地，戰火和徵發，使蒙古民族遭受不可忍耐的死亡破壞和損害。當俄國革命成功之後，他們終於站立起來，由一九二一年的人民革命，到一九二四年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展開了蒙古民族的新的時代。——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時代。

第三章 居民概況

第一節 人口及其密度

蒙古的人口，直到最近，沒有充分精確的統計。在過去，蒙古人口的計算，大多數的場合，都只根據不完

全和不精確的報告，只照各個報告者或書籍著作者的印象而擬定，只好算是一種「估計」，而著者及研究家所估計的蒙古人口，又往往一差就達十萬及至百萬，使人不知適從。第一次獲得的比較精確的統計，是依據一九一八年舉行的蒙古居民第一次國勢調查的統計，這是蘇聯專家邁斯基氏的探險隊所完成的。據這次國勢調查，知道外蒙古居民共計六十五萬七千人。其中蒙古人五十四萬五千人，中國人十萬人，俄國人五千人。

一九一八年的國勢調查，確實證明了大多數研究家估計全蒙古居民人數時，往往說有三、四百萬人云云，究竟是過分的誇大了。「若是依N·M·浦爾傑伐爾斯基及P·K·卡士洛夫二氏，如果把阿爾泰管區、照烏達盟、青海阿拉善及其他中國領土包括在內的蒙古人數，加入外蒙古土著人口數在內，那麼可說大概有二百萬人」。(邁斯基，「現代蒙古」。)

二百萬人口，是包括所有游牧於中央亞細亞領地的蒙古的總數。在這總人口中，還要加進外蒙古的俄國人五千人，內外蒙古的中國人三十萬人，共約二百四十萬人。

由此可見這樣稀少的人口，却佔領着廣大的面積——二百七十八萬平方公里，就是說每一平方公里之地，不過〇·八六人，連一個人也不到，可見平均人口密度是很低的。外蒙古的平均人口密度為〇·四七人，而蒙古土著住民的人口密度更只有〇·三九人。低得有點驚人。

然而，那已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的事了，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還在草創未安時期，人口之稀少，原不足怪。後來蒙古共和國政府的一切施政漸上軌道，努力建設，人口也逐漸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已較原數增加幾達三分之一，據一九三四年的國勢調查統一，總人口為八十四萬人，共計本國人七十三萬九千人，其餘是中蘇兩國人民。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各盟的面積人口，統計如下表：

盟 別

政治中心地

面積(單位一千平方公里)

人口(單位一千人)

I 東部盟

巴音圖門

一七九

五九·六

2 肯特盟	溫圖爾汗	一一四	五四·〇
3 中央盟	烏倫巴圖爾(庫倫)	一一五	九六·八
4 色楞格盟	阿爾頓·布拉克	六七	三六·五
5 庫蘇古爾盟	穆倫	一二四	六七·一
6 阿拉杭愛盟	哲哲爾利克	八五	一六·三
7 烏布爾杭愛盟	圖音戈爾	一一五	六四·七
8 柴普亨盟	第布賓爾特	一九〇	八八·〇
9 烏布薩諾爾盟	烏蘭固木	七〇	四五·八
10 科布多盟	第爾戈爾特	一一一	五一·一
11 南戈壁盟	達冷·恰達曼伊	二〇五	三三·七
12 東戈壁盟	達里·薩音·香達	一二八	二六·一
計		一、五〇三	七三九·七

男女的比率，據一九三四年調查，計為男子三七〇、九〇〇名，女子三六八、八〇〇名。過去由於喇嘛制度及封建統治的存在，花柳病及其他社會病的蔓延，蒙古的人口增加率最低，不過〇·六名左右，後來民主共和的革命政府成立以後，努力於喇嘛及封建舊制的改革，醫療設備的整頓及文化水準的提高，結果社會病一年的減少了，所以人口逐年增加。到了一九四六年依照中蘇條約實行全國投票的時候，全國人口已達九十餘萬，快要躍出一百萬人的大關了。

第二節 人種的構成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人民，在人種的構成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差別。居民的主要部分，即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民族，大概可分為下面所說的三系：

一、北部分派：喀爾喀人或哈爾哈蒙古人，住在外蒙古及庫蘇古爾湖沿岸地區，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居民中的最大多數。喀爾喀人的總數，一九一八年國勢調查的統計是四十九萬二千人，喀爾喀比起別的支派來，保存有更多的蒙古種族的基本的特徵，而且有比較高度的文化。

二、南部分派：這是散居於從內蒙古之興伽恩東南地區，音·西雅納之東部邊境到阿拉善山一帶的游牧種族。南部蒙古人又分為察哈爾，土默特，額魯特，阿拉善各支派蒙古人。南部蒙古人比較喀爾喀人等別族蒙古人，所受漢人殖民的影響，逐漸消失蒙古特有的性質，大部分已經漢化了。

三、西部支派：這是衛拉特族——杜爾伯特或杜爾伯特支族人（庇特、鄂客特、明基特、札哈欽及土爾扈特族）等。所有這些種族有一部遊牧在科布多管區，約有四萬九千人。比較多數的種族，是分布在從烏布薩、察爾湖畔及帖斯河上游，科布多河左岸，到唐努山脈一帶的杜爾伯特族。杜爾伯特的人數，計達三萬九千人。

杜爾伯特人和喀爾喀人，在種型、頭部、服務及性質上，都不相同。他們是活潑而積極的民族。

四、外族：蒙古族之外，在蒙古領域內，尚住有少數居民的賽魯克族。就是居住阿爾泰山南麓到黑伊爾土西一帶的吉爾基斯人，科布多河上游的柯克楚爾·土翁，吉爾基斯湖西北沿岸混雜在杜爾伯特遊牧天幕之間的柯東人。

五、蒙古的最東北部，貝爾湖及達拉伊諾爾地帶，有蒙古族和通古斯集團部族——索倫及鄂嫩春人彼此雜居其間。索倫及鄂嫩春人，和巴爾格·布里雅特，契普欽及鄂蘭特等，都在海伊達爾管區，以巴爾古特及巴古

特而著名。

六、漢民族在蒙古各地，曾經到處形成一個集團而成功，但是在外蒙古方面所看到的漢民族，大多數是男性，且多定居在都市及商業中心地，從事於商業貿易。

反之，在內蒙古方面的漢民族，却多和他們的帶着家眷移住過來的，由於受到南部季節因而使阿拉善平原的水量豐足，所以都經營農業，把土地殖民化起來了。

第二節 蒙古人的典型

蒙古人普通都是中等身材，較短，有強健的體格。顏面寬大，顴骨聳起，髮濃黑，面部差不多沒有毫毛。二十五歲上下才在鼻下及顎部生鬍鬚。長至四十歲光景，但都不會修長。一般人習慣剃鬚，所以美髯公之類是難得看到的。直到大革命以前，十六歲以下的少年男女：都習慣地剃去前頭部的頭髮，把後頭部的頭髮緊緊地編結成一條辮子，但是後來這種垂辮的人一天天的少了，現在大城市裏已經完全看不到了。因為蒙古——蒙古軍人——逐漸以留辮子是看做時代落伍者的標記了。姑娘們的辮髮上，過去往往用中國的銀幣和俄國的盧布五十戈比的以及其他小銀幣做裝飾，結婚後，娘兒們的頭髮也不剃去，理髮是自由的，喀爾喀人的已婚婦女都喜歡編結一種特別的非常複雜的髮髻，在睡眠的時候也不解除。

皮膚的顏色，比歐洲人稍為粗黑，鼻子長而闊，鼻孔大，眼小而秀，眼睛黑而有光，像一對細細的鎌刀那樣斜生着。視力非常銳利。牙齒排列得很好看，純白的象牙一樣，有光輝，又很堅強，不過脫落期比較的要早些。

男子的胸圍普通比較廣闊，體軀強健，但多為瘦型。他們的臀部都很發達，這是因為世世代代長期坐慣了馬匹緣故吧？蒙古人在馬上的姿勢是非常英俊雄壯的，但是一下了坐騎，站着的姿態，便顯得猥瑣和不怎樣活

潑了。蒙古人中間也常常可以看到許多討人喜歡的漂亮的容貌，女子中間偶然可以看到絕色的美人。

說到蒙古人的精神上的外貌，蒙古各種族的典型的性質，表現他們各自在歷史上的強烈的影響。在滿洲人和中國人的權威統治之下達兩世紀以上的喀爾喀人，以深刻的消極性為其特徵。他們的消極性，深刻地遺留在他們的信教、道德及習慣方面。邁斯基氏就曾指出從他們這種基本的性質所發生的喀爾喀人本質上的懶惰無氣力。照一般的習慣，男子都遊手好閒，家務和家畜等粗笨的管養工作，都讓女人和孩子們去做。

曾經長時期和中國作戰的西部蒙古人，却保持有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特徵。例如杜爾伯特人，就決沒有把什麼東西都吃光了一點不事蓄積的喀爾喀人式的懶惰，他們比較地富於對新的生活方式的感受性，所以農業也比較地發達。

南部支派的蒙古人——察哈爾及土門人，更和喀爾喀人完全不同，過去曾被編入滿洲旗軍。他們保持着成吉思汗時代光榮的戰鬥性，他們和愛和平到骨髓裏的喀爾喀人及中國移民為隣，而以掠奪和偷竊為生產上活動的方式之一。正確地說，他們可以叫做「中央亞細亞的庫爾德人」。

普通的蒙古人，其愚蠢和迷信，到了可驚的程度。同時，他們又有不可思議的銳利的視力和好奇心。蒙古人在別人幾千隻羊裏，看出那一隻是自己的。蒙古人或是在曠原遭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或是聽到什麼新聞，他就會快馬加鞭地，有時就這麼趕到三十至五十俄里那麼遙遠的隣人，去告訴他。

最可憐愛的特徵是親切和好客。蒙古人很少會激怒到很久的事。他們一會兒雖然發了脾氣，可是一轉眼間又像孩子們一般朗爽快活了。誰都可以跑進蒙古人的房子——蒙古包裹去，他們會不問你是誰，照樣欣欣然地歡迎你，可以獲得居住和食物。在喀爾喀，那怕你只是一個八、九歲的孩子，也可以平穩地旅行全境，他們到處都是供給吃的和住的。臨走還給你預備好明天旅行中所要的乾糧。喀爾喀人有可敬的愛好和平的心，正直和誠實。

南部蒙古人或西部蒙古人有幾族的情形就不相同。察哈爾人在掠奪得了什麼的時候也不會逃走。西部蒙古人認為偷馬並不犯罪。然而他們也像平原蒙古人的習慣，尊重好客的習慣。

第四節 生活和習俗

(一) 衣服

蒙古人的風俗，以單純和簡樸為其特徵，男人和女子的服飾，都可以通用。這是一種叫做「達蘭巴」或「哲溫巴」所製的褲子和襯衣，上面加一件長而闊的套衫——袖是長長的，着一件反拆的「台爾利克」，用一條長達好幾俄尺的帶子紮緊。王公及富翁們多穿著錦綉的絲質的「台爾利克」，紮的也是綢帶。頭飾也相當考究，有的戴絲綢綴上寶玉的帽子。脚上穿的是「夫都魯」，所謂「夫都魯」是脚尖彎曲如翼的皮革製的長靴，中間有毛氈的襪子，底也是氈的。

蒙古男人的帶子上都備有打火用具，插在鞘裏的小刀，還有裝着煙草和鼻煙的煙袋。

(二) 居住

「悠爾泰」（天幕）內部的裝飾非常簡單。除了「悠爾泰」之中央設有上開煙窗口的爐子以外，還設有佛器，佛燈，安置佛像和經典的佛壇等。（當然，現在多數人家已沒有這種陳設了）。進口靠右手面多是沒有腳的矮床，上面放着被褥枕頭，薄氈和各種衣類。

「悠爾泰」中的食器，是鑄鐵製的錢子，土瓶，和銅製的杓子等等。

「悠爾泰」的建造或折疊，全部傢具的安排，只要兩個鐘頭就可以了，要遷移到新的場所的時候，所有一切，只要兩只駱駝就夠了。「悠爾泰」跟着向新的牧場移動，跟在大羣的家畜的後面，成為遊牧民族的蒙古人的唯一最適當的住宅。

過去王公和富人，現在多數機關學校建造足以容納三百人大的「悠爾泰」。他們的「悠爾泰」是用兩重的氈製成的，而且往往用俄羅斯的或中國所出的金屬暖爐，以代蒙古人傳統的土爐。

烏倫·巴都爾（庫倫）方面，王公及富人們開始建造中國式的黏土和木板建築的家——「庇新」。「庇新」有加帷簾的窗子，內部黏貼壁紙，塗以鮮豔的色彩。現在各大都市已經有歐化的建築。

（三）性的關係

性關係是非常簡單的。世界上幾乎再沒有像蒙古那樣容易弄到一個女人了。照歐洲的看法，關於禮儀和夫婦的信愛等等，在蒙古人是完全不了解的。他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妒嫉，這早已成爲習慣了。就使遇到發生了妻子有不貞潔的現行犯的時候，按照風習，也不過把這個男人所乘之馬和馬鞍一併沒收就算了事。就遠在成吉思汗時代吧，姦通才要遭受處罰的。私生子在蒙古並不當是不名譽的事，可以在母親的家裏養育。蒙古人的性生活，從少年時代就開始了，上流社會都從八、九歲起頭。正式的婚姻，雖在十五六歲時實行，但是十四五歲已做了母親的，並不算什麼新奇。新的性道德，只在革命以後才合理地建立起來。

（四）婚姻

婚姻都由雙親爲子女執行，青年男女間相互的感情，是不會被考慮到的。婚姻的成立，過去多按儀式、風俗及習慣實行。父親替自己的子女選定娶嫁，而和喇嘛僧商討。喇嘛僧就用經書占卜這個婚姻是否吉利。如果喇嘛僧的答案是吉利的，就可以派出媒人兩位，到對方去說親，對方也去請教喇嘛僧，如果他的答復也是好的，就可以公布這個婚約。然後由男家的雙親再去請問喇嘛僧，選擇成婚的吉日良時，時日一經決定，再派媒人到女家去，通知擇定的結婚吉日良時，同時商談聘禮，（蒙古人所謂「蘇伊」）及「嫁儀」（蒙古語所謂「因第馬爾」）的數目。普通富家的聘禮，在從前多數是二匹馬，三四十兩銀子和無數「霍達克」（青色的綢質裝飾等等）不過蒙古的婚姻儀式也並不一律如此。至於嫁儀，過去習慣，最普遍的是牝牛牝馬各四五匹，駱駝二

三頭，及羊三、四十隻。富戶的聘禮，在從前也有用現銀數百乃至數千兩，女家嫁儀也往往用牛數十頭，小家畜數千隻的。不過貧寒人家，就有只用二、三只羊和一些「霍達克」就算了的。嫁儀普通須在結婚後一年才送去。男家的父親，須給與聘禮和「悠爾泰」，而女家的父親亦給與張搭「悠爾泰」所用的皮紐及「悠爾泰」內部的全部裝飾。新娘初進新郎「悠爾泰」時，多帶着父親給她的作爲嫁儀的財產目錄。這個目錄是預備在一旦離婚之時應用的。因爲如果要離婚了，各人就憑這目錄各取應得的財產而去。

預備的商談完結之後，就可實行結婚。婚禮在喀爾喀人就表示女子的生涯的告終，把頭髮編結起來，表示已婚婦女了。結婚的宴會，往往繼續了好幾天。

(五) 婦女的地位

蒙古人的家庭，大部份的事務，都推在女人的身上。這在家族關係上，表現了極大的影響。這裏表現出女人並不是物品和奴隸，不是沒有意思的，供男人享樂的工具。女人差不多和男人同樣的撫養長大，牧養家畜，騎馬奔馳，參加一切大祭和宗教上的行動。她們並不像中央亞細亞一部份民族的女人那樣用面紗把顏面掩蔽，她們可以到處自由行動，完全有關於一切人事的自覺。在決定重要的家務之時，和在轉移牧場之時，丈夫必須取得妻子的同意。

蒙古人對兒女的關係，當然是愛重情深的。他們把兒女當做是神佛所賜的寶貝，小孩子的出世，是一家大喜事。沒有兒女的夫婦，往往憂心如禱地到喇嘛僧那裏去祈禱，要求幫助挽回自己的不幸。有些沒有子息的夫婦，也常常向貧苦人家購買孩子，甚至於偷竊別人子女的事，常常會發生的。

(六) 兒童的教養

和蒙古人的風俗一樣，他們對於兒童的教育，也是非常原始的。

幼兒出世後二天之中，給他一片羊脂舐舐，從第三天起，開始喂以母乳。三四個月光景喂以山羊乳和牛乳

，二三年甚至要到四年之後，才實行斷奶。雙親往往把礦物、植物、動物，或家具等名稱，作為孩子們的名字。母親撫養子女到六七歲以後，男子即須騎馬或駱駝，跟着商隊去活動，女子則學習裁縫和烹飪。直到革命時代，蒙古人都是不給兒童讀書的。隨便到什麼地方什麼旗去，看不到幾個人會讀書和寫字的。

對於兒童的教育，過去完全以聽故事的「教育」為限。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一直到雙親替子女成婚為止，要求子女絕對服從雙親，但是一般的說，彼此關係倒是很好的。

(七) 死的觀念和葬儀

蒙古人因為受佛教感化，相信死後還有來世，所以對於死，並不怎樣恐怖。因此，蒙古人對於新喪之家也不存怎樣嫌惡之心，他們以「一心向善」為立身處世最高道德，而對於輪迴轉生，縱使不能再投生人間，也極力希望投做馬犬等上等的動物，（而且他們相信，要那樣，便只有在此生努力做些慈愛他人他物的好事）。蒙古人對於屍體的埋葬，又是非常別緻的。依照他們信教的說法，屍體不可埋葬在地下，必須供作鳥獸的食物。所以蒙古人通行不把死者埋葬在墓地，反而把來拋在野外，但求能够成為猛獸和蒙古犬的一頓豐富的大餐，最好吃得骨頭也不剩一根。蒙古人在臨終之際，受喇嘛僧的引導，使占卜合於「送葬」的場所。所以一斷了氣，屍體只包以極粗的衣服，拾出「悠爾泰」，但是往往不從正式的出口出去，而另開壁洞拖出，搬送到占卜決定的地方。烏倫巴都爾郊外，逐漸形成特別的「墳場」了。墳場附近的洞窟，差不多早已成為野犬之家，它們專靠殘食搬到這裏來的人類的屍體過活。這種狗就特別猙獰可怕，活人遇到了是非常危險的。

照蒙古人的道德觀念而論，有時對於不易看護的老衰的家族，往往不及等到死亡就把來送到墳場裏去，把這種拋棄瀕死的老輩投給野犬當正餐的事，也認為是可以的。墓地上的那些狗，都張牙舞爪地趕來圍住瀕死的可憐者，立刻舉行它們的「人血人肉之宴會」。

(八) 所謂「送風」

蒙古人風俗中最顯著的特點，在過去是賣淫之風的普遍。發生賣淫的原因，據一般說法，是由於一九一一年以前禁止中國婦女入蒙古境界的命令所造成的。實際上，當時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地的幾千個漢族男人，都要和蒙古「夫海恩」（姑娘）們實行同居，不少人還生有子女；但當漢民族回國之時，都把蒙古夫人拋棄了。因此，漢民族對於蒙古賣淫者之發達，當然不能不担負一部份責任，但是，更主要的，是由於蒙古喇嘛僧的存在，他們受着宗教的戒律的束縛，但實際上這種戒律却造成了促進蒙古賣淫之風。這是不能不特別指出的。因為在革命成功以前，蒙古男人中，大約有四〇%是受戒的喇嘛，他們不能不履行其獨身的誓約，而實際上却有四分之一以上並不遵守戒律。庫倫的第五代活佛，就是患梅毒而死的；最後逝世的活佛——呼圖克圖·波格德甘肯，在青年時代，也曾渡過極其浪漫的生活。因為這個祕密洩漏了。引起全國宗教界的一大波瀾，終於不得不在自己許多老相好中，選擇一個婦女，和她正式結婚。由此可知喇嘛僧之成為蒙古賣淫之風的因素，比漢民族更具重大的影響。

賣淫業在舊時蒙古幾乎合法，有時還會把它看做是有名譽的職業。王公自己也會毫不躊躇地和妓女結婚。例如杜爾勒特的王公朱萊克特汗在一九〇九年和科布多的美貌的妓女正式結婚，後來庫倫政府的外交部長喀爾喀王公阿契多·巴恩，就和從哥哥那裏勾搭上了的妓女結婚。

因為對於賣淫有各種各式的見解，所以甚至有雙親自己已成爲賣淫的媒介者，出賣自己的姑娘而利用其收入的事實。庫倫及其他各城市裏，那些大喇嘛的附近，普通並列着許多「悠爾泰」（天幕），就在這裏實行賣淫，其中和自己一家同居的也還不少。

蒙古的妓女，都從十四五歲開始其皮肉生涯，至二十五歲才以年老而「退休」。他們往往會掩蔽自己的衰老，講究一種歐洲朋友所不能了解的「虛幻婚姻」的特殊辦法。她們有編結限於已婚婦女所結的編結髮髻的權利，這就隱蔽了一些衰老之情。到了已經老到無法隱蔽的時候的蒙古妓女，過去往往做「夏巴新」——尼姑

，她們從這個「悠爾泰」到那一個「悠爾泰」，傳說社會新聞和政事。

第五節 蒙古文化生活中的宗教意義

蒙古人最初的宗教，究竟是怎樣的東西，還不能夠正確判斷。但他們的宗教上的世界觀，在於自然力與現象的偶像化，則和其他一切宗教教理的發生相同，是唯一神的思想所形成的。在十三世紀訪問過成吉思汗帝國的浦拉諾·卡爾布尼，認為蒙古人信奉對人類有功績的創造宇宙的主神，把用氈子和綉布製造的偶像當作家畜的守護神，向它供設禮物，而把太陽、火和月亮也神化了。從十九世紀起，佛教開始侵入蒙古，開始信奉純粹的宗教，即後來以喇嘛教著名的西藏派佛教。喇嘛教一直到蒙古大革命前期，還在蒙古佔有支配的地位。喇嘛教在蒙古人的一般的文化水準上留有非常明白的影響的痕跡。而直到最近，對於宗教上的慶祝祭祀和禮拜，還是發現蒙古的文化生活的唯一的形態。

像在中世紀的歐洲一樣，蒙古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一直把智識的生活的真正的中心地，即啓蒙的苗床，集中在喇嘛廟裏。喇嘛僧的生活比一般住民要好得多，是具有比較廣泛的智慧的蒙古的知識份子。喇嘛僧在普通蒙古人的生活中，表現非常重大的作用。喇嘛僧從一個人的出世起，就開始和這個人的一生，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喇嘛僧的勢力與影響力，比起中世紀的天主教來還要大些。

直到不久以前，宗教的教養，還佔有絕對的支配的地位。從擁有喇嘛僧三千人的庫倫的叫做「大富來」的大喇嘛廟，直到不過三四個喇嘛的小廟，所有一切喇嘛寺院，都有他們的學生——「朋弟」。學生們在這裏經過佛教之善知識的全部過程。蒙古人的各種家庭，依照習慣的規定，必須有一個兒子出家為喇嘛僧。男子一到七八歲就要送進喇嘛廟去，從認識的喇嘛僧中去選定一個師父——「巴克亞」。普通的學習直到四五十歲才告終結。他們不斷地學習作為喇嘛僧的學業，而佛教中各個的教學上及教學的問題非常深奧，所以必須繼續作自

修式的「學術的勞作」，要到五十歲左右，才可享受宗教的最高稱號「阿格楞布」。學習中的喇嘛僧，爲着完成自己的學問，還得親自拜訪宗教的最大中心地——西藏的拉薩和日喀則。

喇嘛廟一般的除了「宗教大學院」之外，又是「天文學及醫學院」。天文學——正確的說是占星學——是天地萬物、曆、占等特殊種的教義，對於天體，完全不作實際的觀察。依照佛教的天文學的教義，以爲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風、萬物之中央爲大洋或高山所蔽，是成爲圓板的土地。據喇嘛僧說，大洋的中心是巨大的山蘇美爾·烏拉，由此發生四大陸。北方爲四角形，東方爲半圓形，西方爲圓形，「我們所住的南方是三角形的。至於在其他大洋之中的國家，那就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了。土地是不動的，太陽月亮和星，在蘇美爾烏拉四周繞轉，太陽和月及星，據喇嘛僧的意見，那是守護神，照射他們的光，完全是太陽和月及星的目光。

喇嘛僧關於人類的身體構造、疾病之發生及診察與治療方法的醫學上的知識，同樣也是迷信的，空想的。但是，迷信和愚昧的時代，就是在蒙古，也終於會成爲過去的。以上是革命以前的情形，現在，由於革命成功，蒙古民族已進入另一理想的文明的新世界了。

第二部 國民經濟

第四章 蒙古的經濟結構

第一節 國民經濟的基本形態

蒙古人自從踏上歷史的舞臺的時候開始，就以畜牧為基礎的甚至是唯一的職業，一直維持到革命時代。蒙古人之壓倒的大多數，一直是遊牧民族，他們的生活狀態和幸福，都靠着他們的家畜。

蒙古的地理狀態、土地，距離海面很高很遠，灌溉極不充分，氣候又極乾燥。但是牧草繁茂，冬季也不積雪，因此，自然而然地使蒙古成為畜牧業發達的天地了。以高聳的山脈和廣袤的沙漠而和外界隔絕的蒙古，直到二十世紀，在大體上保持着遊牧經濟的特徵。浦拉諾·卡爾布尼記述十二世紀的蒙古，說有五種家畜，就是馬、牛、駱駝、羊和山羊。這五種家畜，一直保留到今天。在這五種家畜之外，還有三種有角獸。——薩羅羅伊克，即西藏種牛和蒙古牦牛的混血種、哈伊尼克——蒙古牦牛和雌的薩羅羅伊克的混血種、奧爾托姆——雄的薩羅羅伊克和蒙古牦牛的混血種。

蒙古的畜牧，帶有非常原始的和粗笨的性質，土地是部落公有的，在「旗」（蒙古語為「霍希攸恩」）管理之下，從領主王公到貧苦者，所有人民的家畜，完全可以自由放牧，有時還可事前成立協定，而允許在別「旗」牧地上放牧。夏天的牧場，普通多選擇谿谷及湖畔盆地等離開水源不遠的地方。當一定的牧場上的牧草吃完了的時候，再把所有家畜趕到別的地方，主人也大大小小地跟在後面。冬天的牧場特別選定山或丘的南側面

，因為這種地方積雪較少，家畜可以輕便地吃到下面的枯黃的冬草；冬天的牧場不是共有財產，而為各家所分屬的世襲的產業。

經過了一千多年的遊牧生活方式，在蒙古人中間，構成了愛好移動的感情，因此，牧地的利用，是極度的非經濟的。一年中間，特別是夏天，蒙古人會遊牧到八處至十處地方，有會時遠程到二百五十至三百俄里以外去遊牧。他們對於家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保護方法，家畜的增殖，也任其自然。由於畜牧經營上這種粗笨的制度，在冬天往往有許多家畜，為不斷地追隨在家畜後面的野狼所殺害和吞噬了。特別是在酷寒的冬天，為着飢、寒，犧牲在野狼爪牙之下的家畜，達到驚人的數目，往往會在一年之內喪失三分之一的家畜。

同樣，因為牛瘟、炭疽病及鼻疽等瘟疫而死的家畜，也不在少數。蒙古人在革命以前，對於這種流行於家畜中間的疫病，沒有什麼防備的方法。只在最近二三十年間，由俄國的獸醫實行種痘等新法，近來這種天然的災害已經減少了。

大革命成功以後的外蒙古，國民經濟已有劃時代的大轉變，雖然畜牧還是主要的國民經濟形態，但是農工礦冶各業已有飛躍的發展，我們要在下面詳細講到。

第二節 經濟和社會上的階級關係

蒙古人民的社會結構，具有粗笨的畜牧國家的典型的特徵。因此，還沒有完成階級的分割。依近代的概念來說「階級」這一名詞，在社會的階級構成方面，不能不大加限制。但是，蒙古人民大眾也分為一定的經濟上的不同集團。

據一九一八年的外蒙古的國勢調查，有下列五種階層：即王公、士族（泰伊特基）、喇嘛僧及修道僧（巴恩德）自由民（蒙音作「庶蒙」）、及奴隸（哈姆傑爾格）。王公和士族互相連結得相當鞏固，士族是王公的

家族，由世襲爵位者以下各份子所構成，普通是在蒙古中央地方行政機關中具有特權的集團。從經濟的關係來看，兩個階層實際上應該併入一個集團。

平民和奴隸之間的距離很近，只不過後者對自己的主人——王公，必須服一定的勞役，而前者則不必要而已。「布泰契」的集團在經濟上和平民實在一樣。一九二一年廢止農奴制度，奴才的權利義務和「庶蒙」（平民）相等，這三個階層在他們的報紙上，可以結合成完全同樣的經濟的集團「阿拉特」（平民）。

佔有第三位多數的集團，是外蒙古全體人民中百分之二十二·三的喇嘛僧和修道僧。

外蒙古上述經濟集團之男性人民的數量上的相互關係，有如下面的某盟調查表相當精確地顯示，可以看出全蒙古的社會構造的特徵：

經濟集團		人 數	比 率
王公及貴族		一三·四七九	五·五
喇嘛僧及修道士		一〇五·五七七	四四·八
阿拉特（平民）		一一八·三五二	四九·七
合計		二三七·四〇八	一〇〇%
馬		七·一頭	
駱駝		一·五頭	
牛		七·一頭	
羊、山羊		四四·三頭	

爲着決定這些經濟集團的勢力和作用的相互關係，對於它們在蒙古國民經濟基本形態的畜牧業中所佔地位，還有加以說明的必要。屬於具有納稅義務的集團的，普通人民的典型的經濟，平均是這樣的。

合計

六〇・〇頭

王公和大喇嘛僧的經濟及寺院經濟，相當的大，這些已經是大規模的畜牧經濟了。例如舊時的札薩克·汗·盟，後來的泰伊希爾汗的王公杜蒙契·伐恩，擁有馬七千匹、牛三百頭和羊二萬隻。舊時的賽賽思·汗·盟後來的亨第汗的皮錫蘭爾多因，則擁有馬六千五百匹、牛五百頭、駱駝一百二十頭，羊一萬隻。

寺院經濟形成了喇嘛僧的畜牧協同體，和王公經濟同樣是大規模經營的。例如達夫安（舊庫倫的寺院）在一九一八年擁有馬三萬匹、牛一萬五千頭、羊約十萬隻。葉爾台尼·奇和寺院，在同一年尚有馬三千匹、牛一萬頭、駱駝三百頭、羊五萬頭等等。

在這種大規模經濟中，每一家約有下舉的各種家畜。

	王公經濟	寺院經濟
馬	五三〇・〇	六九・三
駱駝	七三・四	二・八
牛	一二〇・〇	六五・一
山羊及羊	一、六四七・三	五一五・八
合計	二、三七〇・七	六五三・〇

所以——依據邁斯基著「現代蒙古」國民經濟章——在畜牧業部門中，寺院及王公經濟，大約和全部平民的經濟，在規模上並無差別。

然而寺院及王公經濟在蒙古的全部畜牧經濟中，並不表演特別巨大的作用。但看下面所列舉的顯示蒙古基本的各種經濟集團間的各種家畜分布表，蒙古全部畜牧財富的五分之四，是在「阿拉特」（平民）的手裏。

經濟集團	馬數	% 駱駝數	% 牛數	% 羊及山羊數
馬	數	%	牛數	%
駱駝	數	%	牛數	%
羊及山羊	數	%	牛數	%

阿拉特（平民）	八六、九九	七〇・一	一八五、九〇	八二・四	八八二、八六	八二・八	五、五四二、三四一	七七・一
王公	七五、一二〇	六・五	一〇、二三	四四・五	一六、五六七	一・六	三七、五三三	五・二
寺院	一九〇、五八四	一六・五	三三、五七	一五・二	一七八、九四四	一六・六	一、四八、四三一	一九・七
合計	一、一四〇、三一一	一〇〇	二二六、六〇	一〇〇	一、〇七六、五〇四	一〇〇	七、一八六、〇〇四	一〇〇

上面的統計，顯示了蒙古人三個集團之間的勢力的相互間的特徵，和他們在蒙古的經濟生活中所表演的角色。納稅居民之基礎的集團，差不多占有蒙古人口的半數，集中了馬匹七七・一%，駱駝八一・四%，牛七四%（X）羊及山羊七六・八%（、）即全部家畜中的七五・五%。以牛為單位合算為家畜單位（以牛一頭抵羊十只），可見平均各家有六十頭的小規模畜牧經濟的普通人民手裏，佔有蒙古全部畜牧財富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又可見到唯一納稅居民的阿拉特，實為蒙古國民經濟中最主要的經濟集團。

各王公及寺院經濟雖然勢力煥赫，但是它們的國民經濟上的意義却不很大。大規模經濟只有在牧羊中具有較大的意義，牧牛的意義就差得多了。寺院經濟就以牧馬成功而能凌駕王公的社會上的總經濟力。

蒙古人之社會的差別，從全體來看，不能說怎樣的顯著。

因此，在外蒙古自治及革命運動成功之後，在社會階級不平等的消除，比較的未遭遇頑強的抵抗而逐步實現了。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國已漸漸成為沒有階級的理想社會，農工牧民軍人和知識份子，站在一律平等的地位上向民主和平建國之路邁進。

第二節 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

蒙古的經濟的發展，其基本路線規定是非資本主義的，由遊牧經濟躍進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路線。但是，這條路線的進行，可不是直線的順利的發展過程，它需要而且實際上正是在和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過激主義

的鬥爭中前進的。

反革命份子曾經屢次從右或左各方面阻止蒙古經濟的合理發展。右傾機會者企圖把蒙古變成帝國主義國家附庸；他們甚至為此潛入蒙古人民革命黨，發生從內部腐化和修改革命政策的壞作用，他們曾以「胡同反對派」的名義，在一九二八年年底的第七次黨大會席上露臉。相反的，左傾過激主義者則主張立即消滅蒙古的私有財產制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因此激起牧民階級的恐懼，而發生不利於革命政權之成長及政策之推行的反作用。

爲了蒙古國民經濟的正確有效的向社會主義之途發展，必須首先和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過激主義的理論綱領和行動作鬥爭，確定正確的路線。人民革命政府曾經確定：

(一) 在政治方面，主要是設法鞏固革命的法令，促進人民革命黨、人民共和國、和廣大羣衆之間血肉相連的關係，提高地方與中央政治機關在羣衆中的威信，增進行政效率，取消單純對付喇嘛教的行政立法，向廣大牧民羣衆發展革命政治的作用和意義，並吸收羣衆進各級行政機關，使政府的政策能夠充分表達民衆的切身要求，同時能夠切實而正確地執行，使大眾蒙受革命政策的實際利益，使人人樂爲保衛革命政權與政策之貫徹而奮鬥。同時，這一基本政策路線的實現，不僅克服了從右和從左各方面進來的反革命的破壞陰謀，也加強了人民共和國在對外關係上的堅強的地位。

(二) 財政經濟方面，盡力減少非生產性的國庫支出，把國家所有的一切資力，完全用到生產性的事業上去，用以發展產業、加強國防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提高人民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水準。因爲把所有的公款盡力用在生產性的事業上面，同時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減少對人民的徵取，因而更加有助於國民經濟之健全的發展，每一個人民有了較高的購買能力，人民生活獲得空前的改善。

(三) 產業發展的基本路線，在初期必須依據蒙古的經濟基礎爲畜牧業的特徵，因而首先注目和注力於畜

牧業的改善，使遊牧羣衆都能知道如何使畜牧業發展，怎樣保護幼畜，防止畜疫及野獸的損害，而使畜產的收入增加。然後改變一千多年來傳統的蒙古遊牧生活，造成現代化畜牧產業，進一步和蘇聯合作，在蘇聯的協助之下，建立工業——首先是畜產品的加工工業，使畜牧和新生工業生產發生密切的聯系。並且在商業方面維持國營消費合作社，一面限制了私人商業資本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所進行的榨取行爲，一面盡量吸收私人資本參加合作社，以從事國內市場的供應和推銷，保障其合理的利潤。至於對外國貿易，則維持國家的專營權。

從這裏可以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經濟的基本路線，是適應蒙古這個特殊地區的經濟條件和內外環境，並且有效地執行革命政策進向社會主義建設之途的、一種計劃經濟的路綫。

由於這種正確的路綫，蒙古國民的經濟逐漸有正常的發展，國民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國家經濟已奠立健全的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同時國防的實力也因此有了強大的發展。因此不僅對內鞏固了人民共和國自治的政權，而且對外也鞏固了他現代獨立國家的不可動搖的地位。

第五章 財政與金融

第一節 財政

(一) 政府預算的特徵

蒙古人民政府剛成立的時候，由於國家的收支科目不易調查的混亂狀態，無法編製國家及地方預算，只視事實上的必要而隨時支付。直到一九二三年，才編成年度預算，規定各機關分別計算收支，提交預算委員會，經過審查核准。當時的費用種類極其簡單，各機關只分爲人事費、辦公費、房屋維持費、修繕及物品購買費、

交際費、雜費、預算費等七項，又區分為中央費及地方費，但如驛遞費即依照一般國營事業的習慣，用地方費辦理，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十分明確。

一九二四年的共和國憲法第九章第三十七至四十六條，規定預算編製權，規定共和國的歲入及歲出統一於一般國家預算，提交「大呼爾登」（中央委員會定期大會），在特別情形之下則提交「小呼爾登」（中央委員會常務幹事會）審核通過。國家預算的收支總額，有如左表，呈逐漸增加之勢，至一九三九年而突呈躍增，較上年度反增加達十倍以上。可以看出健全發展的趨勢。

年份	收	入	支	出	比	較
一九二一			一、七二二、〇〇〇			
一九二八			九、一三四、二七七			
一九三四			三五、一一七、〇〇〇			
一九三六		四六、一〇〇、〇〇〇	四三、三〇〇、〇〇〇	(增)	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七		六九、一四四、〇〇〇	五八、一八一、〇〇〇	(增)	一〇、九六三、〇〇〇	
一九三八		九二、三〇〇、〇〇〇	八八、六五九、〇〇〇	(增)	三、六四一、〇〇〇	
一九三九	九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九〇三、〇〇〇、〇〇〇	(增)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又如一九三九年的部長會議（即閣議），就提出了二百二十萬土格利克（蒙元）的內閣預算，這也許是經常費的數目。現在且檢討一下蒙古歲出關係：

「行政機關各項經費，逐漸趨向於遞減一途，為經濟上文化上的建設而支出的作用，逐漸增加其重要性。一九二八年的行政機關經費，尚占國家預算中歲出總額的四六%，然而到了一九三二年已經減少到一一·九%，三四年更減少到九·九%。為經濟上生產上的費用而支的，二八年僅占全支出數的一〇·三%，一九三四

年已經增加到二八%。一九二八年對文化建設的支出額為二百八十二萬土格利里，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提高到五百零四萬七千土格利克。同一期間的經營經濟支出額亦由一百六十二萬三千增加到九百八十四萬四千土格利克。（魯伊奇克：「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經濟及文化的建設」。「計劃經濟」一九三六年第六號）

按照上述計算，一九三四年度經濟的及文化的支出之絕對額為一千四百八十九萬一千土格利克，約當總額四二%強，加上九·九%的行政費，約共為五二%。再看這一時期的文化及經濟上支出的內容，有如下表：（單位「土格利克」）

項 目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醫療費	三、五一七、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教育費	六、一六九、〇〇〇	五、三四五、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〇〇
畜牧補助費	四、二八〇、〇〇〇	五、四七〇、〇〇〇	一九、三〇〇、〇〇〇
工業建設長期 低利息放款	—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乾草驛建設費	—	—	五八、八〇〇、〇〇〇
合 計	一三、九八六、〇〇〇	二四、四一五、〇〇〇	一〇八、〇〇〇、〇〇〇

〔備註〕一九三九年度為預算額。（△）是年一月之支出包含畜牧補助長期低利資金貸放支出額之四百七十四萬土格利克。

人民政府在編製一九三九年度預算之時，關於支出方面，預算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出於國防費及醫療費教育費之大量的增加。關於後者，又新在各地建設所謂乾草驛（是指以乾草倉庫為中心的實行家畜社會化的設施）。還有是各別附屬的學校及醫療處的設施費。又這一年度的道路建設費預算，為一千六百萬土格利克，這一點在軍事上說，當然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年支出預算中的軍事費實際數目，是一向不發表的。但是從上引魯伊克氏的論文中，所說經濟上文化上的支出及一小部分行政費（當然其中也有一小部分可看做間接軍事費）計為五二%，那麼可以推想軍事費約占預算總額的半數。如果這種估計不很錯誤，則一九三七年度為二千九百萬，一九三八年度為四千四百萬，到一九三九年度躍增為四億五千萬土格利克，二次大戰中外蒙古蘇聯式軍隊之擴大強化，也應該是從當時開始的鉅額預算所決定的。

又在上列歲出歲入預算表中，連年多有剩餘款額，可以看做是理想健全的財政，不過一九三九年四月內閣總理喬巴山元帥公布，上年度已有赤字，這一年度四月為止的赤字總額為三百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八土格利克。那末，上述的剩餘款額是那裏來的？內債還是外債？這一方面的關係不很明白。但是沒有發生財政上的病象，却有後來的事實作證明。（外蒙古的對蘇聯債務，在一九三八年初約為三千五百萬盧布。）

（二）歲入·租稅和革命政策

再就人民政府的歲入預算來看，當革命政府成立初期，以租稅佔其半數，不過，政府為避免設立直接稅起見，不得不希望以間接稅為主要財源。其中主要的是輸出入關稅，關稅稅率，普通貨物為從價百分之六，皮類百分之九，煙草百分之十二，另外附加市稅為百分之五。

一九二五年之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決定以差別稅率修改國稅，決定參酌本國產業保護主義，對各種商品分設等級。這一年的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又決議：關稅以從量稅為原則，僅在特別場合開徵從價稅。稅關依照關稅法的規定，設立四十一所。

人民政府除了關稅之外，關於工商業，課徵營業稅，基本資本稅，收益稅，商店人員稅等稅，但收益稅及商店人員稅不久即告撤消，以圖商業之發達，後來在左傾政策強迫推行之時，一度課取禁止性的重稅。一九三二年以後，為着獎勵私人商業，再度緩和和征稅，對於合作社更給以特別優待，至於外國人商董，比起蒙古人的

私人商業來，其負担自然要沉重些，不過這裏的外國人是是否指蘇聯人？則不很明瞭。

一九三二年以後的新政策，承認私有資本，提出獎勵貧寒及中等牧民的私人生產，在租稅政策上也充分反映出來。「資力不大的中產階級和勞苦階級，受到完全豁免租稅或大量減少的特別優待」，「以狩獵爲生的蒙古國民，得免除營業牌照稅等等捐稅。」（魯伊奇克氏上引論文）。因此結果過去佔有歲入半數的租稅收入，據政府公布：絕對的及相對的，都有顯著的減少。一九二七年計達四百九十萬土格利克（佔歲入之四五·九%）的一般租稅，到了一九三四年減少至二百萬「土格利克」（佔六·七%）。

試觀當時稅收預算及實際收入額的對照表。其中平民減稅額，是依照上述社會政策的動機而減免徵稅的金額，（單位土格利克）。

年份	租稅收入額	貧民減稅額	稅收實數
一九三六年	四、四〇四、〇〇〇	七六六、〇〇〇	二、四九五、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	六、五〇〇、〇〇〇	九九一、〇〇〇	七、一四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一六、五九〇、〇〇〇		一四、六一二、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據內閣總理報告，一九三八年度的徵稅方針，對資本家及喇嘛比較增徵，對中等民衆減等，對下級貧民免徵。對喇嘛的徵稅，計爲二百萬土格利克，然而「以三九年度喇嘛已不存在」，所以只對舊關係者增稅，而主要的是對下層民衆實行減稅。不過由於人口相當地增加，三九年度的稅收，仍較上年度增加。而上年度尙有沒收的財產總額三百萬土格利克，也撥入三九年度的收入預算了。

由於有如上述的租稅收入之相當額的低下，政府不得不以工商建設機關收入爲主要的財源了。果年收入數額大致是：

一九三六年度	二二，三二五，〇〇〇土格利克
一九三七年度	二五，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度	三八，三〇五，〇〇〇”
一九三九年度	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這裏不容忽視的是一九三九年已一躍而較上年度收入增加達十二倍有餘。

國營機關收入和稅收總和，三八年度約為五千三百萬，三九年度預算為五億，兩年度的收入預算相較，各約有三千九百萬及四億二千五百萬元的財源出處不明。但據總理喬巴山元帥的報告，赤字約為三百八十萬土格利克。

他也說到公債的發行數額，計一九三七年度有教育公債一百萬五千，一九三八年度發行國防公債五百萬，但前者成績不良，後者成績則非常好。此外，還有一部份對蘇聯的借款。

從大體上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財政政策是和人民革命政策不可分離的，而實際的成績，對於中下等人民生活的改善，發展經濟生產事業的發展，以及國防的加強等等，都有重大的貢獻，這是不容忽視的。

第二節 貨幣制度

(一) 原始形態的幣制

外蒙古在人民革命以前，嚴格地說，並沒有貨幣制度存在，一般人民多進行物物交換的原始辦法。交換物也是在牧民中從古相傳的羊和磚茶。

羊和磚茶，都是蒙古人民生活上日常不可或缺的東西，不論何人何時何地，不問任何關係，都可應用，而攜帶方面也比較便利。這些東西遠昔已有中國商人所普及，利用以為交易上的工具，羊和磚茶除了有利用價值

以外，對於從事高利貸的中國商人，尤有極大的利益。

和羊及茶磚等一樣相當廣泛地使用的，過去會有中國及俄國商人帶去的馬蹄銀及漢堡銀。不過這些還不如說是中俄商人之間的交易手段，不像羊和磚茶那樣的普遍，一般民衆過去不知道黃金的寶貴，只作爲高貴的飾物，在封建領主和寺院裏才充作財寶。

後來俄國的商業在蒙古發展，俄國的紙幣、硬幣等也開始流通起來。此外一般民衆中間還使用各種綢布片，像中國商界的票據一樣的東西，但是流通範圍似乎都只限於一小地區。

當然，在那個時候並不是企圖確定幣制，以謀促進正當活潑的商業。所謂外蒙古自治政府，就會在帝俄的援助之下，企圖確立自己的貨幣制度，賦與俄國企業家莫斯科維契諾夫和尤佛洛夫兩人以設立具有發鈔權的銀行的特權，俄國官民之間，就會圍繞着這種權利而進行勾心鬥角的暗鬥。一九一四年後，在烏倫巴都爾（庫倫）創設蒙古國民銀行，才着手於幣制的確定，而俄國帝國主義者及大企業家在蒙古的金融鬥爭才告結束。

（二）革命後的幣制

一九二一年七月，蒙古人民革命黨，獲得蘇俄紅軍的援助，打敗了日俄兩帝國主義者勾結的白衛軍，進兵庫倫，組織擁戴博格德，甘肯（活佛）爲君主的蒙古自治政府。政府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樣迅速恢復陷於不可收拾的紊亂萬分的財政的秩序，當時唯一的國庫的源泉，是關稅收入，那時恰值外國貿易極度衰落的時候，不能取得可以滿足預算的資金。不只如此，而且又由於溫千倫（白俄領袖）將國庫資金作掠奪性的消費，更使政府財政的困難達於極點。

後來政府方面獲得蘇聯的援助，一面整理舊債，一面發行公債，暫時渡過財政上的難關，後來又努力於恢復信用，圓滑物資流通，積極整頓財政，爲此確立貨幣制度。而蒙古的工商銀行，也就爲了這種任務而開辦了。該行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在庫倫創立，除了從事一般銀行業務之外，還作爲通貨制度的確定執行機關而

賦有發行、兌換、印製紙幣及輔幣的特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實施新貨幣制度，發行蒙古民族的第一種紙幣。這種紙幣就叫做「土格利克紙」，票面分爲一、二、五、一〇、二〇、五〇及一〇〇土格利克等七種，每一土格利克，規定必須相當於純銀十八格蘭姆。兌換券以發行貨幣總額之二五%的銀幣及銀子和外國本位貨幣作爲保證，其餘的七五%則以銀行所有的短期支付票據證券及容易現金化的商品，以爲保證。

(三) 新幣制的進步

至於銀行和政府的關係，則規定銀行得對政府以紙幣支付放款，政府得對銀行給與接受融資的資金額五〇%的黃金及外國本位貨幣的保證，其總數則約定以國庫的票據合作爲保證。銀行對政府融資的總數，不得超過蒙古工商銀行所發行的紙幣的五分之一的金額，藉以防止銀行陷於政府的御用機關的地位，不致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

接着紙幣的發行之後，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又發行銀幣及銅幣。銀幣分爲一土格利克，五十蒙格，二十蒙格，十五蒙格，二十蒙格，此外又發行一蒙格，二蒙格，五蒙格的銅幣。一土格利克及五十蒙格的銀幣成份，計爲純銀九百，銅一百，一土格利克的銀幣，含有純銀十八格蘭姆，總量則有二十格蘭姆，五十蒙格的銀幣，規定純銀爲九格蘭姆，總量十格蘭姆，小型銀幣的純銀成分爲二十蒙格——一·八格蘭姆，十五蒙格爲一·三五格蘭姆，十蒙格——〇·九格蘭姆。又有五，二，一蒙格的各種銅幣，則規定每一百土格利克相當純銅三二·七六公斤。

當新貨幣制度施行之際最可憂慮的，曾經是中國商人對於新貨幣的態度問題。因爲當時的外蒙古的市場，依然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操持在中國商人的手裏，由於新貨幣的確立，就不免要消滅一直佔有支配地位的中國貨幣，同時中國商業也不免受到相當的損失。

同時，另一方面，流通範圍也相當廣泛的俄國貨幣，特別是紙幣，由於帝政俄羅斯的崩潰而立刻變成毫無價值，加以因為濶干倫時代的濫發公債，更加慘跌，一般牧民受到通貨和有價證券等毫無信用的深刻教訓，當然也會影響到新通貨的施行上面。但是這種民衆的疑雲，由於政府方面適合機宜的處置，很容易地消除了，市場上竟得風平浪靜地進行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實施金本位制。這樣一來，蒙幣土格利克可以不受銀市變動的支配，而在外匯交割方面，也可以和各國的本位通貨一樣。金土格利克以十土格利克爲單位，純金含有量規定爲一索洛特尼克八十德利亞（索洛特尼克爲舊俄金衡單位，一索洛特尼克合九十六分之一鎊，即四·二六六公分，所以一·八〇索洛特尼克，約爲七·九〇二公分）。

一向不知道什麼叫做貨幣的蒙古民族，現在已經踏進發達了的貨幣經濟之門，開始建築嶄新的國家經濟的生活了。

第二節 金融機關

(一) 建國初期的銀行

蒙古人民革命以前，只有漢人經營的銀號及其他私人金融業。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才全部收入國家的手裏。蒙古銀行在蘇聯政府的援助之下，首先於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在烏倫巴都爾（庫倫）成立。當初資本爲五十萬盧布，由蘇聯及蒙古對半出資。

銀行的業務，包括普通銀行的業務即是票據交換、商品與商品證券、有價證券、貴重金屬的抵押、貸款的交付、商品票據、信用票據之交付、農業及其他放款、外國通貨及貴重金屬的收買、普通活期存款、特別活期存款之收受、定期存款、不定期存款的收受、匯兌、貨幣、信用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券之兌換業務等等，此外又

有銀行的特別使命。該行創立章程第一條：蒙古銀行在強化蒙古人民共和國及其與蘇聯的經濟關係，在蒙古助長商業工業的發展，促使蒙古通貨的健全化，並執行關於蒙古政府歲出入預算的會計業務，基於銀行及政府間的特殊協定，執行其他政府的委託事項。

創業初期的銀行，營業方面專在援助政府預算的執行，對蘇聯蒙古各通商機關實行融資、扶助工商業的發展，而不注重於對一般大眾的金融機關的活動。從當時資本額很少這一點看來，可說是當然的。不過在這裏應該特別說明的，蒙古銀行在金融界方面，與其說是原有銀行活動，不如說在確定外蒙古貨幣制度方面，在實施上更起重大的作用。這種作用，在像外蒙古這樣向來沒有本國的貨幣系統而只有半原始的物物交換的流通手段的處女地，無疑的可說是一大實驗。從這一層意義上說：比起今日蒙古銀行在一般金融方面的作為中心機關的地位來，還是當時在外蒙古作為通貨推行機關的過渡時期的活動，更其有重大的意義。

(二) 蒙古銀行的發達

蒙古銀行利用巧妙的利息政策，一面實施存款放款等普通業務，努力收回過去在外蒙廣泛流通的中國銀元，一面利用以為發行通貨的保證資金，並促進新通貨之合理的流通。這種業務，由於政府方面制定關於新通貨之流通，信用之維持及新納稅法等之實施，內外呼應，相輔相成，所以竟能收獲極好的成效。因此雖然禁止久有信仰的中國銀元，而並不像一般人預料那樣發生物價暴漲及新幣流通受阻等現象，蒙古共和政府的幣制改革，平平隱隱地實現了。

一九三四年，蒙古銀行的資本額，已從創立時之五十萬盧布，增加到三百五十六萬金土格利克。蒙古銀行成爲人民共和國唯一的金融機關而合力執行政府的預算，經營一般銀行的交易爲業務，並且對蒙古的國民經濟、商業、消費合作社、工業、運輸、私人經濟等各部門，實行融資，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化 and 經濟上的建築，表現極重大的作用。

對於私人經濟的融資額，在一九三三年爲七萬三千四百土格利克，至一九三四年已增達七十萬土格利克。一九三四年度對工商業、運輸、畜牧、農業等國民經濟的銀行融資總額，由一九二七年的三、四二九、〇〇〇土格利克，增加至六九、七五三、〇〇〇土格利克。

蒙古銀行在阿爾泰、布拉克、賓土曼、提布霍爾特、哲哲爾利克、溫都爾亨、烏倫柯姆、土音戈爾、摩林夫蘭、葉倫扎布、扎加奴爾姆等全國各主要城市，各「旗」的中心地，遍設銀行。並在全國各運輸、交通、經濟、文化等地方新中心地，設立代辦所及儲金局，努力吸收遊資，動員資金到建設性的生產活動的各門部者。人民共和國國內流通機構之確定及貨幣制度的實施，當然首先靠着黨政當局正確的政策和蘇聯在設計上及技術上的援助，而在建設時期蒙古銀行總裁米海利曼和副總裁德浦欽、迦布羅羅夫等幹練的手腕，也有不容抹煞的功績。在幹部方面，蒙古銀行總行和各地分行的辦事人員，逐年都有增加，其中蒙古的行員，由一九三〇年之二四名，增加至一九三四年七一名。不過實際未見數字發表。

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家蒙古銀行在鞏固外蒙古各進步勢力之團結互助，曾經建立相當主要的功績。

第六章 交通·運輸·郵電

第一節 交通運輸政策的演進

蘇聯在於一九二一年援助外蒙古的人民革命，結果，外蒙古建立起一個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替自己民族命運完成了決定性的轉變——從商業高利貸資本和活佛的神權專制制度下解放出來，同時也成爲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集團最有力的一個盟邦。以後蘇聯對蒙古，在文化上和經濟上，會繼續不斷的加以援助。

蒙古由於特殊的自然的地理的條件，由於是一個在廣大面積上只有極少人口的國家，所以要促進其經濟發達上的絕對的條件，當然必須要求促進交通運輸之全面發達。不過，蘇聯政府對於蒙古方面這個要求，也許是考慮到國際關係和國際上的要求，援助的却有點不很充分。

革命以前，外蒙古沒有汽車。一九二三年締結蘇蒙友好條約，首先有赤塔鐵道局的運輸事務所到外蒙古活動，接着又有「第一運輸股份有限公司」[Suftrušturco]（蘇維埃商船隊）等在外蒙古設立分公司，一時外蒙古運輸界頓呈活躍氣象。

外蒙古的第一個運輸機關，是一九二五年創設的，叫做「蒙古運輸局」，作為國家企業而賦有運輸的獨占權，這個機關後來宣告撤廢。一九二九年改組蒙古蘇聯合辦的「蒙古運輸公司」，完全是外蒙古的國營企業。「蒙古運輸公司」在蒙蘇合辦組織之初，正是蒙古左翼社會主義政策強制推行時代，政府對於「蒙古運輸公司」，賦與運輸上的國家統制權，獨佔國內運輸事業；同時：却忘懷了馬車運輸在國內的重大任務，限制了一般大眾的運輸業務，只集中力量於汽車運輸的發展擴充。

一九三〇年實施國營貿易以後，引起了輸入物資的不足，再加以運輸機關的不完備和運輸能力不足，因而出現商品飢荒的現象，牧民及政府的反革命運動更加激烈起來了。關於這種情形，在一九三四年第七次「大呼爾登」（國民會議全體大會）對極左政策的錯誤作最後審判的時候，總理甘都恩氏曾經這樣說：

「第六次大呼爾登會議所決議的政策，在經濟建設等各部門犯了極大的過錯。在運輸的領域內，實施了在商業領域內同樣的政策。私人運輸業無法發展。挽車運輸有公營農場才被允許。然而公營農場並沒有使用的生產用和運輸用的家畜。因為不能發揮生產勞動作用，家畜首先實行社會化了。蒙古運輸局對國內運輸有獨占權。因而發了一種錯誤的見解，以為運輸的基礎形態是汽車運輸，挽馬車及駝載運輸只是補助的運輸，因此非使後者的任務更加縮小不可。國民對於運輸發生了這樣的見解，以為後者的發展已不必要，不要援助國民的挽

車運輸及駝載運輸。因此全部注意力沒有集中於「蒙古運輸局」手裏的汽車運輸了。我們的挽車運輸在技術上落後，然而却是運輸上的基礎的形態，是在國內可以保證貨物運輸的基礎的運輸力。汽車運輸暫時只能是補助的運輸工具，但是過去沒有理解到這一層。實施了不能保證國內貨物運輸暢達的運輸政策。」

政府鑒於這種運輸政策的失敗，終於取消「蒙古運輸」的獨佔權，改為隸屬於商業運輸部的國營企業而推動運輸業。另一方面，放棄了以前對汽車運輸過分的重視，改以爲次要運輸手段，反之，把私營馬車及駝載運輸特別重視起來。

爲着獎勵私人的創造性的貢獻，保護從業者的利益及其權限，組織了公會等等。總之，是放棄了左傾幼稚的「全部模仿的社會主義化政策」，而改取適應蒙古的國情的新政策，以求積極改善推進外蒙古的交通運輸事業。外蒙古的交通運輸政策的演進，大致就是如此。

第二節 運輸工具和主要道路

首先，外蒙古的交通運輸工具，自古以來，以牛、馬、駱駝三者爲主。馬及牛的使用，以在每年六月至十月中旬爲主，從冬天到初春時期，則以駱駝爲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

牛，普通一小時可行三公里，一天的可行三十公里，貨車的駝載運輸量約爲十五蒲特。（每一蒲特約合四十磅或一六·三八公斤）。

馬，分騎乘用及駝載用二種，駝載運輸量約爲四——五蒲特。如爲乘騎，每日約可行七十至八十公里的路程。

駱駝耐寒及耐飢力很強，所以多用於冬季挽車及駝載，以每小時約四公里左右的步度，一天可行三十俄里左右，運貨的載重量約爲十二至十五蒲特。

這種交通運輸工具，在現代來說，自然不免有太落後了之感，但是在現代交通運輸條件不完備的外蒙古，在這以遊牧爲主要經濟形態的蒙古人的生活上，却一直是第一等重要的意義。

其次當然要推汽車和火車，火車即鐵路運輸，在外蒙古完全是一種新興事業，因此還未取得決定性的地位，汽車是比較近代的交通運輸工具，最初於一九二三年出現於外蒙古，但多數是屬於國營企業「蒙古運輸局」所有的。

此外還有自由車，爲一般大衆的交通機關，在外蒙古人民大衆中，很受歡迎。而且因爲售價不很昂貴，一般人民容易購辦，所以爲一個蒙古青年，都夢想着有一輛自由車。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道路，現在已非昔日之寂寥可比，但是主要的國道，也還只有幾條：

(一) 丘雅國道——這條國道由提爾加蘭，經過察干努爾和柯希·阿加契，而至庇斯克，全長達八百七十公里。

(二) 杜思金國道——這條國道以提布霍蘭特爲起點，經過哈特希爾，杭愛，出西伯利亞綫之庫爾都克站，長度九百十公里。

(三) 買賣城國道——這是自古以來爲最繁盛的國道，從烏倫巴都爾（庫倫），經過阿爾頓·布拉克，買賣城，至烏倫烏台，全長六百公里。

(四) 波爾查國道——這條國道由巴音都曼，經過華倫札布，而至波爾查站，計四百八十公里。

(五) 張家口國道——這是從前通北京的隊商故道，從烏倫·巴都爾（庫倫）經過烏台，直到張家口長達一千二百公里。

以上各路，除了張家口至外蒙之間，在二次大戰前後，會有較長時期的封鎖，完全喪失國際交通的意義外，其他都是和蘇聯的聯絡幹綫，丘雅、買賣城、波爾查、杜思金等國道國境綫，計有七百輛以上的汽車，經

當從事於蘇蒙物資交流工作。

第二節 牛車和駱駝

說到外蒙古的役畜運輸，立刻令人回想起大元帝國以後完備了的驛遞制度。龐大的蒙古帝國，完全依靠着這個制度來維持的。後來直到滿清末年，一直都是利用這種制度，來維持全國的交通通信和運輸事業的。主要的，還是政府的連絡機關，並不是惠及一般民衆的；而且是用馬（有時爲牛）來運送公文和公差官員爲主，似乎沒有運輸商貨的。

蒙古人民政府，從一九二九年以後，曾經一度把這種驛遞制度特別是一般役畜運輸加以限制，以發展汽車運輸事業。役畜運輸事業，不准私人經營，只有加入公營農場的才允許利用集團化的馬匹，從事運輸。

然而，機械化的運輸計劃是失敗了，公營農場的役畜運輸計劃也沒有成功，除了地方性的以外，從外蒙古全體來看，作爲運輸工具各種役畜的重要性，大致爲牛占七三%，馬一九%，駱駝八%，牛的使用比率最大。馬匹多用於蒙古蘇聯國境上的運輸，在國內專作乘騎之用，而且爲着馬匹的集團使用化，結果各公營農場並不能充分完成自己在運輸上的任務。

在政府強制推行汽車運輸計劃的時期，役畜運輸，實際上仍舊有極大的重要性，例如一九三一年內，外蒙古的貨物運送量一百十四萬六千五百公噸，其中利用役畜運輸的，約達七八%以上。一九三二年以後，再度重視役畜運輸制度，這種比率自然更加增高，以後大體上要佔百分之八十左右。

從外蒙古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牧民這一事實來看，這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據人民政府調查，蒙古具有運輸能力的役畜頭數，一九三二年有駱駝二十萬頭，牝牛二十五萬頭，大部分是牧民私人經濟所使用的，實際上從事運輸的恐怕不到這個數目。此外馬匹計達六十五萬頭，不過大部分不作爲

運輸貨物之用、限於驛選用和一般乘騎之用。

蒙古的役畜運輸，也各有地方的特殊性，例如使用駝車的，限於中央部、農業區、東部及肯特盟，而東戈壁、南戈壁、後杭愛、薩布汗各盟，都不使用牛車。這些地方因為地勢的關係，都使用駝駝。

如果內蒙古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上面，最必要的是物貨供應的合理化；那麼，根本上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運輸費合理化——就是運費的減低和運輸時間的縮短。

極左政策時期的運輸機械化，由於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是，外蒙古畢竟不能不利用汽車運輸，這是將來要跟着經濟文化發展而進步的，不過在短時期內，役畜運輸的合理化還是最根本的任務。

從麥粉、鐵器、石油、砂糖、茶等蒙古人的必需品來觀察，國內運輸費約為國境運輸費的一五%至八〇%，如計入運輸期間及其途中的損耗，則可以看到蒙古一般消費者負擔的相當沉重。所以為着加強運輸的效果，必須努力於技術的改良，如貨車及裝備的改善，以及驛遞的設定、飼料的配置、道路的改善等等。

在改善貨車方面，如每牽引獸類一頭增加平均積載量從十三蒲特至三十蒲特，那麼可以獲的效果是：（一）運費減低二五%，依價格言，全運輸費可以節省約一百萬盧布。（二）運輸途上的貨物損耗也可以相當地減少，防水布等運輸上的雜費也可以減少。（三）運輸速度增大，因為可以達到商品流通總量的增加和資金之圓滑的周轉，可以緩和地方性及季節性供給不足。

關於資金的周轉，過去外蒙古經濟機關的資本周轉是非常緩慢的，所以為着發展公私企業，主要的有賴於運輸條件的改善。

第四節 運輸機械化

（一）國內公路運輸

一九二九年開始推行極左政策，在運輸方面以汽車運輸為重點，解散了一九二五年成立以來和私營運輸業考處於競爭地位的國營蒙古運輸局，新創蘇蒙共同投資的蒙古運輸公司，給與國內運輸郵遞業務的統一的獨佔權。但是在這個階段的汽車運輸，由於（一）道路綫過長及道路不良；（二）汽車用油的供給及車庫設備的不足，未能發揮機械化運輸的機能，而且引起了國內貨運停滯和混亂的局面。

在這期間，汽車由六百輛而增加到一千五百輛，後來更加過了二千輛，每年由蘇聯輸入外蒙古的，至一九四一年蘇聯衛國戰爭發動之時為止，約在二百輛以上。

從一九三四年起，蒙古運輸公司所經營的定期汽車路綫如下：

區 間	距離	每日來回次數
烏倫巴都爾——提爾加蘭特	一、四六〇	三
同——哲哲爾利克	四三〇	八
同——上——達蘭薩達加伊	六〇〇	四
同——上——土音戈爾	六五〇	三
同——上——巴音·土曼	六八〇	六
同——上——哈特菲爾	八〇四	四
同——上——齊布哈蘭特	一、一五〇	三
同——上——阿爾頓·布拉克	三七〇	二
同——上——查明·烏台	五七六	五

旅客運費，成人每一公里為十個蒙格，兒童（六歲至十二歲）為五個蒙格，幼童（六歲不足）三個蒙格。行李在二蒲特以下的每一公里二蒙格，二蒲特以上每一公里一律為二·五蒙格。所以，大人一人，從烏倫巴都

爾至提爾加蘭特，約費一百四十六個「土格利克」。

(二) 國際公路運輸

以上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內近代化交通運輸情形，至於蘇蒙國境的通商路線，汽車運輸，向由蘇聯方面的運輸機關經營。

一九三四年通行於蘇蒙國境各道路上的貨車，約共七百輛，不過當時還缺乏修理工場，車庫，技術員等的配置，爲着不能修理，運輸狀態非常惡劣，這年一月裏可以開車的不過全部的二八%。而且運輸車也不好，每輛平均運輸量不過一一〇至五〇公噸。鑒於運輸成績不好，改由「蘇蒙杜芬通商部」獨佔經營一切運輸事業，同時，蘇聯政府爲着加強業務的效率，全部路綫上一律配置政治部，組織工人配給所及郊外農畝，對沿路從業員配給物資等，把所有運輸機構大加改革。

蘇蒙杜芬通商部，自一九三四年起所負責任任務爲：(一)保障商品運輸計劃之完成，(二)修理工場及車庫等設施，(三)肅清潛藏在交通運輸機關裏的階級的敵人，(四)提高沿途生活上以及物質上的設施，(五)培養有資格幹部，並防止其流動；(六)汽車修理之敏速化，(七)水運之最大限度的利用，(八)運輸原價之遞減。

到了第二年一月裏，行程已增達七九%，運輸能力亦從一一〇公噸提高至四二、〇〇〇公噸。

這個機關在波爾查、買賣城、丘雅杜金斯基、烏辛斯基，均設有軍用道路及事務所，備有無線電台，掌握着運輸上的獨占權，在二次大戰期內，發揮它爲蘇蒙軍事運輸的中樞機關的作用。

(三) 機械運輸近况

蒙古運輸公司在首都烏倫巴都爾設有總公司，在阿爾頓·布拉克、貝音·土曼、溫都爾·汗、齊布哈爾特、烏倫·柯姆、達倫薩達加伊、薩音·希提達、查根·烏爾姆、哲哲爾利克、土音·哥爾、哈特希爾等地，都設有分公司。

據B·潘爾林氏的統計，一九四〇年度，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汽車數目，增加了一九三四年的二五%，汽車的總積載量增加了一一%。汽車的運行距離，一九三六年度爲一三、七四七、二〇〇公里，一九三八年爲一八、四〇一、〇〇〇公里。貨物的運輸量，一九三六年爲六〇、八〇〇公噸，一九三八年增加至八四、二〇〇公噸。每汽車一輛的行駛距離，一九三四年爲一七、二八〇八公里，一九三八年已增加至二七、〇三一公里。

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交通運輸事業開始飛躍的發展，一方面是汽車輛數的增加，汽車公路建築。修繕和沿途設施的增加改善，另一方面的蒙古人的交通運輸上的幹部人才，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四〇年全部從業員已有七三、二%是蒙古人，一九四五年這個比率已經提高至九八%。在首都及其這大城市，已創設汽車專門學校及從業人員訓練所等等。

第五節 驛道和鐵路

(一) 烏爾頓——外蒙的驛制

外蒙古運輸交通組織上另一特殊的形態，就是從大元帝國時代以來一直活動着的「烏爾頓」——驛傳制度。這是從古以來官用郵遞組織，課給牧民以特定的義務行爲，主持驛遞的牧民，對於官用旅行者——走公差的——，須在一定區間提供必要的人馬，並且還要負擔這些公差的膳食費用。

這種烏爾頓制度，自從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以後，稍有改變，但大體上保存着，不過限於國道路線。驛遞費由人民按照一定比率繳付，不過對於公差的膳食費的義務，已經正式取消了。而且管驛運的人員，還可以領到一筆酬勞，成爲一種運輸上的從業員。所以，在人民政府下的蒙古驛運，不再是從前那樣的牧民的極權了。

蒙古一般人民的旅行，通常使用自備或僱傭的家畜（馬、牛及駱駝），旅客行李及貨物，也用這種家畜運輸。至於烏爾頓制度，則是公共的或國家的運輸制度，法國的天主教修士普拉諾·卡爾賓，曾在一八四六年和

他的同伴們，從伏爾加河畔的巴第陣營，到蒙古大汗的首府，就是利用這種烏爾頓制度，每天換馬達五六次。近代蒙古的烏爾頓制度，最通行的，一種是主要道路上的國家用烏爾頓，另一種是「盟」或「旗」等二等道路上的「蘇蒙」（鄉村）用烏爾頓。官吏旅行，都應用烏爾頓制度，政府的公民及官有物品，也都用這種制度來傳達及運輸。一般人民，不得擅用烏爾頓制；只有交付特別費用之後，有時個人也可以用烏爾頓制。外國領事有每月免費使用烏爾頓用馬三十頭的權利，外國僑民經過該國領事的申請，也可以繳付一定費用而使用烏爾頓的。

烏爾頓制的旅行，多由各該官廳發給特別的「撒拉」（許可證）向烏爾頓驛所提出，驛所就可按照許可證上所記載數目，供應馬匹及馱者。驛所的距离，自十五至六十俄里不等，平均約為三十俄里。驛所有為旅行者特別設置的天幕，並依照旅行者的官級，供給一定數目的羊。烏爾頓的馬匹，普通可以盡量使用，能在一晝夜間疾馳至二百俄里以上。也有些地方，是供應車輛的。車上普通有五個至六個駕駛者同行，互相輪班交替。那時都用人力挽車而行，往往有車破人傷的事件發生。後來改用馬車，但是對於貴人及重大事件的旅行，仍維持舊式人力挽車的辦法。烏爾頓多由「旗」來維持的，「旗」往往為此而指定若干家族負責此事。

(二) 主要驛道

蒙古領土上的交通，不容易的地方，就在有大大小小縱橫交錯的許多道路，就是最詳細的地圖，也有多數沒有給繪畫上去的。最重要的驛路，是從買賣城經庫倫至張家口一線。此外是連結阿爾泰管區及騰格里之間的就是外蒙新疆一線。由烏里雅蘇台，經薩伊爾斯到張家口為一千七百俄里。烏里雅蘇台至古欽、科布多至古欽一線，是騰格里的草原和蒙古之間的商隊大路，貫穿蒙古阿爾泰和騰格里荒地。這兩條路的延長，約為七百俄里。科布多——西約拉——蘇曼這一條延長達三百三十俄里的道路，是連結外蒙古和阿爾泰管區的要道，在高度達一萬尺的烏魯姆格第嶺上橫斷蒙古阿爾泰山區，夏天只可通行駝馬旅行。至於庫倫到海拉爾的路線，是外

蒙古和東北中東鐵路連絡的要道，經過的是交通便利的平地。這條路經過克魯倫河，可通車馬及汽車。

國內主要烏爾頓道路，是一千四百俄里的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三音·夏比——庫倫線，爲國內主要行政及經濟中心地的連絡線。各區間的里程，自科布多至烏里雅蘇台間四百五十俄里，自烏里雅蘇台至三音·夏比間四百五十俄里，自三音·夏比至庫倫間五百俄里。這些道路，有通行車馬之便，現在大部份通行汽車了。比較困難的只是泥濘較深的薩布亨河之渡涉和杜爾加諾爾（湖）及喀喇烏蘇附近的砂丘。

除了這些重要的道路之外，其他第二等的具有地方上意義的，尚有無數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布多至烏里雅蘇台間，設有十四個烏爾頓驛，烏里雅蘇台至庫倫間設有三十個驛，買賣城至庫倫間有十二個驛，烏里雅蘇台至張家口間有七十五里驛，科布多至古欽間有八驛，科布多至烏倫柯姆間有三十五驛。

(三) 鐵路

外蒙古的鐵路設備，還沒有在交通運輸上占支配地位。但其重要性已日益增加。從外蒙古宣告「自治」的時代以後，俄美等國的企業家，都會再三企圖在外蒙從事建設，但是都沒有實現。最初的鐵路建設，是從一九三八年夏天才開始的，這是從烏倫巴都爾（庫倫）到那伊哈煤坑的一段鐵路，計長四十二公里。烏倫巴都爾的國營工業公司爲着保障煤斤供應的便，才建造這條鐵路，對於外蒙工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從外蒙邊境的買賣城到蘇聯布里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之烏倫烏台之間，自一九三七年開始建設鐵路，至一九四〇年已告竣工及通車。這條鐵路，現在已經延展到蒙古共和國的首都烏倫巴都爾，並以這裏爲中心，作十字形的開展，這種鐵路建設計劃，還在繼續實施中。

此外，從莫洛托夫鐵路之朴爾查站經蘇蒙國境的葉埃倫札布至貝晉土曼，也已經開建鐵路。因此，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交通運輸，更加便利了。在最近，還有許多加強蒙古蘇聯之間鐵路交通的計劃，正在逐步準備及實施。不過，相反的，對於蒙古和我國本部的鐵路交通，則未有開建的徵象。

第六節 水運·航空·郵電

(一) 外蒙的水運

外蒙古最大的湖水，是西北部的柯索戈爾湖，南北一百二十俄里，東西四十六俄里，深達一百四十俄尺。流注該湖的各河之中，尤以發源於蘇蒙國境山中的杭愛河爲最大。又從該河南端流出之河，叫做埃琴·戈爾，與色楞河合流。在這個大湖的南面，有一個叫做哈特菲爾的商業城市，蒙古運輸公司在這裏設有分公司，經辦湖上運輸事務。哈特菲爾市所設倉庫，屬於蒙古運輸公司的有四十貨車的收容力，屬於蘇聯商船隊的有二十貨車的收容力。

柯索戈爾湖的北面，是杭愛市（現在叫杜爾太），有蒙古運輸公司的倉庫，收容力約達四十貨車，不過，上面所說的哈特菲爾市是天然的良港，而杭愛市的碼頭，設備並不好。這一個湖的航行期間，每年約有六個月。其他半年凍結。

蒙古境內可通舟楫的河道，最著名的是：色楞格河（包括支流埃琴·戈爾、台利基爾、摩倫、烏利河等）及鄂爾渾河（包括土拉、喀喇戈爾、伊羅河等）兩大水系。這些河道的航行期間，爲每年四月至十月，但是因爲水路的轉變及砂洲的移動，航行上很多障礙。

蘇聯方面，爲了擴展及加強東西伯利亞水運局，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創辦鄂爾渾河及埃琴戈爾河的定期航路。又在一九三三年，把隸屬於東部西伯利亞水運局的色楞格河航運局獨立出來。至一九三五年已擁有汽輪二十一艘，小汽輪五十艘。這一年從烏倫烏台至買賣城之間的運輸，有百分之九十四是靠水路運輸的。

(二) 航空交通

一九二六年以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烏倫巴都爾，阿爾頓·布拉克和烏倫烏台之間，開始通行五百四

十公里的航空交通路線，除了旅客之外，已接收郵件及輕量貨物的運輸事務，這一條至航空綫，依照蘇蒙兩政府所訂條約，除冬季以外，定期為每週二次，現在已改為每日對開一次了，旅客及貨物到達烏倫烏台後，和西伯利亞鐵路連絡。

從首都烏倫巴都爾到烏倫烏台，票價為每人一百五十盧布，五公斤以下容積五十立方公分的小件行李免費，超過此限，每一公斤加收二·一五盧布。

除此以外，最近五六年來，依據軍事上的新要求，蒙古人民共和國已和蘇聯先後訂約，開闢許多航空路線，似乎都是軍用性質的。

(三) 郵電事業

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了統一郵電事業，已於一九二六年在經濟部屬下設立電信總管局，負責發展電信事業。至於郵政，則利用原有驛遞制度，由內政部主管，後來為便利一般人民的通信，就改組上述電信總管理局，成為郵政電信總管理局，並繼承了內政部所管轄的公文郵件。

一九三〇年撤廢經濟部，郵政電信管理局就移屬於工商運輸通信部，一九三一年改稱為通信總管理局。這個局分設組織、學業、無線電、會計等四課，管理郵政、電報、電話、及無線電等一切業務。

關於運輸及道路的國家機關，則另設屬於工商通信部的運輸道路管理局。該局的前身，就是一九二九年創設的蒙古運輸公司，管理有關道路、橋梁、水運、陸運等一切事務。

電報方面，曾計劃把革命以前孤立的各綫連絡成為國內共通的電報網，到了一九三〇年已經完成了。

電話方面，庫倫——烏台之間，原為張庫電話綫的一部分，這是蒙古第一條電話綫，後來逐漸發展，就有烏倫·巴都爾、朴羅泰伊間、喀喇——阿爾頓——布拉克間的長途電話綫（一九二四年落成），又有阿爾頓·布拉克到首都及以首都為中心而逐步發電的長途電話綫。

城市內的電話網，在首都及其他重要城市，也已先後通話。首都烏倫巴都爾之有電話，是一九一六年的事，當時由俄國人經辦，一九二〇年電話用戶只有五十餘戶，一九四一年也已有二百餘戶。一般人民利用電話的不多。

烏倫巴都爾和阿爾頓·布拉克，從一九三四年起創設無線電廣播局，一九三八年度蒙古人民共和國共有無線電收聽站三千五百十九處。

郵政事務，現在各「盟」「旗」的行政中心地點都設有局所，有若干大城市已利用航空郵遞。

一九三六年阿摩爾總理報告，一九三二年以後五年間，郵電事業大有發展，電報綫增加三〇%，郵政綫增加三·五倍，電話數為三倍，無線電台為十二倍。

第三部 資源與產業（上）

第七章 畜牧

第一節 國民經濟的基礎——畜牧

（一）畜牧與蒙古國民生活

蒙古民族以畜牧為絕對的生存手段，是從這些民族十二世紀初期所謂蒙古人這種名稱開始踏進人類史的時侯，已經聞名於世了，實際上在這以前，也許早已從事畜牧生活了吧。

實際上畜牧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上，還是支配性的基本部的，又是一般國民大眾的生活的根源。外蒙古完全沒有棉布、砂糖、煙草、茶、麥粉等生產，有時還不得不靠着家畜及畜產品來向外國交換輕工業品及五穀產品，而這種對外供給的畜產物，實際上正是蒙古平民大眾生活上所必要的物品。

例如各種乳製品、肉類等牧民日常食品，牝牛、駱駝、馬匹等為牧民的運輸交通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生產手段，獸毛則用以製造氈子、被單、繩索等，用以建造他們日常居住的蒙古包；獸皮則為毛皮革等，用以製造衣服鞋靴之類。甚至家畜的糞便，也可用作燃料而在大眾生活上具有重大意義。

因此可以想起畜牧對於蒙古國民的物質生活、生產事業，實佔有極大部分，而為國民經濟的基礎。

（二）豐富的畜產資源

蒙古人畜牧的生產物，主要是牛肉、牛乳、羊毛、馬毛、各種家畜皮及乳等。

最重要的是蒙古人的主要食物——牛乳及乳製品。蒙古人以牛、薩魯伊克、馬、羊、山羊、及駱駝的乳供給食用。大約全乳量的一半供給家畜的糧食，其他一半作為人的糧食。外蒙古每年的採乳產量為七千一百萬「佛德羅」（桶，俄國液量，一桶約合一二·三立特）全蒙古約共產二億一千五百萬「佛德羅」。蒙古人一面吃家畜的原乳，一面也食用各種乳製品，主要的是「烏羅瑪」（濃的泡沫）「維蘇魯伊克」（各種乾酪）、阿盧盧（乳酒）、泰魯伊克（焙製酸酪牛脂）、阿伊利克（馬奶酒）、阿拉基（火酒）、葉奇干（蒸製乳粥）及白塔（牛油）。

除了白塔以外的全部乳製品，一律是國內消費品。肉及獸脂在國內只用少數。一般蒙古人普通除了非常必要以外，決不輕易屠殺家畜。他們只吃凍死及野獸嚙斃的家畜的肉。

當然，某些富裕的住民，也食用家畜，但是每年的消費量也不多。據邁斯基氏調查，每年平均消費量，推定為山羊四十萬隻，牛十三萬五千頭。

畜產業的重要產物同樣還有羊毛及駱駝毛。邁斯基氏推定外蒙古各種獸毛的每年產額，計為羊毛六十萬「蒲特」（一「蒲特」為一六·三八公斤）、駱駝毛五萬「蒲特」、其中羊毛四十萬「蒲特」和駱駝毛四萬「蒲特」輸出國外。

還有畜產業中的重要產物，是斃命及屠殺以供食用的馬及薩魯伊克的尾毛及鬃。薩魯伊克的毛可以製造帳幕用繩及其他繩類，在蒙古人的經濟上有重要地位。每一匹薩魯伊克每年可得毛約三「彭德」（「彭德」合一〇·四一公斤），外蒙古的薩魯伊克所產的毛，每年即達四萬五千「蒲特」。

獸皮中最主要的是羊皮、仔羊皮。馬及牛皮利用以製革條、皮包、皮箱及釀造乳酒用的革囊、靴底革等。皮的用途則比較的不很大。

畜產業的特殊的產物，是乾燥牛糞阿爾格伊爾，是草原地帶唯一燃料。細心的主婦們每在夏天拾取，所以

一到多天，常常可以看到在天幕的附近，堆有這些特殊燃料的小丘。阿爾格伊爾的火力相當的強，而且又到處都可取得，條件很好。

外蒙古的畜產資源，大體可分為獸乳、肉、皮革原料三種。其中獸乳並不作商品，全部留作自用。春夏秋特別是夏天的用處最多。駱駝、馬、牛、薩魯魯伊克、哈伊奴伊克、羊、山羊等的乳及乳製品，和肉及茶，一併成爲蒙古人的主要食物。而以冬天爲肉食的季节。關於家畜的屠殺，過去並無統制，近來烏倫巴都爾等各盟中心地，也有大屠宰場之設，雖然全國的肉類消費量不很清楚，而據卜特賓尼克氏以一九二七年當時爲對象的估計，外蒙古以自家消費而消費的家畜，一年內計爲大角獸（牛及哈伊奴伊克）七五、〇〇〇頭，小畜一、二〇〇頭。不過近來肉類的消費量已大大增加，當然不上此數了。

家畜的肉及生畜，還有大量的對蘇輸出，。這種輸出，大體上是依照計劃經濟的原則的，所以不會有某一年度特別多或少的現象。從隻數言，約爲大角獸八〇、〇〇〇頭上下，羊四〇〇、〇〇〇頭上下。

畜產原料方面，羊毛、皮革及鬃毛等，都是輸出用原料資源，在外蒙古的經濟上有極重的意義。畜產商品原料的產額，大體如左：

羊毛	一一、〇〇〇公噸		
山羊頭毛及柔毛	二〇〇——二四〇公噸	山羊皮	六〇〇、〇〇〇張
駱駝毛	一、六〇〇公噸	仔牛皮	三〇、〇〇〇張
馬革	三八、〇〇〇——四〇、〇〇〇張	仔馬革	六、〇〇〇張
牛皮	六〇、〇〇〇張	仔羊皮	一七五、〇〇〇張
羊毛皮	一、六〇〇、〇〇〇——一、八〇〇、〇〇張	仔山羊皮	二七五、〇〇〇——三二五、〇〇〇張

第二節 游牧和牧業

(一) 游牧的範圍

蒙古在人民革命以前，土地屬於封建領主所有，一般牧民，不知有所謂土地所有權。各「旗」的牧民，可以在各該「旗」的領域之內平等利用牧地，只有在大旱缺乏飼料或大雪無飼料之時，才可以請准別「旗」王公的特別許可而從本「旗」游牧到別「旗」。

人民革命以後，組織成人民共和國，土地一律收回國有，公開規定以各「盟」（蒙古語「阿伊馬克」）可不許逾越的境界，「索蒙」（區）及「巴古」（村）則在游牧之時不另設固定的境界。

外蒙古擁有廣大的土地，然而人口密度極低，每平方公里差不多只有〇·六人。蒙古人的生產手段既以畜牧為主，而對於畜牧的狀態且有決定的支配力的，則是牧地的牧草。因此，他們常常適應牧草和牧場的良否、水的有無、氣候及其他地理的自然的條件，而結成少數的家族團體，從事游牧；不過這種游牧也決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混沌的，他們依照世代相傳的習慣，互不相犯，循照着自已的範圍內一定的軌道，從事放牧。

(二) 牧地的移動

游牧事業，常常因為各地區的自然的地理的條件而大不相同。從這種特性來看，外蒙古大約可以分為三種牧地的型式。

屬於第一種型式的，是只有外蒙古全境二六%的高山草原地帶，包括人民共和國的北部及杭愛地區，降雨量最多，土壤也還良好，有相當多的森林，富有優良的牧草刈取地及放牧地。因此，在這一地區，游牧的次數，每年平均四次至十次。其軌道亦有由四五公里至二十公里的。在外蒙古以游牧生產形的半游牧形態或定居牧形態而最容易移動的，就是這一地區。當推行極左政策的時代，由於外蒙古的提倡，曾經推行牧民定居化運動

，並且實行設置牧草站、獸醫及醫療分配中心、牧民學校，以及其他為現政府所繼承辦理的大眾的文化的畜產產業開發方策，而且收獲好的效果，所以，這裏也可說是外蒙古經濟地區的中心，將來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的建設，有很大希望。

關於四季牧地的選擇，各地都有其自然的地理的特性，怎樣進行最有效果的利用，則完全要看牧人自己的才能如何而定，不能單論地區的模式，至於一年可以移動四次，那就是說：春天放棄越年的畜牧地，選取留有許多牧草的新牧地。到了夏天，移動到河岸溪谷、小河、泉水等附近牧草豐富而相當涼快的河谷地區，秋天選擇開敞而牧草較多的地方。這種地方亦是距離水源不很遙遠的河湖附近、層丘及高地，冬天則選擇山岳地向南的斜面，以及背負溪谷的溪澗，以及有樹木和灌木圍住的河谷地區等，大體上就在於選取可以遮風又可以利用積雪以代飲用水泉的地方。

第二種型式是北部森林草原地帶至南部戈壁地帶這一地區，在性質上這是荒野的大草原。從外蒙古的植物帶的面積上，約佔二〇%的比重，這裏沒有大森林以刈取牧草的地方，而且又缺乏水泉，土壤是灰褐色的，常常會發生旱災，時時會鬧牧草荒。

因此，這種地方的遊牧次數，普通平均達八次至十二次，其遊牧軌道長度約為三十公里左右。

第三種型式是沙漠地帶，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東南部及戈壁沙漠地帶。此一地區雨量極少，夏天炎熱，酷暑和降雨的程度，決定地限制了牧草的生育狀態。

考慮到激烈的風，飛砂走石的暴風雨，冬天的大雪，水泉缺乏等不良條件，這一地區的經濟條件，究竟如何，已經不難想像了，所以，戈壁地方的遊牧，夏天以山地及山間遊牧為主，到了秋天再回到平地。遊牧者主要靠井水取給用水，而冬天只有靠積雪水。

牧草又是矮小而且稀疏的，遊牧的次數達數十次，遊牧軌道長度約二百公里的也不在少數。遊牧宿營地間

的距離約爲十里二十公里。

(三) 遊牧結合體

蒙古人通常以五戶乃至七戶構成一個小小團體而從事於遊牧。這種共同體叫做「胡同」，使嫡親家屬和親族合在一起，共同飼養家畜。

共同飼養的是羊和仔羊等，至於牛、馬則由各戶各別飼養。「胡同」的組織，普通爲期一年，但有時也有保持好幾年的。這是幾世紀來外蒙古遊牧的傳說。「胡同」也有互相結合在一個更大的集團裏面，而在一定的場所從事遊牧的。所以，在外蒙古，實行畜牧上的「集體農場」化，原來並不困難，問題只在如何把這種傳說從現代的政治經濟的觀點來充分的活用，並且爲着實現現代化的集體畜牧，怎樣提高外蒙古平民大眾的知識水準而使能接受。這一層，人民革命黨和人民政府在長期的努力之中，已經逐漸成功了。

第三節 家畜的分佈狀態

(一) 革命初期的調查

對於蒙古的畜產資源的調查，明白家畜的種類和所有隻數，這事實不僅具有科學的理論的興味，而且還有實際的意義。但是直到革命成功以後，關於家畜隻數的調查，還沒有可靠的統計。多數研究家估計，外蒙古家畜的隻數，從一千二百二十萬隻（「關於建設後營子鐵路的報告」）到一千三百十二萬五千頭（G，巴拉本「蒙古」，一九一四年）。研究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很多差別，因爲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大家都沒有正確的統計，不能下有根據的客觀的決定。

最初對外蒙古的家畜頭數提出充分確的統計資料的，是I·M·邁斯基的探險工作。邁斯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親自踏查各地，從外蒙古各盟各旗各別訪問，終於獲得包括各王公、高級喇嘛、寺院及納稅

住民（貴族平民，奴隸，喇嘛以外的人民）所有家畜的隻數報告的比較可靠的調查資料。這是包括蒙古全區的二八八%及外蒙古居民七五%，並且還有科布多管區，達爾哈特地方，西雅賓（喇嘛廟）及博古德，甘肯（活佛）所有家畜隻數的官方資料和訪問所得資料，可算是外蒙古第一次關於家畜的正確的調查。

依據這個資料，外蒙古家畜種別隻數，有如下表：

家畜種類	隻數	每一居民所有家畜平均數
馬	一、一五〇、五〇〇	二・一
駱駝	二二八、六〇〇	〇・四
牛	一、〇七八、四〇〇	二・〇
羊及山羊	七、一八八、〇〇〇	一三・三
合計	九、六四五、五〇〇	一七・八
馬	一、五〇〇、〇〇〇	
駱駝	三〇〇、〇〇〇	
牛	一、四〇〇、〇〇〇	
羊及山羊	九、五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二、七〇〇、〇〇〇	

不過邁斯基氏從他實地調查的經驗，認為這個數目至少還要加上三〇%，這是由於調查機關的不完全，而且因為蒙古人為着逃避捐稅，往往隱匿自己所有的家畜。邁斯基加上了必要的修正之後，全體的統計——外蒙古家畜的隻數，有如下表：

（依據邁斯基：「現代蒙古」內「國民經濟」一章）

一九一八年的調查，開始給全蒙古家畜實數推定上提供了現實的統計的基礎，依照一九一八年的調查數中邁斯基所作關於家畜隻數及每一口所有種別家畜平均隻數，已可能推定全蒙古所有家畜隻數。全蒙古人民的大多數，貫穿蒙古全史，都只粗笨地經營着畜牧事業，因此，二百萬蒙古人的經濟上的一般條件，和外蒙古居民的經濟條件及特殊情形大同小異。外蒙古及科布多管區的農業的發達，如有下面所要講到的，南部蒙古農業的大部分，由漢族移民所經營，科布多管區及外蒙古的蒙古人農業過去並不足述。因此，可以推算南部柴達木及科科諾爾（青海）蒙古人每人所有家畜平均隻數，大體上和外蒙古人一樣。

遊牧在中亞細亞的蒙古人，推定為二百萬人，除了當時外蒙古人口約五十四萬五千人之外，蒙古其他地方有蒙古人約一百四十五萬五千人。如果以每人所有家畜平均數：馬二·一，駱駝〇·四，牛二·〇，羊及山羊一三·三，他們所有種別家畜頭數有如下表：

馬	三、一〇〇、〇〇〇
駱駝	六〇〇、〇〇〇
牛	二、九〇〇、〇〇〇
羊及山羊	一九、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五、九〇〇、〇〇〇
全部蒙古的家畜總數，奇零不計，當如下表：	
馬	四、六〇〇、〇〇〇
駱駝	八〇〇、〇〇〇
牛	四、三〇〇、〇〇〇
羊及山羊	二八、八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三八·五〇〇·〇〇〇

所以爲蒙古國民財富的主要部分的全蒙古的畜牧業財產約爲家畜三千八百五十萬頭。

而有如上表所顯示的，羊及山羊實爲蒙古人經濟生活的基礎。蒙古畜牧從全體來看，具有小畜牧經濟的特徵，每一人所有家畜，平均只有一七·八隻。

(二) 外蒙古的家畜及其地方的分佈

甲、概觀 外蒙的家畜中，主要的是羊、山羊、牛、馬、駱駝。它們的分佈概觀及實數，過去雖有波戈萊科夫，索波萊夫，潘齊生，波羅本民等的各種估計，但直到邁斯基一九一八年的實地調查在一九二一年公布之後，才算獲得比較確定的數字。後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從一九二四年起，逐年努力於實地調查及統計，隨時公布，其中可算做最具體的資料，是一九三〇年的統計，現在姑且依據這個統計，來看蒙古家畜之地域的分佈狀態。

蒙古人民共和國各種家畜之地方的分佈，都受各該地區的自然地理的條件所支配，從種類及隻數上說，各地的分配也很不平衡。

乙、牛 外蒙古的牛，和布里雅特，吉爾吉斯，卡爾米克，西伯利亞的牛一樣，是中亞細亞的一種，是亞細亞野牛加以飼養馴化了的一種。多紅、黑、虎毛色等，栗色和灰色的也有，肉量多而品質優良。外蒙牛的分佈，以東部台地，即肯特山脈之南斜面及色楞格河沿岸地帶，以杭愛山脈爲中心的中部以北各地最多，西北部較古次之，西至東南部戈壁地方極少。

外蒙牛之分布：

盟別

頭數(千頭)

每方公里密度

東部

二五五·四九

一·三

色楞格	一四〇・六一	二・〇
柯索哥爾	一二五・三九	一・二
阿拉杭愛	一八五・九七	三・二
薩普亨	四五・八一	〇・五
肯特	二〇八・一八	二・八
南戈壁	二〇・四八	〇・一
中央	一一七・五四	一・五
烏布爾杭愛	六三・四九	〇・六
柯爾泰	一一・〇七	〇・一
烏布薩諾爾	六九・五二	〇・六
科布多	二五・二二	〇・三
東戈壁	二六・七一	〇・二

丙、馬 外蒙古的馬，並不是全部屬於同一血統的。西部蒙古哈薩克，與特民族居住地帶飼養的是哈薩克，吉爾基斯系的，匹。純粹的蒙古馬，並不很高大，但是一般都是非常優良的，對氣候的抵抗力很強。

外蒙古人對於馬，除了騎馳及遊牧移動的工具之外，因為是家畜中利益最薄的一種，所以不算最喜歡的，最近才因為輸出及軍用，方被十分重視。

馬的分布狀況，和牛相似，以肯特山岳地帶及北部中部杭愛地區為最多，西部蒙古至南部一帶蒙地，比較

的很少。

外蒙古馬的分布

盟別	匹數(單位千匹)	每方公里匹數
東部	一七六·三五	〇·八七
色楞格	七四·一四	一·〇七
柯索哥爾	一三四·一五	一·三四
阿拉杭愛	一三二·九八	四·〇六
薩普亨	八六·二三	〇·九一
肯特	一八五·六三	二·四七
南戈壁	八三·〇八	〇·五三
中央	一九六·一四	一·三一
烏布爾杭愛	一五四·七四	一·四四
阿爾泰	三一·六六	〇·一五
烏布薩諾爾	八九·五九	一·〇七
科布多	四二·九六	〇·五五
東戈壁	六九·八六	〇·四二

丁、羊 羊在蒙古的家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分布大體上和居民密度的高低一致。外蒙古的羊，也不是全部都屬於同一種類的，最多的是叫做喀爾喀蒙古人之手，身材不很高大，體白，頭部黑色。

喀爾喀羊的身高及重量，亦因地區而有不同，但是那只是由於生活狀態及條件不同之故，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達爾哈特、霍特戈伊特人等所飼的羊，也和喀爾喀等相近。

西部蒙古的卑特、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所飼的羊，則完全相反，是純蒙古羊和土耳其系(突厥系)民族

(哈薩克、吉爾吉斯) 羊的雜種。呈最高度分布狀態的，還是杭愛山脈地方，即阿拉杭愛，烏布薩杭愛，及柯索哥爾至肯特山一帶，西北湖沼盆地之烏布薩諾爾盟境內也不少。

外蒙古羊的分布

	頭數(單位千頭)	每方公里頭數
盟別		
東部	一、七二三·九〇	八·五
色楞格	五四七·五四	七·八
柯索哥爾	一、一九七·七三	一一·二
阿拉杭愛	二、三二〇·七八	四〇·〇
薩彥亭	一、〇三八·二七	一〇·九
肯特	一、四一九·〇七	一八·八
南戈壁	六一三·二九	三·九
中央	一、七二四·六〇	一一·五
烏布爾杭愛	一、六五二·〇六	一五·三
阿爾泰	六六四·〇九	三·二
烏布薩諾爾	一、三五五·二四	一六·一
科布多	七七二·六九	九·九
東戈壁	六三一·〇四	三·九

戊、山羊 山羊在外蒙古各地的分布，比較的平均，種類為中央亞細亞系的，毛色以灰色占大多數，金褐色和白色的數目大體上相等。山羊對於外蒙古人民生活上的重要性，僅次於羊和牛。分為肉用及擠乳二種

主要用途。

外蒙古山羊的分布：

盟別	頭數(單位千頭)	每方公里頭數
東部	三五九·〇六	一·八
色楞格	二五八·六七	三·七
柯索哥爾	三九一·二二	三·六
阿拉杭愛	三五五·七一	六·二
薩普亨	二三七·〇五	二·五
肯特	三一五·四二	四·二
南戈壁	四〇四·八三	二·六
中央	三〇四·四五	二·〇
烏布薩杭愛	四三九·六三	四·一
阿爾泰	二二三·〇六	一·一
烏布薩諾爾	三二五·四〇	三·九
科布多	一九八·一七	二·五
東戈壁	二五八·〇〇	一·五

己、駱駝 蒙古中部以南以多詞駱駝，犬以東戈壁及南戈壁，占有壓倒的多數，被叫做「沙漠之船」，在交通運輸上，為這一地區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且駱駝的乳及毛，都是很重要的蒙古資源。

外蒙古駱駝的分布：

盟別	頭數(單位千頭)	每平方公里頭數
東部	二六·〇四	〇·一三
肯特	二〇·八六	〇·二八
中央	三五·四五	〇·二四
色楞格	〇·二四	〇·〇〇三
柯索哥爾	四·三九	〇·〇四
阿拉杭愛	一三·五九	〇·二四
烏布薩杭愛	七八·四五	〇·七三
薩普亨	二三·三〇	〇·二四
烏布薩諾爾	二九·〇七	〇·三四
科布多	二三·〇九	〇·三〇
阿爾泰	一八·六八	〇·〇九
南戈壁	一二七·一四	〇·七九
東戈壁	八〇·二七	〇·四九

庚、其他 此外，外蒙古的家畜，尚有薩魯魯伊克(外蒙牛)、哈伊奴伊克等。薩魯魯哈克棲息於三、四千公尺的山嶽高原地帶，為中亞細亞產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中東部及西部蒙古，即柯索哥爾、烏布爾杭愛、阿拉杭愛、薩普亨、阿爾泰、烏布薩諾爾、科布多各盟，多有飼養，而以阿拉杭愛盟為最多。肉用及乳用，在數量和品質上，都沒有極大的重要性，但在經濟上的利益却很大，飼養頭數約多五十至八十萬頭。

哈伊奴伊克，是薩魯魯伊克和牛的交流種，以一代交配種為最優良，乳、肉，在質量上都不比牛差，特別

是生殖的質量，遠遠過於牛，這一點比牛和薩魯魯伊克都好。哈伊奴伊克的增殖，過去並無計劃的實行，只在柯索哥爾、阿拉杭愛那種飼養薩魯魯伊克的高山地帶同時又有牛羣放牧的地方，都由自然的交配而生殖。

這種家畜限於一代交配種，如果二代三代代的交配種，品性都會轉劣，所以有計劃地進行，最有效果的利用的必要。飼養頭數大約在十萬頭以上。

第四節 畜牧業的動態

外蒙古在一九一一年實行自治以前，完全受到中俄兩國——特別是中國商業資本的極端的榨取。他們的交易方式，大體上是由外蒙人民用自己的家畜作為抵押，向這些商人借款，而預付極大的利息，但結果家畜不會增加，有時更趨減少了。

自從外蒙古實行自治以後，中國在外蒙古的政治上的影響力，轉移到帝制俄魯斯的手裏了，但是商業權還在中國商人方面的手裏，而俄國商人又採取和中國商人同樣的商業政策，所以家畜增減狀態，依然如故。

一九二一年外蒙古人民革命以後，經濟方面亦努力於這種交易的弊害的消除，實施排斥外國商業的各種方策，所以，雖然國外輸出量及國內消費量都有增加的傾向，而家畜的數量却逐年增加起來了。根據一九三九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喬巴山元帥報告，歷年家畜數目統計如下：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家畜動態：

年 度	家畜頭數 (單位千頭)	年 度	家畜頭數 (單位千頭)
一九一八	一二、七〇〇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一一
一九二四	一三、七七六	一九二七	二〇、一八三
一九二五	一六、四五—	一九二八	二一、三六五

一九二九	二一、九五〇	一九三四
一九三〇	二二、六七六	一九三五
一九三一	一六、一六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二	一九、四七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三		二五、一一五

由上表可以看出，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七這二十年中間，以一九三〇年之家畜頭數為頂點，以後漸見減少，那是因為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實行極左政策，牧民中有人反抗，大量屠殺家畜，而且為着實行其他政策，又把大量家畜輸出蘇聯，以換取大量的資金。結果家畜數量自然更加減少了。但是從一九三三年以後，逐漸增加，至一九三七年已達到一九三〇年的水準，一九三八年已超過過去二十年的最高紀錄了。

外蒙古的政情安定之後，一九三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委員會發表的家畜分布狀態有如下表：（其中阿爾泰已併入薩普亨盟）（單位千頭）

盟別	駱駝	馬	牛	羊	山	羊
東部	二五·七	一五二·三	一八四·七	八六九·一	一六三·五	
肯特	三〇·〇	二〇三·二	二三四·〇	一、〇六五·四	一三六·二	
中央	五七·四	二五六·三	二九二·四	一、七二七·四	二〇六·二	
色楞格	〇·二	七一·九	一二六·六	二九七·七	一〇四·八	
柯索哥爾	三·七	一五五·〇	二六五·六	九三一·三	三六〇·六	
阿拉杭愛	一八·〇	二三一·九	四一四·八	二、〇一四·四	四六七·三	
烏布薩杭愛	八三·五	一二八·五	一〇四·八	一、二一六·〇	三七一·二	
烏布薩諾爾	三四·四	九〇·四	一〇六·二	一、一八一·九	三九四·一	

薩魯亭	三一·九	八三·〇	一二七·二	一、〇六一·七	三六〇·七
科布多	四一·九	一四·九	一六〇·六	一、五三七·〇	六八六·八
南戈壁	一二七·三	九〇·七	二六·一	四四八·七	四〇九·九
東戈壁	七七·九	七〇·一	二四·九	五三四·二	二二二·三
合計	五三一·九	一、六四八·二	二、〇六七·九	一一、八八四·八	八八三·六

家畜的自然增加率，大體爲五——六%，按種數言則達一二%的，今日外蒙的家畜發展狀態，根據蘇聯方面發表的資料，一九三八年計有：駱駝九一五·七六六頭，馬四、〇〇八、〇九六匹，牛六六、二二四、八五三頭、羊一二、五六〇、一九五隻，山羊一、四一六、五一六隻，共計二五、一一五、三七六頭。至一九三九年度家畜頭數合計增加至二六、〇九五、〇〇〇頭。每一家所有的家畜，平均爲一百十頭，比較起來 美國每人平均有〇·五頭，號爲世界第一畜牧之國的丹麥，也只有每人一頭，則可以想見蒙古人民共和國所佔壓倒的多數了，因爲他們每人手內都有二八·八頭。現在大體在三千萬頭以上的家畜，都是在政府有計劃的指導下經營的。一九四〇年六月至七月，舉行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中，就依照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次大會的決定，通過了一個產業五年新計劃，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預定增殖家畜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頭。照這種進展來估計，到了一九五三年可以增加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頭，真可說是世界唯一畜牧之國了。

但是，蒙古的家畜的生存條件是非常惡劣的。天然的條件很壞。自不必說，而且又缺乏科學化的飼養和管理。大批大批的家畜，爲流行病、爲寒冷、爲飢餓、爲野獸的襲擊而死亡了。蒙古人一向不知道刈藏乾草，冬天的飼料少得可憐，對於仔羊及仔山羊等，又沒有冬天專用的溫室，所以每年冬天一定有大批的仔畜的死亡。另一方面過去又受中俄兩國商人那種掠奪式的收買，結果使蒙古家畜的增加感到非常困難。邁斯基氏研究外蒙古的產業狀態，所得結論，就是在原始的家畜產業的支配之下，往往發生長期的停滯狀態，家畜的增加非常遲緩。

不過，家畜頭數的增加雖然遲緩，蒙古的家畜，却漸達飽和的界限了。在粗笨的畜牧制度下面，是不可能飼養大量的家畜的。暖天的牧場，雖然可以放牧大量的家畜，但是一到冬天，就感到不充足了。現在蒙古牧場是特殊的狹隘，似乎是因為從古以來，蒙古人之相對的移居，爲着擴張各自的遊牧範圍而出現了自然發生的侵略運動。成吉思汗的後裔處於強大的隣國——中俄兩國之間。二十世紀的相對的移民之自然發生力，規定了蒙古畜產業近乎停滯的狀態，無論在量的方面和品質方面，蒙古的畜牧上的活動，是停留在十二世紀的水準的。

但是，畜牧業之合理的經營，未嘗不能使家畜有某種程度的增加。這是要靠牧草之比較合理的利用，制止牧場之非經濟的使用，並發展刈藏乾草。如果這麼辦，單就外蒙古言，就可增加家畜達十萬頭，使蒙古在家畜肉製品對世界的供應上佔得第一位。如果再使運輸加以歐洲化，效果自將更大，那時駱駝和馬的數量勢將減少，牛、羊及山羊的數目勢將增加，在種類方面，家畜的相互關係也要變化了。

第五節 畜牧改革政策及其前途

(一) 畜牧社會化的困難

外蒙古國民經濟的三個主要構成要素，即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而以後者的重要性最大，這在畜牧業尙未社會化的時期，原是不可避免的現象。政府在一九二九——三二年強化社會主義化階段，曾經以畜牧爲建設的最大目標，但是竟遭遇到牧民大眾的反抗，不得不轉變方向。因爲蒙古的畜牧業，主要在於可能的減少勞動力的支出，採取純靠自然力的利用的那種落伍的經營方式，擁有一定數量的家畜，就是擁有一定數額的資本，就靠此生利以維持生活。所以帶有自給自足的色彩，而缺乏商品性。「利息」之中，除了自己消費了的以外，把剩下來的一部分，才用以交換衣服、茶、雜貨等，而這種經營，也不是企業性的，不是追求商業利潤的。

所以，粗看很可能加以社會化的畜牧業，却帶有最頑固的私人經濟的色彩。例如在蒙古，往往有這種經驗：飼養曼利諾種羊，很可以採取優良的羊毛，可是因為肉的品質不好，蒙古人都摒棄不肯飼養。他們以為肉味不好，就不值錢。

對於蒙古問題比較具有正確了解的外國學者歐·拉狄摩爾氏曾經發表過他研究的結論：「游牧蒙民具有完全的經濟。他的家畜，供給他衣食住一切必需物品。所以用貨幣買賣的物品，是必需品以外的物品了。這一點是蒙古人要比給貨幣所束縛的漢人農民優越的地方，如果他賣掉了家畜中不必要的一部分而購買棉布、綢緞及穀類製造品，那麼，他的優越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歐·拉狄摩爾「滿洲的蒙古族」）指出蒙古畜牧業的自給自足的特性。

（二）畜牧技術化的成勢

蒙古人民政府在急進的集體畜牧化失敗以後，自一九三二年以後，不能不改變方針，注力於畜牧技術上的改善，以謀漸進的社會化。主要的辦法是：（一）注力於飼料之集結、畜產之技術化的設施、家畜醫療設施、給水設備、家畜飼養方法之改良、保溫畜舍之設施等等，藉以加強及改進畜牧經濟中的技術的基礎；（二）提高蒙古國民經濟的生產力及利益；（三）提高國民經濟之商業性；（四）創辦家畜之共同飼育、共同運輸、共同狩獵等基本程度的生產合作社；（五）由家畜飼料為媒介，使畜牧與農業的發展聯結起來。

從這種新政策實行以後，照人民政府自己所公布的，說：「最近對於游牧必要條件中最重要問題即牧地的利用和保護，已加以極大的注意。並且以實現技術的游牧經營法為目的，由畜牧農業部和社會機關合作，在牧民大眾間推進廣泛的啓蒙工作，出版關於畜牧的通俗性科學研究書籍，開辦畜牧業者短期講習班等。政府又勵行適合實情的價格政策，用集中原料精製罐頭等方法，以促進品價的改良。又為着更加確定技術的方法，國立銀行對蒙古牧民經濟實行長期放款，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批資金，必須用於製造乾草、建築保溫畜舍、

開掘井泉、購辦優良種畜、以及購辦機械等生產所需要的開支上面。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五年最近十餘年間，共和國刈取牧草的面積已由一千五百五十一公頃增加到一千六百六十公頃。播種面積則從四千三百八十三公頃增加到二萬四千二百公頃。畜舍數亦從一九三二年的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二所增加到一九三五年的十三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所，井泉數則由八千八百七十七處增加到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九處（見魯伊奇克比引書）。

(三) 技術化的內容

人民政府對於畜牧業技術化，首先注力於獸醫診療網的擴充強化。在這一方面，在一九三六年已有七十五個獸醫分配站，以後規定每年須增加數十處。獸醫亦以蒙古人出身的作爲基礎部隊，當時也有二百餘名，每年診療家畜數在二百萬頭以上。在防止獸疫方面，也特別重視，普遍進行預防注射，受注射的有數百萬頭。依據官方報告，一九三〇年獸醫及藥劑師，比十年前增加八倍，由二十四名增加到一百九十六名。分配站由十三處加至一百四十處。廣泛推行家畜預防注射，一九三四年度鼠疫、天然痘、肺病等預防注射約四十萬枝，一九三八年度家畜診療數達二百十五萬二千頭。獸醫及畜產技術方面的幹部，也加緊培養起來。在國內擴充遊牧，爲了普及高度的畜產技術，設置國立農牧試驗場二所。

畜舍的建造也成爲重大的任務。由來外蒙的家畜，一年到頭都在露天之下放牧的，不論寒暑，特別是在劇寒時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設備，以致有不少家畜受到了不良的影響。因此，政府鼓勵對家畜管理上面的注意，畜舍的建設。一九三六年已有耐寒畜舍一五四、〇〇〇所，因此獲得保護的家畜達六萬頭。一九三九年度之畜舍數目，已達十七萬四千四百五十六所，其中且有永久設施的，但大部分是可以移動。

爲着挽救飼料不足尤其是冬季飼料飢荒起見，會極力獎勵儲藏乾草，而牧草刈取面積及從事刈取牧草的人數，也逐年增加了。一九三五年計有面積八萬九千公頃，從事刈草人員達二萬八千人。知道儲藏牧草之利益的牧民人數一年多一年，到了一九三八年，牧草刈取面積爲二〇二、三九一公頃，牧草之收穫者人數達三八、八

〇二名，儲藏量達十萬公噸。由於挽馬式刈草機械、自動刈草機械等文明機械的廣泛利用，牧草收穫面積有了迅速的增加，牧草儲藏合作社也活潑地成立了。這些牧草儲藏合作社和民間牧草站，那時已有刈草機械一千二百六十六架（一九三七年）挽馬式刈草機一千二百〇三架（一九三七年）。

牧草站對於外蒙古的經濟建設及牧草的儲藏，都有重要的作用。從一九三七年起，政府開始有計劃地舉辦國營牧草站，最初設置十站，其裝備為拖拉車四十輛、刈草機械四百七十架、挽馬式機械二百八十五個，汽車二十輛、石油發動機十部。一共消耗經費三百萬盧布，而全部由蘇聯無代價的提供了。這種牧草站由一百二十四名蘇聯技術家實施指導，其刈取牧草面積達七一、九五九公頃。一九三八年更增加十四個牧草站，全部二十四個牧草站的裝備，有拖拉車一百〇七輛、刈草機械一千三百七十三部、挽馬用機械八百六十二部，壓搾包裝機械一百二十二部，牧草刈取面積共達十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九公頃。一九三九年度的割取面積增加為十二萬六千七百〇三公頃。貧苦的牧民，可以免費配給牧草。

在中南部尤其是戈壁地方，給水不足之處，政府特別獎勵開掘井泉，這一方面在一九三六年共計掘井一百二十口；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已有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二口。後來更注力於增加開掘及已開掘井泉設備的修理，一九四四年全國已有遊牧用井五萬口以上。

爲着防備野獸對牧牛的突襲噬殺，又力謀防制狼害之法，每年以數百萬「土格利克」，分發爲增殖家畜的補助金。

國營農場也作爲家畜試驗場而活用，各盟都有這種試驗場。他們從荷蘭及蘇聯輸入外國種羊等，以和蒙古羊交配而產生特種優良種羊，努力於推廣增殖。還有養馬集體牧場也努力於蒙古馬（牝馬）的改良和異種交配，培養優良品種。

一切租稅政策和金融政策，也都以改良牧畜業爲主眼。而漸進地實現畜牧業的社會主義化，不過，國營經

濟和合作社經濟雖然漸進地發展了，私人經濟所佔的地位還是相當重要和被法律所尊重，因此不致再像一九二九——三二年大改革時代所遭遇到的嚴重危機。

第四部 資源與產業（下）

第八章 農業

第一節 人民革命以前的農業

（一）漢人殖民農業的演進

（甲）屯田
兵的開墾

蒙古農業的發達，是非常不平衡的，主要的是在邊境地區特別是附近中國本部的南部蒙古一帶最為發達。所以，蒙古的農業，從它的發生時代起，就是中國農業的一部份。蒙古人對滿清政權屈服以後不久，就在蒙古出現漢人耕地。蒙古為着保障中國衛戍部隊及中國邊塞的糧食需要而開始種植事業。中國要塞四周的土地被開墾起來了，小麥、黍及大麥，在蒙古土地上生長了。耕地的一部份，是由邊境衛戍部隊自行開墾的，一部份則由有兵役義務的蒙古人開墾。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中國政府開始在鄂嫩及土拉河畔，北部蒙古，開設官辦農場，設置屯田兵。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又在科布多附近改置屯田兵，由漢人和蒙古人一同開墾，這種初期的農業殖民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結果，大麥、顯黍小麥的每年收穫量達一萬蒲特。但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蒙古，是和平的統治時代，要塞等於虛設，戍兵數量著減少，因此又歸於荒廢。鄂爾渾河流域耶爾德尼·喬約附近，當年的耕地和灌溉水路，用水池塘的遺址，只剩下一片荒烟蔓草了；裝粉用的石臼也空留曠野，一任風雪吹打。因此，照蘇聯邁斯基氏的研究結論，中國屯田兵制度的開墾的和清朝漢人的移民開墾，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關聯。

(乙) 中國移民開墾

中國人向蒙古移民的先驅者，出現於嘉慶年代或稍為前一些時間。那是十八十九兩世紀的交換時期的事。由於中國本部耕地的狹隘及農業條件的需要，提出了在大清帝國北部開拓土地的要求。根據波士特納夫氏的考證，南部蒙古人模倣中國人的農業耕種，他們的耕地至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已在喀爾加恩（張家口）及庫庫霍特之地，散見於中國移民的耕地之間。

十九世紀初期，滿清政府極力防制在滿族和蒙古族之間發生友善的聯絡，因此盡力阻止漢人向蒙古移民墾殖。一八〇三年（嘉慶八年）八月，上諭准理藩院奏，驅逐在圖什特汗部游牧地從事耕種的漢人，因此漢人向蒙古墾殖，遲遲未見發達，直到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年底，布爾吉伐爾斯甚從買賣城到庫倫，據記載說：「從買賣城起一百英哩一帶，有幾英畝之地，由漢人移民從事耕作。」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中國政府方面開始採取向北部蒙古移民墾殖的政策。從這時起，中國農民開始移居蒙古色楞格河下游，附近俄國邊境的右岸北部支流即巴晉戈爾、喀爾喀、哥爾及伊羅河畔，中國政府為着緩和中國本部耕地的狹隘，準備蒙古北部國境的殖民地化，並由廣泛的中國土着民大眾，防制由鄰近的西伯利亞而來的俄國勢力的侵入。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到了一九一一年，北部蒙古私人經營的中國農業總面積達七萬「代西亞丁」（一「代西亞丁」合一〇九·二五公畝）。

(丙) 漢人墾殖的衰落

漢人移殖外蒙古，從十九世紀末葉的光緒年代，才引起俄國人的注意。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庫倫辦事大臣三多上奏，籌辦蒙古墾務，派遣印務處筆帖式（書記）至各地，勘查地畝。在外蒙古第一次自治運動以前，清朝在實際上已成爲漢族的政府，當時漢人向外蒙古的移民，已呈逐年增加之勢。但是因爲領導者的不得法及本身累犯錯誤，又加以國際關係的複雜，以致激起外蒙古人的反感，而有一九一一年開始的分裂運動。以後中國民族在蒙古的農墾事業便遭受到衰落的命運，同時也給蒙古農業生產以一大打擊。

一九一一年北部蒙古分離運動以後，漢族移民有一部分逃回中國本部，另有一部分則被驅逐，他們的土地也因此荒蕪了。從一九一七年起，北部蒙古的中國農業一度開始恢復，但是那不過是靠著中國政治勢力一度恢復的便宜，也可說是漢人在蒙古農墾的回光反照罷了。不久政局轉變，漢人經營的農業再度動搖，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漢族移民，回到色楞格谿谷及其右岸支流的原有耕地，漢人的耕種地的面積，那時早已大不如昔了。

北部漢人農業之發達大受阻礙之時，南部蒙古的殖民化，恰還能順利地進行，而且獲得相當的成功。尤以喀爾加恩（張家口）的蒙地收穫最大。至一九二一年止，漢人耕地已達長約七十哩寬約四十哩的地帶，佔有二百八十萬哩的土地。據英國的旅行家L·G·台德利·潘克斯頓的觀察，延長約七十哩的蒙古牧地上，中國人的農業活動區平均每年擴展一哩。

(二) 外蒙古的漢人農業

初期漢族平民到喀爾喀區從事耕種，可說是漢人自動的。而成爲他們的媒介的，則是漢族商業。因爲蒙古王公之中，有很多拖欠漢商債務的，也有祕密把盟旗領地賣給中國商家的，也有抵押給他們的。商人把這種土地轉售給農民，或召集農業移民前往耕種而坐收其利。還有比較開明的王公，從漢人那邊了解經營農業的利益，自動歡迎漢族農民前往從事墾殖。其中有已出賣了的土地，經開墾後，還得把收成的一半，繳給蒙古王公的。因此多數王公也樂於讓出土地給漢人耕種。漢農向蒙古移殖的人數因此迅速增加。中國農民向蒙古移殖的全盛時代，是滿朝末年蒙古實行「自治」政變以前，耕地面積達七萬「代西亞丁」，這些農業移民以居住在色楞格河下游地域者爲主，在巴音哥爾、哈拉戈爾、及伊羅河流域，建設起相當多數的中國農村。

中國農業移民所以在這一地區特別集中，據說是受了十九世紀末葉蒙古羅蘭公司着手開發伊羅河溪谷金礦的刺激，所以移民迅速增加。此外，是由於清朝政府害怕俄羅斯占領蒙古，曾在庫倫設立拓殖局，在這危險性

最大的地方，加強漢人移殖事業；而且也確實收得相當成功。中國農民的生產力旺盛，加以這地方的降雨量也算充足，土壤方面，在外蒙古也算是最適於開墾的。不過，自從蒙古實行分裂以後，蒙古人不斷地對漢人掠奪及暴力壓迫，結果漢人在外蒙古無法立足，人數迅速減少，商人及工匠作坊等，紛紛結束營業，商人逃回本部，農民也不得不放棄耕地而回到他們的故鄉。一度會達十萬以上的漢族移民，那時竟激減而為八千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外蒙古的中俄對立關係一度轉變，中國的殖民政策再度恢復舊有勢力，在一九二一年，據邁斯基的調查，外蒙古的漢族人口，仍達十萬人，其中商業移民七萬五千名，農業移民五千人，工匠一萬五千人，戲子、教師及醫生等一般自由職業者一千二百人，官吏二千三百人，此外有新軍數千名。當然，在人民革命之後，局勢為之一變，漢人在外蒙古的勢力，真是一蹶不振了。

漢族的農業，和布利雅特蒙古人及俄羅斯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的五穀生產多作為商品而提供於市場，設置有製粉用的水車和馬匹的磨坊等等。

(三) 外蒙古的俄人農業

俄羅斯人的農業經營，以俄羅斯商業資本之向外蒙古活動，為其背景，主要目標是使俄國商人在蒙古可以自給自足，他們在色楞格河沿岸一帶，踏襲着中國農民的蹤跡，利用那些早已開墾的土地，從事俄羅斯式的耕種。

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方面的俄國人的農業，也為謀俄僑商的自給自足而開拓少數土地，在農耕技術方面，當然比墨守成規的中國農民要優越得多，但是卻沒有生產的意義。在俄羅斯人移殖前後，曾經在這些地方耕種的布利雅特蒙古人的農業，在大體上也是這樣的。

(四) 蒙古人的農業

土著蒙古人的農業，不一定是古代所無，根據歷史推斷，似乎在成吉思汗時代，曾在鄂爾渾河流域屯田開

墾。但是作為生產企業來看，蒙古人的農業，無疑間的，還是在受了漢人農業經營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農耕技術、農具等等，都很幼稚，完全只是畜牧業的一種副業罷了。耕作的農業植物，是大麥、小麥和黍等。耕種的區域，從買賣城至庫倫，沿路平原地帶，散布在漢人農田之間，如科布多官有農場，柴哈丁、及烏倫柯姆地方，都有土著蒙民所經營的農業。色楞格、鄂爾渾地方有大麥小麥及黍，科布多則專種大麥。

外蒙古的農業，因為有集體的工作形態的必要，受到人工灌溉農業的限制，不如定居於村落的遊牧民族，這是最困難的形式。所以大體上說，蒙古人自身的農業說不上什麼，蒙古人農業最發達的地方，是南部蒙古，但也只是夾雜在漢人殖民耕地之間題小小地點，此外有如上述，只有科布多、色楞格河畔及張家口——庫倫——買賣城這一條大路兩旁這些地方一樣。蒙古人在農業及土地利用法方面，完全學習漢人，耕耘及灌溉是漢式的。耕耘的深度約為一至二「凡爾索克」（每「凡爾索克」約合四·四四五公分），是用原始的犁耕的。耕耘的土地，漢人非常重視施肥，但蒙古人對此却漫不關心。漢蒙人都用並不怎樣大的中國鐮刀刈取穀類，在石臼中搗去殼衣用大篩藉風力以瀝去糠糠。穀粒用手碾石臼，水力或馬曳磨碾成粉，色楞格一帶打穀用人手，去糠用牛馬之力。

大概漢人移民的平均收穫為播下種子的十五倍，蒙人則僅為十倍至十二倍，每一「代西亞丁」的通常收穫量為燕麥八十五蒲特，大麥七十蒲特，小麥七十五蒲特。

蒙古人的土地利用法，以非常的不安定為其特徵。從事農業的集團，由盟旗方面領到一定數量的土地，對於這些土地的利用，不需要繳付地租，但須組成以此為基礎的「巴克」——合作社。「巴克」所有全部土地，就按照「巴克」組內各人家屬分配，同樣也分配家畜及種子，「巴克」成員的家屬及經濟狀態發生根本變化時，也就得另行分配土地，自己的耕地，可以由父母傳給子女，但是也可以租給第三者。只有科布多管區方面則相反，不准租給第三者，不過使用地之佔有，只要獲得本旗的允許就得了。

第二節 人民革命時期的農業

在蒙古，說得上「發展農業」的事，是在人民革命以後才開始的。在人民革命以前，農業完全在自然發生的狀態之中，在氣候上自然地理上不良條件之下，沒有什麼計劃，沒有什麼農業知識，停滯在原始的農業經營狀態。到了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才有合目的性的統一化計劃化的指導，開始對外蒙古的糧食部門發生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五年舉行的第二次中央全體大會，關於開發人民共和國的農業，規定了下面這樣堅定的方針：

「蒙古是畜牧之國，蒙古人一直到現在，排除一切障礙，以從事於畜牧……在蒙古，幾乎看不到蒙古人的農業，然而，革命在這一方面，也在國民面前開闢一條新的出路。中央全體大會雖然知道這一新的事業帶有怎樣巨大的困難，但是仍須課給國家以領導發展農業的任務。為此，中央全體大會決定了下面的規定：

「爲着將來農業的發展，免除税金等項，以期全面地鼓舞從事農業的國民，改善現存的國營農場的狀態，並在適當的場所，設置新的國營農場。

「派遣農學專家至各地 並爲指導農業經營而設立農科學校」。

人民政府爲着扶助蒙古人的民族農業的開發，對漢人農業規定相當的限制，逐漸縮小其播種面積；同時，因此發生的穀類的減收，則用促進國營農場及牧民的農耕以資補救。

又爲獎勵農民對於農業的收益，規定免稅三年，並且配給適當的農地和農具，派遣指導員，盡力推進及改良農業。結果，當然使從來完全不知道農業經營之道的蒙古民族的蒙古人的農業經營，也逐漸發達起來了。人民革命以後，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牧民經營及國營農場、公共機關經營耕地的面積，有如下表：

(單位「代西亞丁」)

年 度	國營農場·公共機關	牧民經營	外人租佃地	寺院耕地	合 計
-----	-----------	------	-------	------	-----

一九二四	七〇〇	二六〇	一〇,〇〇〇	三,四三〇	一四,三九〇
一九二五	九八〇	三,六一〇	一二,〇〇〇	三,四八〇	一九,〇七〇
一九二六	一,〇〇〇	三,二九〇	一二,三一〇	四,〇〇〇	二〇,六〇〇
一九二七	一,九〇〇	三,一二〇	一五,六三〇	九〇	二〇,七九〇
一九二八	一,八六〇	九,七五〇	一七,三九〇	七〇	三〇,〇七〇

人民革命後外蒙古農業與耕地的轉變，這個表正像開映一本新開電影一樣明白。

依據邁斯基的推斷，外蒙古在自治政權成立以前漢人農業全盛時代，共有耕地面積約為六或七萬「代西亞丁」，其中極大部分是漢族農民所佔有的。但一看上面這一統計表，可以看到國營農場、公共機關及牧民的耕地面積，有逐漸增加的趨向，另一方面，由於耕種的限制，漢族農民耕種的，却逐漸減少（所謂外人租佃地面積中的漢俄人的變化，不說也會明白的吧？）此外喇嘛勢力削弱了，寺院的地產當然也跟着激減。

第三節 極左政策時代的農業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人民革命黨第七次大會中，獲得政治指導權的最左翼派，會做照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例子，漠視了自然的地理的條件和蒙古民族的知識水準，企圖一舉而轉移到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現穀類的自給自足，規定了下面這樣的開發農業五年計劃，並且規定立即付諸實施。

年度	小麥		裸麥		黍		飼料穀類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一九二八	1,100	1,100	2,000	11,000	5,000	1,000	11,000	11,000
一九二九	1,100	1,100	2,000	11,000	5,000	1,000	11,000	11,000

作物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五年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計	計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計	計
小麥	10,100	15,800	1,640	27,500	1,000	1,640	5,500	24,500
裸麥	15,100	16,500	3,190	31,400	1,200	7,000	6,300	24,500
黍	25,500	15,500	5,200	21,800	1,200	10,700	5,500	18,400
飼料穀類	51,100	11,400	6,640	71,300	5,500	21,700	15,000	54,600
	19,800	51,600	24,000	1,000	2,000	12,000	24,000	54,000

農業生產數預計如下：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五年

作物	社會化農業				私人農業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計
小麥	10,100	6,640	9,500	1,000	5,000	5,000	1,640	6,640
裸麥	15,100	3,190	17,700	1,200	10,000	7,800	1,400	9,200
黍	25,500	5,200	31,000	1,200	16,000	14,800	2,200	17,000
飼料穀類	106,100	24,740	130,840	5,500	27,000	21,500	1,140	28,640

因為預定這個生產量可以完全滿足國內的需要而計劃的，大體上可以看作外蒙古穀類需的總量。

但是，這個生產計劃，後來因為極左政策的停止而同時放棄了。農業方面施行的極左政策的具體的批判，但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第七次中央全體大會席上總理甘都恩的報告可以明白：

「在農業部門，雖然並沒有什麼前提，却實施了完全保證我國居民食用本國所產穀類，使遊牧經營的集體農場轉向於定着經營的激勵轉化的政策。當然，結果沒有產生什麼東西，而且也是不會得到什麼的。這裏要注意的，是集中於農耕及播種活動，以代替了畜牧業。農耕業在我國，因為自然的各種條件，只能在若干地方才

能發展，只是畜牧業的補助的經濟部門。在一九三〇及一九三一年，創設了六個國營穀類農場，三個國營牧場。然而這些國營農場，不經過試驗而立即賦與產業的傾向。因此，國營農場擁有廣大的播種面積和大量的家畜，一九三二年所製定的計劃，只要指出為國營農場而給予大約七萬頭的羊和大約一萬「代西亞丁」的耕地一點，就已經足夠了。然而，國營農牧場的業務狀態並不好。產業的型式的國營穀類農場及國營牧場，消耗了龐大的經費，蒙受了不能獲得補償的損失，給國家以巨大的損害」。

第四節 實施新政策以後的農業

自從極左政策撤消之後，同時也放棄了重農主義政策，改取以農業為畜牧的副業的政策。共營農場是解散了，改取鼓勵個別人民重視農耕的新方案。國營農場也縮減了，只留下一、二個。而且以後的國營農場，也只作為試驗性的農場，希望以此為中心而逐漸對牧民介紹歐洲式的文明的農耕方法。此外，如人工灌溉之施行，對於購買農業機械器具之撥發補助費，乾燥地區耐寒性穀類的研究調查，以及實行分配品性優良的種子等等耕作方法方面，也改取私人經營及僅在耕作期間實行臨時性的共同耕種的新方針。

依照伯爾林氏的統計，在一九三八年，外蒙古方面從事農耕的牧民戶口數，共達一萬七千八百戶，近年耕地面積的增減情形，有如下表：

近年耕地面積增減趨勢（單位公頃）

一九三四年	二一、五一六
一九三六年	一一、一〇七
一九三七年	一五、一〇三
一九三八年	一一、三六四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二〇

這裏可看出二次世界大戰初，外蒙古的農業，已在極短時期趕上了實行極左政策當時的年度了。一九二九年的增加最大，而從一九四〇年起，又開始產業五年計劃，所以後來外蒙古的農業，還有新的發展。另有一點可注意的是：機械牧草站的設備，除了播種穀類之外，從來未曾試行過的蔬菜的栽培，也出現了一千九百四十公頃之多。在這一方面，機械牧草站在未來的農業上的活動，具有很大的意義。

第五節 農業地區

外蒙古的氣候條件不好，而土壤也在形成過程之中，差不多沒有適於農業的肥沃的土地。典型的土壤，是包含有砂質八成以上的砂質土壤。所以適於農業發展的地方真可說是「寥若晨星」地散佈着。主要的農業地點，是色楞格、鄂爾渾河的下游地方，科布多地方的薩巴欽、土爾扈特、塔里雅欽地區，以及烏倫柯姆地方。

其中最希望是色楞格、鄂爾渾河下游地區，可能從事農耕之地的面積，約達七萬平方俄里。這些地方，雖然在外蒙古，但在氣候條件、土壤及灌溉方面，都相當適於農耕，依照最近外高加索氣象觀測所的調查，平均溫度為攝氏〇·八度最暖之七月份平均溫度為一九·二度，降雨量常年平均為三〇三公厘，夏季有二〇三公厘的降雨量。

植物的生育期間，自五月至九月，平均為一百七至一百二十五日，這時期的平均氣溫，約為一四·一度，因此，農作物亦限於春蒔，主要作物是小麥、裸麥、燕麥、蘿蔔、燕菁、南瓜、人參、二十日蘿蔔、薄荷、茴香、葱等等。

科布多地方的平坦地，氣候比較適於農業，土壤是風化土。但是平原的大部分是砂礫地或岩石地，含有砂子，所以適合於農業經營的，還只有河流附近砂性土質及粘土質的土地，比較可供利用。

薩哈欽旗的主要農耕地區，散布在土格利克河、哈拉烏斯河、賽爾基河、庫恩都爾音及波都恩契河沿岸一帶，以及布爾袞、札岡奇爾德河和威晉契河下游各地。這些地方爲大麥地帶，以四線種及三叉種大麥和裸麥爲主要作物。但是過去的收穫率很低，收成達播種量的五一六倍，必須要算是豐收了。

塔里雅欽旗的農耕地，主要是科布多河下游布雅恩特河、奧蘭特旗及哈拉烏斯湖的中間地域。這一地域內漢族農民的移殖，遠在清朝康熙年間（一七一六——一七一年）地質是粗糙的砂礫地，面積廣大，但是可耕地却不多。布雅恩特河的三角洲，約有一千公頃的耕地面積，可以擴展爲二千公頃的裸麥栽植地帶。

烏倫柯姆地域的農耕地，主要是集中在哈拉希拉河及其支流、以及烏倫柯姆廟附近的河川流域。這一地方所栽植的穀類，是有芒大麥，其次是小麥和裸麥。收穫量最好的可達播種量的十至十二倍。小麥全部用以製粉，生產額約達一八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蒲特。

一般地說，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穀物產量不多，全國總生產額僅够國內需要的三分之一，穀類不足的部分，一向全部依賴蘇聯供給。

第九章 工鑛及其他產業

第一節 蒙古工鑛總論

外蒙古直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可說還沒有現代意義的工業。手工業也差不多還沒有達到完成的形態，各別家庭只爲補充他們經濟上的需要，才在必要的範圍之內從事於畜牧生產物的加工。一般蒙古人民，不知道比較複雜的作業，他們所能做「工業上的」工作，主要是鞣皮的加工，革紐的製作，以羊毛及駱駝毛做氈子，

羊皮的鞣化，以及紡紗等等。直到人民革命以後，局勢才慢慢轉變，蒙古人民政府從蘇聯購進毛皮工廠設備，首先在阿爾頓，布拉克（舊名馬伊馬丁）開設。

蒙古雖然有很豐富的有用地下埋藏物，但是這個國家，受到了粗笨的畜牧業的一般生活樣式所限制，鑛業方面，加工及採掘的發達，一直是非常落後的。蒙古政府從一九一五年起，在俄國的專門家的指導下，在距離庫倫三十五俄里的那拉伊夫地方，着手煤鑛的開採，那拉伊夫的煤鑛，以最原始的構造為其特徵。這個煤鑛共有最大深度為八十六「沙尋」（俄國尺度，約合二·一三四公尺）的坑道二條，蒙古人坑夫平均不超過四、五千人，每年平均的採鑛量，大約為十萬蒲特，不過煤質倒是很好的，煤在外蒙，以作燃料為主，差不多全部供給庫倫之需。

蒙古金鑛的範圍非常廣大。土謝圖汗盟的都恩摩德地區，伊羅及喀喇哥爾河畔，貝德利克河流域及蒙古阿爾泰山脈山麓地帶，都有豐富的金鑛。最出名的是都恩摩德的資源，全部埋藏量約有二萬五千蒲特之鉅。

十九世紀末葉起，「蒙古羅爾」股份公司，曾在都恩摩德開始採金，這家公司，曾和蒙古活佛政府取得特權，在一九三〇年為期限，以支付採取金額之一六·五%為採鑛費，據庫倫工業聯合會的統計，「蒙古羅爾」公司在一九〇七——一九一二年間採取額達銀金四百七十蒲特。這種開採工作後來繼續進行。這家公司之外，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獲得貝德利克流域黃金採取權的俄人經營的「聶姆契諾夫·西尼晉公司」，從事採金事業。

至於小量的產金地，在外蒙古，竟可說是到處皆有的，還有沒人探測的礦區。

岩鹽的採取，具有純粹地方性的意義。蒙古人一向會從涸竭的鹽湖，用原始的方法，從事製鹽，在手工業相當發達的科布多管區，有總面積達三十平方俄里的十二個鹽湖。

上述有用的埋藏物之外，外蒙古到處都有磁鐵錘，銘鐵，銅及鉛鐵，汗·博格德·烏里斯克（舊土謝圖汗）

盞，發現有銀鉛鏡，柯索哥爾湖之達拉哈特湖岸有金山和品質優良的石墨。蒙古各地有水銀，硫黃，錒及各種寶石——柘榴石、綠玉石、煙水晶、黃石等等。在距離庫倫五十俄里的土拉河流域，更以上等水晶之產地著名。過去漢蒙居民，可以自由開採水晶，水晶原石都輸入中國本部，是製造眼鏡的原料。

這些有用的埋藏物，差不多還沒有開採，繼續埋藏在地下。主要是由於蒙古人的宗教信仰。依照這種信仰，認為人類可以自由利用地上的一切財富，但不能向地下採掘任何物品。因此，開鑛事業，一直成為蒙古人的大忌，他們不僅自己不幹，而且盡力阻制外國人開鑛，過去除了曾經獲准在距離恰布太卡特七十俄里的俄國邊境附近有鐵鑛開採權的男爵許廷可夫之外，許多外國企業家一切關於開發蒙古資源的企圖和計劃，都葬送在「大汗」政府的手裏了。人民革命以後，情勢才算為之一變，不過工鑛業尚在幼稚時期，未來的開發，還有遠大的前途。

第二節 鑛產資源及其開發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上「蒙古勤勞人民權利宣言」中規定：

「蒙古人民共和國版圖內所有土地、地下埋藏物、森林、水產富源、適合現行制度及主義，蒙古現行習慣法，屬於一般人民所有。不准對此具有任何私有權，而應由全部勤勞人民依法處分之。」（第三條甲）

自然富源的開發，當然必須由國營或合作社經營，但是開發的實際情形，外人不能充分明瞭。過去甘德溫、阿穆爾等總理在議會中的報告，也沒有說到鑛業，在上面會引證過的羅伊奇克的論文中，曾經這樣說：

「最近蒙古人民共和國，展開了發見國內鑛業資源和調查埋藏量的大規模的活動。國內各地區，鑛業的發展，都有遠大的前途，埋藏有金、銀、鐵、銅、鉛等許多金屬，而鑛泉（硫黃泉）也很豐富，一部份可以獲得國家援助而利用以為療養之地」。

但是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蒙古的鑛業似乎還未脫離調查時期。從一九三〇年起，蘇聯科學調查院開始進行五年計劃，人民政府要每年撥出五萬土格利克的補助費，詳細情形，似乎一直沒有公布。

外蒙古鑛產資源中，以金爲主要金屬，而以蒙古羅爾金鑛（土謝汗），貝達爾河盆地（三晉諾顏汗），蒙古阿爾泰山麓（同上）等三地最爲出名。特別是貝達爾盆地的埋藏量即達二萬蒲特。從前由漢人及俄國人經營的，是伊羅河的砂金業，當時漢人鑛工就有六萬之多。

其他埋藏最豐富的是鉛，早已發見的就四大富鑛，鐵的狀況，過去不很清楚，銀鑛似乎到處皆有。

比較最豐富的，似乎要算是石油，最出名的，是中央部的那拉伊哈（烏倫巴都爾之東南三十公里），東部貝音·土曼，西部蒙古阿爾泰三大區。那拉伊哈的全部埋藏量，據稱爲三億蒲特，政府在一九三〇年將煤鑛資本額增加三倍，計爲十一萬三千土格利克，由此可以想到它的規模如何。一九三四年的生產額，爲四百萬蒲特。後來在那拉伊哈到烏倫·巴都爾之間，敷設起運輸用的狹軌鐵路。貝音土曼的煤田，從距離外蒙古東部邊境四百公里的一個同名的村落，到克魯倫河，埋藏以褐煤爲主，層厚約二十六公尺。雖然品質不良，但是經營業務，蒸蒸日上。西部煤田的情形當時不很詳細，人民政府在工業開發五年計劃中規定增產煤斤，單爲調查，已化了二十萬「土格利克」。

第三節 外蒙古鑛業的動態

正像上面所說，外蒙古的地下資源，雖然有鐵、銅、金、銀、鉛、石墨、水銀、錒、硫黃、及其他鑛床，但是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正式的現代化的開採。在人民革命以前，蒙古羅爾公司，曾獲得採金的權利，有如上所述。人民革命之後，政府接收蒙古羅爾公司的企業設備，繼續作爲國家企業而經營，可是後來因爲資金困難而停頓。

蒙古羅爾公司採金地以外的金鑛，對於一般蒙古人，給與各種開採上的優待，所以開鑛利益的一部份提撥所在地方政府。不過實際上普通蒙古人對開鑛的技術水準太落後，所以政府又不得不允許國外資本及企業公司對於蒙古鑛區的開採權。

現在已經開採而對蒙古人民共和國有相當重要性的，是在烏倫巴都爾東南三十五公里地點的那拉伊哈煤鑛。這個煤鑛，有如上文所述，是在一九一五年發見的，埋藏量約為三億公噸，有褐煤三·五至四·三公尺的合層，舊「移行層」為〇·七五至二·八〇公尺。

近年因為開發事業的進展，發見更有希望的煤鑛，特別是由於煤坑的電氣化，機械化，生產力更有迅速的增加，一九三九年的產額，已達一二九、〇〇〇公噸。烏倫巴都爾和那拉伊哈之間，一九三八年夏天建造了輕便鐵路四十二公里，因此更消除過去汽車運輸的不便，對烏倫巴都爾的工業聯合區可以極輕便地提供煤斤。

此外，貝音土曼附近的褐煤，年產量達三〇，〇〇〇公噸。一九三九年在東部盟區的猶哥希爾附近，又發見了新的煤鑛區。

在最近，對外蒙古的經濟及國防具有重大意義的，是烏倫巴都爾至阿爾頓。布拉克途中的烏魯姆士伊，發見了磁鐵鑛和煤鑛區。深約一公尺半，厚約半公尺，後來繼續進行廣大範圍的調查，阿爾頓·布拉克到烏倫巴都爾之間，已為此建築鐵道，從這裏可以推想這個新鑛區的重要性了。

柯索哥爾盟的穆林至西北十五公里之台利基爾穆林河畔，又發見了極有希望的煤鑛區域。這裏的鑛層，不只對於穆林，而且在外蒙古未來工業中心地哈特希爾，也有極重要的地位。

烏倫巴都爾向東二百五十公里地方，舊時已以土爾加土伊努爾鉛鑛著名，據調查結果，實為外蒙古最有期望的鉛鑛，將來的重要性極大，特別是在這裏的鉛鑛和銀鑛結合的一點上。

此外，最近因蘇聯科學家合作而發見的地下富源，更屢次出現新的發見。不過，在大體上說，蒙古人民共

和國的鑛業，還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開始踏進現代化鑛業的初階，並且也才開始有比較大量的開採，具有經濟性鑛工業的意義的生產，還不得不期待於將來。至於鑛泉，則有貝晉士曼，烏里雅蘇台，哲哲爾利克附近等十多處，現在一部分已由政府開闢作療養地方。

第四節 森林資源

從蒙古人民共和國疆土的總面積來看，森林的面積極少。依地域來說，可稱為森林地帶的，是杭愛山脈，汗柯柯山脈，波爾那伊山脈及葉德爾，喬爾台，德利格爾·穆林的水源地，台斯，色楞格，鄂爾渾，葉金哥爾等沿岸的杭愛山林地區，柯索哥爾湖四邊地區的哈特希爾森林地區，包含肯特山嶽地帶的肯特森林地區等等。杭愛森林地區，面積六四、〇〇〇平方俄里，哈特希爾的森林面積為八〇、〇〇〇平方俄里。肯特的森林面積相當廣大，此外戈壁阿爾泰也有若干森林，但是散佈在山間河畔，似乎不能算是森林地帶。

大體上說，外蒙古的森林面積極為狹小，只有疆土的七——八%上下。外蒙古森林最顯著的特徵，森林多在山嶽的南北兩斜面，形成兩大極端。即是森林多在山北斜面，散佈相當濃密，但在山嶽的南斜面，幾乎找不到樹林。這是由於兩斜面濕度的差別之故。

樹木有西伯利亞赤松、落葉松、針樅、白樺、白楊等等，種類倒也不少。外蒙一般國民多以畜牧為業，沒有建築固定房屋的，也沒有燒製薪炭以備為燃料的，普通燃料多利用獸糞。除了若干大都市、寺廟聚落地、官廳、外國人等的建築用料，薪炭，以及漢人及蒙古人中少數工業勞動者的貨車、家具農具、製造用料之外，森林資源的開發利用，還只是最近的事。

近年因為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之下，政治上文化上都有極大的發展，利用木材的地方一天增加一天，都市附近的森林，已多遭斫伐，更加由於不慎，常有森林火災發生，因此使原來太少的蒙古森林，為此更加有絕跡的危

除了。政府自一九三〇年來，力謀保護各種森林，澈底預防森林，火災，設置造林署，嚴禁濫伐，指定保安林等等，在政府嚴密的監督統制之下，以圖實現山林資源之合理的有效的利用。

作為工業的森林企業，現在亦稍見端倪，製材方面的設施，已有烏倫巴都爾附近伊羅河畔的官營製材工廠等。當然，規模還是不大的。

第五節 狩獵業

蒙古西北部山地的居民，從古以來，號為「森林之民」，自古盛行狩獵。當然，戈壁及草原方面的「畜牧之民」，也多從事狩獵，不過和畜牧比較起來，不算重要的生產部門了。大體上說，蒙古民族，自從成吉思汗當時以來，即盛行大規模的狩獵，一面在乎收取經濟上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給部屬大眾以戰鬥訓練，傳下了當時英雄的史詩的精神。

所以狩獵是最原始的產業，同時，在今日也是外蒙古民衆最重要的收入的源泉。

在經濟上最被重視的，是近乎土撥鼠那樣的「獺爾巴肯」的捕獲，這是普遍散居於草原和戈壁地方的地穴中的小動物，牠的毛皮可以做防寒用的帽子和衣服。獺爾巴肯皮的產額，一九三三年為一百十萬四千七百張，一九三四年達一百三十萬張。

此外，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捕獲栗鼠七萬四千，韃靼狐六萬另四百，（所謂韃靼狐，也許就是「家口一帶所常見的沙狐」），狐三萬二千，狼一萬三千，山貓、豹、獾、兔、黑貂等各有若干。

狩獵業在外蒙的國民經濟上，次於畜牧，至今尚有重要的意義。除了畜產原料品之外，蒙古狩獵物之輸出占達二〇%為重要的輸出資源。這些狩獵動物的棲息地，大體上以肯特山脈、杭愛山脈之南北斜面，和阿爾泰山一帶為主。主要的輸出資源，就是上面說到的獺爾巴肯，栗鼠，韃靼狐、狐、狼等，年產額以二十世紀



的三十年代十年平均，計為秋獺爾巴肯一百至一百二十萬只，春獺爾巴肯二十至三十萬只，狐二萬至二萬五千只，狼一萬至一萬二千只，羆、獾、孤一萬五千至一萬八千隻，栗鼠十萬至十八萬隻。一九三四年的毛皮輸出價格，達三百萬土格利克以上，占全輸出額一五·一%。

人民政府對於狩獵事業採取管制的辦法，他們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施行狩獵法，禁止對獸類的濫捕殺，規定狩獵時間，狩獵方法，禁獵區等，以助長獸類的蕃殖，促進狩獵業之合理的發展。其中如獺爾巴肯，且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實施國營。同時，為了保障獵戶的合法權利，廢除過去所有營業執照等等捐稅。

毛皮工業以北部之達爾哈特地方及普利索哥爾比較發達。自二十世紀以來，蒙古的獺爾巴肯毛皮工業非常發達，幾乎曾經獨占歐洲市場的毛皮製造用品的銷路。作為歐洲市場和蒙古市場之間的仲介商人的，是俄國商人，他們在一九〇九年以前，已輸出蒙古的獺爾巴肯毛皮約二百五十萬張。

第六節 水產業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河川，都有豐富的水產，特別是色楞格、鄂爾渾、克魯倫諸河，及布伊爾諾爾、柯索哥爾及其他湖沼最多。種類以鱒、鱒、梭子魚、鯉、鮭、鱧、螺、蟹等等。不過蒙古人在過去，由於宗教上傳說的誠律，視魚類為生物，禁止殺食。可以從事於漁捕事業的，只是僑居外蒙的國人，可以說是漁業的，也只限於柯索哥爾湖區。那邊的蒙古人，受到俄國漁夫的影響，也逐漸從事漁捕了，冬天也把魚類養在家裏。

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即以法律保護漁業，使不受宗教信徒的妨害。並且規定了關於漁捕的時期、地區、手段、租賃、利權契約等等。不過一向似乎還沒有作為企業而經營的。最近布伊爾諾爾湖畔，已有魚類的罐頭工廠開設，由於喇嘛教的宗教的偏見，跟着宗教勢力的逐漸衰落而打破了，蒙古人民對於魚類的一般需要也增加了，因此，這一方面的企業化的前途，已有極大希望。

第七節 工業一般情形

外蒙古在人民革命以前，還沒有現代意義的工業。即使說有，也都不出手工業的範圍，而且從事工業者，也因為在革命以前蒙古政治經濟勢力之錯縱，在中俄蒙古各民族間，所占的生產上的地位，還不很重要。此外，這些工業的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

蒙古人的工業，是畜牧生產品之幼稚的加工工業，如製造「悠爾泰」（天幕）用的氈子，羊毛皮的精製加工，革紐之製作等等。此外是杜爾伯特族用的箱櫃木器業、木匠、冶坊、金屬工藝、製鞋等等，往往是一人萬能式的工藝，沒有什麼分工。

反之，漢人的工業，分布在庫倫、阿爾頓布拉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地方，比起蒙古人的工業規模要大得多，種類也是多方面的，主草的是羊毛皮的加工、箱櫃木器業、製靴業、裁縫業、鍛冶業、馬鞍精製業、金銀工藝、佛像雕塑業、皮革業等等。在中國主權一度恢復的一九一九年夏天，這種漢人經營的企業，共達三百六十三家，從業人員達四千二百八十人。

俄國人在外蒙古經營的工業，以畜產品的加工工業為主，比較蒙漢人的工業，可算是最文明的了。俄國人從事於皮革的精製、羊毛的洗滌、獸腸的處理、油脂製造等等，以阿爾頓·布拉克、烏倫巴都爾、穆林夫倫為根據地的皮革工場，總數有十五廠，精製皮革年產四五萬張。而洗毛工場大小合計約一百處，洗毛能力在六、七、八三個月間達五千磅特左右。

此外在烏倫巴都爾有幾個獸腸處理工廠及肥皂工廠。這些小工業在人民革命前後政治混亂時代，都蒙受極大損失，以後就一蹶不振了。

以企業公司形式而興起的小規模的近代企業，是在人民革命以後的事，一切都是由「蒙生可普」——蒙古

中央合作社創辦和經營的。因為這在外蒙古，不能算是蒙古人的私人資本，創立的宗旨，在「蒙生可普」創立之時，就由財政部發表聲明：

「新的合作機構，爲使發展國民經濟，購入品質優良而且價廉的商品，將原料直接售賣給需要者，並爲蒙古原料之加工，組織本國的企業，必須克服外國資本家的壓迫。」

這樣創立的企業，在阿爾頓·布拉克及烏倫巴都爾設有皮革工場、羊毛皮工場、製靴工場、獸腸處理工場、脂油工場、肥皂工場、蠟燭工場、糖菓工場、防寒靴鞋工場，這些工廠基金多不充裕，設備也不完善，所以除了皮革工場之外，生產實力並不怎樣顯著。這些工廠企業，在實行極左政策之前的一九二七年，除了若干工廠之外，都移交國民經濟部管理，逐漸轉移到獨立的會計經營。這一時期的營業成績並不見好，阿爾頓布拉克兩個皮革工廠計共出克羅姆革三千四百張，毛皮外套用羊毛皮三萬張，其他各種皮革四千五百平方公尺，總共不過九十九萬「土格利克」。

後來曾經做照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產業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也成立了五年計劃，不過因爲後來一般牧民對極左政策發生全面的反擊，這個計劃沒有完全實施。只有一點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一九三〇年在首都烏倫巴都爾建設工業合作機構，和蘇聯的經濟機關成立援助契約，同時，着手培養這個企業組織所必要的從業人員。從此外蒙古的工業，才展開了新時代的史頁。

第八節 工業聯合組織

從來沒有任何近代工業的外蒙古，爲着近代化的要求和建設外蒙古國民經濟的特別要求，當然需要計劃實施國營工業企業。主要的是一九三四年在蘇聯援助下建設的烏倫·巴都爾工業聯合組織。這個近代化的生產機構，包括畜產加工工業、洋紗工廠、製氈工廠、蒸氣洗毛工廠的羊毛工業，及皮革工廠、製靴工廠、羊皮大衣

工場等皮革加工工業，這個綜合大工業機構的計劃，大概和一九三一年五年計劃中所規定者大同小異，鑒於過去之不易實施，才在蘇聯的財政上和技術上的援助之下，實行改組充實。

這個工業聯合組織，包括下列各部門：

- (甲) 蒸氣洗毛工場：洗毛能力為不潔羊毛二、四〇〇公噸。
- (乙) 紡織品工場：年生產額為紗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公尺。
- (丙) 毛氈工場：年產毛氈七二五、〇〇〇條。
- (丁) 皮革工場：生產能力為牛革七〇、〇〇〇張，馬革二〇、〇〇〇張，羊皮二五〇、〇〇〇張。
- (戊) 羊毛皮、羊毛皮大衣工廠：羊毛加工能力一五〇、〇〇〇張。
- (己) 製靴工場：年產蒙古靴一〇〇、〇〇〇雙，洋靴七〇、〇〇〇雙。
- (庚) 聯合工場發電所：發電力二、五〇〇基羅瓦特。

此外，在聯合工廠中尚有機械修繕工場，從業員用磚瓦建住宅六幢，膳堂、俱樂部、診療部等近代的設施，相當完備。聯合工廠的生產總額，一九三六年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至一九二九年增加至三九、四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

聯合工廠中最主要工場的生產力，在三十年代，統計皮革工場年產約大皮三萬張，小皮二十萬張。製靴工場年產蒙古靴九萬對，長靴七萬對，製絨工場產布十萬公尺。這個聯合廠有自己的發電所和工人宿舍街一條，自成一新的「工業之城」。一九三八年度，這裏的發電廠的發電能力，已由二、五〇〇KW增加至五、五〇〇KW。

國內生產的畜產原料的加工，以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為目的，全生產額在一九三五年為七百十六萬五千五百「土格利克」，至一九三八年度，增加至一億七千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九「土格利克」。工人為一千三百

餘名，其中九〇%在以前是從事遊牧業的。

工業聯合工場之外，在一九三四年，又曾由蘇聯的友誼援助，在哈特希爾設立蒸汽洗毛工廠，以輸出商品之加工爲主，從業員爲二百名，其中九〇%是蒙古人。此外革命後建設的，尙有烏倫巴都爾的機械土木工廠（一九二九年設立，當時工人一百八十名，年產額一百至一百二十萬「土格利克」，一九四四年已增加至一千人以上，生產額不詳）。首都另有製肉聯合工場，印刷廠（工人初爲二百名，現有八百餘名），第二洗毛工廠，汽車修理工廠（工人原有一百餘人，現已增加至一千餘人），糖菓工廠、汽水工廠、蘇打工廠等。又有年產一千萬片的磚瓦製造工廠及伊羅河畔的製材工廠。這裏所有工人，除了少數專門部分必需的熟練工人是由蘇聯借用來的之外，已經都是蒙古人了。

從這裏可以看出外蒙古的新產業，主要是就當地所產原料，加工及精製，幼稚的製造工業，以手工業聯合工場的形態，而獲得在國民經濟上新的主要的地位。

據政府公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工業發展的各種指數，國家工業投資總額在一九二七年度爲三十二萬「土格利克」，一九三四年度已增加至一千五百八十萬；國立工業的從業職工，一九二七年爲二百二十五名，一九三五年已增加至三千四百九十二名，其中九十%爲蒙古人。其工業生產額亦由一九二九年之一百八十萬「土格利克」，增加至一九三五年的一千二百二十萬「土格利克」，一九三五年一年間由於工業聯合工廠建設完成，工業製品增加了九〇%。到了一九三九年度，又把經濟部內的工業建設機關，獨立而成工業建設部，配合着二次大戰及遠東的特殊關係，人民政府開始採取以國防產業爲中心的新工業建設政策。不過實際指數，還未得見公報。

第九節 從業員的培養和勞動條件

蒙古人民政府早在開始建設國營企業的時候，由於連年虧損，所以年年支付補助金，不過作業的進行既無預算，不免缺乏科學的管理。後來才確定目標，為經濟的自立自營，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原價的減少，勞動力的防止，減少和防止損失等等，以期確立國營工業的基礎。

政府特別注意的是新式工業從業員的培養。當初，一九二七年不過六十名，到了一九三六年，已增加至三千餘人。而且，當時幾乎沒有一個蒙古人的熟練工人，後來也有了；而且蒙古籍熟練工人的比率也增加了不少。雖然大部分還以輕工業部門的為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才向重工業方面發展。

勞動條件在無統制時代，已曾禁止十四至十五小時的工作，公布全部企業一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依照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的規定，一切被僱勞動者，每年須有二個星期的休息一次，不滿十六齡的童工，每年須有延長及一個月的休假一次，妊婦則須給與二三個月的休養，休假期內的工資，一律照發。另外規定勞工的社會保險，以備疾病及不能工作之時，加以救濟。

一九三九年，實施「突擊隊」稱呼及勳賞制度，（這年四月第二次小呼爾登會議決定），這不只是表面的對蘇聯制度的模仿，對於加強蒙古勞動生產，確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蒙古人民共和國早於一九二六年就仿照蘇聯的辦法，組織起根據生產單位主義的「工會」，使加入「國際職工聯合大會」，使勞工及一般從業員的政治教育，更加完善。同時，又依據新憲法，蒙古的職工法，從物質到精神，都有了可靠的保障和尊重，使他們在無形中成爲一個新興的進步的和幸福的階級，使好幾世紀寄托在原始的遊牧經濟上面的蒙古民族，開始向新的人民時代邁進。

第十節 外蒙古的手工業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工業，是以當地生產的畜產原料的加工精製爲中心的，對於一般農村經濟上需要的

機械器具的製造，比較的居於次位，（當然，這是根據外蒙古整個國民經濟和自然條件而決定的，以後可能慢慢改變），但是，因為如此，手工業及其改良，在外蒙古的地方經濟上，還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爲着這個原因，人民政府把手工業者結合起來，成立手工業合營同盟，藉以防制對手工業勞動者的榨取，援助其原料之供給，援助其製品的銷售，品質之提高，規定有利於手工業勞動者物質上文化上水準之提高等等各種優待及特權。

手工業同盟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據B·潘爾林氏報告，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爲止，加入這個同盟的作坊數爲一百五十一個，加入人員爲三萬八千一百六十名。一九三八至四〇年間，根據政府的決定，爲着吸收一般下層喇嘛到產業戰線上來，會以下層喇嘛組織了一百十八個生產組織。

手工業生產單位組織的主要活動方面，是蒙古靴鞋之製造，皮革之加工，貨車之製造，金屬物之製造，箱櫃木器業、食品業、裁縫業、馬具製造業等等。

手工業合營體所生產的物品，在種類和數量上也逐年都有增加，從一九三八年之二百五十五種，增加至一九三九年之三百二十七種。手工業合營體的產品價格，從一九三一年之四、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增加到一九三九年之一二、六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

手工業合營體同盟的總部設在首都烏倫巴都爾地區，營業所分設哲魯利克、貝晉土曼、阿爾頓·布拉克及其他主要地點。蒙古國營工業及手工業合營體，可以提供國內需要的二十五%。

第五部 商業與貿易

第十章 商業與貿易概況

第一節 蒙古市場的特殊性

蒙古的商業，帶有相當程度的以貨易貨的性質。最古的貨幣形態是羊，這是因為在蒙古的畜牧經濟中可以作為比較價格的。跟着交換的發達，起而作為一般流通的貨幣的，只才轉變而為叫做「滋長」（音譯）的圓形綠茶茶團及茶磚及白銀。

銀子在蒙古，過去流通的有「計量銀」，「元寶銀（馬蹄銀）」及銀幣等。計量銀或漢堡銀都由俄國輸入蒙古，但這不是俄國出品，而是從德國的漢堡及法蘭克福買進的。漢堡銀的品質優良，所以蒙古人非常珍重。然而在計算之時，非分割銀塊不可，却非常困難不便。元寶銀當然是從中國本部輸入蒙古的，是在北京及張家口製造的具有一定重量的銀錠。元寶銀的品質不及漢堡銀，然而普通表示重量却相當輕便。至於在蒙古流通的銀幣，有俄國的盧布和五十戈比的銀幣，中國的七錢二分幣等，也有俄國的小銀幣。銀子以重量計值，其單位為中國的「兩」，一兩又可分為十錢或百分千毫。

蒙古人，一般的說，都不從事商業，在蒙古，如果是從事於某一特定經濟部門的地域，也就是消費某種特定的生產物的地域，在半自然經濟的範圍裏，經濟和生活條件的一致，使蒙古各地域間的生產物之交換，成為沒有多大意義的事了。

只有在這種自然經濟的生活範圍之外的需要，蒙古人才向外國人——中國和俄國人仰求必要的商品，這些外國人就全部收買蒙古人的畜牧生產物的餘剩部分。外國商品之輸入蒙古，根據人民革命黨第三次大會中達姆

巴氏報告的統計，一九二三——二四年間爲一千五百五十萬兩，輸出則爲一千七百萬兩。

在蒙古市場上有銷路的重要商品是綠茶、織物和加工後的皮革。茶葉都由張家口——庫倫及張家口——薩伊爾——烏蘇——烏里雅蘇台的商隊，從中國本部運入蒙古，再分散至蒙古各地。中國綠茶，運銷蒙古一帶的，都是製造精茶所揀剩下來茶屑，壓成茶餅，稱爲磚茶，品質並不好。

中國輸入蒙古的第二種重要商品是織物，其中占有第一位的是棉布毛呢和綢。這些商品實際上不是純粹的中國產品，其中有英國、美國、日本出產的，一部份是上海的中國工廠製造的。中國本部輸入的綢緞布匹，向以張家口爲集散地，蒙古人喜歡用藏青、黃及紅色的。張家口中售的府綢（繭紬）等織物，也都染成蒙古人所歡喜的彩色。此外也有一部份綢布是由俄國輸入的。從中國輸入的，還有比較珍貴的紡綢、紗、羅、和緞子等等，這些織物的大主顧，過去當然只有王公和喇嘛，但他們也只用來製造禮服。

在蒙古輸入市場上居於第三位的重要商品，就是加工皮革。過去俄國所產皮革，差不多早已形成獨佔蒙古市場的形態，但也有少數是從中國本部及日本輸入的。現在除了俄國皮革在蒙古市場上，仍佔相當優勢之外，蒙古自己也有新式皮革製造廠，自行製造各種精美的皮革了。

此外，金屬製品，如斧、鏟、鎚等等，也是蒙古重要輸入品，以前有百分之七十五至一百，都是由中國本部輸入蒙古的，那時還有婦女使用的金銀製造的裝飾品及宗教儀式用具，源源輸入外蒙。革命後情形一變，這種東西，都轉向而仰給於蘇聯了。

第二節 蒙古的中國商業

過去蒙古商業的大部份都在中國人手裏，集中在大中心都市及喇嘛廟——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庫庫·胡圖、德隆·諾爾、巴伊爾·胡圖及其他較小的喇嘛廟和王公所在地。當時中國商業機關的組織如下：

北京及山西幫的大商行，都在蒙古的重要中心地——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處，設有分行，這些分行又在第二等中心地、如察音·夏比、伐恩·克蘭、伐恩·金·克蘭、烏倫可姆、哈特希爾等地，再設附屬的支行。而在這些第二等的支行之外，又有在各「旗」地開設的第三等支店，夏天更派遣特別天幕隊，到處販售中國各種特產。

蒙古的中國商業機關的內部組織，也是很不一樣的。中國商行的夥計，多數是在十二、三歲時到蒙古來，有的隨時返鄉，也有就在蒙古過了一生的。夥計們都是從不受薪給的「學生意」出身的，不過當時在蒙古的中國商行，都是合夥經營的性質，所以夥計也有配紅的優待，大概共事的年分愈多，他所分得的紅利的成分也愈增加。他們也就爲着這點紅利，往往從少年到老衰，全部生活，都消磨在荒野的寂寞的蒙古了。

蒙古的中國商業，又多具有百貨公司的性質。蒙古人可以從無論什麼店舖裏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同時，這些商號又有寄售部的性質，蒙古人也可以出售自己不需要或餘剩的物品給他們。

一九一九年、蒙古還有中國大商行二十五家，這幾家支配了全蒙古的商品市場。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在北京和山西設有總行的，其餘半數是活動範圍以蒙古爲限的獨立的企業。蒙古的中國商行的規模，可以從下面的數字中推想而知：在蒙古經商有三百年歷史的大盛魁行，資本會約達三千萬盧布，它在庫倫、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各分行一九一九年的交易額達到三百萬盧布之鉅（這是說第一次大戰前俄國的硬幣，價值很高）。還有一家布德溫羅斯商行，資本五十萬盧布，其交易額也達一百三十萬盧布之鉅。

除了商行之外，在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及南部蒙古，還有許多「店」——中國商人經營的旅館及居間商號——他們和中國大商號締結有交易契約，收取交易額的百分之二十上下。

一九一一年外蒙古分裂運動以前，中國商業爲信用交易，商行本身對蒙古人不必要求付現款。大體上以羊、羊皮及其他家畜和畜產品爲担保。譬如蒙古人在春天以山羊爲担保，依當時的價格〇·八兩白銀，從中國

商行除得磚茶一塊，那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就得付給這家中國商行以仔羊二隻。因為一歲之羊的時價為一兩，這家商號對於信用出售的商品（○·八兩），隔了一年收回的是二兩，也就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利息了。如果隔了一年，這個蒙古人不能交付這兩隻仔羊，那麼還可以延期，不過在第三年春天，就得繳還二歲的羊兩隻了。二歲之羊的時價是一兩半，那麼，對於○·八兩說來，兩年以後的利息為年利一三七·五%了。如果這個蒙古人在第三年仍舊不能清償這筆債務，第四年春天就得支付市價值三兩的三歲之羊即成熟之羊二頭了。換一句話說，○·八兩的商品，在第二年的利息已是年利二一六·七%了。

中國商業高利貸者，就是這樣地使蒙古人債台高築。而且計銀和計量的衡器也各不相同。又加在蒙古顧客酒醉飯飽之後，誘使購買他所不必要的商品，債務便不由的更重了。他們的貨色出售給蒙古人是用一種秤，而收買蒙古人的家畜時却又是一種秤。一九一二年以前，往往有整個「旗」的蒙古人都對漢商欠了一筆債務，因此形成全旗蒙古人對中國商人的從屬關係了。實際上中國當局並不經常強制蒙古人履行償債的義務，然而利用了蒙古人對於欠債的恐怖心理，往往使蒙古人的家產蕩盡了。

蒙古人都有好客的習慣，會在自己的天幕內殷勤款待來客，中國商人便利用了這種習慣，他們幾乎每天到對他們負債的蒙古人那裏去，大吃大喝的，不幸的債務者，往往爲了應酬債主而先破了產。債不清的債務，就變成商業·高利貸者無形的奴隸了。

中國商業在蒙古，會確實把握到蒙古人的生活構造和他們的習慣傳統，而曾經奠立根深蒂固的基礎。他們同時是比較高度的文化的輸入者，對於蒙古人民的經濟及精神生活，會發生相當巨大的影響。然而，中國商業方法是在陳腐而苛酷的奴隸的條件之中發達的，這種特徵一到碰着了西歐大資本的衝突的時候，他們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

第三節 蒙古的俄國商業

蒙古本身和俄羅斯交易的歷史，是從中國被迫為歐洲人開闢港埠的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以後開始的。蒙古從這個時候開始，經過買賣城而開闢了一條對俄國及西歐運銷中國商品的新路。買賣城在那時以前，曾一直為大清帝國對俄羅斯及西歐各國唯一貿易中心。

天津條約以後，買賣城的商業意義不同了，而西伯利亞鐵路的敷設的意義，又具有決定的性質。當中國商人為着追求游資的投放市場而開始進向北部蒙古之時，外國勢力也開始侵入蒙古了。一八六〇年，庫倫出現第一家俄國商行。一八六八年，科布多又有兩家俄國商行創設起來。俄羅斯商業資本，飛躍一般深入蒙古。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蒙古的俄國商業已大大發展，北部蒙古全部處於俄羅斯經濟的影響之下了。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仲介的商業已漸漸縮小，俄國和蒙古直接的通商關係却大大增加了。

經過柯西·阿加契的稅關的輸入總額，從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這三年的四十二萬四千盧布，增加到一九一一年的一百五十萬盧布，即增加達百分之二千以上。

蒙古的俄羅斯商人，不少是一些地方的富農資本的代表。他們採取了最苛酷的方法積蓄起自己的財富來，因此，他們當然完全套用了中國人在蒙古所有的商業組織和抵押出售的方法。

俄羅斯商人在外蒙古，同樣也用大斗小秤等等欺詐的方法，債務的抵押及高利貸剝削的殘酷手段，以吮取蒙古人民的血汗脂膏。踏着中國商人在蒙古所開闢的血路，俄國商業同樣走上這條老路而且更加擴張了它，最初會獲得相當的成功，不過那些地方的俄國富農資本家，在資本額及其他方面，還不能和中國人比擬，結果是遭受到不小的挫敗。

史托根商會、維台爾曼、休佛卓夫、雅·塞爾加根和其他歐洲型的大資本企業之在蒙古出現，是二十世紀

的事。由於他們的出現，在蒙古的一切勢力關係也跟着發生了鉅大的變化。這些新式的商行，不採取中國人的百貨商店式的方法，而採用專門商行的形式。例如史托根商會及賽爾加根商行，是專辦羊毛的，每年收益額各達萬十蒲特之鉅。其他新商行，也採用「抵押買賣」方法，原料的收買，則是用其他商品和現銀的。

從此以後，中國商業受到鉅大的打擊，那是一九一一年的事。這時有幾家中國商號，被掠奪了；別的商號，也幾乎無代價地出盤給俄國人了。中國商民紛紛逃回中國本部去了。當時外蒙古的俄國商業完全得到獨佔的地位。然而俄國商人並不能充分利用展開在面前的遠大機會。主要是因為俄羅斯資本從二十世紀開始的活動，其由蒙古輸出者，凌駕了向蒙古的輸入，對蒙古的商品供應畢竟非仰賴中國商人不可。俄羅斯商業資本趕走了中國人之後，只有利用其龐大的資本在蒙古收刮物資出蒙古國境外，却沒有增加向蒙古的輸入，因此，很明顯，這種新式掠奪買賣是不會有什麼根柢的。試看當時蒙古對俄國的輸出入上的相互關係：

蒙古對俄輸出入相互關係：（單位第一次大戰前之盧布）

年 度	俄國對外蒙古之輸出	由蒙古輸出
一九〇六年	四、五五〇、〇〇〇	四、五五〇、〇〇〇
一九〇七年	四、五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八年	三、七〇〇、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九年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一年	一、四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二、七〇〇、〇〇〇	八、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	二、四〇〇、〇〇〇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內俄國對蒙古的輸出，比較一九一一年差不多是一一倍，但是以後俄國商人就只注力於蒙古原

料的輸入了。因此，俄國商人對於從中國分裂出來的外蒙古，並沒有實行它提供商品的使命，外蒙古市場的唯一支配者的俄羅斯商人，把價格和利潤作驚人的提增。然而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之間的交易額，只及自治蒙古貿易的三分之一，蒙古國內需要的不足額達六十五%以上。

在這種情形之下，外蒙古在經濟上有恢復中國商行活動的必要。中國商行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爲着俄國紙幣的慘跌而遭到猛烈的打擊。一九一三年俄國盧布紙幣在蒙古的市價爲〇・七兩，比銀幣高出〇・二兩。然而到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已下跌至〇・三三兩，一九一七年一月只有〇・二九兩了。從一九一七年起，俄國紙幣的下跌特別猛烈。中國商人不再收受「羅曼諾夫」紙幣以外的俄國紙幣了。克倫斯基政權的二十盧布及四十盧布的紙幣，遭到絕對的拒絕，只有二百五十盧布的紙幣會偶然有人收受。而且對於「羅曼諾夫」紙幣，也只要新的，稍有皺紋的就沒有人收，結果俄國紙幣在蒙古幾乎沒法流通。

俄國的內戰，給中國商業資本以回到蒙古活動的絕好機會。從此一直到一九一九年，蒙古商業的大部分，再度回到中國商人的手裏了，俄國人的私營商號逐漸停止活動，只有戰時設立的爲軍隊收買家產的「蒙古探險隊」繼續其事業。

第四節 蒙古探險隊和「中聯」

蒙古探險隊是在蒙古、西伯利亞和滿洲等地收買肉製品的俄國商業遠征隊，他們曾涉至山東半島及澳洲等地收買鹽漬肉類，所以在一九一八年以前，這是獨佔蒙古牛羊收買事業的國營機關。每年收買牛隻常在十萬頭以上，平均可得一百萬蒲特的肉和獸脂。一九一八年，西伯利亞的白衛軍——葉賽爾派政變之後，蒙古探險隊因爲有波爾賽維克黨的嫌疑，受到了一切的壓迫，幾乎無法活動。從提督考爾察克的政權出現以後，就完全遭受清算。不過，西伯利亞的白衛軍，並不能在蒙古家畜收買業衰落之後委託私營家畜業者的集團。他們無法進

行這樣規模龐大的事業，因此不能不委諸「中央聯合會」之手。

中央聯合會在蒙古的活動，在起初幾年是非常困難的。一九一九年在伊爾庫次克設立的事務所，就感到資金和有經驗的人物的非常不足的痛苦，當時白色西伯利亞支配下的運輸機關的紊亂，以及無限制的投機，同樣使事業大受影響。一九二〇年，西伯利亞的考爾察克政權破產之後，伊爾庫次克的事務所就替生產合作社在蒙古定購各種家畜，完全履行定貨的全部條約。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中央聯合會的伊爾庫次克事務所在蒙古的活動有如下表所示。

中聯在蒙收買家畜統計

一九一九年	一〇、〇〇〇頭
一九二〇年	三三、〇〇〇頭
一九二一年	三二、〇〇〇頭

一九二二年中央聯合會在蒙古的活動，已經帶有新的性質。伊爾庫次克事務所，從這一年起開始用自己的資本獨立活動了，並且除了家畜之外，兼收毛皮等等。一九二二年活動的結果，是收買了牛九千五百九十頭，羊一萬二千八百頭，各種毛皮十五萬八千張，價格十三萬一千六百金盧布，全部共計六十萬金盧布。

皮革、及羊毛等原料品的一部分，是由中央聯合會的外國部販賣給外國市場的，第五事業年度開始時，伊爾庫次克事務所獲得一九二三年度的流動資本五十萬金盧布，因此，伊爾庫次克事務所在一九二三年收買了：牛一萬二千頭，羊一萬五千頭，駱駝毛、羊毛及馬尾二萬三千蒲特，皮革一萬三千張，馬鬃一千二百六十蒲特，栗鼠皮及其他皮革三萬張，羊毛皮及曼利諾斯皮七千張，牛油五千蒲特。

中央聯合會的活動，在一九二三年，已西至科布多，東至哲尊汗盟的平原，已漫及外蒙古全境了。

伊爾庫次克中聯一九二四年的事業，是收買大家畜二萬四千一百三十頭，小家畜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頭，羊

毛一萬一千蒲特，以及其他各種原料，一九二四年的全部收買額，共達一百〇二萬二千七百七十盧布。

中央聯合會的西伯利亞支部，於一九二四年改組為消費合作社西伯利亞州聯合會，中央聯合會在蒙古的業務始告終止。伊爾庫次克及其在蒙古的機關，轉移到西伯利亞州聯合會，而西伯利亞州聯合會為着進行的蒙古的收買事業，認為不應和作為消費合作社的直接使命分離，所以從一九二五年又把西伯利亞國營商業的蒙古分號，移交於伊爾庫次克事務所。

第五節 蒙古市場上的蘇聯國營商場

蘇維埃國營商業在蒙古的事業，是以下述兩個機關開始的。這就是國家商業西伯利亞支部（簡稱西比古蘇托爾格）及國營商業遠東支部（簡稱達利古蘇托爾格）。前者的活動範圍從蒙古西北部科布多一帶開始，它在一九二三年收買牛二千頭、羊一萬頭、羊毛五千蒲特，生皮革三千張，一九二四年的收買事業擴張為牛七千頭、羊一萬頭、羊毛一萬蒲特、獺爾巴肯皮三千張等等。

一九二五年，國家商業西伯利亞支部在蒙古的活動更加擴大規模。一九二五年在蒙古的事業，統計為收買資金二百五十萬七千盧布，收買牛二萬頭、羊三萬頭、羊毛二萬七千蒲特、駱駝毛四千蒲特、牛油一萬蒲特、栗鼠皮四十萬張、獺爾巴肯皮七萬五千張。

國營商業遠東支部在蒙古東部地方推進業務。一九二三年在庫倫開設事務所，從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六月間，已有三百二十萬六千盧布的交易。不過這個機構在蒙古的業務，並沒有詳細的計劃。

此外，一九二四年的蒙古市場上，還有股份公司「錫爾斯底」，也有顯著的活動，收買了四萬六千蒲特的羊毛，蘇聯通商代表商業部的仲介收買業務，交易數額亦達七十五萬盧布。

為着加強和發展蘇聯和蒙古之間緊密的通商關係，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決議規定關稅率，

凡由蒙古輸入蘇聯的一切家畜毛皮、羊毛、馬毛、原料皮革及魚類，一律免稅。其他商品，則由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之俄羅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人民委員會通過，按照亞洲一般關稅率課稅。

國營商業西伯利亞支部由中央聯合會舊伊爾庫次克事務所發展，曾為蘇聯在蒙最堅強的商業機關，也就是蘇聯在蒙古市場上最有力的商業上收買機關。結果使所有蘇聯在蒙古設立的各種有關商業——收買物資的機關，準備統統移交集中於這個國營商業西伯利亞支部。

蘇聯各商業機關之在蒙古推進大量的肉類及原料收買事業，使蒙古的畜牧業和蘇聯的工業發生緊密的結合。蘇聯中央部的工業，可以獲得品質優良的蒙古原料，消費者又可獲得賤價的肉製品，所以國營商業機關更加強化，普及於蒙古所有事業，從此把二世紀之久而可驚的經濟的奴役狀態束縛蒙古人的中國商業資本從根本給剷除了。

第十一章 國內商業

第一節 革命與商業

在革命以前的外蒙古經濟上，可以制牧民之死命而表演其決定的作用的，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者，同時又是外蒙古畜產原料之顧客的外國商業，其中最主要的是漢族商業資本的活躍。

這些商業資本在外蒙古，和民族生活的特異性及封建的社會組織相結合，深入大眾生活內部，起着極端的保守的作用。因此促進了牧民經濟的危機，成為外蒙古爆發人民革命的主要因素。所以，蒙古的革命，在外蒙古說，完全是以外國侵入勢力為背景的，是以驅逐外國商業資本之榨取為目的的民族解放的革命，獲得封建

階層、喇嘛階層和游牧民等等的擁護，維持反對外來商業資本掙取的民族統一戰線。而在另一方面，同時又刺激了新的蒙古民族的配給機構之建設。所以，在商業方面，也像政治方面一樣，對於國內封建層及喇嘛的妥協政策，當然也有其時間性，因為這些階級，一向就是所有配給機構的所有者，內外商業的獨占者，而且是純粹外國商業採取密切地結合着的。

蒙古人民革命，不可避免地具有這樣對外和對內的戰鬥的特性。

新的政府，首先在外蒙市場上和外國資本抗爭，防制畜產品的掠奪式的囤購，以協助牧民經濟的復興，同時，在國外貿易方面，組織獨立的國家貿易，用這種國家機關來保證統一商品的輸入和適當順利的分配。

這種機關，最適當的莫過於合作組織了。「蒙生可普」（「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的簡稱）的創設，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因此，要知道革命以後的外蒙古的國內商業，不能不先理解這個「蒙生可普」的發展狀況。

第二節 初期的「蒙生可普」

「蒙生可普」（「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創立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當初的「蒙生可普」是極其貧弱的，加入這個合作社的股東，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底，不過一百十六名，資本不過銀洋八千三百元。所以它的交易數額也很少，計為收買原料一四、三〇〇元（銀幣）、商品販賣額一五、七〇〇元（銀幣），合計三〇、〇〇〇元。

這個合作社是國營的機關，直到一九二四年，才算脫離室內的實驗的範圍，稍具經濟上的意義。到那一年，股東已由一一人增加至一、五〇〇人，固定股票資本四八、三〇〇元增加至六〇、〇〇〇元。政府為着增大放款的能力起見，放出了三、〇〇〇、〇〇〇兩的資金，然而，在穀產物工業生產品等完全依賴外國的外蒙古，合作社這種營業狀態，當然還不能和漢族私人商業相對抗，試觀第一屆大國民會議的決議：

「商業是蒙古經濟生活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因此為謀蒙古將來經濟發展的運命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強化，必須對內外商業作適當的調整，使國民可以把自己生產的生產品實行適當的有組織的銷售，並由此取得必需的外國製品，原料生產品和購入商品的價格，由國家實行統制，使直到現在還在這一方面坐獲巨利的私人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作用，因此逐漸衰落。」

第一屆大國民會議決定：(一)減少自由競爭的私人商業，(二)以發展畜牧第一主義，推進商業政策，(三)逐漸壓制高利貸資本，(四)有組織地獲得市場，(五)國家機關及企業公司間無競爭，以圖實現蒙蘇兩國緊密的協調，相互扶助，同時，一直靠政府的補助金來維持的「蒙生可普」也力謀恢復其為合作社的本來出發點，勸導個別國民積極地參加。

這時合作社的交易動態，有如下表：

年 度	初期消費合作社的交易動態(單位一蒙幣「土格利克」)	
	輸出原料收買額	輸入商品銷售額
一九二一——二二年	一四、三〇〇	一五、七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年	六一、四〇〇	一二二、六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七四七、四〇〇	七五八、六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四、五九七、〇〇〇	四、一四六、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年	四、八四九、〇〇〇	五、一二三、〇〇〇
一九二六——二七年	五、八六二、〇〇〇	四、二三四、〇〇〇
一九二七——二八年	五、八九六、〇〇〇	四、二七八、〇〇〇

交易總額

當時外蒙古的交易總額，大體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因此，「蒙生可普」在當時大體上

獲得國家商業的四分之一。

第三節 極左政策時代的「蒙生可普」

極左政策之決定，是一九二八年人民革命黨第七次大會。商業方面的極左政策，是：（一）對私人商業採取壓制政策，（二）通過「蒙生可普」，加強及擴張國營商業。

由於極左政策之強烈的推行，引起了根本動搖蒙古國民經濟的空前未有的深刻的波瀾，在這暴風雨中，獲得飛躍的發展的機會的，當然是上面所說的「蒙生可普」。

「蒙生可普」作為國家的合作機關而創立以來，始終一貫地，企圖獲得及獨占對外國的販賣市場和國內供給市場，以驅逐漢人及其他各國私人高利貸商業資本為其使命，不過一直沒有順利地進展，現在因為極左政策之全面的推行，才在「蒙生可普」面前展開了一幅光明的遠景。首先是活動的計劃性的確立，第二是和財政部締結輸出入機關支付協定，第三是「蒙生可普」在貿易及國內商業上獨占的地位之確立。

一九三〇年的第八次人民革命黨大會時決定「蒙生可普」站在供給和銷售的立場，必須使勤勞牧民大眾實現合作，並對集體農場，實行援助，助長家庭工業手工生產合作社等之發生和強化，而對於「蒙生可普」當前的任務，則有如下決定：

- （一）貧農及中農之經濟，以未來三年為期，完全實現合作制度化；
 - （二）黨、革命青年同盟、工會關係者，在一年以內，全體加入合作組織；
 - （三）從各階層的見地實行採用從業工人；
 - （四）以「蒙生可普」的利益作為貧民合作制度的基礎，並給與各種特別優待。
-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蒙古的貿易已完全實行國營。一直繼續到這一時期的以中國為對手的交易，至

此才完全斷絕，而私人經營的商業，也一時瀕於消滅。因此，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私人商業全部撤退之後，就和蘇聯商業人民委員會成立協定。即由蒙蘇兩國主管機關，互相建立完全一致的輸出入計劃，關於商品的販賣及原料物資的收買，實行相互間的分配制，努力避免無益的競爭而調整市場的供需關係。

這時在國內商業方面，「蒙生可普」的比重，統計為輸入總額三六、五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中佔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即三八・四%，輸出總額三一、八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中，佔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即六二・九%。另一方面，蘇聯社會化的商業部門，輸入品有四二・六%，輸出品有二七%。而私人經營商業的比重，則僅為輸出約一〇%，輸入約二〇%。

遍及外蒙古社會經濟全部而樹立的產業五年計劃，關於「蒙生可普」的活動方面，也可以部分地反映出來。根據這個計劃，「蒙生可普」的商品供給力有如下表：

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之商品供給力（數額單位「土格利克」）

摘 要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五年		對三〇年度	
	對參加合作社之國民的商品供給額	供給率%	第五年度的商品供給額	供給率%	供給絕對額	供給增加率%
(一) 地方關係之部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三五・五	
(甲) 工業商品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一・三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七一・六	
(乙) 農產品	七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四二八・五	
(二) 都市之部	七、〇〇〇、〇〇〇	五八・三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八	一九二・八	
(甲) 工業商品	六、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	一一、七五〇、〇〇〇	八四・五	一九五・八	
(乙) 農產品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五六・四	一七五・〇	

合

計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五二·七五八、五〇〇、〇〇〇

九四·三三〇七·八

(甲)工業商品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五四·一五三、七五〇、〇〇〇

九七·七三一〇·六

(乙)農產品

一、七〇〇、〇〇〇四二·五 四、七五〇、〇〇〇

五七·八二七九·四

在這個時期，外蒙古牧民的購買力，由一九三〇年之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增加到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其需供率由五二·七%增加到九四·三%。因此，如果這個方案完全實現了，蒙古的國內商業就可以通過「蒙生可普」而差不多完全國營化了，完全實現國內供需的充足了。

然而，這次獨占國內商業及完全清算私人商業的計劃，竟完全失敗了，因此這個方針也中途放棄。理由是：(一)代替私營商業的商店網，無法立即普遍展開，(二)需要商品之輸入計劃過少；(三)由於交通機關不充分，商品的運輸狀況不良。因此結果全國各地出現商品飢饉的現象，牧民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反抗更因此而強大了。

第四節 實行新政策以後的國內商業

極左政策的放棄，在國內商業方面，就是允許私人經營的商業之恢復，就是撤消「蒙生可普」的獨占商業政策，允許私營商業，其中特別注意於促進蒙古人私營商業發展的各種方策，因此對牧民分配商品及原料的調度，逐漸便利起來了。

但是當時還維持外國貿易的獨占，保持國家的統制的作用，除了「蒙生可普」外，又另行創設特殊的國營商務公司，附屬於蒙古銀行，專管對私營商的交易。因此，這時外蒙古的國內商業，是由「蒙生可普」及其委託販賣業者、私營商、國營商務公司之間進行的。

「蒙生可普」由自己的分社、下級合作社、商店、巡迴零售商、委託販賣者等，從事於輸入商品的售賣，

以及外蒙生產的輸出原料的收買。

私人經營的商號則相反，是從工商部主管之下的國營商務公司接受商品的供給，受到相當的統制。個人商號收買的原料、毛皮等則仍由國營商務公司收購。這樣雙方在競爭的立場，促進了國內販賣調度活動之發展擴張，私人商號不能獲得不正當的利益，而另一方面，「蒙生可普」又可以促進業務的內容及品質的提高。

統一於「蒙生可普」之下的下級合作社，共有一百六十一個，它屬下的商店網，遍及全國各地，共有一千〇九十七家。此外，爲了補助商店的不足，另有委託販賣業者。合作社的從業員計有二、二三四名，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是蒙古人。股份資本額一九四〇年達一、五八二、〇〇〇「土格利克」，合作社員計一三三、一〇〇名。營業狀態也開始有顯著的改善，自一九三五年以後每年對合作社股東分發股息。又爲培養從業員計，在首都烏倫巴都爾設立合作實驗學院，該院設有分院三所。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經濟制度實行蘇維埃化，因此私人商業開始新的清算，所以「蒙生可普」在國內商業方面的比重漸漸增加，一九四〇年間已達九〇——九五%，依潘爾林氏的統計，其總交易額已達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了。

第十二章 對外貿易

第一節 革命前期的貿易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外蒙古的對外貿易及一般商業機構的特質，有如上面所一再述及的，外國貿易機關，是給中國及俄國等資本主義各國的高利貸商業資本所支配的，這種外國商業機關，是輸出貿易機關，同時，

在國內商業方面是配給與調度的機關，完全脫離外蒙古的民族榨取的機關。

外蒙介於中俄兩個大國之間，政治上久成中俄兩個政治勢力的角逐之場，經濟上也以兩國的政治勢力為背景而為商業資本市場的鬥爭之地。這種鬥爭，曾以帝政俄羅斯的沒落為轉機，因徐樹錚發動了恢復中國主權運動而轉取攻勢，結果中國商業一度大獲全勝。

然而從這個中國商業資本恢復時期，經過俄國白衛軍餘孽溫干倫軍侵入蒙古以後的掠奪的統治時期，不久終以蘇海·巴圖爾——這位「外蒙的列寧」領導的蒙古人民革命軍組織人民政府，結束了長期的外國商業資本在蒙古的鬥爭時代，外蒙古的商業資本被根本本地破壞了，牧民大眾開始面對一種嶄新的局面了。

這時外蒙古的輸出入的種類和數量，據邁斯基氏的統計，有如下表：

革命前期輸入商品

種類	數	量	依照一九一三年匯率的盧布計價
(一) 茶	一五〇,〇〇〇箱		四、五〇〇,〇〇〇
(二) 各種麥粉	一、一〇〇,〇〇〇蒲特		三、二〇〇,〇〇〇
(三) 穀類(黍及禾)	九五〇,〇〇〇	”	九〇〇,〇〇〇
(四) 煙草	四五,〇〇〇	”	五五〇,〇〇〇
(五) 酒精飲料	三七,八〇〇	”	九〇〇,〇〇〇
(六) 砂糖	八,〇〇〇	”	一五〇,〇〇〇
以上食品合計			
(七) 棉布	五,五〇〇,〇〇〇俄尺		一一,六〇〇,〇〇〇
(八) 毛布	二,五〇〇,〇〇〇	”	一,二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種類	數量	一九一三年滙率之盧布計價
(九) 綢緞	五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十) 絲棉交織品	一三〇,〇〇〇	七五,〇〇〇
(十一) 絲	一二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十二) 紗羅	八五,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十三) 洋紗	八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
(十四) 粗紗	七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十五) 錦	二七,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
以上織物合計	九,〇一二,〇〇〇	二,九五〇,〇〇〇
(十六) 鈕扣等		二〇〇,〇〇〇
(十七) 衣類		六〇〇,〇〇〇
(十八) 金屬製品		一,五〇〇,〇〇〇
(十九) 佛具		四五〇,〇〇〇
(二十) 精製皮革	六五,〇〇〇張	一,三〇〇,〇〇〇
(二十一) 其他物品		一七五,〇〇〇
總計		一八,七七五,〇〇〇

由此可見支出金額的六一·七%是食品，織物為一五·七%，金屬製品（銀，裝飾品，鎖，錫子，其他等）八%，精製皮革七%。

革命前期輸出商品

(一) 牛	一〇〇,〇〇〇頭	四,五〇〇,〇〇〇
(二) 羊	八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三) 馬 (牝馬爲主)	七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〇
(四) 駱駝	三,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以上家畜合計	九七三,〇〇〇	九,六五〇,〇〇〇
(五) 羊毛	三五〇,〇〇〇蒲特	一,八〇〇,〇〇〇
(六) 駱駝毛	四五,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七) 羊毛皮 (及山羊毛皮)	五〇〇,〇〇〇張	三七五,〇〇〇
(八) 仔羊毛皮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九) 皮革 (家畜及馬)	一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十) 毛 (馬及薩魯魯伊克)	四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十一) 馬尾	五〇〇,〇〇〇條	三五〇,〇〇〇
以上畜產品計	—	三,六六五,〇〇〇
(十二) 獵獲物	—	五〇〇,〇〇〇
總計	—	一三,八一五,〇〇〇

第二節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貿易

過去外蒙古國民的貿易，是和封建的社會組織相結合的，這就構成了後來國民經濟沒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到了一九二四年活佛政權轉移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共和國的憲法，首先規定解放人民大眾，而

以實行國營對外貿易爲解放人民大眾的前提條件之一。「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開始驅逐幾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外國獨佔的個人高利貸商業和外國商業資本，把貿易事業拿到蒙古人民手裏，給站在貿易界前綫的人以復興國家經濟的重大任務。這是在上面一章裏已經說過了。

在強制推行極左政策和施行國營貿易之前，外國商業資本在外蒙古市場上還有相當堅強的勢力，這些外國資本以中國商人，英美商號，在蒙俄國私人商行，及蒙古新興商人階級爲代表。不過除了中國商人以外，誰也沒有佔得支配的地位。

中國商業高利貸資本，在蒙古革命政府看來實在是實行新政府的流通政策上的癌腫。因爲他們好幾世紀以來，支配了整個外蒙古市場，充分了解到以蒙古人爲對手的交易的禮儀、規矩、技巧、和蒙古人的心理，早已深入民衆生活而對蒙古人民大眾中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中國商人在蒙古第一次「大國民會議」時，在烏倫巴都爾（庫倫）計有商號四百七十六家，此外各地尙有一千〇七十七家，在外蒙古交易上，占有壓倒的優勢。他們在外蒙古有着穩固的貨幣制度，所以不只靠現金投資，而且以商品的賒賣爲主，和蒙古的蘇俄機關抗爭，在蘇蒙貿易機關的物價政策方面，中國商人屢次發揮其優越的作用。

中國商人在外蒙古革命以後，雖然因爲受到政治上的各種壓迫，因而不得不逐漸趨於衰落，然而在沒落的過程中，在中介貿易方面，依然保持其相當重要的地位。後來政府實施內外商業一律國營的政策，使中國商業面臨絕望的深淵，不能不向後轉，但是還能利用自己特有的商業手段而在蒙古人民大眾中保持一部分潛勢力。在和中國商業高利貸的鬥爭過程中，對「蒙生可普」自始至終表現着積極的作用的，當然是蘇聯方面的通商機關，蘇聯經濟機關最初在外蒙古的活動，是一九二三年秋天，不過那時還是個別的分散的，所以金融上的根據是非常薄弱的。

和「蒙生可普」合作，與私人的高利貸的外國商業資本對抗，深刻發覺到建立商業上的統一戰綫的必要，

而且同時還必須要求避免內部無益的競爭。一九二七年二月建立的蘇聯的統一的商業機關「斯特魯蒙格」，就是依據上述要求而組成的，由一向各別獨立在市場活動的蘇聯機關——國營商業西伯利亞支部、全蘇織物聯盟、皮革辛迪卡、普羅姆出口、國營重工業等等，共同參加為這個組織的股東。

蘇聯在外蒙古的商業機關單一化和加強化之後，又和蒙古的「蒙生可普」合作，一致盡力排除中國商業高利貸資本。據羅西丁氏統計，這一期間對外貿易的總額如下：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之對外貿易（單位一千土格利克）

年 度	對中國貿易		對蘇聯貿易		計 總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一九二四	一六、七三	一五、七五	二、三二	四六六	二、六六三
一九二五	一四、九九	二一、五八	三〇、八五	四、七七三	三、七八九
一九二六	一五、〇九	一七、一五	四三、二二	四、七七三	三、七八九
一九二七	一二、六五	一九、〇六	三一、七一	二、六〇八	五、五四七

這一時期「蒙生可普」的比重，在輸出中約佔二四%，在輸入中約達二五%。

第三節 極左政策和外國貿易

蒙古人民共和國實行極左政策，在商業方面，主要是加強「蒙生可普」對蒙古市場的獨占力，和抑制新興富裕階層的發生，因此，在外蒙古，唯一可以利用為蓄積手段的經濟部門——私營商業，亦陷於消滅，對外貿易當然完全採取國營政策了。

蘇聯的經濟機關在外蒙古的活動，第一是調度供給外蒙古一切原料品，以助蘇蒙新興工業之發展；同時，

在外國商業高利貸資本及其事業的排除過程中，扶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營機關。因此，跟着中國商業退出外蒙，蘇聯商業展開了他對外蒙古市場的活動。

本來已經逐漸趨於衰落的中國私人在外蒙的商業和外蒙古的對華貿易，自從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實施國營貿易之後，完全停頓了。「蒙生可普」——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就依據以實現供需完全國家統制為目標的輸出計劃，作為國營貿易的執行機關而開始試辦了。

有如國內商業一章所說，「蒙生可普」在五年計劃之第一年度——一九三〇年，輸入了總計達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的工業生產品及農產品，至一九三五年度止，提增至五八，五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其供給率達九四·三土格利克。而國民的購買力，在同一期間，預計自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增達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相對的，外蒙古的輸出原料資源在同一期間，由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增加至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即對第一年度增加達一五七·四二%。

第四節 實施新政策後的對外貿易

但是，實行國營貿易以後，流通很不圓滿，蘇聯生產的日常用品，實際上和蒙古人的傳統的民族的嗜好，並不適應，沒有充分的配給組織和運輸機關的「蒙生可普」，及上述蘇聯的「史特魯蒙格」，往往到處引起「商品飢荒」，使牧民大眾對於極左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了。

國內商業方面的極左政策，使政府遭遇到失敗，私營商業復活已成為勢所必至而終於實現了。至於政府對貿易方面，國營貿易的政策，並沒有什麼變化。不過因為其他經濟部門內極左政策的失敗，其性質也不能不稍為變化，其善後處置的中心，就在允許私營商業活動，以補助「蒙生可普」的不足，使商品的供給更加活性化，整頓運輸機關的內容，一直被禁止的私營馬車運輸，也有了發展。

爲着使商品活潑化，在「蒙生可普」之外，另行在蒙古國立銀行直屬之下，設立以私營商業爲對象的國營批發商業機關「蒙格蘇·普納爾」，使新告復活的私人商業可以在這個機關的援助之下獲得發展。這個機關以後解散，自一九三四年起，改組成立國營商業公司，專門負責。

以後外蒙古的貿易，差不多專門以蘇聯爲對手而進行的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還有一部分對美對德的貿易，也都由蘇聯駐美駐德商業機關經手，實質上也只是對蘇貿易。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九四五年冬天蒙蘇成立新商約，使雙方的貿易關係有了新的發展，這個新商約已在一九四六年春天正式開始實施，同時，由於中國對蒙古人民共和國已正式承認，今後政治上軌道，爲了雙方親密合作，也有轉入新階段而恢復正常貿易的可能。

第五節 蘇聯在外蒙古的貿易機關

(一) 第一階段的蘇蒙貿易

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外蒙古的對外貿易，完全爲蘇聯所獨占。因此，研究外蒙古人民政府的對外貿易實況，一定要着重在蘇聯方面的對蒙古貿易。

蘇聯自從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利用兩國密切的政治關係，逐漸驅逐中國及其他外國商人勢力，獲得獨占的地位，但在政策上，已經幾幾次變遷。

最初期的形態，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相適應，是一種自由貿易政策，當時，「在保證國家之統制的作用及國家對市場之安全保障氣氛之內」，有某種程度的通商自由。

後來蘇聯對外蒙古經濟的統制力逐漸加強，同時，由蘇聯駐在外蒙古的國營經濟機關，代替過去私營商業活動，蘇聯獨占外蒙古市場的色彩濃厚起來了。一九三五年「蘇聯遠東經濟政策」的著者伐伊奧萊特·柯諾利氏

說過：「一九二六年以來，聯的商業活動，深入了蒙古國家經濟機構，從來在蒙古經營的外國商行——特別是漢人商舖，從這一時期以後，由於加給一切私人商業的行政上和財政上的障礙，顯然已經無法繼續營業了。」

(二) 第二階段的蘇蒙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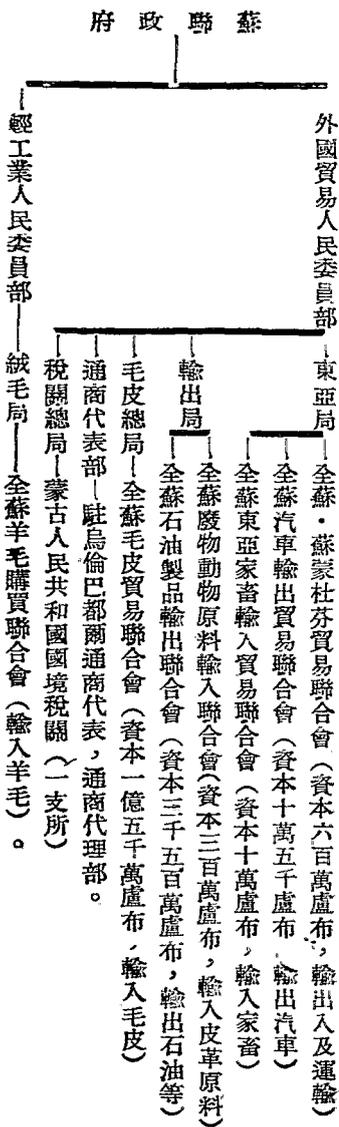
到了一九二七年，蘇聯把外蒙古的各種貿易機械集合起來，成立一個「史特魯蒙格」——蘇蒙貿易公司，以圖貿易業務的單一化，為着擴大加強經濟的任務，轉入蘇聯對蒙通商政策的第二階段。依照 V·柯諾夫的上述一書所說：

「這種政策日臻成功，蘇聯貿易戰勝了英美中國貿易而迅速地發展了，一九一八年蒙古有四百家商舖，只有五十家俄國商號，但是一九二六——二七年一年之間就只剩六十家中國商舖，二家英國大商行也關了門，蒙古羊毛貿易的八〇%到了蘇聯的手裏。蒙古的對外貿易總額中，蘇聯所占有的比率，由一九二四年之一七%，增加至一九二六年的二九%。一九二八年，蘇聯完全獨占了蒙古的羊毛輸出貿易。」

一九三〇年底，蒙古人民共和國宣布國營貿易，蘇聯在外蒙古的商權又有一大飛躍的發展，全蘇聯東亞貿易聯合會 獨占了對外蒙古貿易，按照預定的方策，完成了對外蒙市場的獨占。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蘇聯貿易人民委員會改組，新制度中，外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獨立出來，全蘇東亞貿易聯合會也因此實行改組，一九三二年一月，蒙古杜芬獨占貿易機關——全蘇·蘇蒙杜芬貿易聯合會成立，當時共有六個貿易機關，有如下表：

蘇聯在外蒙貿易機關一覽表



上表內的全蘇·蘇蒙·杜芬貿易聯合會（簡稱蘇夫蒙杜芬土爾格）為對蒙古及杜芬兩國獨占石油製品及汽車以外蘇蒙輸出貿易的機關，實際上為對蒙貿易的中樞。全蘇石油製品輸出聯合會則對蒙古輸出石油及石油製品，在外蒙首都烏倫巴都爾（庫倫）設有代表部，在蘇海巴都爾、杜爾泰、貝音土曼設石油基地，在科布多、哈特希爾、哈喇、烏倫巴都爾、溫都爾·汗、烏台、哲哲爾利克七地設有大儲油場所，另外還有九個地方設有小儲油庫；這一切，在過去，都是為準備一旦對日本偽滿及中國反蘇派作戰而設置的。後來曾在抗日戰爭中發揮其重大的作用。

（三）蘇蒙貿易的新階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蘇蒙兩國間成立通商協定，從此蘇聯對外蒙貿易進入第三階段。不過一切變化只是表面上的，其政策的本身，則始終一貫的扶助蒙古人民政府發展國民經濟，並不斷地利用以發展本國的社會

主義的經濟建設和調整生產工業，特別是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和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作戰期中，蘇聯對蒙古的貿易，更在戰爭物資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這是不言可知的。現在蒙蘇新商約是在戰後民主、和平復興建設的時代開展的，他們的前途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第六節 蒙古對蘇貿易的動態

外蒙古的對蘇貿易，可說是對外貿易的全部。人民政府為適應蘇聯方面而調整對蒙貿易機關，於一九二四年依照蘇聯的機關，設立「蒙生可普」——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且有對外貿易及國內商業獨占權。一九三二年以後，由於政策轉變，在國內商業的分野方面，再度允許私人經營商業，已如上述。

據統計，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由外蒙輸出的羊毛，有八六%是到中國本部的，到俄國的不過一三%，但是一到一九二八——二九年度，對蘇聯的羊毛輸出已達九三%，對中國的反降落到六·五%，後來對蘇輸出就增達一〇〇%。當時只有一部分磚茶，還是由中國本部輸入蒙古的，後來因為戰爭，交通阻塞，連這一點也沒有了。

外蒙古的主要輸出品毛皮及皮革等，也完全由中國市場消失，同時一向由東三省輸入外蒙的許多小麥等農產品，也由俄國農產品所代替了。輸入方面，紡織品、砂糖、機械等代表文明的五大商品，已大量地由蘇聯輸入。

外蒙輸入蘇聯重要商品一覽表 (單位公噸)

商品名稱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五年
織物	八二三	二、五六二
砂糖	五一〇	一、九三四

麥粉	一、一九五	二〇、〇一〇	二七、五七九
煙草	五九	一、三九八	一、二二八
電力製品及 電氣機器	三二	三、八七六	三、四五八

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九月，輸入麥粉等四七、九五八公噸；砂糖四、一九一公噸；茶二、七八六公噸；棉布二、三二七公噸；石油一三、六六一公噸，水泥一三、六六一公噸；機械、器具及金屬物二、四三九公噸（包含農業機械八三三公噸）；汽車及腳踏車及其零件八八一公噸，拖拉車一六九公噸，當然，這是外蒙古技術化的反映。

魯易奇克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經濟的及社會的建設」中，曾經說：

「在躍進狀態的蒙古輸入貿易中，已經出現了革命以前完全沒有輸入的許多新的物資，特別是由蘇聯輸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金屬、機械——尤其是汽車、各種機械的輸入大大地增加了。

「最近五年間，汽車的輸入增加達五倍以上。穀類的輸入也增加了。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三〇年三年之間，汽車及其零件的輸入，已由一・二%增至五・六%，雜糧類由一三・二%增加至二一・八%，砂糖由六・八%增加至一〇・一%。另一方面輸入額中，茶的價格的百分率，由一九二七年度之一三・三%減少至一九三四年度的六・六%。此外蒙古人民對於新式的服裝和糖菓、廚房及家庭用品等需要却激烈地增加了，都市方面、裝飾品、香料、歐式鞋靴、衣服，文具等等的需要也增加了。和城市建設有關係的，建築材料的輸入增加了。例如，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蒙古人民共和國輸入的水泥，即由二百七十七公噸增加到一千七百七十六公噸，金屬品由七百八十九公噸增加至三千八百六十二公噸。而且由於汽車運輸業務發達的結果，對石油製品的需要也增加了，石油的輸入，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已經增加了十倍以上。

第七節 蒙蘇貿易的內容

在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除了蒙蘇貿易的內容對抗戰中國以物物交換方式大量供給軍火等類之外，外蒙古一直是蘇聯商品在遠東的最大的消費者。第一次大戰以前，俄羅斯對蒙古的貿易，常常是入超的。從一九二九——三〇年度開始，就轉向而為出超了。後來蒙古的貿易狀態，繼續有利於蘇聯，從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到九日期間，輸出五千〇四十七萬一千盧布，輸入一千六百二十四萬四千盧布，出超達三千四百二十二萬七千盧布。

二次世界大戰前蒙蘇貿易實況（單位一千盧布）

	蘇聯對蒙古輸出	蒙古對蘇聯輸出	合計
一九三一年	三七、三四三	二八、八三三	六六、一七六
一九三二年	四一、三九五	一九、二七八	六〇、六七三
一九三三年	三八、五六二	一七、二六九	五五、八三一
一九三四年	四四、八一〇	二〇、五六一	六五、三七一
一九三五年	一一、六三三	七、九一一	一九、五四四
一九三六年	五〇、四三三	三二、一二〇	八二、五五三

依照蘇聯方面的資料，一九三五年以後蘇聯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貿易，是按照金盧布的價格計算的。然而一九三五年則因特別的考慮，輸出入內容，數量方面雖然和往年相差不多，而在價格方面則有了極大的差額。不過就蒙古人民共和國方面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由蘇聯輸入的各項物資，都顯示激烈的增加了。一九三六年由蘇聯輸入的總額為五千〇四十三萬三千盧布，至一九三八已增至七千〇五十八萬四千九百盧布了。外蒙古是蘇聯商品在遠東最大的消費者，同時，蒙古人民共和國又是蘇聯所必要的原料供給地。試看蘇蒙

二國貿易的內容：

外蒙輸入蘇聯主要商品一覽表（已見前）

外蒙輸出蘇聯主要商品一覽表：（單位公噸）

商品名稱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五年
羊毛	一九一三	一九三二
皮革	六、七二〇	五、〇二二
大家畜	一、九二七	四、一四七
小畜	二二、三九五	一八、七〇九
	八、一九三	一一、二二二

依一九三六年度の蘇聯貿易統計來看：

蘇聯對蒙古輸出商品一覽表：

商品種類	數量（單位公噸）	金額（單位千盧布）
澱粉	七、八九五	一、二四七
小麥粉	四九、五四五	八、〇三八
茶	四、二八三	三、一九六
砂糖	六、〇六五	一、五九四
糖果餅乾	一、五八八	二、四四五
乾果	四八一	三四二
牛油	二七四	四九七
煙草類	九七四	二、三三六

第十二章 對外貿易

棉布	二、三〇六	一三八
罐頭	三七九	五、七八二
酒類、酒精	六〇四	三九四
衣類	一五八	七二八
絲織物	六〇	二、二六八
毛織物	六〇	一、四八六
精製皮革	一八八	三九四
麻製品	六一三	一、〇三四
石油類	一四、三七九	九〇四
陶磁器類	九九	二、三八三
橡膠製品	五四	一二四
靴鞋	一四九	二二二
玻璃及玻璃製品	五九五	九九四
電報、無線電器具	二九	二九三
農業機械	二八五	二七六
鐵板、銅板	一、四四〇	一一八
鐵線、銅線	四九五	三三三
日用金屬品	一、二二八	一三五
化學藥品、藥劑	三一二	一、八九三
		三八二

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對蘇輸出；

商品名稱	數量(單位公噸)	金額(單位千盧布)
染料	三三七	三三三
火柴	八五三	四三八
紙類	四七三	一八五
電器機械	一九〇	二八六
汽車、腳踏車	四一八	八一四
拖拉車汽車零件	二一五	八七五
合計	九七、〇二四	四二、七三九
生畜	三〇、二六二	一一、六四〇
製肉	四六〇	三八〇
胃腸	四一	一〇六
獸毛皮	九一	五六六
肉用野禽	一、二七八	一、二八二
皮革原料	四、四七四	四、七七八
羊毛	三、一三〇	七、〇三六
毛髮(麩)	一、九四五	四、六六六
合計	四一、六八一	三一、四九五

一九三七年九月爲止，這一年度的蒙古對蘇輸出，計爲家畜一四、一六六公噸，家畜野禽一、三一九公噸

，肉製品三五六公噸，羊毛一、五二九公噸，據上面引述的魯伊奇克氏說：

「蒙古人民共和國只和蘇聯有貿易關係。蘇聯在蒙古，以有利的條件，供給其不必要的物資。這種特點，是由蘇蒙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深切的友誼與援助而給與的。蘇聯的生產工業長足進步的結果，無論商品等級方面和品質方面，使蒙古人民共和國蒙蘇聯的物資已可滿足國內的要求。蘇聯也買進蒙古的輸出品。」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民經濟，由於貿易國營制和蘇聯的支持，不致遭遇到世界經濟恐慌之破壞的影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營貿易，對於鞏固蒙古民族的獨立，對於蒙古的革命事業，具有偉大的意義。」

第六部 革命過程

第十三章 外蒙古自治運動

第一節 外蒙古怎樣和中國分離

蒙古在被中國支配的二百年間，它的政治生活上，並沒有多少對外事件。北京政府就運用中國商業資本，單純的行政機關，並不怎麼壯大的駐兵，把蒙古民族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給彼得堡的帝國主義者野心家們，對遠東的侵略政策，帶來了不幸的結果。從這時起，蒙古的政治形勢，也開始變化了。帝制俄羅斯爲着抵償在遠東的失敗起見，企圖在中央亞細亞方面有所收攏。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俄羅斯的外交官，開始採取了以蒙古包括在俄羅斯的經濟上及政治上的勢力範圍裏的政策。他們在庫倫、烏里雅蘇台及科布多等地，開設俄羅斯領事館，而莫斯科的工廠主，也派遣商業遠征隊到蒙古去，更進一步又把西伯利亞鐵路幹線和蒙古之中心——庫倫連結起來的計劃，提上了議程。

俄國政府當局，俄國工商界和報紙雜誌，都給關於蒙古的事物記載所吸引住了。結果當然大大地刺激了北京政府。北京政府爲着加強自己在蒙古北部的勢力，也曾經費盡了心機，其中最顯著的，是劃定從巴爾虎草原到蒙古阿爾泰山蒙俄全部國境地帶的土地爲墾荒地區，遷移大量農民到邊地去從事墾殖。北京政府鑒於南滿洲西部中國農民移殖地區農業發達後中國權力與權威同時增強的經驗，計劃在這裏建設起廣大的中國農業地帶，

作爲防止日趨膨大的俄國殖民勢力深入蒙古的壁壘。因此，就在哈爾濱和庫倫設立移民局，專管中國農民移殖蒙古北部的事務。這種移殖政策，在伊羅、哈喇、郭勒、巴音、郭勒等盆地，以相當龐大的規模展開了，這是防止俄羅斯勢力由最短作戰綫——蒙古恰克圖（後營子）到庫倫侵入蒙古的主要防衛障地。

北京滿清政府這種政策，因爲一九一一年的一「辛亥革命」而被推翻了。這種移民實邊兼防俄寇的政策，大體上可說沒有實現。然而，這種大量移民到蒙古北部的計劃，却引起了蒙古人極大的不滿和猜忌，引爲「威脅」蒙古人本身前途的「警號」。當然，大規模的中國移民農業的發達，對於廣大的蒙古民族的畜牧事業，勢必會造成牧場縮小的事實。處在俄羅斯和中國這樣大國之間的蒙古人，到了二十世紀，自然不能再用法即侵略方法去擴張牧場。但是蒙古人認識，在這種條件之下，如果中國農業在蒙古日趨發達，那麼，結果就會引起蒙古畜牧經濟的崩潰，進而不免使民族隨之滅亡。這種心理，使沙皇的外交工作更加輕易地支配了一九一一年的蒙古的革命。這年夏天，喀爾喀族的王公和喇嘛僧，在庫倫召開大會，大會上最主要的也可說是唯一的議題，就是商討中國關於北部蒙古殖民地的計劃。出席這個大會的共十八名領主，陰謀派遣代表到彼得堡去，向沙皇請願，出而保護蒙古人。這些陰謀份子，在獲得沙皇的支持以後，就積極地開始準備「革命」了。

「讓蒙古從中國分離出來」的運動，以非常龐大的規模出現了。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的結果，是滿清皇朝的崩潰，這一事實又給蒙古人的「獨立」運動以法律上的根據。同時蒙古的愛國份子也認爲滿清皇朝顛覆以後，蒙古和中國就用不到再行結合在一起了。因爲蒙古人在十七世紀當時，已成爲滿洲的歸化者，但却不是中國人。清朝存在的末期，對清朝一直維持服從態度的蒙古人，現在，照他們的意見，倒是再度獨立的時候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庫倫舉行了不流血的革命。蒙古人起來強迫清朝的守備隊投降，當時的中國總督躲進俄國領事館。這個大戰，就被轉放在突然蜂起的蒙古的「汗」和喀爾喀四個「盟」的「王公」的權力下面了。並且，開始用「汗」和「王公」的名義，向蒙古人民公布宣言。這個宣言中說：

「我們蒙古自古已爲一大獨立國家。所以我們要求再受古來的風習的統治。從今以後，外國人（中國人和滿洲人），不得再行干涉我國的政治。不問地位如何，拜免中國人及滿洲人的官職軍職及公廨，命令他們立即退出蒙古。」

「關於商人一般居民，不問其民族性如何，可以繼續他們原來所有的居住和職業。我們可以進兵到這裏的唯一目的，就是爲着保護我們的大喇嘛，我們的宗教，和我們人民，爲着維持治安，凡我善良的居民，用不到有什麼恐慌，但是對於威脅我國獨立及擾亂治安的，掠奪竊盜的，就得立刻加以逮捕，從嚴處罰。」

幾天以後，中國官吏爲經俄國南返，在俄羅斯·加薩克保護之下，到了赤塔，清朝駐蒙軍隊也繼續從這裏轉輾返國。

蒙古方面，當即宣示以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的第八世轉生者爲蒙古大汗，至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位。革命後就由五位大臣組織蒙古政府，結合和支配全國蜂起的蒙古人民。

庫倫這次政變，捲起了全蒙古的獨立運動。當胡圖克圖（補格德·甘肯）即位的一天，烏里雅蘇台的中國官吏，也被逼向蒙古軍屈服。一九一二年一月，呼倫·貝爾管區的巴爾虎人，也爆發了起義運動。只有西部蒙古對中國政權的清算，比較的遲緩些。一九一二年五月，杜爾伯特人、喀爾喀人及烏里揚哈伊人，在丹比·強章——奇亞喇嘛的領導之下，集中了五千多人，圍攻中國駐國軍隊。中國軍隊終於支持不住這種頑強的圍攻，在這年八月間向奇亞喇嘛投降，從古欽及夏拉·蘇曼派出的中國援軍，無法到達科布多，這批援軍不得不在離科布多十俄里的地方過冬，到第二年春天碎碎而回。

同樣的，在南部蒙古，大部分蒙古人也表示希望和庫倫方面聯合一致。而當一九一二年夏天及秋天，喀爾喀部隊出現在南部蒙古的時候，烏倫·哲布、伊挨、凱蘇及錫林·郭爾會議，以及察哈爾的大部分，都宣誓對大汗盡忠。

因此，到了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從阿爾泰一直到興京，從西部到東部及南部的鄂爾都斯，蒙古的大部份，實際上已從中國獨立出來，集中在庫倫的博格德·甘肯的政權下面。

第二節 外蒙古的「自治政府」

用武力所取得的，却給不斷的外交所斷送了。蒙古的初期的獨立，大體上就有這種情形。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在沙皇俄羅斯的援助之下，組織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的革命。因此，沙皇俄羅斯就開始着手於這個新國家的國際及政治地位的形成。但是俄羅斯資本，在和廣漠的戈壁沙漠分離的南部蒙古，並沒有什麼利益。所以，當它和中國進行協商的時候，沙皇的外交官只進行關於北部蒙古的協商。他們在北京努力於北部蒙古合法關係的恢復，要求某種限度的自由，即拒絕派駐軍隊和停止殖民地化的政策。最初的協商，沒有獲得什麼結果，「俄羅斯爲了維護俄國在蒙古的利益」，與「大汗」締結直接協定。這個協定的第一條，就規定俄羅斯對蒙古實行下列援助，即「維持業經制定的自治制度，禁止蒙古領土上的中國駐軍及中國人的殖民地化，蒙古保持編練軍隊的權利」。

中國政府爲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協定而不得不妥協，到了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公佈了關於蒙古的「中俄聯合宣言」，並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赤塔市成立「關於外蒙古自治之三國協定」。這個協定，由俄國、中國及蒙古政府代表參加簽字。「三國協定」把自治外蒙古的領土限定爲外蒙古的四個「盟」和科布多管區。根據「三國協定」，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而俄國及中國則相約承認中國領土之一的「部」的外蒙古的自治權。

「三國協定」禁止和外國締結有關蒙古政治及領土問題的條約，但是允許蒙古具有締結關於商業及工業問題的條約的權利。

中國政府根據這個協定，爲了監督「蒙古政府的活動，不侵犯中國的宗主權及中國與中國人民在自治蒙古的利益」，可以派遣官吏到庫倫，並得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及買賣城派遣政府代表。中國商人有免稅輸入商品權利，但不得免除在蒙古境內的課稅。

蒙古在國際上的地位的形成，是以一九一五年條約完成的。但是蒙古民族主義者所希望的全蒙古的獨立，根據這個條約，只限於北部蒙古——外蒙古的自治。巴爾虎及南部——內蒙古全部，仍舊爲中國的領土。

外蒙古自治的最初三年之內，蒙古人民的福利，據說已有迅速的顯著的發達了。他們停止償付對漢人的公債和私債，而「旗」的連帶責任制的撤廢，更加構成了蒙古國民經濟發達的優良條件。

俄國政府曾有好幾次對自治蒙古提供總額達五百十萬金盧布的借款，並爲調整外蒙古的行政及財政管理而派遣特使。蒙古政府裏的俄國顧問，從一九一四年活動到一九一七年，這是俄國借款的一部份的代價。在俄羅斯顧問部的下面，有一連串的俄國專家，不過關於蒙古財政的改革，實行的還不到一半。俄國顧問對於蒙古的中央財政組織，完成了一些準備工作，因爲蒙古各王公不想放棄無統制課稅權，使俄國顧問的整理盟旗預算方案完全失敗。

一九一六年，俄國顧問確定了外蒙古國有財產的管理制度，因此，關稅制度的改革、佃租經濟、森林經營等的整備，也有某種程度的成功。此外，俄國駐問部在一九五至一八一六年間，又援助A·P·維支台領導的探險隊，進行了關於蒙古的自然、歷史、地理及經濟上種種調查，成爲一九一八年的國勢調查的基礎。

第二節 泛蒙古運動和漢人回蒙

俄國在自治蒙古的勢力，從一九一七年起開始衰落。俄國商業資本失去它在蒙古市場上的獨占的地位，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間，他們的勢力已瀕於消滅。反之，中國的政治上的勢力再度增加了。一九一七年一

「大汗」政府在中國政府的壓迫下面，撤消了俄國顧問部。

一九一八年，蒙古高原上出現了新的政治勢力——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是向亞洲大陸擴展勢力，他們企圖把滿洲、蒙古和貝加爾湖畔蘇領遠東，完全推進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日本帝國主義者反對當時「奧姆斯克最高政府」的集中主義，支持外貝加爾的謝妙諾夫將軍的分離主義，提出了結合全體蒙古民族為一國家的「大蒙古」的口號。

泛蒙古主義的理想，是在俄國白黨謝妙諾夫的主謀之下，編成蒙古——布里雅特師團，作為泛蒙古運動的積極的核心，受到外貝加爾的布里雅特知識份子的狂熱的歡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們所發起而由內蒙古著名的胡圖克圖——納伊賽、甘肯主席的「全蒙古民族代表大會」，在赤塔開幕了。參加會議的是內蒙古、巴爾虎、和貝加爾的有里雅特旗代表，外蒙古的代表沒有參加。這個會議，決定建立一個從貝加爾到西藏、從滿洲到東土耳其斯坦的「大蒙古國」。這個會議又起草了未來的大蒙古憲法。規定這個國家承認種族平等，政府的形成，召集包含海拉爾兩太守的代表機關，按照比率原則，編成由各種族合組的國民軍。

謝妙諾夫將軍每月用一百萬盧布給與大蒙古臨時政府，以蒙古的鑛物資源及鐵路建設權等作為担保，締結六百萬盧布的外債，並約定以武器供給蒙古軍隊。會議以最高尊稱「佐伊尼、巴拿」授與謝妙諾夫，以納伊賽·甘肯為首領，組織臨時政府。此外，這個會議在開會之時，又推選特別代表參加班爾薩伊歐會議，但是後來被日本人逮捕了去。日本方面正式代表是鈴木，但是這個會議的實際發起人並為其中心的是謝妙諾夫將軍手下的日本的代表黑木。

可是謝妙諾夫並不如預期那樣履行其約束，日本因為柯爾察克之執拗的反對而召回黑木，因此，泛蒙古政策就顯得非常軟弱了。恰好這時在喀爾喀具有堅強的基礎的中國勢力，為着柯爾察克而並不支持臨時政府，納伊賽·甘肯派遣在庫倫的胡圖克圖的代表也為「大汗」所不容。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泛蒙古運動的發展失望了。由服從日本的安福系軍閥的援助藉以獲得蒙古獨立的企圖，納伊賽·甘肯和日本關東軍直接交涉的嘗試，是完全失敗了。以前一直掌握有華北方面的政權的安福系，認為納伊賽·甘肯和日本關東軍直接交涉的企圖，違反了後營子三國協定的，而表面的理由是派兵到外蒙古。同時，北京政府為着自己的冒險獲得列強友誼的態度，強調了「布爾什維克的危險」。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長對路透社特派員聲稱：「考慮到布爾什維克的傳播和全國動亂的結果，發生了一九一八年西伯利亞的事變，中國不得不注意到和保證北京安全有關的問題。庫倫當局對於這個問題，不僅也和中國政府具有同感，而且為防衛西伯利亞國境而有自行派遣軍隊的必要。若干電訊傳稱，布里雅特在三、四個月之內，即將由B·辛哥率兵三萬，從佛爾夫納烏丁斯克進攻蒙古。外蒙古政府為挽救此種危機起見，非常要求中國派遣軍隊」。

「大汗」政府當然沒有充分的決心。佔有支配地位的蒙古各王公在喪失自治權事件中，表演了最可恥的脚色。政府允許安福派的軍隊進駐蒙古。然而在泛蒙古主義和親華派的鬥爭之下，在庫倫召集的各王公及喇嘛僧的大會，也和泛蒙古派同樣，表示反對親華派的活動。確定自治蒙古對俄國革命戰爭保持中立。但是，當時已被中國白銀收買了的庫倫的當局，忠實地表演了他自己被愚弄的喜劇。中國白銀的力量，比蒙古人民大眾的要求更有力量，一九一九年九月中旬，王公大臣及庫倫的最高當局，向博格德·甘肯稟陳：挽救蒙古脫離重大的政治及經濟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必須內向服屬於中國。這時西北邊疆的中國軍事統帥徐樹錚將軍，為了支持他們的聲明，曾派兵包圍「大汗」的宮殿。「大汗」在兩重壓迫之下，不得不簽名在希望使自己和外蒙古重新變做中國臣屬的請願書上面。當然，這個請願書受到中國方面友好的歡迎。這年的九月底，中國和「大汗」政府之間，簽訂了關於外蒙古廢止自治制度的協定。於是，蒙古政府的內閣宣布解散了，蒙古國民軍也解散了，中國北軍統帥徐樹錚——北京政府大員，以及親日俱樂部「安福系」的領袖之一——獲得全部權力，成為外蒙古實際的統治者。中國軍司令官——徐樹錚率兵北進，揚言「防禦布爾什維克的傳播」而佔領了靠近蒙古國境

的俄國都市後營子。

安福系對外蒙古表面的成功就是如此，但是對外蒙古內部却毫無改善的設施。北洋制度的恢復，使外蒙古人民普遍地激起反感。北洋駐軍的一切費用，都用消耗方式由蒙古人民負擔，外蒙古全部國民經濟都受到不良的影響。而且一般蒙古人因爲一九一一年革命中已經廢止了的對中國人所負債務又見恢復，更由不滿而起來反抗了。

最激烈的蒙古人開始發動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救亡運動」，一九二〇年四月，就出現了一個以解除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爲第一使命的「人民革命黨」。

恰在這個時候，泛蒙古運動又呈死灰復燃之勢。蒙古人民大眾之間又燃燒起全體蒙古人聯合起來的情緒。不過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利用親日的安福系實現他們關於蒙古的種種計劃，對「大蒙古」的「臨時政府」的一切援助已經停止了。後來又因爲中國人的活動而引起的布里雅特之一部和內蒙古軍的衝突，使這個臨時政府爲之解體，總理納伊賽·甘肯被中國人槍斃了。

至此，所謂外蒙古自治運動已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蒙古人民革命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了。

第十四章 人民革命的經過

第一節 反革命的溫甘倫軍

人民革命黨成立之後，開始集合蒙古的革命的新勢力。這個黨迅速地在蒙古人民大眾中間獲得同情。但是，他們的活動，遭遇到上面所說謝妙諾夫的身邊的戰友——溫甘倫男爵所發動的事件的阻止。

溫甘倫在蒙古出現之前，遠東的政治形勢已有顯著的變化。紅軍的勝利，清算了沙皇俄羅斯的帝國主義政策，白軍——謝妙諾夫軍也崩潰了，同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又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奉軍逼迫，然而親日俱樂部安福派後來也終於沒落了。

這種新的政治形勢，使一向以蒙古為侵略活動中心的日本帝國主義，不得不轉變政策，並爭取適應這種新形勢的勢力，為他們侵略大陸的工具。在蒙古和一部份伊屬遠東的這種勢力，就是被紅色游擊隊所追逐而退却到軍臣汗盟境內的溫甘倫軍。日本立刻放棄對蒙古的安福系的政權的政策，改派特務首腦人物到溫甘倫參謀部去當軍事及政治顧問。早在一九二〇年開始被謝米萊契氏所粉碎的杜特夫將軍及安南柯夫白衛軍的殘部，經過準噶里而出現在蒙古，在柯索戈爾的南岸，集中白色特溫金薩克。這些份子，當溫甘倫在蒙古出現的時候，就劫掠了中央合作社聯合會和溫甘倫軍結合，向東部竄擾。

溫甘倫軍有四千名俄國兵和二千名中國馬賊，沿軍臣汗的草原，經過長途的艱苦的行軍，向庫倫進攻。然而溫甘倫最初的進攻，給早已聞訊而準備好了的中國人打敗了，在庫倫以東一百俄里的地方給打退了。溫甘倫就提出蒙古獨立的口號，噓聚軍臣汗蒙古人。獲得這批生力軍之後，他就再度猛撲外蒙首府，把出擊的中國軍隊粉碎了，於一九二一年二月進兵庫倫。他在進城的時候，趕走了猶太人和中國人的集團。差不多同一時期占領科布多市的安南柯夫將軍，就和溫甘倫軍勾結起來。因此，不久之後，差不多外蒙古全境也都進入俄國白衛軍的掌握了。

從這時起，庫倫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特務部隊和俄羅斯白衛軍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據地。溫甘倫眼看西歐方面的革命的進行已經毫無遏止的辦法了，在心理的苦悶之中，就企圖以外蒙古作為恢復王位，並和遠東區革命軍對抗的一環，而提出了復興清朝的方案。

溫甘倫將軍在對蘇維埃軍進攻而從庫倫出兵的前夜，曾經寫信給自己派在北京的代表說：「為着和共產主

義者作戰，給與部隊及人民以堅強的決定的刺激，全看我的成功與否而定。當我看到在俄國抬頭了的運動的計劃性的時候，我要站在這些良善而忠實的人們的運動的前頭。我要促成清朝的復興，使我的行動達到蒙古及其同盟的各省，我要在這裏放出和革命鬥爭的手段。無論在道德上、在技術上、在經濟上，被破壞的俄羅斯的將來是可怕的，可能有誰也預想不到的結果。」

溫甘倫慎重地注目到遠東的一切，他拉攏博格德·甘肯，在組織「蒙古國民同盟」中，廣泛地利用了他的名字和權威。「同盟的宗旨——溫甘倫寫道——一方面要把蒙古所有全體人民中的中堅分子結束在它的周圍，造成一個核心；另一方面，無論在精神上或肉體上，完全擺脫陷入革命的瘋狂和道德的沒落的西歐式頹廢的影響，造成軍事的和道德的壁壘。這種事業的第二階段，要在「亞細亞人的亞細亞」——創造中和的蒙古王國這個口號之下進行。所以，不能不耐心地特別強調：復興曾經對蒙古人有極大貢獻的具有歷史光榮的清朝，把中國從革命動亂之中拯救出來。」

溫甘倫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給張泰將軍的信函中，曾經提議集中自己的努力於張作霖將軍的一般的領導之下的「專制君主的復興工作」。溫甘倫寫道：「想到歐洲方面的沙皇復辟問題，由於歐洲學問道德的頹廢，結果人民為社會主義思想而發狂，所以沒有什麼特別意義。而與中和的王國（中國）及 人民接觸，一直到裏海一帶人民，復興（君主）則大有可能，所以應當在這裏展開俄羅斯君主復興的工作。」

這就是這個半封建的男爵的夢一樣的政治綱領。當然，特別是在開始的時候，在蒙古人民某種階層，曾經獲得成功。但是人民迅速就和溫甘倫分離了，因為溫甘倫在滯留蒙古的期間，為着和蘇維埃俄羅斯進行鬥爭，實行殘暴的掠奪、殺人、暴行、徵發及勳員，使蒙古人的忍耐達到最大限度，因此蒙古的政權，開始了向人民革命政府轉移的準備。

第二節 民族革命的成功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當外蒙古停止自治政治的時候，蒙古人民革命黨已經開始鞏固自己的基礎，努力從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把蒙古解放出來；並使蒙古國家實行民主主義的改造。人民革命黨的創設者，是一個排字工人出身的蘇海·巴都魯，和平民（阿拉特）出身的抄寫員鄧強，曾經以喇嘛而在蒙古著名的政論家鮑德及喬巴山（即現任總理）等等。後來追認為蒙古人民黨第一次大會的人民革命黨員第一次會議，是在男爵溫甘倫將軍占領庫倫之後不久就舉行的，這個會議的出席者二十三名，差不多全部是屬於平民（阿拉特）階級的。這次會議決議在「獨立民主主義蒙古萬歲」「蒙蘇同盟萬歲」的口號之下，掀起蒙古解放的革命鬥爭。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在恰克圖選出「蒙古臨時人民革命政府」，其構成人員為：主席却哥爾查帕，內政兼司法部長班利克·薩伊哈納，陸軍兼蒙古人民革命軍總司令為蘇海·巴都魯，財政部長賴索拉。

人民革命政府向蘇維埃俄羅斯政府提議，以蒙蘇聯合行動對付溫甘倫白衛軍。溫甘倫白衛軍在蒙古對於當時尚為「緩衝的」遠東共和國，準備新的攻勢。後來成為蒙古人民革命軍的蒙古革命家的游擊部隊，把中國駐軍從買賣城趕走了，人民革命政府把買賣城改名為阿爾特因·布拉克，為其軍事的及政治的根據地。溫甘倫的軍隊趕到貝加爾湖畔的鑿道，把它破壞了，企圖切斷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和遠東共和國之間的交通，而向塞爾特爾·米索伐亞進攻，但是被紅軍澈底地擊破了。接着，蘇維埃軍和蒙古人民革命軍從阿爾特因·布拉克（買賣城）開始向庫倫進攻。溫甘倫軍連戰連敗，至七月六日，蘇蒙聯軍進占庫倫。乃進而掃蕩白衛軍部隊的殘餘，至七月二十二日，溫甘倫男爵被捕。實際上是被他自己的戰友所出賣的。

被粉碎了的溫甘倫軍的殘餘，逃到滿洲方面，曾經受到東北軍統帥張作霖大帥的收容。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占領庫倫以後，為着肅清佔領區內的白衛軍殘黨，向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邦

政府提議，在蒙古未得完全解放以前，締結條約，使蘇軍暫不撤退，在科布多管區方面，對個別部隊的鬥爭特別拖長。白匪巴克查、卡桑哲伐、卡伊哥羅德伐等等，時時進襲從科布多管區到阿爾泰區邊境地帶。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以特別通牒要求蘇俄政府為共同利益而留駐紅軍在蒙古境內。

蘇聯政府對蒙古政府這種要求，答復如下：「為考慮西伯利亞國境的安全，特派軍隊至科布多管區，但是一到威脅蒙古新制度的危險解除以後，蘇軍當立即撤退」（按：蘇軍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實行從蒙古撤退）和白衛軍部隊的鬥爭及肅清運動，是在蒙古的酷寒的氣候不良的道路及其他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進行的，到了一九二二年，白衛軍已被從外蒙古全境清掃出去了。

第二節 民主建國的開步

肅清了白衛軍之後，蒙古革命運動的新任務是民主建國的各種任務，一九二一年三月，人民革命黨通過了這樣的決定：

(一) 確定使人民從封建主義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法律，實行(甲)國民皆兵的義務，凡非在喇嘛廟服務的喇嘛僧，亦概不免役；(乙)一切身分在普通審判及審判部行政處分之前，刑罰一律平等。

(二) 制定對於一切身分之課稅平均化的法令，並促其實現。

(三) 對於具有向國民徵集喇嘛廟經費之權的封建神權的財產，制定利得稅的法律，並促其實施；但課稅率絕不得超過蒙古人從中國人及溫甘倫政權下解放出來以前的比率

(四) 制定廢除農奴制，並由舊農奴制畜牧業建設國營畜牧業的法律，儘速促其實施。

(五) 為保證人民政府與全國人民的結合，並使廣泛的勤勞大眾對國家事業的壓倒的影響，召集以廣泛的大眾為基礎的「小呼爾登」(小國民會議)，「小呼爾登」為具有立法上動議權的諮詢機關，其活動至召開一

大呼爾登」(大國民會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爲止。

(六)在「小呼爾登」召集以前，應即行制定有關「旗」自治的法律，並促其實施。

(七)地方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政府公佈的法律之實施有反對行動的，應進行毫不姑息的鬥爭，並整肅地方行政機關，爲此目的，當確定關於「旗」及「盟」政權代表者之職權及政府方針實施之遲延原因的逐日報告制度。爲着同樣目的，確定違犯此種制度的懲罰人及其辦法。

(八)實行立憲君主制度，呼圖克圖的權力繼續保持，但同時尊重人民權利，呼圖克圖的政權沒有否決權，政府應與小呼爾登及大呼爾登，制定法律，通告呼圖克圖實施。廢止區會議直接向呼圖克圖報告的權利。一切報告都須經過政府，政府通過後始可施行。一切法律，都用政府及人民的名義公佈。宣戰、講和及預算決定權，屬於小、大呼爾登及政府。

由此可以看出蒙古人民政府所施行的國家管理組織的改革，人民革命黨在蒙古政治上的使命和意義。

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剝奪了庫倫的博格德·甘肯的實際的最高權力，然而在法律上，死滅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變形，依然存在，繼續領導蒙古國家，形式上，蒙古還是神權專制君主國。博格德·甘肯類似「地上使徒彼得的中世紀的代理人」——羅馬教皇一樣的人物，在蒙古具有最高的政權和教權。不過實際的全部政權，却屬於後來改名蒙古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政府。博格德·甘肯只是有名無實的統治者。

博格德·甘肯從來未曾實現其作爲國家元首的權力。從蒙古一脫離中國之後，一九一一年起，已由博格德·甘肯之妻指導的最高喇嘛構成私幕而攫取實權。(註：依據佛法，禁止喇嘛有妻室，但是，博格德·甘肯改革了這個戒律)。這個私黨的支配權，幾乎沒有什麼拘束。

一九二〇年，是安夫伊斯坦占領蒙古和溫甘倫軍統領時代，博格德·甘肯名義上仍爲蒙古的元首，具有相當的名譽。然而實際上的國家的支配權，却在統領手裏，他們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監禁蒙古政治及宗教上的支

記者，使他作必要的處置和強迫他簽名在一定的文件上，而毫不受任何拘束。

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以後，立刻爲派定人民代表而採取各種方案。小呼爾登就是最初的方案之一，是蒙古民主政治史上第一個全體人民的代表機關。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蒙古人民政府制定小呼爾登選舉法，根據這個法律，「旗」的代表由盟及「夏賓」政府服務者——老練賢明的王公中各選出一名，又從各盟及「夏賓」治下選出官吏書記或平民中有教養者五名。這六名之中，五名屬於平民，另一名則由王公中選舉出來。

選舉法第三條規定：蒙古人民革命黨、外交部長、各派一名，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三名，各軍單位一名，推派爲議會代表。臨時議會的構成，由各部部长參加，此外議會中亦可由庫倫的王公及喇嘛僧而未負國務責任者參加。

呼爾登的一切決定，統由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投票的大多數才能通過。投票贊成與反對同數的場合，但議長有投票表決之權（第十三條）。小呼爾登爲預備議會即臨時代表機關，所以它的決定並不是最後的決定，它所討論通過了的問題，應再由政府全面的審查而決定之。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召集「呼爾登」，但直到十一月一日，從各地到達庫倫的代表爲二十五名，不足「呼爾登」名額的半數。這次呼爾登討論蒙古人民政府關於建立爲中蒙間相互關係調節者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一樣國家的要求，並討論這個政府的對外政策。關於內政，呼爾登承認政府方針的正確，強調了全力維護蒙古人民所獲得的獨立的必要。呼爾登又決定撤廢王公及喇嘛賦課給人民的貢物制度。

一九二二年初的小呼爾登，就這樣完成了它的工作而閉幕了，在閉幕的時候，提出了成立一個常設代表機關，召集大呼爾登的要求。

第四節 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形式上初由博格德·甘肯爲國家元首的蒙古神權君主政體，雖然繼續保存，然而，關於共和制支配形態的確立問題，是早經決定了。人民革命黨及政府的領導者，一方面承認作爲蒙古佛教徒之信教的支配者——博格德·甘肯的權威和勢力，另一方面，在國家制度問題上爲了不給與遭受篡奪之責難的口實，關於這個問題，決定延展到召集大呼爾登的時候。

到了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這份最後的蒙古神權君主，因爲荒淫過度而死了，因此，傀儡式的君主政體也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了。人民政府根據人民黨中央委員會事務局及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的決定，實行下列辦法：

(一) 博格德·甘肯的靈柩，移交政府保管；(二) 不以大總統爲國家元首而實行共和制度，最高權力賦與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會議）及其所選出的政府；(三) 以每年六月六日爲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蒙古國家創立紀念日；(四) 「大汗」支配的年號，從這時開始改稱爲蒙古國家第十四年。

蒙古已經由神權君主政體轉變爲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了，人民政府這種重要的決定，完全把握住早已成熟的政治形勢，所以蒙古人民各階層中沒有什麼反抗。

關於大總統的問題，並沒有發生重大的意見上的對立。蒙古的輿論界都重視中國大總統制度的失敗的經驗，他們看到袁世凱的陰謀，違反人民意志，以暴力而爲中華民國的大總統，後來又自行宣言爲皇帝；這一幕醜劇和悲劇，他們不希望蒙古重演，所以一致反對大總統制。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宣言，後來在大呼爾登的熱狂的歡呼中通過了。

關於內政，人民政府實行地方自治制。依據這個制度，凡年齡達十八歲的蒙古人而未受審判，夫有肉體及

精神上的缺陷（雙啞、智力薄弱等）的，不問身分如何，在「旗」自治體選舉之際，都有在自己的選舉區投票的權利。經過一千多年的發達過程而形成的「旗」，仍舊為基層的行政、政治單位。旗的境界，依照政府關於地方自治制的法律，規定以包括五百以上二千以下游牧民戶與人民之自然的生活條件而定。

「旗」的自治的使命，在於國 財產的保護、軍事教練、審判、行政活動、道路之修理、橋梁架設、渡舟之維持及其他行政的經濟機能之執行。地方「旗」自治經費，規定從全國稅及收入中承受百分之十至二十。

在一九二四年當時，外蒙古全國共有一百二十四旗，其中一百一十個是喀爾喀和科布多的「旗」，十三個是僧侶王公的「夏賓」。

所有旗及「夏賓」旗是和蒙古國家行政制度中的上層單位「盟」（阿伊馬克）相結合的。其中孟達爾、哲魯克、烏生斯基、博格德汗、烏里斯基汗、亨地、及塔什爾、汗各盟，屬於喀爾喀部，而杜爾伯特、阿爾泰、烏梁海盟屬於科布多管區。旗的首長，曾經長時期由世襲的旗主，以「旗公所」實行旗的專制的統治。（只有科布多管區有一個啟奇特旗的小旗，從二百多年前已實行「共和的」統治，不顧「大汗」政府的反對，實行王公的選舉及更迭）。「盟」的首長，為盟代表會議的議長替爾金·達爾格，以前也有「汗」的稱號。在最後的改革以前，在法律上由世俗的及信教上的王公會選出，實際上由庫倫政府指定。

蒙古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宣告成立。以後自八月四日至三十一日，舉行第三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首先揭示外蒙古為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口號，決定向社會主義施政邁進。政府在這裏立刻準備召集第一次大呼爾登，完成制憲會議使命。這個會在十一月八日召開，二十六日通過新憲法，規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根本任務，在於廢除封建制度的殘餘（第二條）一切，土地、地下富源、森林水泉等，為一般國民所公有，不承認私有權（第三條第一項），取消外國人霸權時代以連帶責任而對外國高利貸所負有的個人及政府的債務（同上第三項），把經濟政策集中於國家之手（第四項），為解放民衆，確立民權，以實施對外貿易之國營，

列爲解放國民大眾的條件之一。

然而，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必須經過對左右極端派進行的艱苦的鬥爭。

第十五章 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成功

外蒙古從一九二一年脫離中國之後，和蘇聯的關係立刻引起遠東各國的注視。同時又因人民革命政府採取了肅清封建神權支配以解放游牧平民的政策，引起了國內舊勢力的反感。因此，國內的封建神權派，和國外的帝國主義——從中國軍閥、帝俄餘黨到日本軍部法西斯，彼此勾結起來，從蒙古內部發動叛亂活動，提出了反蘇反共的口號，以圖恢復和人民大眾爲敵的舊秩序。因此，肅清這些反革命勢力，是保障蒙古人民革命的果實首先必要的工作，而蒙古人民革命軍，在這裏終於完成了這一重大的任務，鞏固和發展了人民共和國的勢力。

第一節 建國初期叛亂的肅清

(一) 鮑德之亂的肅清(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

蒙古人民革命軍入庫倫後，人民革命政府即由恰克圖遷到庫倫，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的事。第一任內閣的總理，就是人民革命黨的首創人之一的喇嘛鮑德。

新生的政權是革命的政權，它的政綱政策，當然引起了舊勢力的不平。他們用種種方法企圖推翻這個基礎尚未穩固的革命政權。從一九二二年冬天到一九二二年間，這種掀起政變的陰謀給揭發了，鮑德等五十餘名重要份子一齊被捕和鎗決。

這是一九二二年九月間的事，政府公布，他們「曾謀推翻人民主權，企圖依照蒙古歸屬於中國的方針，恢

復舊貴族政治」，指摘他們和美國領事，中國軍閥及俄羅斯白軍有秘密勾結關係。

這一檢舉，是代表急進派勢力的蒙古革命同盟的第一件功績，他們在陰謀實施之前打斃了陰謀派，使新生的人民政權獲得較長的時間來鞏固自己。

(二) 薩西喇嘛之亂的肅清 (一九二二年)

在鮑德陰謀事件前後，烏蘭可姆(舊科布多，即烏布薩盟公署所在地)喇嘛又起而叛亂。

薩西喇嘛是西藏人，爲了反對人民政權政教分離的政策，在一九二二年動員了二百多名喇嘛，提出「擁護法燈」的口號，向盟部衙門請願，要求政府允許喇嘛教自由活動。這年冬天，更進而以砲火攻襲盟部衙門。

他們這種叛亂，在一九二三年春就給政府軍鎮壓下去，二月，薩西喇嘛及其他參加叛亂的高級喇嘛，被判處相當的刑罰。

(三) 霍希烏·夫里揚暴動的平定 (一九二三年)

薩西喇嘛之叛亂平靖後不久，一九二三年的春天，又有居住在東部肯特盟的霍希烏·夫里揚的喇嘛百餘名，要求保障寺院財產，發起暴動，包圍盟公署，但不久即被肅清。

(四) 鄂羅第戈爾之亂的肅清 (一九二三)

一九二三年，由肯特盟北部到布里雅特共和國南部方面，又發生叛亂。以布里雅特蒙古流亡封建貴族爲中心，和喀爾喀蒙古人聯合，集衆二千餘人，提出「打倒革命政府」「復興清代蒙古」等口號，實行武裝暴動。叛軍攻占索蒙公所，包圍盟公署，一時聲勢浩大。但是這種沒有獲得平民大衆擁護的運動，不久就被肅清了。

(五) 鄧桑之亂的肅清 (一九二三——二四年)

鄧桑氏，本來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首創者之一，革命政府成立時出任財政部部長等重要職，鮑德陰謀事件後

，他曾被任爲人民革命軍總司令、人民革命軍政部部长等，是所謂穩健派的人物。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鄧桑在中蘇協定之時，到北京去，對於蒙古的政治組織問題，和中國北京政府有所洽商。

第二年五月，因爲活佛逝世，人民革命黨內部，發生了立憲君主政體論的鄧桑一派及共和政體論的左翼青年派的對立，六月三日，終於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國，鄧桑一派乃進而陰謀推翻革命政府。但是這個陰謀也在事前被破獲了，這年七月，鄧桑以下各主謀者被捕，判處死刑。

蒙古人民政府的公布說：「鄧桑與漢人同志通謀，與中國軍閥首腦勾結，在其陰謀援助之下，推翻人民政權，企圖建立一個從屬於中國的國家。」

(六) 布里爾普陰謀分子的肅清 (一九二五年)

布里爾普，是科布多方面的大喇嘛，爲了維持封建神權，和外蒙各地的喇嘛勾通聲氣，企圖擁護中國及西藏的班禪呼圖克圖的政治勢力，祕密推進恢復喇嘛教政權的運動。然而也在事前 (一九二五年) 暴露，當教徒三百餘人擁布里爾普而叛亂的時候，立刻遭遇有效的彈壓。

這一叛亂的直接動因，是這一年第二次「大呼爾登」通過了撤消「廈比」(宗教政府)的特權、及規定喇嘛有收稅義務等決定。

(七) 科布多·烏布薩西部叛變的平定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一九二五年，蘇聯紅軍全部退出外蒙古。當時則有烏里雅蘇台·霍登伽希拉汗「達蘭加」(市長)，一位老貴族，是主謀乘機發動叛亂，掀起了科布多和烏布薩戈爾兩部王公喇嘛的叛亂。

從一九二五年底到一九二六年，這位姓名不詳的市長，把舊科布多所轄的上述二部和新疆方面一部分貴族團結在一起，標榜建立「大蒙古帝國」，興兵叛亂。然而新疆方面沒有大規模的行動，蒙古方面這個市長被捕

鎗決 各地叛軍也就雲消煙散了。

(八) 鄧巴克德爾第·第鄧巴叛亂的肅清 (一九二七——二八年)

科布多方面動亂之時，各地右派都會陰謀策應，發生戰爭流血衝突，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因為人民革命黨的右派領袖鄧巴克德爾第（當時的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長兼革命青年同盟中央委員長）及第鄧巴（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兩人的失敗，這種右傾反革命暴行，不久就被肅清。

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七次人民革命黨代表大會上，左派起而指摘上述兩位領袖的右傾錯誤，有利於反革命份子的活動，結果被指派到蘇聯去學習，後來鄧巴克德爾第於一九三五年客死列寧格勒，但第鄧巴氏的名字也沒有提到。

(九) 艾蘭格頓·達克巴喇嘛叛亂的肅清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三月，留居首都烏倫巴都爾市的兩位大喇嘛——艾蘭格登及達克巴，和烏蘭柯姆地方的喇嘛勾結，以寺廟為根據，反抗政府軍。但是，到了九月底，就被肅清，主謀犯大喇嘛三十多人判處死刑。其中有一個是三音諾顏汗的台爾瓦爾呼圖克圖，被脫逃到內蒙古。

(十) 薩伊溫台特呼圖克圖事件 (一九三一年)

留居阿爾杭愛部的薩伊溫台特·亨布·呼圖克圖，在蒙古全境負有聲譽，為一般人所尊敬。當上述叛亂發動之前，他曾由鄉里到庫倫市，向政府當局警告，如果繼續彈壓宗教勢力，就會激起危險的事變，要求立即停止反宗教運動。政府方面曾一度把他扣留，但是他後來再三再四向政府諫勸，不意他在一九三一年，被汽車軌傷致死，一時民間嘩然，反革命勢力擬乘機發動羣衆，推翻人民政府，但是沒有造成叛亂。

(十一) 德布欽·薩思波將軍叛亂的肅清 (一九三二年)

參謀部的德布欽·薩恩波將軍是反蘇派的領袖，他在一九三二年初，從烏倫·巴都爾回到故鄉烏布爾·杭愛部，秘密和各地反革命份子勾結，積極準備叛亂。

這年五月，他和烏布爾·杭愛，阿爾·杭愛，烏布薩·戈爾，薩布汗各部，即舊科布多及三音諾顏汗的西部地方的舊王公喇嘛勾結成功，動員了一千多的兵力，企圖一舉而圍擊首都，實行政變。政府軍進行惡戰苦鬥，三個月之後，終於在八月間把這一次叛亂平定了，薩恩波本人也被俘，於一九三三年春被處死刑。

(十二) 薩恩基·德爾第喇嘛陰謀的肅清 (一九三三年)

在反革命派動亂的時期，一九三〇年會和艾蘭格頓喇嘛等勾通的薩恩基·德爾第喇嘛等秘密從事擁護法燈運動，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和班禪呼圖克圖之間的機密文件給人民政府的內防處查到了，就把通謀的五個大喇嘛一併拘捕處刑。

(十三) 蘇恩溥等陰謀的肅清 (一九三四年)

蘇恩溥，曾經是人民革命黨工業中央會主席，曾任政府要職，由於右傾反動思想，於一九三〇年秘密和各機關首腦及知識份子，合謀推翻革命政府。

恰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他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積極準備大規模的反革命運動；推進從中央部到肯特·特羅加特各部和偽滿洲國合 的運動。一九三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內防 發現這種陰謀，把陰謀首腦四十五名，其中包括要人三十六名，在首都公審，判處死刑。

(十四) 貢卜伽普縱火事件 (一九三五年)

和上述動亂有關的，是「工業家同盟」的首領貢卜伽普縱火事件，他在一九三五年，把首都羊毛倉庫裏所裝滿的預備輸出至蘇聯的羊毛，用石油燃燒淨盡。

這一事件，包含着相當嚴重的反革命陰謀，企圖搗亂新蒙古的經濟及貿易制度，所以不久之後，他和他的 一派，都被逮捕處刑。

第二節 初期叛亂及其肅清的總結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設初期這一連串的叛亂陰謀，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和我們上文所會述及的經濟和社會上的根據具有密切關係的，主要的是：

第一，在經濟根因方面，因為蒙古的經濟結構的基本形態，是畜牧經濟，其特徵是游牧經濟生活的流動性，城市和農村的定居生活仍未發達，國民和國家的主要財產是家畜和牧地；因此，私有財產觀念還是非常陳舊的。和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業已擺脫封建桎梏不同，這裏封建勢力相當強大，他們依托長期遞嬗下來的王公貴族制度和以喇嘛寺院為中心的神權制度，束縛和剝削那些散居及游牧在大草原上的牧民大眾。當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以後，他們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則是把大多數國民的勞動牧民從這種封建經濟桎梏中解放出來，逐步廢除各種以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制度，因此引起了這些利權的獨佔者的反抗，他們還能用一切辦法進入革命政府及勾通革命黨人以謀完成其企圖。

第二，在社會的根因方面，經過長期的滿清王朝的愚民政策，蒙古社會各階層間對於喇嘛教具有迷妄的信念，喇嘛教的宗教勢力，在滿清時代發生了使蒙古民族文化與革命的戰鬥精神衰弱的作用，甚至使蒙古民族人口為之日益減少，因而便利異民族的滿清王朝的統治。這是對外的一方面。同時對內，更主要的是他們集中了極大的財富，利用宗教的名義，掩護他們對廣大游牧民衆的剝削，並利用以鞏固封建政治制度。當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逐漸地剝奪去喇嘛在蒙古政治上的地位，進而削弱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因此，每一次叛亂，都有上層喇嘛活動的影子。

第三，是外國侵略者的策動。（這一層留在下節詳述。）

封建勢力在崩落的過程中，並沒有放棄他們無效的掙扎的企圖，而且用種種狡謀惡計來打擊人民革命政權

，然而，這一切是徒然的。一方面：歷史是前進的，決不能後退，另一方面：羣衆在人民政權的理論和政策的實踐中覺悟了，他們不再跟舊的反革命勢力跑了。同時，人民政府集中了全國人才和全世界民族與民主革命的智識，善於揭發和撲滅反革命的陰謀和叛亂。上面這一切事實，就在替我們證明：一切違反廣大羣衆的理想和利益的罪惡行爲，不管你利用怎樣誘人的名字，都不能掩飾過去，而要受到無情的打擊的。

第二節 有組織的反革命勢力的肅清

(一) 反革命勢力的國際背景

然而，國內反革命勢力在沒有從根本被肅清的時候，他們是決不會放棄最後的反抗的可能的。同時，國際帝國主義野心家，爲着爭奪殖民地權利，也堅決地企圖利用殖民地國家的反革命勢力，製造這些國家內部混亂，從而取得支配的地位，完成他們帝國主義的政策。

這種歷史的鐵則，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向獨立與繁榮適進的途中，也無情的反映出來。蒙古國的反革命勢力，當他們瀕於崩潰的末日之際，他們不惜一切去拉攏國外帝國主義者，甘心做國外侵略者的先鋒。

蒙古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一切反革命活動，幾乎完全以帝俄及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中國野心軍閥的陰謀爲背景的。但是更明顯的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後，以日本帝國主義爲主的策動，蒙古的反革命階級，爲了保存自己這個瀕於滅亡的剝削階級的權利，不措利用一切勢力，不惜用賣國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因此可以從容地驅使這些反革命派的統帥和將軍們。

(二) 一九三四年的叛亂及其肅清

爲着以「滿蒙政策」爲「大陸政策」的初步實踐，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製造了偽「滿洲國」之後，立刻活動製造一個偽「蒙古國」。

國內反革命勢力在獲得國外的支持之後，立刻進行有組織的叛亂的行動。他們會經定期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烏倫·巴都爾，貝音·土曼，泰姆斯克等地發動叛亂，約定彼此連絡呼應。

首先，在京城烏倫·巴都爾方面，十一月十四日，即有蒙古騎兵團長巴太馬也夫，司法部長貢卜馬太馬伊夫及醫學博士那拉薩林等反蘇反革命份子，煽動外蒙古軍隊的一部份及平民約八百五十人（一說二千人），襲擊首都各機關團體，殺死蘇聯顧問及「猶太人」二十八名（其中女子六名），另有蘇聯國籍職員十八名遇害，蒙古革命政府及各級機關人員頗多遇害，反革命份子即謀盤踞京城，為全國叛亂的中心。

經過激烈的衝突之後，反革命份子終於十七日起居於劣勢，二十一日而全部鎮定。當時且傳稱，蘇聯於十七日起出動飛機三架，及紅軍六百，由恰克圖急駛首都，援助政府軍，所以把叛亂迅速鎮壓住了。

結果叛亂的首領巴太馬也夫團長等三人被鎗決，貢卜馬太馬伊太，那拉薩林等被捕監禁。十九日又有失敗將領帶了蒙古軍三百名及飛機七架企圖逃亡，也被截殺。首都各機關立刻恢復工作，再由人民革命軍保衛。

當首都發生事變之日，反革命派預定同時在其他各主要城市發動叛亂，貝音·土曼也積極準備了。幸而人民革命軍事前增駐騎兵三百，飛機四架，戰車及裝甲汽車等三十輛，所以市內得以無事，只有從達烏利西到貝音土曼途中的蘇聯要員四名，在這時被害。

泰姆斯克蘇姆方面，反革命份子也在十一月十四日發動叛亂，殺害蘇聯軍官三名，但經首都方面增派飛機，戰車及機關鎗隊前來，十八日即告無事。

中央及東部方面的叛亂，就這樣迅速地平定了，西部方面，反革命者也同時進行暴動，破壞各種機關，但也在幾天以內就平定了。

同一時期，在蒙古各地發動叛亂，其為有組織的陰謀，是不言可知的事。而反革命者之具有國外背景，也在事後的審問中暴露出來。但是，由於：第一，反革命者並沒有廣大羣衆的支持，而叛亂首領部下的軍隊也不

願爲叛徒作戰，所以崩潰得很快，第二，是由於蒙古廣大平民階級，是擁護革命政府的，他們不但不會跟反革命派跑，而且積極參加了政府方面，和反革命派作戰。第三，由於人民政權早已向羣衆提示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蒙古的野心，防範帝國主義者勾結國內反革命派的活動，所以當叛亂發生時，黨政軍民一致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給反動者以有力的反擊。

(三) 一九三七年的叛亂及其肅清

但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東北及華北方面侵略活動的沒有遭遇到有力的打擊，由於國際上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綏靖」妥協（如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造成了歐洲緊急局面，在蘇聯，由於國外局勢而發生了肅軍事件，因此在客觀上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蒙古反革命派的氣焰，同時也使革命中某些份子發生動搖，因而，必然地鼓舞了反蘇反共的陰謀。在一九三七年，當日本對中國準備全面進攻的前夕，他們在外蒙古製造更大的一次叛亂。

參加這一次大叛亂的，有前任總理耿都溫，國防部長台米德，國防次長達里第亞普，參謀總長馬爾弟，國防部政治廳長羅特沃契爾，第二軍團長鄧巴，總理阿摩爾，外長桑波等及其他主要人物，包羅外蒙所有政治軍事各界巨頭，形成一個龐大的陰謀集團。當一九三七年六月蘇聯開始治肅軍，是年七月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中國大舉侵略的消息傳到外蒙之後，這一批平常站在人民革命立場的巨頭，竟暴露出他們的動搖的意志，彼此開始秘密合作，準備改變外蒙政制的運動。

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候，陰謀案中的主角之一——台米德元帥因接莫斯科電請赴蘇，而日本間諜怕他洩露秘密，設法把他毒斃，結果，他在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中暴死，另一種傳說，是他看見情急而自殺的。接着，耿都溫等上述各主要人物，以及各地參加叛亂陰謀的重要份子，也同時被捕下獄。先後被捕的及處刑的叛亂首領，據日人公布，包括：前任總理耿都溫，國防部次長達里第亞普，參謀總長馬爾弟，軍政治部長羅特沃契爾，

第一軍團(首都防區)長索索霍魯魯，第二軍團(貝魯士曼區)長露巴，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師團長，外長桑波，工商部長明德，衛生部長烏爾迪巴德，教育部長巴泰摩特爾，司法部部長重德薄，納蘇準，汗波喇嘛達姆丁·汗波喇嘛，孟喬希爾·呼圖克圖，羅布遜哈伊希克喇嘛(以上第一次檢舉)，內防處長官拿姆薩拉伊，商業合作社長拿姆哈伊迪亞斯倫，德羅加特盟黨祕書長米希第渥，教育部長希姆·鄧比(以上自一九三七年秋至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又逮捕總理阿摩爾，財政部長特波幸，經濟部部長德爾第等。

由於革命政府政策的貫徹，地方政治的首領也實行澈底的更迭，當時十二個盟(略等於省)長官中有九個盟長及副盟長，十一個盟工商局長，十一個盟中央合作社長，十個盟黨本部書記長實行調任，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動搖份子及反革命份子，一律加以肅清，以期在狂風暴雨般的遠東大局中，可以巍然生存和繼續發展。

當叛變主角之一的台米德元帥暴死之後，八月三十一日起，開始實行肅清運動。十一月起，政府一方面廢除台米德元帥所規定的法規、公文，焚燬關於讚揚他的宣傳品，一面明白宣布，凡是違反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行動，都有助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構成日本第五縱隊的罪名。所以蒙古台米德元帥一派之以通謀敵國日本而加以肅清，大體上的情形，和蘇聯杜哈乞夫斯基元帥一派之以通謀德國罪行而被肅清，恰恰相似。台米德元帥和軟都溫，都是在外蒙古曾受各方信仰的人物，大眾崇拜之如神，並敬之如親，但是當他們的行為發展到有利於敵國日本帝國主義者而危害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生存與安全的時候，他們立即遭受到排斥。當時政府對於他的批評是：「台米德未能擺脫資本主義的殘渣，並再度和資本主義國家通謀，企圖推翻向非資本主義發展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他的一派，也先後以通謀侵略國家而被判罪。」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事後爲了辯白及洗清自己的罪名，他們曾表示，台米德元帥一派，「完完全是蒙古民族獨立運動者」，「因爲蘇聯害怕蒙古在蘇聯的影響之外，由台米德一派領導向真正獨立統一，所以加以突然的肅清。」

(四)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叛亂與肅清

日本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派在蒙古的陰謀，從此遭受到嚴重的打擊。雖然後來又發生過許多小規模的叛亂陰謀，那已經起不了什麼決定的作用的了。

一九三七年秋天和冬天，首都烏倫巴都爾曾發生小反抗行動，以及反蘇份子的擾亂金融的事件，都很快地平定下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科布多盟境內的哈薩克及烏梁海兩族，有一部分反革命份子和新疆省西部的哈族封建領主勾結，引導他們越境入科布多從事掠奪蒙古人的財產等行動。這時又有國外回教徒襲擊阿爾泰·阿特利亞特的監視哨，但這些破壞行動也都迅速地加以打擊。當時會有科布多·阿特利亞特的參謀長，忽在視察轄區時失蹤，為二百多名反革命匪徒所綁架，後來由蒙古當局和新疆方面取得聯絡，把這一事件解決了。由於這種事件包含有少數民族的問題，所以當時蒙古當局更進而確立以蘇聯的政策為範本的少數民族政策，把國內少數民族團結在人民革命政府的周圍，成為防制帝國主義和封建反革命勢力的一枝生力軍。

第四節 日本侵蒙計劃的澈底失敗

(一) 滿蒙侵略與大陸政策的失敗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陸政策」的中心，是放在對滿州和蒙古的鬥爭上面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為着朝鮮和滿州而曾經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即清日之戰和日俄之戰。這兩次戰爭中，日本的僥倖勝利，更加强了他們對滿蒙侵略的野心。一九〇五年日本以擊敗帝俄的聲威，積極展開其向滿蒙侵略的計劃，在一九〇七年七月，日俄協約成立，其中包括兩國劃分在蒙古的勢力範圍的條約，大體上帝俄保留在外蒙古、貝加爾、以及北京以西的內蒙各部的勢力範圍，但內蒙古即北京東北的部份

(即今熱河省境)及南部滿州，則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不過，事實上內外蒙古都在中國的宗主權和直接統治之下，所以，帝俄和日本對蒙古人，都提出了反漢獨立的口號，帝俄宣稱援助蒙古王公活佛實行自治，展開了自治蒙古運動，日本製造所謂建立「大蒙古國」的計劃，企圖用這個口號來收買蒙古人的心，以便推進侵略政策。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革命前後，這兩個帝國主義者在外蒙古狼狽為奸，乘機鼓動蒙古人脫離滿清王朝的統治，居然也號稱「獨立」。而一部分蒙古民族革命者，也因為歷來遭受滿清王朝、漢族軍閥及中國商業高利貸者的剝削，也乘此利用日俄勢力而積極推進自治運動。不過，當時日俄兩國在蒙古的勢力是不平衡的，外蒙古方面這種反對中國統治的運動，主要還是在帝俄野心家的領導之下進行的，那時日本正在傾全力於朝鮮及南滿方面的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內，帝俄的主力，被歐洲方面的戰事拖住了，在外蒙古方面的活動，不免鬆弛下來，後來又加國內發生工農大衆的大革命，分散了他們向蒙古滿洲進侵的實力，結果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陸政策以有利的機會。他們本來和蒙古王公貴族及喇嘛具有祕密勾結的關係，現在一看時機已到，便積極地利用這種關係而向外蒙古進攻。日本第一次在外蒙古的侵略行為，始於一九一三年向蒙古自治政權要求獲得在外蒙古建築鐵路發展商務等權利，作為支持蒙古人脫離對中國的宗主關係。到了這時，他們就利用列強無力東顧的機會，提出了樹立「大蒙古國」的政綱。在一九一八——一九年間，他們會由布里雅特蒙古的知識份子發起，由日本出資本及專門幹部人才，由白俄將軍謝諾夫指揮，積極準備加強對蒙藏的全面侵略。那時俄國的反革命的白黨，為着最後挽救自己的末運，企圖以外蒙古為對工農兵蘇維埃革命政權進行最後決戰的地方，以圖恢復自己的特權。他們在戰略上不惜勾結任何反共革命的國際勢力。那時日本帝國主義也利用殘敗的白俄軍事首領和中國軍閥對外蒙古的野心，推進自己在外蒙古的特別地位。

一九一九年二月以後外蒙古方面的「泛蒙古」運動，如上文所已經說到的，就是在日帝國主義者，白俄將

軍以及中國軍閥三者互相勾結而演出的。不待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這種運動是設計者和導演者。不過日本人對於這種運動的出力，是需要極大代價的，他們必須蒙古政府方面允許把全境建築鐵路之權給與日本，並且用外蒙的特產（金、銀、鹽及手羊等）作為抵押才允許借款幫助蒙古建設新式軍隊。當時的自治蒙古政府當局，對於日本（乃至日俄及中國軍閥）的心理，是相當了解的。因此，他們對於日本人的條件，不敢立刻簽字。結果，日寇和白俄匪魁，就決心用武力征服外蒙古。如上文所述，中國軍閥（以當時東三省的張作霖大帥為主）是善於投機的，他們立刻準備和日俄兩個侵略者連通一氣，分路圍攻。不過在尙未談得具體條件的時候，俄國的革命勢力已以決定性的一連串的勝利而向外蒙古方面邁進，直搗白俄反革命派最後的巢穴了。於是，白俄軍隊等便迅速崩潰下來。

在這以後，日本人會經利用中國安福系政權，支持徐樹錚對外蒙古的統治，當中國內戰結果安福系衰敗之時，日本人又趕快支持溫甘倫男爵的殘敗白衛軍，於一九二〇年建立反動的專制政權。這個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之下的白俄匪魁的政權，曾經有「自治蒙古政權」的表面文章，而實際上的中國軍閥政治更加殘暴地壓榨蒙古平民大眾，溫甘倫一派企圖利用外蒙為恢復帝制俄羅斯的根據地，而日本則企圖在外蒙古建立起一個由日本一手包辦的新國家——所謂「大蒙古帝國」，利用一部分蒙古人希望「真命天子」的不健全的心理，製造一個日本的傀儡國，作為侵略大陸的根據。

然而，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日本人這種陰謀並沒有完成，因為在外國人各種各樣的支配下面，壓迫、剝削、掠奪、和囚殺，使蒙古廣大遊牧平民們覺悟和自決起來了，他們在民族英雄蘇海巴都魯和喬巴山等的領導之下，創立蒙古人民革命和人民政府，獲得蘇聯紅軍的援助，起來肅清國外支配力，把中國軍閥部隊、白俄男爵政權及日本特務人物野心家們，一股腦兒地掃除了和殲滅了。

（二）諾門坎挑釁的失敗和蒙古獨立的保障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由於狂妄的深入，加以戰線拉長，兵力分散，而尤感北方前綫守衛兵力的過分的浪費。因此，隨時企圖侵略外蒙，鞏固偽滿，以便專力於對華作戰。同時，他們更需要挑起對外蒙和蘇聯的戰爭，以便在國際上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似乎他的對華侵略，主要目的是反共和反蘇，求得若干帝國主義國家的諒解，而分散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聯合力量。

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建立偽滿洲國的時候，他們會同時煽動蒙古內部反蘇聯反左傾的叛亂，已如上文所說，當時人民革命政府在極左和右傾革命的兩條綫中，堅持人民革命黨的政策。他們看到偽滿建國之後，日本又扶植所謂「冀東自治政府」，積極推進其大陸政策，在蘇蒙邊境，動員了大量的兵力，不斷舉行攻防演習，有隨時侵略的危險。蘇聯和蒙古當局，不得不也調派軍力，增加邊境的防禦實力。結果日本反而誇張地宣傳蘇蒙有侵入「滿洲國」的野心，一時邊境局勢極度緊張，蘇蒙日偽之間的邊境糾紛，時時發生。當時蘇聯會盡力嚴禁蒙古與偽滿之間發生直接的接觸，保障外蒙古的獨立和安全，說服了當時外蒙古政府的領導者及蒙古人民革命黨，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蘇蒙相互援助的君子協定，到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又進而成立互助協定，期限為十年，這一來，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外蒙的挑釁陰謀遭到極大的打擊。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開始對中國的全面侵略以後，外蒙古的受威脅的情勢更加緊張，到了一九三九年七月，就發生了日寇對外蒙挑釁的哈勒欣河——諾門坎事件。

哈勒欣河一名喀爾喀河，是黑龍江上游額爾古納河的一條支流，位於東蒙古，即呼倫貝爾和外蒙喀爾喀部之間。河東屬東北，當時為偽滿版圖，河西則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境。一九三九年一月，日本的關東軍精銳越過這條河，冒險進攻，但是立刻遭遇外蒙和蘇聯軍隊猛烈的打擊。

原來當時蘇聯和中國，已因中國全面抗日戰爭而成立互不侵犯協定，對抗戰中國有很大的援助，如易貨資助軍需物資等。蘇聯更認識在中國東北及北部吸住日本軍隊的重要性，會以三十萬兵力集中在西伯利亞方面，

時時舉行演習，使日軍寢食不安。但是日本還認為蘇聯只是虛張聲勢，根據日方所得關於蘇聯的錯誤的甚至是虛構的情報，認為蘇聯經過清黨與肅軍之後，國防實力已大衰弱，對遠東方面更不會願意真正出力援華抗日，所以企圖偷襲外蒙。那知當日本一個聯隊偷過哈勒欣河侵入外蒙之時，遭遇到猛烈的反擊，澈底的消滅，迫得關東軍當局調派三個師團（關東軍當時一共為七個師團），對蒙蘇紅軍作戰，以圖挽回危局。可時，當時中國戰場正是武漢大會戰的時候，調兵不免遲緩，關東軍的一個師團趕到新陣地諾門坎之時，立遭蒙蘇聯合軍飛機戰車的痛擊，又殺得日寇片甲不回，三個聯隊長（團長）切腹自殺。使關東軍全軍為之震動。

三個月的戰爭，把日本軍部法西斯派的「北進政策」給一個嚴重的打擊，比起一九三八年八月的張鼓峯之戰來，更加挫傷了日寇的戰鬥精神。使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倉皇逃往東京去請教另一軍部法西斯派首腦——他的同學陸軍大臣坂垣，結果不能不自承失敗，再不敢侵犯外蒙，改派梅津美治郎為關東軍司令官，並向蘇聯表示屈服求和。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成立諾門坎停戰協定，全文共為四條，主要的內容是：雙方停戰，各保持九月十六日上午二時（莫斯科時間）雙方所佔之陣綫。協定簽定後，由日本佔滿及蘇蒙兩方，各派代表二名，組織委員會，以劃清外蒙古與偽滿洲國最近發生衝突地帶的界綫。

從此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蘇蒙聯合戰鬥力，有談虎色變的感覺，不敢再行挑釁。而且，翻轉臉來，盡力和蘇聯勾搭，暗送秋波，以圖離間中蘇及蘇聯和民主各國之間的關係。東鄉、重光 and 松岡洋右這一批東方法西斯派的外交家們，先後以「親蘇派」的姿態，在莫斯科活動。特別是松岡洋右，他不惜打破國際慣例，以一國外交大臣之尊，親自搭乘西伯利亞的火車到莫斯科遊說，謁見史太林，不怕肉麻地發表許多「相見恨晚」的親熱話，對於蘇聯的政制大加讚美。進而溜到柏林羅馬，和希墨兩位密商，再到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大吹大擂地回到東京。以為從此「穩定北方前綫」，可以專力侵華及南進。並且以「聯合德意蘇，以打破民主自由主義的舊世界秩序」，大唱高調。不意未出半載，六月二十二日蘇聯戰起，收得

蘇日中立條約之利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和蒙古！反之，蘇聯和蒙古對於法西斯侵略者，卻始終不存任何幻想，嚴格注視現實，積極準備給敵人以打擊。宣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西方打垮了德意法西斯集團之後，八月間就反過來打翻了東方的法西斯的大本營，迫使日本投降。蒙古人民共和國在這一時期，始終與蘇聯攜手合作，完成了自己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戰鬥任務，完成了消滅法西斯侵略者保障本國及遠東和平安全的重大任務。

第七部 政治建設

第十六章 民主建國的鬥爭

第一節 民主鬥爭的出發

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以後，首先迅速實施臨時政府所確定的政綱，其中主要的是取消蒙古人民對外國高利貸的債務、撤廢連帶保證、取消牧民對封建層及寺院的納貢制度等等。由於自己的特權和利害受到重大的打擊，蒙古的封建層及喇嘛等，對新政府表示深刻的不滿，而黨及政府內部，也發生分裂的危機。所以，在民族革命時期結成的統一戰綫，在民主建國時期，終於發生裂痕，政府及黨內的封建的分子，和喇嘛出身政治人物，一部分不得不自動地放棄自己的領主權、特權、官位等等，而另一部分則斷然投入反革命的抗爭陣營。

一九二一年的民族革命，當然同時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革命，但是因為大家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下努力，蒙古的封建社會的基礎，並沒有受到最大的破壞，雖然封建層的政治上的權力已經取消了，但是他們所有根深蒂固的經濟的支配力量，却沒有澈底破壞。所以他們後來從新抬頭，不斷地為反革命派向人民共和國政府作戰的基本力量。

早在民族革命一成功以後，就是一九二一年，以博格德·甘肯為中心的上流貴族層及喇嘛僧等，拉攏了蒙古人民政府的主席鮑德，祕密扶植反革命的封建殘餘勢力。鮑德的陰謀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被發覺了，關於這個事件，政府的布告中說：「舊喇嘛部長鮑德、却格都伊爾查波、滾·特克特霍、宮內部長達·喇嘛·龐哲庫德

齊、滾·鄧都伊普、哲文·台萊袞！……及若干兵士，組織徒黨，陰謀推翻人民政府，企圖恢復獨裁政權和對中國的從屬關係。這時，陰謀團中有一部分，會對美國領事要求援助。並且通過了達姆賓·強姆查，招請中國軍隊到蒙古。不僅如此，這些陰謀團又和俄羅斯白衛軍及他們的宿仇張作霖互相勾結」。這一事件結果，有十五人被處死刑，在第二年七月九日執行。

接着在一九二四年發生了所謂「鄧桑陰謀事件」。這次陰謀，是以民族獨立為目標的一派，乘黨的領導部的虛隙，使蒙古人民革命黨屈服於國家機關而發動反革命運動。蒙古官僚的上層，有高額的俸給、收賄、政府承包事業的濫用等，通過三者而行商，以致暴富，逐漸成為新興民族支配階層，表示了顯著的政治上的積極性。這種新生的民族支配階層，因為具有封建的反動派和中國高利貸商業互相結合的關係，終於在蒙古國內及黨內引起了右傾的危機。

右傾思想的領導人物，就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建設者之一，當時黨中央委員會的會長，政府副總理，兼任蒙古人民陸軍總司令官的鄧桑將軍。他主張重行檢討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政策，企圖奪取領導權，循着資本主義的路徑，以發展蒙古的經濟。他同時和中國的反動軍閥保持秘密的勾結。他這種經濟的反革命行為，單看他把革命後廢棄的舊有奴隸性的債務，再度和中國商行締結契約而向地方居民收回，就可看出來了。他這種行為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受到彈劾，被判處鎗決。

蒙古非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綫，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至三十一日第三次黨大會中，因彈劾鄧桑一派的右傾行動而暫時擱置，但是，這種政綱，到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日的第四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終於正式確定。蒙古人民革命黨暫定政綱第九條內規定：「在國家組織及經濟組織方面，人民革命黨為使我國不再在新的外國侵略者之下而奴隸化，決定集中一切金融及經濟的活動於國家統制之下，以代替資本主義的法律和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並使向有遊牧的生活形態的習慣的國民，實現國家資本主義化及發展合作社等等政

策。所以，本黨當促使我國實現再無權取階級與被權取階級的社會組織」。從此以後，蒙古人民黨或稱爲人民革命黨，向民主建國之途邁進。

第二節 人民政府的民主政策

解放後蒙古的新政府，活動的第一步，就是和各旗王公、德札薩克和舊官僚作鬥爭。這些份子大都不情統治上的新形態，漠視中央政府的措施，有時竟加以反對。一九二二年夏，人民政府爲着和王公的反動勢力作戰，曾經實行檢查地方政府的活動，肅清王公、德札薩克等等的私人的組織，一律由政府改派全權代表。肅政運動的結果，有許多王公和薩伊特被調換了，其中有一部分更被提付審判，改由對新制度表示贊助的王公德薩札克及薩伊特繼承他們的地位。此外，又以「關於德札薩克及服國務之王公」的法案，確定人民政權下面的王公的地位。除了被提付審判的以外，蒙古的王公，一律加給「德札薩克·達爾加」的新名號，確定了「旗」德札薩克的職權。同時，對於「旗」屬居民，賦與更調及選舉新的「德札薩克」的權利，而且沒有王公等身份的，也有被選舉權。人民政府又廢除王公的世襲權，現在王公逝世後，各旗居民即可改選「德薩札克·達爾加」（旗的長官）。這種政策，給王公專制統治以某種程度的限制，使他們的活動，受到人民的統制。在許多「旗」內，雖然已經廢除「阿爾巴」，但是有些繼續對人民苛征暴斂專橫不法的世襲王公，從此可以被趕走了。

人民政府很早就決定了關於清算「廈比」（宗教的府）問題的原則，現在開始準備實施這種原則的各種方法。一部分，是對向來免除一切義務的「廈比」政府課與納稅的義務，並且停止國庫對他們的補助，這些辦法，經過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然而，在蒙古的現實條件之下，清算廈比政府是一件非常複雜而困難的事，非經過長時期的努力不可。當時外蒙古居民中，尚有百分之二二·三是喇嘛，他們具有龐大的權威和根深蒂固的勢力，在文化落後的居民中間，在實行這種改革的過程中，必需遭遇怎樣的困難，這是可

想而知的。

在外蒙古，尚有一種和喀爾喀族過着不很相同的生活的衛拉特族，人民政府對於他們所住的科布多管區的統治問題，總算獲得有效的結果。這個管區的住民，賦有對該「盟」統治者的選舉權，盟的統治的組織，應由人民政府批准。政府爲連絡和統制起見，派遣薩伊泰赴科布多。「薩伊泰」對該管區只有關於市政方面的發言權。這種組織完全爲科布多管區的住民所承認，社會活動家及行政關係者大會也須加以通過，以特別公文聲明對人民政府矢盡忠誠。

此外，人民政府又設具有太守或總督的機能的政府、薩伊特部、哲哲爾里克、孟達里及汗、泰伊希爾各盟的薩伊特駐在地爲烏里雅蘇台，而博格德·汗烏里斯基及汗·亭台·烏里斯，置於中央直接統治之下，科布多·薩伊特的駐地爲科布多，東南部地區的薩伊特駐在車臣汗。

人民政府的教育部，主持蒙古人教員之培養，基本教科書之編纂，蒙古語教科書及參考書之編印等等事業。一九二三年初，開辦短期教員養成講習所，這年培養出十四個蒙古籍教員。那時蒙古的小學校共只十八所，庫倫第一次出現中學校，政府爲了這個學校的建築，撥付中國幣五萬元。一九二三年底，爲着培養國家及社會活動的各種部門的活動家，在庫倫創辦蒙古人民大學，分設師範和地方行政兩部。此外，一九二二年在庫倫成立學術委員會，推舉布里雅特族學者在全蒙古族內非常著名的伽姆查拉博士爲主席，這個學術委員會的任務，在於蒐集和整理那些顯示蒙古人的歷史事跡的民間的史詩、歌謠等歷史的知識及故事等等，使成一體系。這個委員會又把世界性的古典文籍，翻譯爲蒙古語，以期在蒙古民族中，普及西歐文化。他們把普希金、萊蒙托夫、戈果里等俄羅斯的古典文豪的著作，考茨基的「資本論淺說」及經濟政治問題名著，盡量翻譯爲蒙文。

學術委員會是蒙古的學士院，蒙古第一個具有真實意義的學術團體組織。在它的周圍，結合了一班燃燒着對西歐科學偉大成果及發見的知識慾的蒙古青年，他們企圖把自己那班被喇嘛教的形而上的哲學和迷信矇昧其

意識達七世紀以上的同胞，普遍享受科學的恩惠，從意識形態上解放出來。

人民政府在財政上經濟上活動，首先必須指出稅制的改革和漸進的整理。規定凡有家畜二十頭以上的市民，不問身分如何，一律須納國稅。對於寺院財產，起初可以享受優待，稅率可以減去二成。對於國內商業，規定以六%為限度的課稅——「加伊利」，實行管理關稅。所以，從一九二三年二月到六月，關稅收入達六十六萬餘元（中國幣）。此外，人民政府又實行酒業的國家獨占，以增加國庫收入，並禁止中國人及其他外國人販賣酒類。中國人及其他外國人，常和蒙古人締結掠奪性的交易條件，廣泛地利用酒類，以從事對蒙古人的榨取。酒類專賣制度實行以後，當年專賣收入已達十萬六千兩之鉅。同樣的，又宣布對木炭採製業及腸類加工業等金融上的獨占。

國家的收入，據一九二三年先頭五個月的統計，主要的是「霍德烏爾頓·加伊利」（關稅）六六〇、一八五元（中國元），以下為商業營業稅四五、〇五一元，汽車稅八、〇〇〇元，財產所得稅二一九元，其他四九、二二五元，合計七六二、六八〇元，可見以關稅收入佔國家收入的大部分。庫倫之西部及東部的稅關經費，這五個月中，計達四十七萬五千五百元，比較蒙古自治時代增加達一〇七%。蒙古的歲入國家預算，一九二三年為一百〇五萬五千元，一九二四年為二百六十萬元，一九二四年的國家預算，歲入約三百八十六萬二千兩，歲出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兩。有八十萬四千兩的不足額。後來把國庫負擔的一萬喇嘛的供養費廢除了，省却一筆不生產的開支。

司法部關於服務於德札薩克及國務的王公的法令之外，又制定「哈姆奇爾格」與一般人民平等的法案，形式地廢止了農奴制。在司法部裏的特別委員會，專職從事於有關審判及內政的法律之再檢討工作，看是否適合時代。這種事業，因為缺乏精通司法行政事業的人才而結果遭遇極大困難。所以行政立法精神的法令之制定，經過了較長的時期。此外，在司法部的事業方面，又賦與外蒙古境內布里雅特族以和蒙古族平等的權利。

陸軍方面也完成了新的編制，建立起歐羅巴型的蒙古常備軍。

第三節 和左右極端派的鬥爭

(一) 反對派集團的活動

蒙古的反動派陣營，是指舊時有勢力的領主——即宗教上及非宗教界的王公、喇嘛保皇黨、貴族及住民中的富裕階級。反動派並沒有像民主主義派那樣明顯的完整的組織，不過大體上形成兩大傾向。即封建貴族派和喇嘛神權政治派。這兩個集團，在人民政府統治之下，就彼此結合起來，積極活動。這些反動派和中心却在北平，這些舊領主，新制度的反對派，常常集合一起。在中國的蒙古反動派的命運和他們的鬥爭方法，恰像在西歐的俄國反革命派狀況和戰略一樣。他們並不是蒙古民族中積極和鞏固的集團，他們夢想奪回自己已經喪失的支配權，從事收買，陰謀，及暴動，但一切都失敗了，才不得不希望從中國或日本方面獲得軍事上的援助，他們為着推翻蒙古人民政府的統治，曾向張家口的美國領事薩可賓、中國的關外王日本帝國主義曾經支持的張作霖大帥等，成立軍事同盟。

蒙古的反動派曾經發見中國軍閥的支持可以作為自己的避難所。例如蒙古反動派大活動家領主諾莫特把蒙古牧地賣給中國，以期恢復自己的地位，他在一九二二年從北京政府方面獲得「蒙古鎮撫最高委員」的名義。封建的貴族集團，在蒙古內部已經得不到什麼同情了，但是神權政體派在外蒙古人民中受到傳統的迷信的支持，在國內保持相當大的權威和勢力，成為現實的政治勢力，所以，蒙古人民政府的一切改革，不能不極度慎重。何況，反動派的更狡猾的戰略，是混進人民政府來活動呢！

(二) 極端派的社會和經濟的根據

上面所說的鮑德和鄧桑的陰謀都失敗了，但是這證明了蒙古人民革命軍內部存在某種不正確的傾向。在一

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日的全黨代表大會中表現得很明顯。

人民革命黨內部右傾的危機的根源，實在潛藏在蒙古革命後經濟生活的一般條件之中的。封建階層被革命剝奪去政治的權力，但是經濟上的勢力，顯著的家畜的財富，則在革命後依然保存着，這種事情，是當時蒙古私有關係所構成的。

當時蒙古富有家畜的大戶不過百分之五，貧農及中農則佔全國戶數的百分之九十五，所謂大戶，就是舊封建貴族、神政論家、富豪、及寺院主等。從人口方面來看，據一九二八年的資料，貧農及中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三，另一方面，財產在一百英鎊以下的戶口，擁有全國牲畜百分之四十五，一百英鎊以上的財戶，佔有百分之五十五。

因此，佔有共和國全人口之八三%的貧農和中農，雖然在戶數上佔有九五%，在家畜財富方面，只佔全體的四五%，反之，封建貴族、寺院，喇嘛上層份子，在人口上雖然不過一七%，在戶口上不過佔五%，而擁有外蒙全部家畜的五五%。

封建階層的政治的積極性，是和這種經濟的根據不可分離的，而在黨及國家的領導機關內部，就有舊封建份子及大喇嘛份子，所以時時掀起大規模的收復主權的反革命運動。例如反覆數次的博格德·甘肯第九世的再現運動，以及對寺院家畜課稅所引起的喇嘛的反抗等等。

(三) 右傾及左傾領導權的消長

由於黨組織及國家機構內舊封建分子及和他們勾結的新官僚暴富份子，擁護丹巴·德爾奇、伽·丹巴、伽姆查拉諾等右傾的政治領導權，力圖加強這一派的勢力，在第三次黨大會上所決議的反封建主義的、蒙古民主革命的鬥爭，完全取消了，並且盡力阻止這種民主革命運動，同時盡力使和蘇聯的外交、友好關係陷於停頓，攻擊由共產國際所領導的革命運動。

這一右傾領導權的鬥爭，成爲一九二八年第七次黨大會上檢討的最大對象。結果，政權的領導，一轉而入甘都恩、巴達魯霍、哀利杜伊布、奧啓魯等親蘇派急進份子手裏。從此到一九三二年中，通過了沒收封建階層喇嘛上層的財產，加強對蘇友好關係、牧民生產合作社的創設，農業的共營化、國家工業的確定、貧民畜牧的集體農場化、對於宗教勢力的抑制、私人商業的阻制等等政策，並由蒙生可普（蒙古中央消費合作社）強化及擴張國營商業，設定及強力執行累進課稅辦法，對富農階級實行種種限制。這些都是很理想的社會主義政策，但是他們卻和外蒙古現實的社會、民族、經濟及文化上各種條件不符合，只是機械地模仿蘇聯，以圖一舉而達到社會主義的實現。

（四）極左政策的失敗和轉向

蒙古游牧民衆經不起極左政策急進的改革，一九三〇年在烏蘭柯姆爆發了叛亂事件，各地先後發生叛亂，其間最爲猖狂的是一九三二年五月至八月間。由舊封建貴族及上層喇嘛所領導的這種牧民的叛亂，遍及於柯索戈爾、阿拉杭愛、烏布爾杭愛、薩布亨、阿爾泰各盟，無辜牧民之犧牲者五百餘人，被破壞及掠奪的下級合作社四十五家、「索蒙」（鄉鎮）公所三十五處，此外還有許多集體農場被劫，損失達一千萬土格里克。而在經濟方面，又因爲家畜的減少而遭遇輿論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之下，蒙古人民革命黨就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統治委員會第三次臨全大會，首先檢討並制止左傾極端派的政策，改取漸進的革命政策。接着，在七月二日召開的第十七次大呼爾登臨時會議，共同認識蒙古還沒有具備一舉而實行蘇聯式的社會經濟所必要的經濟及文化上的基礎和經驗，從革命的現階段，國家及社會各種關係上的特殊性出發，這次大會把外蒙古作如下的定義，即「外蒙爲奠定漸進地實行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的基礎，爲新型的民族革命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共和國」。

同時，臨時議會確定了下面的各種新政策，立即付諸實施，那就是：（一）對私人經濟的發展，不加任何

限制，而對富裕支配層採取漸進的抑制方針；（二）對於絕對多數的中產者及貧民的私人經濟，力謀改善提高，增進其物質的幸福；（三）以一切手段，融通資金，發展各個的畜牧經濟，增加家畜及其收益，改善物質的狀態；（四）廢除根據「夫皮」（身分）的社會的所有等級區別；（五）撤銷集體農場制度；（六）撤銷「烏爾頓」（驛遞）的義務；（七）准許國內私營商業；（八）停止以行政手段彈壓宗教；（九）倡導單純的生產合作社組織；（十）撤銷累進法課稅；（十一）衛生文化設施之推進。以及其他比較穩健的革新政策。

從此以後，蒙古人民政府所實行的表面上的資本主義的內部則是非資本主義的革新政策，以期在蘇聯的援助之下，奠定向新社會制度前進的基礎。

第四節 外交活動的成就

蒙古人民共和國，不單是在國內左右兩條陣綫的戰鬥中，而且是在國際侵略者、陰謀家的活動的苦鬥中長大起來的。

（一）和中日軍閥政權的鬥爭

外蒙古的國際地位，在法律上並沒有充分的規定。蒙古這個新國家的建立，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之外，並沒有其他外國加以承認。蘇俄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宣言中，承認蒙古為「自由國」，建議蒙古更調及辭退俄國沙皇所派遣的顧問及領事，以示蘇俄為蒙古人民唯一的友邦。

解放後的蒙古，最先感受到的威脅，是怕做中國軍閥的犧牲品。當徐樹錚軍佔領外蒙古的時候，在恰克圖的三國協定所確定的範圍之內，曾經承認外蒙古自治。但是中國軍閥會經用武力和內部的活動，努力利用牧復外蒙入我版圖的美名，以謀宰制外蒙古。中國商人高利貸者，也因為恐怕他們的債權被廢除、喪失將來榨取蒙古人的可能，所以也反對蒙古的獨立自治。因此一九二二年的全國商會會議，曾決定以武力把外蒙古併入中國

國的商業範圍。但是這種計劃，因為各個軍閥之間的離合及內亂而未及實現。而這些軍閥們，就多利用外國人的資金，奴役苦難的中國人民，推行帝國主義列強的政策。中國這班軍閥，是建立在違反時代潮流的傭兵制度上面的，如果這些軍隊進入外蒙，當然會遭受到燃燒着為蒙古人民自由而戰鬥之意義的，受過歐洲式教育而軍紀嚴肅的蒙古人民軍的反擊。

中國軍閥對外蒙古的野心，雖然掛上愛國主義的美麗的外衣，但是，實際上他們在國內的信譽早已破產，他們經略外蒙的政策也沒有獲得國內人民大眾的支持。中國進步的革命的黨派和中國平民大眾，認為蒙古民族自治獨立的實現，和中國民族的利益，並不對立。一九二三年在北京舉行的十月革命十五年紀念會中，中國工人書記局的代表康德尼曾發表演說，就說：「如果蒙古歸還給中國，究竟歸還什麼人呢？除了張作霖以外，會給什麼人呢？而這不是反而含有陷蒙古於日本勢力之下的危險嗎？如果中國爲了自己的獨立而鬥爭，那麼，中國對於爲獨立而奮鬥的蒙古，也不能不表示尊敬」。

當時由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手創而在華南擁有相當勢力的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急進的革命的份子，和一部分社會主義份子的結合，因此成爲蒙古革命家自然的同盟。中國國民黨以使中國從外國資本下解放出來爲目的，和外國資本的傭兵——中國軍閥，進行堅強的鬥爭。國民黨承認居住在中國國內民族的自決權，在對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的鬥爭勝利之後，準備建立一個自由結合的中華民國。在那些奴役中國及蒙古人民的中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之中，由於共同的利害關係，蒙古人民黨會和中國革命黨——國民黨互相緊密結合，以共同行動，以期完成共同的使命。

蒙古社會的知識份子，考慮到了複雜的國際情形，認爲不一定要和中國斷絕一切關係，但是必須保住經濟上政治上的完全的獨立。中國不應該干涉蒙古的內政，不再支持蒙古那些企圖奪回政權的反動的王公和上層喇嘛，不使反動軍閥的軍隊進入蒙古領土，並且停止中國農民對蒙古牧地的殖民政策，因爲在蒙古現存的畜牧經

濟的條件之下，這會使蒙古的國民經濟受到極大的損失。

日本帝國主義當時會企圖佔領蒙古，或是把蒙古放在自己實際的勢力範圍之內，而加以任意的支配。在日本國內，就有專門計劃殖民東部蒙古的東洋殖民協會，並且完成了殖民地區的分配計劃。這個協會的活動，是獲得在遠東方面計劃建立反蘇反共活動的主要的領導者完全諒解之下進行的。

蒙古解放運動的真正的領導者，都認定日本人所提倡的「泛蒙古主義」和中國軍閥的蒙古「內向」運動，都和蒙古民族本身利益毫不相干，而蘇聯對於蒙古的援助，却沒有任何掠奪的侵略的企圖，完全是和平的友邦。在蒙古反動派的策略陰謀和中國反動軍閥進攻蒙古的威脅之下，蒙古人民政府就採取了和蘇聯友善合作的政策。但為調整對華關係，及確定中蒙和平事業關係，蒙古政府曾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公文通達蘇俄，要求居間調停。蘇聯政府乃於同年九月十五日以覆文接受蒙古政府的要求，公布蘇方希望中國為中蒙兩國間的利益，由蘇維埃政府介紹而表示友誼的接受。蒙古政府當即提出聲明，只要中國不干涉蒙古內政，不派兵到外蒙古，並不破壞蒙古統治上民主主義的基礎，蒙古對中國絕對沒有敵意，且準備建立兩國之間的通商及外交關係。並向各國政府提出，以蒙古人民政府一九二〇年的宣言為進行協商的基礎。

然而，當時的中國政府，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不同意蘇俄的調解，關於調節中蒙之間從屬關係的問題，沒有獲得成功。

(二) 蘇聯對蒙援助的事實

蒙古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則日益發展和強化。一九二一年十月，蘇蒙談判在莫斯科舉行，十一月五日成立關於「確立俄蒙友邦關係」協定。根據這個條約，蘇維埃政府承認蒙古人民政府為蒙古唯一合法的政府（條約第一條）。兩締約國負責不許在兩國領土之內形成或存在反對締約國一方之鬥爭團體，不許編成與一方敵對的軍隊，禁止經過本國領土運輸軍火。（第三條）。居住在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內的兩國公民，有最惠國之公民和

同等的權利與義務，在民事及刑事中，屬於締約國一方的審判權所管的，且「根據文明與人道主義之最高原則，」拒絕肉體的苦痛或毀損人類精神的威嚴的刑罰及檢舉方法之適用，締約國之一方，在對第三國市民提供任何特權的時候，此項特權，自動地亦提供與締約國之另一方的公民。（第八條）。締約國兩國間商品的輸出入，各課相當的關稅，其稅率應該和對待最惠國的相同。（第九條）。此外，在第十條中規定，蘇維埃政府「援助蒙古人民政府實行組織由世界帝國主義獨立的郵電交換的政策，蒙古領土內俄羅斯共和國所有物及電報局設備，一律無賠償地完全轉讓與蒙古人民所有」。兩國交換全權代表，確定領事制度，（第四條）由根據協定而形成的特別委員會，確定俄蒙國境（第六條）。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的協定，強化了以後的蘇蒙關係。蘇俄及蒙古進入正常的外交關係，一九二三年又締結了蘇蒙之間的電報條約。

一九二四年，蘇蒙兩國代表又商定了關於所謂杜芬（烏梁海）問題的決定。從前，烏梁海地方，位於薩彥山脈的北部和唐努山脈的中間，面積十五萬平方公里，為中俄兩國權力所不及的「非經濟的地方」。一九二一年，在烏梁海住民中占有壓倒的多數的杜芬人，（烏梁海人），發生了民族革命運動。杜芬人民意識之反映者的杜芬人民革命黨，組織烏梁海各族的全體代表大會，選出唐努·杜芬人民政府，一九二四年，凱姆契克斯族爆發烏梁海封建王公與富人的暴動，結果有若干族聲明烏梁海必須和蒙古合併。

駐在烏梁海的蘇聯及蒙古代表，為了恢復杜芬國的安寧秩序，並協力加強對蘇蒙的友誼關係，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對杜芬人民聲明，認為關於杜芬國家這個問題的決定，必須符合杜芬人民自身的希望和利益。這個聲明中說：「杜芬人民還必須注力於為本身幸福和政治意識向上的內政工作。蘇蒙兩國政府準備以友誼的忠告和指示，給與援助，到必要的時候，將作符合杜芬人民之希望的關於唐努·杜芬的最後決定。」就這樣在當前的條件之下，與文化及政治意識水準相關連而提出的關於唐努·杜芬國家的問題，採取了最適當的決定，不久，就在一九二四年十月發表宣言，聲明了唐努·杜芬人民共和國的希望。

後來會經使蒙古人民大眾爲之動搖的根本問題，還是有關中蒙兩方的相互關係的，蘇聯表示始終爲蒙古的友邦。當時蘇聯對於中蒙關係的意見，可以從當時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在第八里士舉行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例會上的演說中看得明白。他說：「我們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爲中華民國一部份。然而，我們也應該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內政上不得有任何干涉，並且承認蒙古有民政獨立等廣泛自治權。」

蘇聯國內正確而澈底的蘇維埃民族政策，對於蒙古人民之對蘇友誼感情的增進，有極大的作用。東部西伯利亞和外貝加爾，居住着東部蒙古之一的——二十五萬人以上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他們和蒙古人有歷史上的流源，有共同的語言，而過去又都在專制皇帝的壓迫之下。蒙古人曾經親眼看到同一民族的布里雅特人，怎樣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獲得民族自決權及建國事業，怎樣的發達。一九二二年，布里雅特形成了伊爾庫茲斯卡雅縣及在遠東共和國內成立兩個自治省，自從遠東共和國合併入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後，根據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的全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合併這兩個自治省，建立布里雅特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以佛爾努欽斯克爲首府。

蘇蒙友善關係的另一例證，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對蘇聯外交人民委會提出照會，呼爾登在這一照會中宣言：「蒙古人民努力使兩國之間的兄弟的同盟有更進一層的強化。革命的蒙古人民，爲着蘇聯的經濟上的復興及其國際地位的強化，慶賀蘇聯勤勞大眾的事業的成功。蒙古人所以獲得政權，驅逐內外的壓迫者，完全是十月革命的結果，我們決不忘懷於蘇聯對我們的友誼的援助，所以，蒙古人民，深信十月革命的口號，由東洋全體勞動大眾及被壓迫人民的同盟，來加強其獨立，忠誠地爲打倒全世界資本主義並加強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新制度的奮鬥，爲對於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勞動者加深蒙古人民之兄弟的友誼，本大呼爾登特別推選加里寧同志及閣下（齊采林）爲呼爾登的名譽主席。」

蒙古人民對蘇聯的友誼及同情，是對資本主義列強的一大威脅。因爲蒙古人民，在實際上確信蘇聯對被壓

迫民族政策的真實性及其無私無欲無野心，這就是對東方全體民族的證明人。外蒙古在歷史及地理上，一向和滿洲、南部蒙古各省、新疆省，有歷史的和民族的結合，對西藏也有不可分割的宗教上的聯系，現在，外蒙古就成爲蘇聯勢力對這些地方發展的先導者，成爲亞細亞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的酵母」了。當然，這並不是對中華民族，而且對企圖長期征服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可怕的威脅。

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國，會有很長的時期，不能獲得蘇聯以外任何國家的承認，而蒙古的民主主義的制度，也成爲世界帝國主義的憎惡的對象之一了。

然而，不管世界帝國主義的威嚇和陰謀，革命的蒙古，並不因此害怕。蒙古革命的人民大眾，由於蘇聯的援助，已經粉碎了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神權貴族的桎梏，建立起人民共和國，而且在民主主義的建設戰鬥中日益壯大起來了。

第十七章 政治機構

第一節 憲法

(一) 制憲的經過和憲法要旨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經第一次「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大呼爾登爲制定憲法，曾經過極嚴格的集會和審核。大會在「烏倫巴都爾·霍特」（紅色英雄之城）即庫倫舉行，大呼爾登的主席就是蒙古著名的革命黨中央委員伽·鄧華氏，大呼爾登討論後審查通過了關於在外蒙古確立共和制度的這個人民政府的基本大法。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事。這個憲法的全文有十章五十條。

第一章規定，由政府接收「大汗」的印璽（第一項），以共和政體爲國體，主權的執行，賦與大呼爾登及由大呼爾登舉出來的政府，（第二項），以自治蒙古成立之年爲紀元年號，會後年數即以這一年起算（第四項）等等原則，第二章以下則規定如下各原則。

第二章規定一般人民的權利，並以肅清封建的神政論的舊秩序與世界觀，確立人民共和國的新秩序，作爲共和國的基本任務（第二條）。否認領土、地下富源，森林、水等國家財產的私有權，宣布爲公有（第三條第一項）；廢除已往的國際條約及國家債務（同上第二項），廢除連帶債務（同上第三項），規定政府統一經濟政策、確立民衆政治，發揚民權，解放大衆，以此爲實施國營對外貿易的前提（第四項）等等。

爲了使人民擁護政治、排除外敵，防止國內富裕支配階層的政治的復權，規定人民革命黨的組織（同上第五項）。此外，規定信教（同第六項）、言論（同第七項）、集會（同第八項）、結社（第九項）、國民教育（第十項）等自由享受權，這一章又規定男女平等權（第十一項），廢除活佛的支配權、爵位稱號，並撤消其領有權（第十三項），實施和蘇聯一致的對外政策。

第三章規定共和國主權的所在，以及外交、通商（第一項）、國境之變更與劃定、宣戰、締結和平條約、批准國際條約（第二項）、財政之運用（第三項）、內外貿易制度之確定（第四項）、國民經濟計劃之編成、稅許等權利之賦與改變及廢棄（第五項）、運輸及郵電事業之組織（第六項）、軍政之施行（第七項）、國家預算、稅制之運用（第八項）、幣制之實施（第九項）、行政區劃之制定、兵役法之編訂（第十項）、審判處構成法及訴訟法、民法之制定（第十一項）、教育（第十二項）、衛生（第十三項）、度量衡（第十四項）、統計（第十五項）等，規定了共和國最高政治機關之一般管掌事項。

第七條以下至第二十六條，包含入第四章，是關於大呼爾登、小呼爾登、小呼爾登幹部會的大綱。
第五章內規定內閣的組織（第二十七及二十八條）。

第六章規定設置經濟會議。又自第三十條至三十三條，則包括爲第七章，規定關於地方自治各種事項。第三十四條至三十六條爲第八章，關於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第九章（第三十七至四十六條），規定國家預算及預算權。

最後第十章規定國旗、國家的徽章，及作爲大呼爾登、小呼爾登召集地爲烏倫巴都爾。國家徽章由二部分構成，在蓮花台上加花，爲獨立的象徵。

(二) 蒙古勤勞人民的權利宣言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一條，公開確定蒙古勤勞人民的權利是：

一、蒙古宣布爲全部權力屬於勤勞人民的獨立的人民共和國。人民宣布以其最高權力交由全體人民大呼爾登及其所選舉的政府實施之。

二、蒙古共和國的根本使命，在廢除封建的神權政體制度，加強根據統治之完全民主主義化的共和國新制度的基礎。

三、爲着強化國家管理及上項宣言的國家制度，以實現人民的真正的權力，通過如下原則：

(1) 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以內的一切土地及其埋藏物、森林、江河及其富源，爲適應現存的蒙古人民所習慣的生活制度，和適應現行制度之原則的國民的財產。對於這些，不允許私有財產權，完全屬於勤勞人民管理。

(2) 一九二一年之革命以前的蒙古政府所締結的一切國際條約及對外債務是暴力強迫所形成的，應該廢止。

(3) 依據自從受外國支配的時候開始形成的連帶保證的外國人高利貸，所有個人及官廳的債務，因爲國民經濟及人民大眾所無力負擔，核准政府關於此項債務殘餘之撤廢及連帶保證制之廢除的決定。

(4) 國家的單一經濟政策集中於國家管制之下，以實施外國貿易之國家獨佔為確定人民大眾之解放及人民權力的條件之一。但外國貿易之國家獨佔，當在可能範圍內作漸進地實施。

(5) 為了完全地保持勤勞人民的權力，排除一切使國內外搾取者復興的可能，確認蒙古人民革命軍之編成，並由勤勞青年之全部的軍事教練以武裝勤勞大眾。

(6) 為了保證勤勞大眾的精神上的自由，實行寺院和國家分離，宣布宗教為各別公民的私事。

(7) 為了保證勤勞大眾發表意見的真正自由，蒙古人民共和國組織出版事業機構，並用以交給勤勞人民之手。

(8) 為了保障人民有集會、示威遊行等等真正的自由，共和國應具有人民集會所必要的設備的場所，提供勤勞人民使用。

(9) 為了保障勤勞人民大眾結社的自由，蒙古人民共和國給與勤勞大眾（阿拉特及手工業者）以團結上和組織上必要的物質條件。

(10) 為了保證勤勞大眾有獲得知識的途徑，蒙古人民共和國以給與勤勞大眾以必要而完善的完全免費的教育作為自己的任務。

(11) 蒙古人民共和國不問民族、宗教及性別，承認全體公民一律平等。

(12) 蒙古人民共和國，可以剝奪和限制那些利用自己權利毀損共和國利益的個人或團體的權利，以此為指導勤勞人民之利益的原則。

(13) 和舊領主王公及貴族（泰契奇）的尊稱同樣，廢除胡圖克圖及胡比爾汗的領主的權利。

(14) 考慮到全世界勤勞大眾為根本廢止資本主義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努力，勤勞大眾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應該實施適應全世界被壓迫少數民族及革命的勤勞大眾之利益及根本使命的對外政策，並且將適

應各種情勢與條件的要求，而與各外國列強建立友誼的國際交誼，然不論在何種場合，凡有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者，當加以決定的反擊。

第二節 議會

(一) 「大國民會議」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共和國最高機關的爲大「呼爾登」（意爲大「國民會議」，即「人民代表大會」），大會閉會期內屬於小「呼爾登」（小「國民會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小呼爾登通常會議閉會期間，則屬於小呼爾登主席團及政府。

屬於共和國最高機關的權限，包括：外交上的代表權，與外國談判政治、通商及締結條約、國境之變更、宣戰之佈告、和約之締結、國內及國外公債之設定、外國貿易之指導、國內商業制度之設定、國外經濟計劃之組織、利權之提供及廢棄、軍隊之建設及統率、金融制度及度量衡之設定、稅制之設定、國家預算之通過、土地利用原則之設定等等。

共和國之基本法的通過及修改，這是大「呼爾登」的專屬權限（第六條），大呼爾登由各盟、各城市及軍隊代表所構成，其員額依選舉區的人口而定，議員之任期爲一年。（憲法第三章第七條）關於派遣至大呼爾登的議員的選舉，另行制定大呼爾登派遣議員選舉法。

大呼爾登以每年召開一次爲原則，臨時會議，得由小呼爾登提議召開之，或由大呼爾登議員三分之一以上的要求，亦可臨時召集。此外，如果可代表共和國人口三分之二的各盟代表要求，也可以召開大呼爾登臨時會議。又當大呼爾登閉會期中，可以選出小呼爾登，以爲運用主權的執行機關，其議員名額規定爲三十名。

(二) 「小國民會議」及其主席團

小呼爾登（小「國民會議」，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委會）以議員三十名構成之，議員的選任權屬於大呼爾登。議員人數，得依必要而增加，另行制定特別規則。例如第三次大呼爾登會選出四十五名議員。小呼爾登自己全部的行爲，對大呼爾登負責。

小呼爾登的行爲，照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二條至十七條的規定，是法律、決議及命令之頒發，統理有關政府最高機關監督權的一切事務，規定小呼爾登主席團及政府的業務範圍，指示政府之一的活動方針，監督憲法及大呼爾登決議之實施狀況等。（憲法第十二條）。

小呼爾登規定每年召集二次（第三條），臨時會議，得經小呼爾登主席決團議，政府提議或小呼爾登議員三分之一以上的要求而召集之。（第十四條）。

小呼爾登主席團——在指導小呼爾登的會議，準備制定小呼爾登的議案、法律案、法律草案等，並監督小呼爾登之決議的實施情況。關於各地方的問題及其他問題，可以指導政府，由政府和各該機關交涉，必要時小呼爾登可以進行直接交涉。

此外，屬於小呼爾登主席團所轄事項，主要的尙有關係大赦、特赦等重要事務，小呼爾登開會期內之法規的制定，改訂或政府所定法令之暫時停止提交下次會議，閣員之任免、各部之間發生的問題及紛爭，對各部申訴及訴訟的解決等等。主席團的全部活動，完全對小呼爾登負責，其任期爲一年。

（三）選舉權

這裏還有一述關於國民參政的方法、民意暢達之手段的選舉的必要。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凡在實行選舉之日已滿十六歲的，能由雇傭勞動獲得生活之資，或從事實業者，不分男女性別，資產差別，都可以選舉大呼爾、小呼爾登、盟、索蒙（鄉）巴格（村）等各呼爾登的議員，或賦與被選舉的資格。（第三十四條）。

然而有以下各項者，無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一) 以營利爲目的而搾取他人以資生活者；
- (二) 以他人之勤勞、及資本利息、收益或其他利潤以營生計之高利貸業者及商人。
- (三) 舊王族、貴族、及常住寺院中的喇嘛階級。
- (四) 精神病者及殘廢者。
- (五) 以利得爲目的而犯罪、犯喪失廉恥罪而受刑者。

第三節 政府

(一) 中央政府——內閣

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爲內閣會議制而不採大總統制，由內閣會議主席（總理）代理主席（副總理）主持，以下分設內政、外交、陸軍、財政、經濟、司法、教育等七部，各部都有部長。此外中央政府另設軍事會議（主席制）、經濟會議（主席制）、國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及會計檢查院（院長）等。後來由於政局的進展，及政變等，政府直屬機關，各部會等，先後有改革及增設，除了（一）保健、（二）教育、（三）司法、（四）牧畜與農業、（五）商業運輸、（六）工業建設郵電、（七）內政、（八）外交、（九）財政、（一〇）陸軍之外，又有國家保安部及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等，都是內閣直屬機關，其長官與國務部長屬於同等資格。現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構成，包括：（一）總理，（二）副總理，（三）外交部，（四）國防部，（五）教育部，（六）財政部，（七）司法部，（八）衛生部，（九）畜牧農務部，（一〇）經濟（工商交通通信）部，（一一）內防處（蒙古晉「德達加特·哈馬加拉霍·衙門」，是和蘇聯的國家保安部相同的觀察機關，直屬於內閣），（一二）工業建設部（一九三九年由經濟部內分出）及新聞宣傳處、法制局、全國經濟計劃委員

(二) 地方政區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區，依據憲法第三十條規定，分爲：(一)阿伊馬克(舊譯「盟」，新譯「省」)；(二)霍希恩(舊譯「旗」新譯「縣」)；(三)索蒙(鎮)；(四)巴格(鄉)；(五)阿爾本(甲)；及(六)霍泰(特別市)等五級。其中「霍泰」，蒙古語爲「城市」，例如首都庫倫，今名「烏倫·巴都爾·霍泰」，意思就是「紅色英雄之都」。又如內蒙古的庫凱·霍泰，即是鹽城，漢名厚和。而在外蒙古的地方行政制上，帶有「特別市」的意思。除了首都定名爲烏倫·巴都爾·霍泰之外，一九三九年四月起，又宣布貝音·土曼及霍海·巴都爾爲「霍泰」制(特別市)。其餘五級地方行政區劃，在過去都有相當的漢譯，如「阿伊馬克」爲「部族」或「部」或「盟」，「霍希恩」爲「旗」，「索蒙」爲「佐領」，「阿爾本」爲十戶的名稱，約當於漢俗的「甲」。不過這些分劃，多少保留有相當濃厚的封建色彩，革命後這種名稱，則純粹爲地方行政區劃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改革地方行政制度，廢止「霍希恩」(旗)制，只有科布多地方，因爲有特殊情形，保留烏梁海旗(三個索蒙)吉嘎斯旗(七個索蒙)。「霍希恩」制撤廢的結果，「阿伊馬克」(盟，或部)的直接下級行政體爲「索蒙」(佐領，區或鄉鎮)，這種「索蒙」，一九三四年度全國計有三百零九個。「索蒙」之下，是「巴格」(鄉或村)，即以「阿爾本」(十戶)爲最小自治單位。但在一九三三年亦皆廢除，所以地方行政區劃，只有「阿伊馬克」，「索蒙」，「巴格」三級了。

這種三級制的地方自治體，由憲法第三十條至第三十三條，規定其權利義務，都有地方「呼爾登」(議會)；推選出任期一年的「處理各該行政經濟事務」的地方權力的執行機關。這種執行機關，對地方「呼爾登」負責，和中央之對大「呼爾登」負責一樣。這種執行機關，叫做「Yaniny」，例如，索蒙公署，叫做「Somons Yaniny」，大致是中國話「衙門」的轉音。

(三) 盟制

「阿伊馬克」(盟，或部)制，自從清統制時代已經實行，一直到革命以前，和內蒙古方面現存的盟制併用。(內蒙古三省除了若干例外，大體上都以二個以上的「部」，摺合而成「盟」，如錫林郭勒盟，包括五部十旗，但是在外蒙古，則盟和部是合一的。)

清朝以來的外蒙古，地方行政區制如下：

(甲) 科布多

- (1) 三音·察哈特右翼盟
- (2) 三音·察哈特左翼盟

(乙) 喀爾喀(外蒙古固有的)

- (1) 比特里雅諾爾盟(札薩克特汗部)
- (2) 奇齊爾利克盟(三音諾汗部)
- (3) 杭愛·烏拉盟(土謝圖汗部)
- (4) 克魯倫·巴爾奇溫盟(車臣汗部)

各部都有王，一律號稱成吉思汗的嫡系後裔，從清朝統治以後，受「親王」的禮遇。其中，科布多區分爲十九旗，喀爾喀爲八十旗，各有封建領主——世襲的札薩克統治。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推翻了舊時的支配階級的王公貴族，首先在一九二三年宣布喀爾喀四部實行自治。接着在一九二四年，公布科布多區、達里杭愛地方及柯索戈爾湖地方實行自治。

特別可注目的是達里杭愛，這是突出於內蒙古之錫林郭勒盟北部的牧地，原來不是外蒙古領域，當時由中央政府(清朝)直屬的察哈爾部管轄，可說是內蒙古的一部分。民國以後，因爲內蒙古的勢力衰弱，漸爲外蒙

古所靈食。

到了一九二六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改變上述七個區域的名稱，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六日，又因經濟上的條件，把行政區制大加改正，在全國分設十三個「阿伊馬克」(盟)，一九三四年將阿爾泰盟併入薩波汗盟，成十二個盟部，至一九三九年又恢復阿爾泰盟，並且接續色楞格盟創設波拉根盟，共有十四個「阿伊馬克」。一九四〇年又由科布多盟分出以哈薩克族的民族旗為主體的哈薩克盟，所以共有十五個盟。

蒙古行政區劃表

盟部名稱	盟政府所在地	「索蒙」數
德羅加特盟 (東盟)	貝音·土曼 (舊森班茲)	二七
肯特盟	溫都爾·汗 (舊車臣汗王府)	二七
德特盟 (中央盟)	烏倫·巴都爾·霍泰 (舊庫倫)	三二
色楞格盟 (農業盟)	阿爾吞·布拉克 (舊恰克圖)	一四
柯索戈爾盟	哈特斐爾	二五
阿拉杭愛盟 (後杭愛盟)	哲哲爾利克	三五
烏布爾杭愛盟 (前杭愛盟)	拉馬·干千納	三六
薩音亨盟	奇普霍蘭特 (舊烏里雅蘇台)	二一
杜爾伯特 (烏布森·戈爾) 盟	烏蘭柯姆	一五
科布多盟	傑爾·加蘭特 (舊科布多)	二三
阿爾泰盟	亨泰·希里	一七
南戈壁盟	達里基爾·杭愛	二六

波拉根盟，東戈壁盟，哈薩克盟。

(四) 三級行政及市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機關，現在分爲「阿伊馬克」、「索蒙」及「巴格」三級制，其概況如下：

(一) 阿伊馬克(盟) 盟的政治執行機關是盟議會(「呼爾登」)，盟議會的議員，根據選舉法，是由「索蒙」議會選出的議員構成的。盟議會在閉會期內，選任盟政府，掌理盟的行政上機能之指導，以及實際行政之執行。盟政府的組織，包括閣員五人及候補二人，並互推其中一人，任命爲盟長，另任次長以輔佐盟長活動。盟長及次長都須經共和國政府批准任命。任期都是一年。

盟政府下設五局，即畜產局、財政局、軍事局、教育局及庶務局。此外，各盟又有根據特別法令而設立的盟法院及檢察局，內防處分處及警察局。

(二) 索蒙(鎮) 鎮的執行機關是鎮議會，鎮議會由最下級行政機關巴格議會選出的議員組織成立。鎮議會閉會期內，選任組織鎮公所，以爲政治活動的執行機關。鎮公所由長官三人及候補二人組織成立。鎮長由上述三人中互推一担任，經盟政府批准任命。鎮長如須長期離開任所，由鎮官中推出一人代理。這個執行機關的任期爲一年。

鎮公所也有附屬的區法院，小的刑事事件全部由區法院審理。區法院除了依據法院組織法及訴訟法的刑事事件之外，並有對於一千蒙幣以下民事訴訟事件的審理及判決權。這是在求一切事件可以作迅速有效的解決，同時，可以提高牧民對政府的威信，使牧民對於政府的權利義務，具有尊重的觀念。

不過，同一機關兼爲政治機關及審判機關，不免發生流弊，所以後來又有司法權獨立的運動。

(三) 巴格(鄉村) 鄉村是鎮公所管轄下的外蒙古最基層的行政單位。範圍以住民密度的高低而沒有一定，大體上由三十至四十戶爲一鄉，和我國保甲制中的保相當。鄉長在鄉內發生重要事件，而受上級官所指

令之時，或受命執行必要的任務之時，得召集鄉村議會。鄉的執行機關是鄉長及其代理人，屬於一鄉政務，都由鄉議會選出，任期為一年。

(四)市制 蒙古人民共和國除了這三級地方行政制之外，在首都烏倫巴都爾、阿爾吞·布拉克、及貝魯士曼，先後實施市制，市有市議會，大體上和「盟」相同。不過，在市政府之下，有和「鎮」相當的「霍隆」議會及霍隆政府，霍隆之下有和地方的巴格（鄉村）相當的「霍林」議會及「霍林」政府。霍隆政府有審判權，和「索蒙」公所一樣。

第十八章 政黨組織

第一節 蒙古人民黨的簡明歷史

和溫甘倫白軍的鬥爭，蒙古共和國的建設、蒙古國軍的編組、蒙古人民共和政府的建立，既有這許多事業，大部分是由蒙古人民革命黨執行的。這個黨，後來因為要反映蒙古人民民主主義部分的政治意志和利益，改稱為蒙古人民黨。這個黨的根本使命，是使蒙古從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一切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使人民從封建的神權政體下解放出來，發展生產力，以及蒙古人民大眾的啓蒙及政治教育。

(一) 人民黨以前的蒙古政黨運動

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外蒙古的牧民大眾，到處發動反封建的和反中國商業資本榨取的暴動，當時東部蒙古出現了沙因·愛蘭黨，在西部蒙古出現了「哥蘇哲伊」黨。然而比較地有組織的牧民的民衆運動，是從二十世紀——一九〇五——〇六年當時開始的。當時在內蒙古鄂爾圖斯的烏辛旗發生了牧民運動，東部蒙古有巴伊爾台吉、托克托霍的運動（一九〇五——一〇年），而在薩哈克特汗部南部達爾汗·班伊蘭旗的哲哲庫·諾爾

索蒙，則發生了牧民的反封建運動（一九〇五——〇九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成爲人民革命偉大領袖之一而且長期主持人民政府中重要職位的兀老阿猶希氏所領導的民主主義的運動，他們的政綱是：（一）減輕「烏爾頓」（驛遞制）義務負擔；（二）減輕王公的徵稅，（三）王公及台吉也得負擔「烏爾頓」及一般排稅；（四）撤消封建階層的特權；（五）撤消王公債務的連帶保證（六）創設旗公署，確立鎮及旗自治制。他們這種運動波及愛賽特·班伊什、薩爾土爾·溫、喬諾伊溫等附近各族，幾乎席捲薩哈庫特汗盟全部。

這些牧民的反抗，最初是對封建領主發動的，後來發展成爲反對中國王朝對蒙古族殖民政策的鬥爭。因爲蒙古的封建統治階層向中國王朝要求援助，反而刺激蒙古民族的愛國心，使反封建運動加上了民族鬥爭的意義，成爲對蒙古封建層、中國高利貸商業及中國政權的革命了。王公喇嘛也因爲民族運動的推進，乘機利用，和反中國的民族運動結合，策劃如何脫離中國的統治。當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滿清政府一倒，無暇顧及邊疆，使他們這種投機獲得成功。

（二）人民革命黨的誕生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蒙古宣布自治。我們在上文已經說過的，這是帝俄及蒙古王公利用中國革命及蒙古牧民的反中國運動而進行的。他們首先援助一九〇五至一〇年間東部蒙古的巴伊爾及托庫特霍的牧民運動，反對中國軍隊駐紮外蒙及中國農民移墾邊境。外蒙宣布自治以後，托庫特霍任陸軍部長，並以博格德。甘肯任命爲「俾利庫特·瓦特爾·公」。後來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大革命，白俄在外蒙古的勢力才逐漸衰落。中國人會一度回到外蒙古，而日本帝國主義乘機勾給帝俄餘黨及中國反動軍閥，企圖以外蒙古爲反蘇俄的根據地。以致從一九一九年起，外蒙古陷於極度混亂和戰爭狀態；特別是在和日寇勾結的溫甘倫公爵指揮下的白衛軍統治時代，外蒙痛受蹂躪，變成一大地獄。

悲慘的經驗，促使蒙古人民大眾的自覺，一部分進步的封建階層民族主義的知識份子，也都要求廢除一切舊條約，實現真正的自治，蒙古民族的獨立，而蘇維埃俄羅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發表的對蒙聲明，更大大地鼓舞了蒙古人民革命的情緒。

這時，外蒙古的進步集團，包括受布里雅特蒙古的學者伽姆查拉諾的思想影響而結成的哲倫德爾第，阿摩爾，鮑德等愛國民主主義份子的一派，以及哲倫德爾第主持的烏爾加平民學校出身的優秀份子在伊爾庫克、烏蘭烏台、特羅伊柯薩夫斯克等俄國學校就學的達姆巴·德爾第、伽·達姆巴、喬巴山、蘇海·巴都爾、羅索爾、鄧桑、鄧都伊普等親蘇派急進份子十八名，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在恰克圖集合，召開第一次會議，組織蒙古人民革命黨，發表十大綱領。

(三) 民族統一戰綫時代的人民黨

人民黨的綱領是在於爭取政權，給與人民以平等和福利，提高民族文化到世界的標準，復興自治的外蒙古，在危局中建設蒙古民族的獨立國。這個黨根據他們這種政綱，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宣告成立臨時人民革命政府，甲察格都伊爾傑普為元首，當時在在人民黨的綱領中，曾提議中國滿洲、華北、華南、四川、新疆、西藏等建設具有廣泛權力的自治邦（第三條），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三月二日由六百多名游擊隊編成的人民革命軍，即由蘇海巴都魯率領，獲得蘇俄西伯利亞紅軍的援助，在恰克圖等地附近擊破中國駐軍及白俄溫甘倫軍，六月八日長驅入庫倫。該黨第一次大會中，就決議和第三國際及蘇聯保持友善關係，要求外貝爾的紅軍協助，驅逐白匪出蒙古。

人民革命黨開始就集中軍政兩權在黨的掌握之內，但暫時會援助立憲君主制，利用封建層及喇嘛，以支持民族的統一戰綫；同時使君王——博格德·甘肯——不能掌握實權。十一月一日，又使他簽署在人民黨所提示的誓約上，規定祇有對於宗教問題的絕對權，不干預政治，實際政權則操在內閣總理即人民黨的領袖手裏。黨



在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又通過了建設新國家的大綱，那就是：（一）制定及施行使國民從封建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法律；（二）除當居寺廟者以外，全體國民，包含喇嘛在內，一律須服兵役；（三）確定普遍的司法權；（四）急速研究及實施國民均等課稅法；（五）研究及施行對封建階層財產的課稅法；（六）急速研究及施行農奴權廢除法；（七）召開小呼爾登會議，實施「旗」自治制；（八）從新整頓地方行政權，防止對政府所行政策的反抗。

（四）民主建國時代的人民黨

由於統一的民族戰綫的展開，在反封建主義的方向上的蒙古民族運動，開始新的活動。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神權君主制的象徵——博格德甘肯——逝世後，人民革命黨立刻宣布廢除君主制，六月十三日宣言「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後在八月四日到三十一日的第三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上，提出了外蒙古非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的口號，決定向社會主義建設之途邁進。黨在十月八日起召集了第一次「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制憲會議，二十六日通過了新憲法。使今後以勤勞大眾為主體的人民共和國在法律上奠立了基礎。黨又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日間，召集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全文。後來經過了和極右及極左派的激烈的鬥爭，至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日間召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使黨的行動由右傾機會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權轉入親蘇派激進份子的掌握。以後黨在共和國政權方面，趨向左翼極端派的綱領，激起了反感和混亂。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召集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統戰委員會第二次臨時大會，矯正了左傾幼稚病的政治作風，改取適合蒙古現實條件的漸進的政策。

（五）二次大戰及戰後的人民黨

在中國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蒙古人民黨在保障共和國的安全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方面，始終站在領導的地位。他們加強了對蘇聯的友善關係，使遠東這一區域內的和平建設獲得保障。早在一九三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蘇蒙互助的君子協定，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進而締結蘇蒙互助條約。使日本侵略亞洲大陸的「滿蒙政策」無法向蒙古方面獲得一寸一分的進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蒙古人民黨繼承了親蘇反日的傳統，一九三九年，就在蘇聯的援助之下，擊潰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蒙古的進攻。人民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面在蘇聯精神及物質的援助之下加強國內建設，一面為配合中國的抗戰在北方拖住大量日軍使無法調到中國及後來無法調到南洋各地。人民黨在一九四一年蘇德宣戰以後，又號召蒙古人民從各方面援助蘇聯的衛國戰爭。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出兵東北及朝鮮實行抗日的時候，蒙古人民又領導了協助中國及其他盟軍威脅日本投降的戰爭。

當全世界反法西斯反侵略戰爭用勝利來結束了的時候，蒙古人民黨開始新的活動，從中蘇雙方的諒解之下，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法律上的支持。現在，黨正展開新的鬥爭，為反對國際反動派及法西斯殘餘勾結宣傳和挑撥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為促進世界及遠東長期和平安全民主建設而鬥爭。

第二節 人民黨的組織機構

(一) 黨的組織機構

蒙古人民黨的組織機構，以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為原則，以「旗」的組織「旗委會」為基礎細胞。以上盟部各有委員會。而以全蒙古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為黨的最高組織。中委更互選一人，為發言人。中央委員會依據全黨大會的指令而活動，為黨的思想上和實踐上的領導者。在和別黨交涉時代表黨。人民黨最高權力機關的全黨代表大會，每三年開會一次以上。在大會上須推選出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政務監察委員會的委員，依照黨章，其各級組織機構是：

(甲) 黨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及一切事業，對大會議決事項確定具體實施辦法，並指導服務於黨所經

辦的各種事業及國家生產教育各機關團體裏的黨員。此外，中央委員會並得指導革命青年同盟的事業，負責上述一切事務之統制。每年召集全體會議一次以上。並規定每六個月召集地方黨組織會議，在黨內施行嚴格的紀律。中央委員會並須指定黨中央機關報的編輯人。人民黨的中央機關報是「人民的權利」報，此外尚有黨中央機關雜誌「人民黨」等，銷數月達萬餘份。

(乙) 黨中央政務委員會——負責監督黨員，確保革命黨的訓練，規則的尊嚴，每月召集一次以上的會議。中央政務委員必須是入黨以後「固守團結」四年以上的黨員，而其委員長則須六年以上。

(丙) 政務監察委員會——負責調查及研究黨員義務獻金之徵集狀況，黨委員會之會計經理狀況，黨委員會對下級機關照會回答的遲速，職員實行黨委員會規定的狀況，黨內各機關間報告的內容及實行狀況等等。

(丁) 地方黨支部——地方的黨部，高級機關是盟、部（或省）的黨支部，每年召集會議一次。盟支部選出盟黨委員會及盟政務監察委員會，這種機關的任務，大概和中央的相似。盟黨委員會在盟黨代表大會閉會期內，為地方黨最高機關。盟的黨委會全體會議，每年召開一次以上，由委員互選一人為書記長，其當選條件為入黨後已有五年經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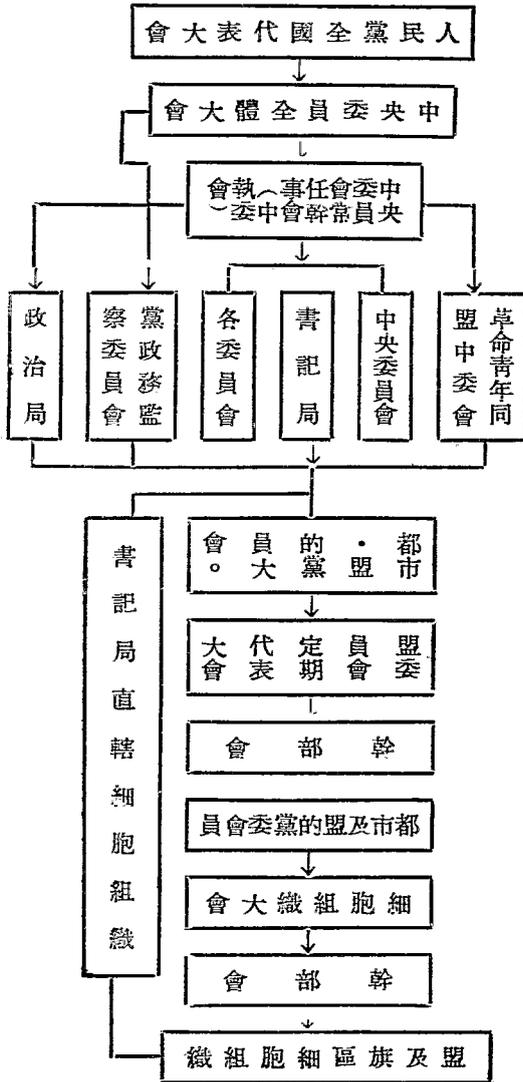
(戊) 黨的下層機構——黨分部，由居住在「索蒙」（區、鄉）的黨員及企業機關內的黨員所組織的黨分部，每月召集全體會議一次以上，凡入黨滿一年者可以被選為書記長。但索蒙及企業、公務機關內的黨員不滿五人的，則設立黨補助分部，選出黨特派員，但只有黨員一人的自屬例外。

(己) 軍隊內的黨組織——人民革命軍及內防處內，設有蒙古人民革命軍政治訓練處，實行黨的政治訓練。訓練處就該軍原有的事業，直屬革命軍的管轄機關。又關於黨的關係事業，得受黨中央委員會的指揮。所以可說是軍隊裏的政治部。又革命軍有全軍代表會議，可以推選黨大會的代表。

此外，黨中央委員會及盟委員會，為了在黨機關以外各種機關、團體事業之內貫徹黨的政策，也都派出

「細胞」份子，進行各種活動。

蒙古人民黨的組織系統圖



(二) 黨員的素質、數量及信條

蒙古人民革命黨對於黨員的入黨及教育工作，依照共產黨辦法，注意蒙古的實際環境，稍加改變。凡要求入黨的，須有黨員二人為保證人，宣誓嚴守黨章和黨的紀律，經過基層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呈請盟的黨委會批示決定准許與否。除此以外，凡是蒙古人民共和的人民，其有國籍而年滿二十歲以上的，不分男女，都可以為黨員，年齡不滿二十歲的，可以參加人民黨的外衛團體「革命青年同盟」。

凡是教師、農業技術人員、醫師、獸醫、護士，及其他民族文化從業員，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的重要性，極被尊重，所以特別被歡迎入黨。至於宗教界出身的人，普通的比較被重視的是還俗了的下級喇嘛，並且須有二年以上的平民活動，否則不許入黨。

人民黨的黨規非常嚴格，黨員必須嚴守國法及黨規，尊重國家的財產，仰制小我利益，為公家而犧牲服務，展開大眾的文化的活動，為一般民衆的領導者及模範，並應受最嚴格的軍事訓練。

黨員必須遵守的信條是：

(1) 黨員必須精通黨章、綱領及中央指導委員會、盟委員會等各團體的規則，人民政府的基本法律、小「呼爾登」的決議、政府施行的生產訓練的主要方策，以推進國民訓練。

(2) 文字的修養。因為多數黨員是文盲，對於黨及政府法規之實施，常常感到困難，所以必須在黨內加強文字上的修養，實行國民的教育訓練。

(3) 黨的團結和鞏固。

(4) 黨員須重視畜牧生產，實行畜產品的儲藏和加工，不斷地觀察研究，求其精通，以期正確地執行政府所定的方策。黨員必須使自己的子弟入學讀書，私生活等也須隨時為大眾的模範。

(5) 軍事訓練及軍事技術的研究。

(6) 不論担任何種公務，都必須參加黨的支分部的事業。(附有罰則)。

(7) 對於義務會費及獻金等不得怠懈(附有罰則)。

(8) 禁止紊亂黨派。

(9) 要求實踐黨本位的行動。

(10) 節約物資，不得對國家及全民的財產，有任何掠奪侵佔及類似行爲。

(11) 信仰宗教，以自己財物捐贈寺院及喇嘛，只是各個人的私人行爲。故必有爲求宗教的發展而煽動人民，違犯使宗教與國務嚴格區別的法律時，當受驅逐出黨的懲戒。

(12) 公家在商業交易機關服務的黨員，與進行榨取的交易的一般黨員，必須嚴格區別。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榨取性商人不得服務於公家機關。

黨員大部份爲平民(阿拉特)，如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三次大會的代表中，計有平民八十八名「台吉」十四名，喇嘛十八名。後來——平民出身的黨員人數更見增加。關於黨員的人數，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時共計不過一百六十名，一九二二年爲一千五百名，一九二三年爲二千五百名，一九二五年爲六千三百名，一九二九年爲一萬二千名，一九三〇年爲三萬名，一九三二年爲四萬二千名，呈歷年增加之勢，至一九三二年實行清黨的結果，這一年度，黨員人數一度減剩一萬二千名，一九三四年更減少至七千五百名。又在一九三四年全國共有支部四百六十單位，(一九二四年則爲一百二十個)，最近沒有正式統計公布。

第二節 人民黨的黨章·綱領

(一) 概況

蒙古人民黨是從對左右極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壯大起來的。它曾經在黨章中明白標示「喚起全國大眾和全

世界勞動者及被壓迫階級大眾，與帝國主義者鬥爭」。但是黨內部也不是在想整肅的統制下一絲不紊地向社會主義化之途邁進。在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中，通過了三大原則，就是：（一）實現「阿拉特」（平民階級）獨裁，（二）把黨的基礎放在「阿拉特」的上面；（三）外蒙古的經濟的發達，採取非資本主義的道路；黨的綱領，和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一致。然而，黨內會進行了左右的鬥爭。鬥爭的結果，表現在蒙古共和國政府的政策之轉變，上面已經大略說過了。

（二）黨章

到了一九二五年九月的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綱領，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修正，由黨中央委員會公布。

黨章的第一章是「黨和黨的主義」，第二章是「入黨及開除」，第三章是「黨的支部」（附：黨支部內全黨員會議的權限和任務，黨支部書記長及委員的任務），第四章是「盟的黨機關及其他」（附：盟黨委員會權限和任務，訓練普及部的事業），第五章是「黨全國代表大會及黨的中心地」（附：黨全代大會的權限及任務，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章是「黨中央政務委員會」，第七章是「人民革命軍裏的黨的機關」，第八章是「在黨的機關以外的細胞組織」，第九章是「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禁戒及舉手表決規則，黨的會計」，一共包括這樣九章。

（三）主義與政綱

人民革命黨的根本的主義，明白規定為「爲防制蒙古人民共和國遭受侵略者的威脅，使本國的利益更加堅固，其根本方策，必須以黨爲主要機關，進謀所以發展。」爲着這個目的，黨必須「站在上述主義的立場上，確定完全的國家的權力，培養所以保護政權的實力，以期啓發各地的生產能力、文化訓練及民衆的智能，根本否定封建主義的存在，逐漸抑制各地的侵略性的資本家。」

「蒙古人民革命黨，雖不直接參與國家行政機關的業務，……但必須檢討合乎本國主義的行政事務施行上的要點。」

爲了使全黨黨員實施上述任務，人民黨的黨員必須：

- (一) 對共和國建國的精神及當前的時局，必須有正確的認識；
- (二) 担負起根據黨政綱之方針確立國策及根據國策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使命；
- (三) 向民衆普遍深入地宣傳對帝國主義者及封建主義者抗爭的精神，革命發展過程中可資依據的方針，國家權威的建立，以教育培養起實力來，使能擁護國權。

(四) 經濟綱領

人民黨在政綱上表現它是民主主義的政黨。蒙古人民生活的半封建的遊牧制度，使蒙古全國不存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建立共產主義政黨的優良的條件。然而，蒙古的國際形勢的特殊性，蘇聯對於蒙古民族解放的援助；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對蒙古的野心；又使蒙古人民黨不可能推行和平主義的民主主義；它不能不採取和蘇聯攜手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鬥爭。所以，在人民黨內，曾經有許多著名的黨員們，他們的信念來說，不愧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人民黨的領袖之一，台·林啓諾氏，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人民黨第三次大會前所發行的「蒙古革命之展望」這部書裏，指出蒙古人民黨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黨可能不經過布爾喬亞。資本主義的發達的階段而向這一個目的前進。黨必須和布爾喬亞在蒙古發生、傾向私有制的大資本及生產手段之集中，進行決定性的鬥爭。黨的基本的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國營及合作社式的工商業之設立，大量的消費物之生產及販賣，決不許由私人經營，加強確定了的國家的獨佔。

在蒙古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建設的理想，曾經由人民黨的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通過了關於經濟綱領，「在經濟政策的分野方面，對於外國貿易，嚴守切實的國家統制政策，把金融政策及全部經

濟的一般領導權，集中在國家之手。蒙古人民共和國維持私人的經濟關係和私人的經濟上的創造性，但同時必須以在國家權力的指導之下爲提供發展生產力之可能的唯一方針，並以國家資本主義（利權、租借、合作社組織等）的發達，藉以防止外國資本使蒙古人民奴役化」。

（五）動搖和反動的克服

黨內有些和過去的世界觀未盡絕緣的貴族及神權政體份子，使該黨不能充分地鞏固，時時引起內部重大的動搖。一九二九年秋天，庫倫方面就爆發了神政論者的陰謀事件，許多人民黨內的名流被逮捕了。因爲這一陰謀事件而被槍決的反革命家之中，還有人民政府的總理，人民黨的創立人之一的鮑德，內政部長彭克·德魯契第，司法部長特庫托霍，以及其他著名人物。

第二次大動搖是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這時黨中央委員兼蒙古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鄧強，就以反革命行動及與共和國之敵通謀的罪名被捕。鄧強氏利用了自己的地位，使哲哲爾利克、孟達里盟的居民，向中國商行支付爲人民政府所撤廢了的高利債務。鄧強和中國人合夥在胡登經營商業，榨取人民，參加了和蒙古合作社競爭的外國人的公司。此外，他又和中國軍閥有秘密的連絡，他破壞許多官廳的活動，在軍隊裏，他煽動反對「蒙古革命青年同盟」。大會選出的全權委員會確定他的全部罪狀，終於被判處槍決，他的汽車和其他財產被沒收入國庫。

鄧強一派的「英雄史詩」的行動，被看做是蒙古資產階級活動的一種嘗試。鄧強本人是這種努力的典型的和積極的發現者，但是他們遭到有力的反擊，就是人民黨那種不經過原始的資本蓄積及資本主義階段而向國家資本主義建設方向邁進的政策。鄧強不僅是一個秘密從事商業及投機的革命的單純的指導者，他還爲着澈底地實行經濟上的反革命政策，而利用了自己的地位，且和中國軍閥連絡，準備政治的反革命。鄧強派以人民黨之領袖及政府要人而增加反革命，這一件事更進一步地提高了黨的警惕性，使全黨痛切地感覺到，必須使真實的

革命的勢力更加團結起來，必須加強黨的主要的社會基礎——中農及貧農牧民大眾。人民黨第三次大會，就站在這種見地，林啓諾氏曾在他的報告中，指出必須組織蒙古的手工業者及職工大衆到人民黨的旗幟下面來。

誕生了四年以後的蒙古人民黨，終於獲得作爲生活組織體的健全的素質。人民黨所採用的強化共和制度，加緊蘇蒙友善關係的政策，成爲使蒙古從外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及政治奴屬下解放出來的唯一正確的政策。以中農及貧農爲基本的社會的基礎，更洗滌了黨細胞而健全了黨的革命的階級的內容。使黨在以後內部反動份子及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犯中，能够不斷地克服困難，戰勝敵人，推進了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建設，並進而有助於遠東及世界的和平事業。

第四節 蒙古革命青年同盟

(一) 同盟的誕生與發展

蒙古的民主主義陣營中，另一個政治組織，就是「蒙古革命青年同盟」。這個同盟，最初於一九二一年八月，是從蘇聯回國的一些蒙古青年們在庫倫組織起來的。這些青年都是在蒙古革命初期，爲着反革命反動派的壓迫，不得不亡命蘇俄的。庫倫這個組織的基礎要素是青年官吏，他們反抗從來利用肉體的刑罰權而發揮無限制的權力的高級長官的壓迫。在蒙古革命初期，這些急進的青年官吏成爲積極的革命層，但是後來會暴露一部分人的動搖。

同盟在起初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只能說是人民黨的一部分，把自己的活動，向黨及政府的活動看齊。自從人民革命政府的聲權遍及外蒙全境而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期以後，這些組織的合作才開始分離。在根本消除蒙古的神權政治制度問題方面，人民政府的優柔寡斷，激怒了青年同盟。青年同盟開始在廣泛的人民大眾之間，宣傳根本的大改革，站上蒙古輿論界的最前方。青年同盟對政府的關係，在一九二二年一月莫斯科舉行

的遠東青年大會上，會有這樣的決定：「只要蒙古人民政府站在擁護蒙古民族的獨立，從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蒙古的鬥爭的前面，青年同盟當然要以全力支持它。然而，在另一方面，青年同盟不能不監視它是否忽視了廣大遊牧民衆的利益，所以，青年同盟在國家建設上，必須堅持民主主義的改善政策」。

(二) 同盟的政治鬥爭綱領

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一次大會中所制定的革命青年同盟的綱領，宣佈「爲蒙古人民完全從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鬥爭」，作爲青年同盟第一個任務。第二個任務，是使勤勞人民實際地發展自己經濟上及文化上的生活，使不得不走上進步的路，組織起國家管理制度。王公貴族會經一直支配勤勞人民，王公爲了自己的利益，把人民出賣給外國的暴力，不僅不顧人民的幸福，而且壓迫人民。所以，革命青年同盟，必須消滅封建王公對人民的支配，人民不受什麼汗、王、公等等的統治，爲實行自己所選的人民代表的統治而鬥爭，革命青年同盟必須獲得所謂民主主義共和制，因爲只有這種制度，才能給人民保證經濟及文化的發達和完全的自由。

大會通過了這個綱領，使青年同盟成爲獨立的政治組織。大會在規定對人民黨的關係的決定中，強調：「作爲勤勞大衆之組織的革命青年同盟，對黨支持，同時在組織上及政治上對黨保持獨立。」這個決定，又在一九二三年的第二次大會上獲得通過。

(三) 同盟的特徵及其工作

青年同盟轉變爲獨立的政治組織之後，它的社會基礎也跟着變化了。庫倫的急進派官吏，把他們在同盟中的地位，讓給粗野的貧窮的遊牧民衆了。根據同盟人員數額的統計，至一九二四年四月止，同盟盟員的百分之九十，已是遊牧平民，其餘百分之八·五是地位和平民差不多的小喇嘛，另有百分之一·五是王公貴族青年。全體盟員人數，一九二一年八月只有三十名，一九二二年一月爲三百名，八月激增至八百名，一九二三年七月

已達二千五百名，一九二四年已有四千名以上，一九二七年增至七千名，一九三一年已達二萬二千名，一九二四年一度減至五千人。婦女盟員也有增加，第二次大會以前連一個女盟員也沒有，但是一九二四年已有三百個遊牧女子參加同盟。

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以其顯著的積極性為其特色。以往好幾次反革命的企圖及陰謀的彈壓和消滅，都是青年同盟的功績。在共和制宣傳的工作上，青年同盟曾為共和制度進行三年多的宣傳鼓動工作，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並不等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但據第一次大會決定，青年同盟「和革命的青年的國際團體——共產主義國際青年聯盟，保持密切連絡的活動」。到了一九三二年，由於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已上軌道，這個同盟再度取消獨立性，而從屬於人民黨，為其外衛團體。同盟的書記長以黨員充任為原則，並派優秀黨員參加指導。盟員多為二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達二十一歲時即可正式入黨而保留盟籍，至二十五歲可以除去盟籍。

青年同盟為提高盟員的素質，有讀書會及政治研究會等組織；舉行全國青年評議會，召集學校講習會，進行軍官學校預備教育等，在工作上注力於國家財產之尊重及保護，家畜品種之改良及增產，經濟的提高，教育活動的貫徹，文盲的撲滅等，並且敏感地洞察國民的慾望而普遍活用報紙雜誌及紅色勞動俱樂部等，舉辦預備及實習教育，軍隊內部軍事及政治工作等等。他們有機關報「正義報」，教育及組織青年大眾，又利用大眾的生產的文化動員，獲得極大的成績。

第八部 國防·社會和文化

第十九章 人民革命軍

第一節 人民武裝的發展過程

蒙古人民的武力——人民革命軍，其發展過程，自和蒙古的政治經濟之發展，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同時，它也獲得蘇聯方面極有力的援助，終於日漸強大起來。

(一) 人民革命軍的誕生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後，白衛軍的敗將溫甘倫男爵以俄華蒙三國雜湊的聯軍約二千人，進犯庫倫，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庫倫成立所謂「獨立政府」；但是他那種種匪軍統治，使蒙古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激起了民間極大的反感。

那時，贊同俄國革命勢力的一派，開始了外蒙古發動革命的計劃和準備，他們潛入俄國境內，和遠東方面的紅軍發生連絡。其中主要人物，就是蘇海·巴都魯、唐都安、鮑德等。及溫甘倫進入庫倫，建立獨立政府，這些革命的領袖，就和紅軍方面協商，於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即溫甘倫占領庫倫後不久，就在恰克圖召開第一次革命黨大會，三月十三日，又在這裏組織蒙古人民臨時革命政府，推察克德爾伽普氏爲總理，蘇海·巴都魯爲軍政部長兼蒙古人民革命軍總司令，蘇海·巴都魯就着手組織討伐溫甘倫政府的人民革命軍。

蘇海·巴都魯在人民革命黨員內募集義勇軍五百人，編成游擊隊，進攻買賣城，立即加以佔領，就把人民

政府遷入，並把這個城市改名爲阿爾吞·布拉克。當時會遭受溫甘倫軍的攻擊，但因為獲得蘇俄紅軍的協力，不僅把他們擊破了，反而長驅直入，攻占庫倫。恰巧當時溫甘倫政府的陸軍部長哈頓·巴都爾·柯克薩爾德伽普在烏里雅蘇台（今伽普哈蘭特）方面反抗溫甘倫政府，和人民革命軍呼應，因此，溫甘倫軍士無鬥志，每戰必敗，造成了溫甘倫政權沒落的條件。同時，科布多（今伽爾加蘭特），烏蘭柯姆方面的自衛軍也漸形崩潰；不久之後，外蒙古全境，差不多完全由人民革命軍所控制了。

人民革命軍遷都庫倫（改名爲烏倫巴都爾），人民政府和蘇俄政府之間，成立正式修交條約，以人民革命軍爲保障蒙古人民政府的基本武力，進而力謀充實加強。當時對此項任務給蒙古人民以最大助力的，是從南俄羅斯特別選派到遠東來的布留罕元帥，而蒙古人民革命軍的編成及成立的初期的指導者，也就是這位元帥。

（二）人民革命軍的發展

蒙古人民革命軍創立方針，是從貧苦的阿拉特（平民）階級中徵募兵員而採取強制徵募的辦法。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記載，當時蒙古的徵募官，和蘇聯顧問，帶了一隊武裝同志，巡迴各部落各蒙古包的集團，把認爲壯丁而測驗合格的就實行徵集，使穿軍服。這樣徵集的兵員，在初期約有一千五百人。

一九二四年人民政府實行改組，人民革命軍也實行改組。政府機構的改革是依據十一月八日至廿八日的第一次大呼爾登的議而實行的。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中，關於軍事方面的決定，主要的是：鑒於軍事及軍隊組織的重要，設立總司令，並爲監督軍隊的行動及國家任務之間的關係，而在軍政部上面設立軍事會議，爲最高機關。同時，選出重要的首腦：總理蔡倫·德爾第，軍事會議主席林啓諾，人民革命軍總司令喬巴山，國防人民委員阿爾吞·哈吞·巴都爾。並任命其他重要領袖及參謀長，使先到蘇俄去受教育。（據邁斯基著「外蒙古」，柯羅斯特維支著「外蒙古近世史」。）

後來歷經若干次小改編，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因爲實行左傾政策而實行大改編，一九二八年改

「人民革命軍」爲「人民紅軍」，一九三〇年的改革，從外蒙政權的左傾趨勢配合，在企圖實現外蒙紅軍的共產黨軍化，並企圖和中國共產黨的紅軍遙相呼應而發展。這種計劃，諺傳由一九二四年以來爲中國國民黨最高顧問的鮑羅廷設計，自一九二九年起着手，據日本方面宣傳，這次改編的要旨是：

一、編成以騎兵爲主的強大的蒙古紅軍，必要時，步兵由蘇聯紅軍方面派遣。爲此必須完成烏蘭烏台（前威爾夫納·烏丁斯克）至恰克圖之間的汽車及馬車運輸設施。

二、爲強化軍隊內的共產分子，貫徹第三國際的綱領。

三、蒙古紅軍應對中國共產軍作精神及物質上的支持，並爲中國共產軍指揮員的學校、

一九三四年以後，經過政治上的整肅運動，這種計劃一度擱淺。後來因爲不能立即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就取範於蘇聯紅軍初期的黨化工作，加強外蒙紅軍的黨化活動。關於軍事方面，由莫斯科派遣參謀上校蘇凱爾氏，關於政務由鮑羅廷氏自任，至一九三〇年四月改編完成，四月二十五日一度撤廢國防部及國軍總司令，把他們的執掌一概移交軍事會議。

（三）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人民軍

一九三一年四月，外蒙政府派遣軍事委員會主席林啓諾氏赴莫斯科，要求蘇聯政府作軍事上的援助。具體的要求，據傳是關於軍火彈藥的供給，教官的聘請，以圖強化外蒙國軍的實力。這一期間，也正是一八二八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後來因爲瀋陽事變，莫斯科政府對遠東局勢的發展異常關切，蒙古人民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政策的發動也十分重視。於是再度恢復國防部，隸屬於軍事會議，後來又恢復人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位，以圖加強外蒙古的抗戰力。至一九三四年又撤消軍事會議。原來軍事會議制度，在蘇聯紅軍中，爲杜哈乞夫斯基等所主張，同樣也以全黨全軍關係而於一九二四年撤廢，據傳和黨軍勢力消長與外蒙古排斥左傾極端派的政策，具有連帶關係的。

後來蘇聯在一九三七年肅清工作後恢復軍事會議制度，但外蒙並不恢復。一般傳說，以為恢復軍事會議制度，將使黨對軍隊的控制加強，使外蒙軍隊左傾，致蘇聯實力威脅外蒙軍。不過實際上倒是因為外蒙人民革命軍已漸趨健全，有了獨立發展的可能，用不到一切惟蘇聯紅軍的馬首是瞻了，而且在外蒙，對於軍隊跋扈的制裁機關，已另有「內防處」的組織，嚴密監察軍隊的行動，此外又有「波爾可羅伊」（檢察處）負責監察軍隊內部革命紀律的普及形態，他的主要使務，包括對於人民革命政府之法律、軍隊高級指揮官之命令及指令等，並為貫徹於軍隊內部的狀況，如有違犯軍紀的事件發生，即可通知「波爾可羅伊」，以待檢查審問及判決。

蒙古人民共和國國防體制的日趨嚴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向滿蒙深入的政策，曾是一大打擊。在「一九一八」事件以後，至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蘇德戰爭爆發，差不多十年之間，日寇對外蒙古數次挑釁，爆發了乾岔子事件，哈桑河事件，海拉爾事件等，但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在蘇聯的援助之下，發揮了自己的國防的威力，給侵略者以嚴重的反擊，使敵人不敢進入蒙古疆土一步。

一九四一年蘇德戰後，蒙古方面實際上已經不再有蘇聯紅軍的援助，相反的，在蘇聯一切援助（人力和物力）完全撤退之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防部，還積極地鼓勵國民，以一切力量，援助蘇聯的衛國戰爭，充分地履行了蘇蒙互助協定。從這裏，在外交上可以看出蘇蒙互助協定是雙方面的，決不是片面的援助；而在軍事上，也可以看出蒙古國防力的強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最後出兵打擊日本法西斯侵略軍的時候，蒙古人民共和國配合着蘇聯紅軍的行動，向東部及南部境出動大兵，從法西斯侵略者下面解放興安嶺乃至熱河北境一帶，建立了輝煌的戰績。

現在，蒙古的國防實力還在繼續增強着。當一九四六年春天，蒙古總理兼最高統帥喬巴山元帥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曾和蘇聯最高領袖史太林元帥論及加強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防建設的重要性，為着保障遠東永久的和平與安全，為着防制國際帝國主義及革命派的陰謀復活，蒙古人民革命軍在這裏担负着極重大的使命。

第二節 蒙古建軍的方式

(一) 建軍的本義

蒙古紅軍，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武器（見「蒙古紅軍讀本」，即蒙古人民共和國與蒙古民族革命軍——一九三五年，烏爾迪巴德著，國立蒙古人民紅軍學校教科書）這裏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為民族的獨立，蒙古的社會革命，及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亞洲的前衛而存在的。所以，蒙古人民紅軍的目的是：

第一，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使蒙古平民從舊帝國俄羅斯及封建中國的壓制搾取下面拯救出來，同時，排除代之而起的威脅者——很明白，當時是指日本帝國主義者。

第二，使蒙古平民從王公喇嘛的暴虐下面解放出來，使由平民建立政權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得以防衛舊榨取階級及和它相禁的反革命派，提高國民的生活，建設文化，保障平民大眾的和平的生活。

第三，爲了上述目的，和友邦蘇聯保持密接的關係。

(二) 宣誓的制度

蒙古人民紅軍爲了這種使命，到了每年五月一日勞動人民革命紀念日，凡是新入兵籍的，必須宣誓。宣誓要旨爲人民紅軍誓忠完全保護人民共和國，如有違犯，願受重罰。又對於身穿紅軍正規軍服者，認爲是一種榮譽，須爲保障蒙古人民共同的權利和自由而戰。爲保護被壓迫民衆的平等生活而戰。所以，宣誓制度之設立，是人民革命政府及蒙古人民給與人民紅軍以責任重大之深切的認識，使全軍澈底了解，如有違反，須受最嚴厲的處罰。

人民紅軍宣誓的內容如下：

(一) 我們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的子弟，在國民及世界無產階級面前，公認我們人民革命紅軍的名

譽。

(二) 我們是革命紅軍的一員，我們誓當以誠心尊重其名譽，努力獲得健強的軍隊及國家的一切知識，決不侵害人民及軍隊的財產。

(三) 我們是紅軍的一員，誓當遵守細密而嚴格的革命責任，率直服從革命政府所派遣的幹部的指示。

(四) 我們是紅軍的一員，必須經常戒慎，決不辱及全體人民及革命紅軍的名譽，協力一致，以期維護全體人民之權利自由的完整，努力使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日益強健。

(五) 我們是革命黨及紅軍的一員，誓當不惜生命，盡力遵從政府命令，擁護人民所已獲得的革命的產物——民權與自由，並防止資本主義之侵入，擊退侵略者，以期革命的偉大事業，更加發展。

(六) 我們是革命者的兵力，如有違反宣誓而受全體人民嫌惡之事，當受蒙古人民共和國嚴厲的法律的制裁。

(三) 兵役制度

蒙古人民共和國採取徵兵制度，大體的原則，是由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大「呼爾登」議會上決定的。

在恰克圖時代，人民革命軍，當然是由人民革命黨員中徵募的。後來政府遷至烏倫，巴都爾，爲了加強革命軍力的必要，開始徵募一般蒙古平民。這一點和蘇聯紅軍所取原則一樣，必須具有階級的資格。就是享有兵役義務的壯丁，按照紅衛軍組織原則，以純粹的勞動階級——即用自己的勞動來維持生活及從事自己勞動的產業的。所以，從來過着資產階級生活的，沒有服兵役的權利。

他們很明白地規定，不得服兵役的是：(一) 靠着別人的勞動，以及資本的利息和地租等收入以維生計的人及高利貸者；(二) 以前的王公、活佛及經常居住於寺院裏的喇嘛僧；(三) 被認定是精神病者及白癡，以及被判喪失廉恥之罪的。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兵役的義務，和蘇聯所會強調的一樣，是一種兵役權利論，

到了一九二四年開始這一規定的「成文」化。

徵募的方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起初曾為適應非常時期的需要，隨時作非組織的強制的執行。年齡，大體上自十八歲到四十六歲。當時人民革命政府的勢力範圍，實際上還很狹小，人口稀少，而且蒙古包又富於移動性，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戶籍不易明瞭；為着迅速征集大量兵力，不得不採取這種辦法。當時編成的紅軍，不過一千五百至二千人。由於對反革命派的苦戰，兵員的減少率很大，又必須擴大強化，於是又擴充壯丁的徵募範圍，從不耕而食的下級喇嘛開始，漸漸擴展到其他「布爾喬亞」階級。但是主要的是課以四個月至六個月的軍役而已。

但是這一層却激起人民革命政權的反感，引起外蒙人民紅軍的衰弱，所以後來又恢復舊制，由鮑羅廷氏主動，實行加強蒙古紅軍，並向社會主義之途邁進，徵兵制度方面，以滿足十八歲為的壯丁合格人選，未足定數時則擴充至滿二十歲的壯丁，但不得超過二十六歲，而在某種場合，則仍可使四十五歲以下的人民，受徵集教育。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合格者的比率，約為全部受檢壯丁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適當年齡，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為滿二十一歲，一九三七年改組訂為滿足十八歲，這是適應日本侵略戰爭中蒙古所佔地位的重要的。入營期為六——七月，除隊期為八至九月。

服役的義務年限為平時五年，後來分為現役及預備役，現役為二——三年，預備役為三——二年，其情況如下：

兵 種	現 役	預 備 役
騎兵、砲兵、戰軍兵車工兵	二 年	三 年
機械化兵、航空兵、通信兵	三 年	二 年

現役期間完結以後，即可除隊而就預備役。但預備役也分期，規定若干期間除隊。這一點，和蘇聯紅軍之

在現役五年後實行十五年的預備役一點不同。不過尚有補充召集的規定時間，似為實際上的後備役。

檢查合格的徵集兵為正規兵，分配在：（一）正規軍部隊、（二）民兵部隊、及（三）學校中服務。經二——三年間的繼續現役服務終了後，可適應時期進學校或補充入民兵部隊。以後一直到四十歲，都得隨時應召參加勸務演習。

（四）民兵及補充兵

蒙古人民共和國除了正規軍之外，尚有民兵部隊，是現役未徵集者及已受教育的兵員所編成的臨時部隊，為使這種民兵作正規軍而服役，又有這樣的規定：

（一）在兩年內施行八個月的學校教育。

（二）為學校編成而召集服務。

（三）其餘期間包含在全部服役期間內。

此外，尚有補充兵制度。這是對退役者為補充人民紅軍員額而規定的。這裏召集以年齡滿四十歲為限度，第一次為三十四歲以下，第二次為三十四歲至四十歲，共分二期，作為補充而被徵集的，均入臨時學校。這種學校設立在各種部隊裏面或部隊所在地方。

第三節 軍隊的構成與裝備

（一）人民紅軍的構成與編制

蒙古人民紅軍有陸軍與空軍兩部。各部隊都會接受蘇聯顧問及教官的指導。大體上騎兵師團司令部中有蘇聯教官二人，每團約有一名。騎兵師團中又有內防處司令部，統理軍民之警察權。此外機械化部隊中，當然也有蘇聯顧問及教官，司令部、本部及團部也都有蘇聯教官。空軍在初期，差不多完全是蘇聯紅軍，後來才開辦

上面的輕機關槍連，戰時分屬於第一第二騎兵連，預備連具有別連的一切兵器，戰時可以補充別的連，補充後的編制和上述基本編制一樣。

每一軍團約有飛機三十架，但近狀不詳。又有裝甲汽車、戰車、炮兵（機械化的）三種編制，從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部隊的機械化運動積極推進，騎兵團中也都配備了高射砲隊和對抗戰車砲隊。

此外，還有「阿特里亞特」（獨立部隊），是一九三七年以後的新編制。

（二）裝備

蒙古人民紅軍的裝備，從制服以至兵器（從步槍到飛機坦克）全部都是蘇聯製造的，所以比起以前的中國軍隊的裝備來，是優越得多了。

砲兵，普通一排有砲二門，一團有砲十八門，由四匹至六匹馬挽曳。在一部份機械化的部隊裏，有汽車牽引重砲。

高射機關鎗隊有汽車牽引高射機關鎗四門（四個班），對戰車砲隊中，有四馬挽曳的對抗戰車砲四門。

騎兵連中，也都配備有對戰車用特別鎗類，機關鎗連有機關鎗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蘇聯技術上的協助，蒙古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起自己的軍火工業，有許多新式裝備，都已可能在自行製造，不僅用以供給蒙古人民紅軍，而且有一部分可以於供應蘇德戰爭前綫。近來，為着保障遠東的和平與安全，蒙古的軍隊裝備，正在積極改善和加強着。

（三）兵力

蒙古人民紅軍的兵力，在中國抗日戰爭以前，不過三個軍團，十一個師團，約計一萬五千。入一九三七年以後增加到二萬五千。用這個數目來和蒙古的人口比較，當時蒙古人口約為八十五萬人（現在號稱九十餘萬），約為二·九名。不過，關於蒙古人口的增加，沒有正確戶籍統計，據專家估計，外蒙人口增加率，最低為一

%最高爲二%，折中數約爲一·五%，然則出生數爲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人，男子約爲一半，當作六千三百七十人，合格率即使高達四〇——六〇%，則爲二千八百人。入伍二至三年，約爲一萬。這裏可注意的就是臨時部隊之改編爲正規部隊，已受教育的預備兵之召集等等。

蒙古人民紅軍可能動員的資源，如爲人口的一〇%則爲九萬人，如爲二〇%則爲十八、九萬人。現在的實際兵力不得而知，但就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幾次對日戰爭，對蘇援助，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出兵東蒙內蒙，兵力也有一部分消耗，所以一九四六年喬巴山元帥訪問莫斯科的時候，會和史太林元帥商及增加蒙古兵力的具體事項，今後如何善於利用蒙古的人力資源一層，是很可注意的。一般說來，蒙古實行的是全國皆兵制度，不分男女性別，一律受軍訓，服軍役，這是和蒙古民族的歷史習慣相適應的，所以非常自然的，蒙古的人口雖然少得很，而兵力卻不見得特別不足。何況，在量的方面之外，人民軍的素質、裝備及戰鬥意識，也都是決定戰鬥勝利的的主要因素呢。

(四) 配置

大體上，蒙古人民紅軍的配置，分爲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以首都烏倫·巴都爾（第一軍團司令部所在地）爲中心，更分爲三個方面配置（一）巴都爾汗——巴伊辛特（達里杭愛）方面，（二）三音希揚達——烏台——薩達加伊特方面；（三）色楞格——巴囊倫戈爾（達蘭薩加泰）——達蘭干思戈爾方面。

人民軍更從這些重要地點，分遣到各地，遠及於國境全綫。

國境的警備處，大約每三十公里有一小警備所，六十公里有一大警備所。兵員自二十名至四十名，有機槍等配備，大警備所有兵員五十至一百名。這是平時配置。

第二方面，以貝音·土曼（第二軍團司令部所在地）爲中心，更爲四個方面配置，即：（一）北方，中（東

北)、蒙、蘇三國邊境之伊爾薩布——曼達瓦伊——薩布達伊方面，(二)馬太特——三晉俄斯納阿麥(馬太特之北二十公里)的中間要地，(三)泰姆蘇克·索蒙方面；(四)猶克虬爾·索蒙方面。

泰姆蘇克索蒙，曾經是所謂「諾門罕事件」的據點，猶克虬爾索蒙，是向內蒙達布蘇、諾爾方面出入的咽喉，馬太特、三晉俄斯納阿麥，都和貝音·土曼及泰姆蘇克，以猶克虬爾為紐結而發展的空軍根據地。伊爾薩布是和蘇聯的赤塔及達烏里亞方面連絡的要地。

東部方面，因為和我國東北交界，一向沒有堅固的監視哨所。起初每三十公里即有一所，後來在偽滿國時代，曾改為每十五公里一所，嚴加戒備。

這一方面的兵力，大體上和第一方面相同。

第三方面，以齊普哈蘭特(第三軍團司令部所在地)為中心，分派到齊爾加蘭特方面和察根羅姆方面，主要任務為維持地方治安及防備新疆省方面的異教徒及異民族。

在戰前，大體上有兩個師團派在第三方面，三個師團派在第一方面，六個師團放在第二方面。自從「諾門罕」事件以後，局面稍有改動，在國防衛方面採取了新的對策。

第二十章 國防實力

第一節 人民軍的戰鬥能力

(一)蒙古軍隊的一般素質

外蒙古不像內蒙古南部那樣漢化，因此保留的蒙古人的特性也比較的多些。他們的特點是純朴和勇敢，但另一

方面就不免過於剛強和輕躁。智識的程度當然比較不高（但近來由於文化教育發達，已大非昔比了），具有強烈的感情。肉體方面很能適應自然條件，所以多很強健，可是，因為天然的條件太壞了，生活環境太單調了，死亡率是相當的高，能够抗爭而生存下來的，當然要算是最出色的人物了。他們在徒步行動時稍有鈍重之感，但是，因為從奶兒時代，七、八歲起，已習慣乘馬，又喜作跌撲、射弓之戲，所以，騎馬及騎射等技術都很熟練，騎兵的機動力也很出名，在戰爭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他們自然地具備的特質，是在外蒙古的大沙漠大草原，雖在暗夜，也不會迷失方向，而且蒙古人的眼力特別敏銳強烈，是歐美及亞洲別國人所望塵莫及的。

在民族的健強性方面，遠超過漢民族及其他東方民族，他們為民族而戰鬥的力量也特別旺盛，在革命及衛國戰事中，他們的戰鬥力量是不容忽視的。

（二）政治教育

蒙古人民革命軍除了一般的共產黨式的教育之外，還受特別的政治和軍事訓練。

在教育方針方面，蒙古人民紅軍讀本上這樣說：「暴虐的封建份子，暴虐的上層階級喇嘛，為了反對革命政治，努力利誘革命份子，分散各地，阻害一般民衆的革命行動及國家事業，發展反革命的學說及陰謀。」

「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屈服，殘暴的封建分子的苛政之再度復活，這一方面是由防衛力的衰弱。所以我們全體阿拉特（平民階級），必須一致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代表人反革命封建份子及班禪喇嘛等進行鬥爭。」

「我們人民紅軍，絕對不許屬於王公台吉（貴族）等舊時代的、進入黑暗時代的活佛、居住在寺院裏不事生產的喇嘛等特權階級繼續存在。」他們公開攻擊蒙古境內的封建勢力，和封建勢力勾結的日本帝國主義，偽滿洲國及中國的新舊軍閥，指導羣衆向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的路綫，向列寧——史太林的路綫前進。因此，

他們在人民紅軍的教育中，往往利用一切機關及一切方法，進行這樣的宣傳：

- (一) 蘇聯是全世界唯一理想的國家，真正文明的國家，最強大的國家，是平民的樂園。
- (二) 中國遭受着帝國主義和新舊封建軍閥的壓榨，中國人民正在爲求自己的解放而苦鬥。
- (三) 日本是橫暴無理的侵略國，企圖併吞滿蒙，建立法西斯的國家。
- (四) 偽滿洲國爲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的傀儡國。
- (五) 喇嘛教在宗教上沒有怎樣重大的地位，有許多怪誕不經的說教，而王公及喇嘛僧則利用宗教迷信以榨取一般平民。
- (六) 爲着和國內外敵人鬥爭，必須有民族的武裝力量。

他們在教育上極力反對國內外王公、喇嘛、富裕份子，反對外國資本主義、法西斯侵略者和封建專制，排斥反共及反蔣份子。例如報紙「蒙古紅星報」等，一直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記載和言論，對於歐洲的納粹法西斯主義，也盡力指斥。使每個人民紅軍都具備正確的國際常識和政治認識。

(三) 軍事教育

人民紅軍的教育方法，分爲(一)一般軍隊教育，(二)黨的教育，(三)平民大眾的軍事化。一般軍隊教育包括：(一)正規軍部隊的教育，(二)民兵部隊的教育，(三)軍事學校教育，(四)預備教育。正規部隊的教育，是在現役期間所受的二——三年間的部隊內教育，在預備期間爲勤務演習而召集，在學校受教育。又正規兵中選，則又可受特科學校、軍官學校的學校教育，民兵部隊等臨時勤務，也受四個月學校教育。一般士兵的部隊教育，分爲：(一)革命教育、普通學科(政治學——共產主義教育、軍事學、抗日反「滿」)反法西斯教育，(二)軍事訓練。在普通學科之中，包含蒙古語教育。每日日課如下：

蒙古人民紅軍士兵日課表：上午五時起床、點名、掃除，六時早餐，六、七、八時學科，九時至十三時爲

術科，包括教練、演習、劍術、射擊、瓦斯教育。十四時至十六時為休息及午餐，十七時至二十一時為學科、自習、兵器及被服之整理，二十一時三十分晚餐，二十二時就寢。

民兵部隊的情況不詳，大體上有如蘇聯的集體農場師團。民兵在二年內受八個月的學校教育。

學校方面，在首都烏倫·巴都魯設有軍官學校，學習期間三年，優秀者可保送到莫斯科去留學。在蘇海·巴都魯市另有蘇海·巴都魯航空學校，此外，還有培養軍事的特科學校。至於兵士臨時教學的各種學校，多臨時設立於部隊所在地的附近。

此外，具有一般平民軍事化及提高正規軍部隊的軍事能力的意義的，是對一般大眾實行準備及補助的軍事教育。

蒙古政府獎勵一般革命青年的團結，使他們的組織軍事化機械化，並獎勵工業技術人員及一般工人的組織，也實行軍事的機械化，使所有阿拉特（平民時階級）組織，成為軍隊的補充機關。

對於婦女，也照上述意義，普及軍事知識。例如最初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日，由國防部教育司長強第德普、師團會議婦女專業指導員特溫斯羅恩二人發出指令，進行集團的社會主義教育，同時以特別命令使首都烏倫·巴都爾市的全體婦女，集合於軍人俱樂部，使受軍事知識。

關於黨的教育，完全和蘇聯一樣。

（四）軍紀

人民紅軍創立以來，一方面有許多規則和教育生活，但在初期不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反動及破壞，從指導員的態度問題、政治軍事警察的失措問題，一直到反蘇派的陰謀活動，日寇法西斯特務的反幹部運動等，使軍隊紀律的維持，遭遇到各種困難。但是由於不倦怠的教育及勸誘工作的成功，由於政治及黨的組織生活的進展，人民紅軍的軍紀，很早就嚴整起來，獲得全國最廣大的平民階級的愛戴。

(五) 綜合的素質

依據上面所說的許多條件，綜合各種情報，外蒙古人民紅軍的素質，大體上有幾個特徵：(一)一般軍官經過革命鬥爭的不斷的淘汰，素質已改善，都有優越的軍事和政治認識，比中國一般下級軍官的能力強得多。青年軍官大多數富於革命戰鬥的精神，勇敢而有嫻熟的戰鬥技術，但是在戰術能力上面還看不到比中國軍官更

好的地方。其中不少是蘇聯留學生。

(二) 軍士的素質，一般的比軍官更優良些，他們富於革命戰鬥的熱情，學術兩科都有很好的成績。

(三) 兵士多勇敢好戰，並多能運用汽車、戰車、飛機等，在戰鬥中的機動性很強，所以往往能以少敵衆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所以，蒙古人民紅軍，在數量上直到今天也許還是區區不足稱道，但是在素質方面却有很大的優點，因此他們能用質的發展，來補充量的不足；同時在量的方面，也在考慮着大大的增加。由此可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軍戰鬥力，已成為遠東不容漠視的一枝革命和進步的力量。

第二節 組織・統帥和給養

(一) 軍隊的政治組織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結社，主要是蒙古人民黨的組織。而人民紅軍，也就是蒙古人民革命軍。照「蒙古讀本」所說，「革命目的之實現，必須促進及提高我們軍隊的加強訓練、戰爭準備及國家工作的實踐」，而蒙古人民革命黨黨章第一章也明白規定其黨義的要旨「爲着防制侵略者對我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威脅，加強我國國權，其根本方策，在以黨爲最重要機關，進謀它的發展」。所以，人民黨以和外國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爲第一義，把重點放在國防上面。關於革命黨的主義，在黨章第五項中規定：「黨委員爲使國防力量充實，當按照黨的

指示，研究軍事的技術、熟習武器的使用，使平民大眾都具備軍事學識，並以一切手段使他們獲得這些知識。黨委員要使大眾認識蒙古革命軍實行主義、目的及義務上重要和莊嚴的事實，必須使政府為援助人民革命兵士之家庭這個目的而發表的法規，切實實施」(黨章第一章)。

爲了建設趨向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爲着驅逐國內反動派，和國外反共勢力抗爭，必須使黨和軍合爲一體。當初蘇海·巴都魯氏使人民革命和蘇聯紅軍聯成一體而活動，以一黨統率外蒙紅軍；不久實行徵兵令，非黨人員數目激增，所謂以黨主軍，也採取了蘇聯紅軍裏所實行的辦法。以後國家體制向國防國家體制前進，一面加強軍民的團結，另一方面，把統帥權的實體放在黨的上頭。

國防國家體制構成上最顯著的事實，可以從人的資源的培養上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人民，由於國民皆兵制、徵兵制，一律須從事於國防業務，要求有充分的軍事知識。他們必須接受下面各種軍事知識的教養，是強制性的：

(一) 徵兵檢查合格的男性青年，須服一定的軍役；(二) 沒有受檢資格的，須捐獻一定數量的財物及服一定的勞務；(三) 未滿適當服役年齡的青少年，須在「兒童會」或「青年同盟」中受軍事知識的教育及訓練；(四) 工業勞動者須入黨，組織工會，受軍事預備訓練；(五) 合作社及集體農場的商人牧人，各在所屬團體內受適當的國防知識及訓練；(六) 婦女亦須入人民黨婦女部、俱樂部、紅色集會場等，在黨的指導之下，受軍事教育及訓練。

這種軍事知識的教育是強制的、義務的。這種組織與制度，在蘇聯及德國，曾達高度的發展，外蒙古方面就完全模仿蘇聯的辦法而實施的。

政治組織也和蘇聯的一樣，是實行革命與戰鬥的黨義的最高主動性組織。產業組織也是這樣。在人民紅軍中另設所謂工業紅軍，在部隊中教授文化教育的基礎知識，施行教育、國家學、軍事學及訓練。又有兵工廠，

翔參觀實習方法，普及科學思想和科學知識。這種組織從下而上，由巴格、索蒙、部盟至地方集團，地方集團為政治區域的單位，由紅軍派遣能幹的軍官來從事教育。這些工業紅軍，後來成為發展軍事工業的基礎。

集團農場和合作社的軍事組織化，也很盛行，例如乾草倉庫的設立，和集體畜牧場密切聯合組織下，實行軍事化。

蒙古人民共和國，就這樣在落後的遊牧經濟的基礎上面，以妥善的計劃，組織起進行近代戰爭的軍事制度。

(二) 統帥權與士兵會議

蒙古人民革命軍的統帥權，依照憲法，屬於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軍事最高權的掌握者，依照「呼爾登」的決定而行動，但是關於軍事的指揮命令，純粹統帥事項，也必須要求總司令的指示或同意。所以，也和蘇聯的制度一樣，有二重存在的形式，實際上黨的支配權是不容忽視的。

蒙古人民紅軍的實際行動，實際上都受人民黨的領導。紅軍在軍事教育之外，還要接受政治教育。所以，平時黨的指導員，在紅軍裏又是司令員，和部隊長一同，草擬將士教育計劃，不單是學科，並且兼及軍事訓練。而一般軍官部隊長，也得尊重司令員的主意。

人民黨黨章第七章內規定，在人民革命軍中設立黨機關，因而蒙古人民革命軍國家訓練處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革命軍及內防處內實行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國家訓練，在軍隊裏領導黨的機關的事業，指導軍隊內的黨的小組會議等。人民紅軍原有的事業，是軍隊的管轄機關，而與黨有關的事業，則須受黨中央委員會的指揮。然而，實際上結果是黨支配了一切。例如當實施教育訓練的時候，凡是軍事訓練的成績不好，都被認為革命精神教育即黨義教育政治教育不好，給指揮官批下劣等的分數。這樣，指揮官就得接受黨代表的指導了。在人民紅軍裏面，有黨組織，也有青年同盟的支部。

部隊裏有部隊指導部，這是由部隊長及司令員編成的，受指導部長的指導。又在司令員領導下的士兵會議，出席者也以黨員為主，他們進行關於所屬部隊的教育、訓練、內務、及經理等的檢討。這是兵士們的軍官批判會，有許多軍官往往因此失意去職。例如蒙古紅星報，經常會登載出士兵會議的結果，發覺「不實行黨的訓練」，「學術科不照規定計劃實施」、「黨的幹部互相傾軋」等等，由士兵檢舉長官及幹部。這樣，有些犯了錯誤的幹部不能不去職。當然，這種軍隊裏的民主作風，起初因為執行得過火些，又免不了有些缺乏黨和政治素養的士兵，有意無意地造成偏激的行爲，使一些並無重大錯誤的軍官脫離革命陣線，又激使一些老軍官走上反蘇反革命的道路；但是，這畢竟不是制度實施的結果，而是制度實施者的錯誤。所以，後來有了比較順利的發展，使軍黨政打成一片，鞏固和發展了人民軍的力量。

(三) 人民軍的給養

比起外國來，蒙古人民軍的給養也許太差了；但是在幾千年來過着「茹毛飲血」的遊牧民族生活的蒙古人，却要算人民軍的給養最精美了。所謂給養，普通是指：軍餉、糧食、被服三者。

在軍餉方面，連長每月薪俸爲一百六十蒙幣（土格利克），排長一百四十，班長階級不過數十，士兵只有十個蒙幣以下了。（按，一個蒙幣，合純銀十公分。物價大概羊一頭二十蒙幣，砂糖一磅一·一三蒙幣，白紙煙二十五支爲〇·八〇蒙幣）。不過這是一九三七年的數字，近來的實情不大清楚。

糧食及宿舍方面，凡在營外居住者，排長以上和家屬一同住在營外，則由官方發給糧食一部分，每人每月可得羊一頭（約够三十五人吃一頓），粉半磅，糖三包，蒙古磚茶一塊，牛油五百公分，肥皂一塊。至於在營內居住的，下士以下都在營內，一切食用由公家發給，食品以羊肉和麵包等爲主。

人民軍每天的伙食，大體上早餐有白麵包四百公分，蒙古茶一些，砂糖五粒；午餐有羊肉及穀類食物的混煮品，約爲五百公分。晚餐有羊肉二百五十公分，羊乳若干。

服裝方面，居住營外的由官方發給上等物品，在營內居住者發給軍帽一頂、軍裝夏冬兩季各一套，衫褲亦夏冬各一套，大衣（外套）夏冬各一件，長靴及「卡登卡」（防寒長靴）各一雙，其他零件不計。

這些是普通給養，在戰時及戰後特別好些，尤其是經過士兵會議，使一般給養有了合理的改善。一般的說，已比普通平民優良了些。

第三節 國防地位與蒙蘇互助

（一）外蒙古的戰略地位

從國際戰略地位上說，外蒙古一直是遠東國際糾紛的中心之一，它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乃至歐美帝國主義進攻俄國的理想根據地，和東北各省居於同樣地位；它也會經是俄羅斯帝國主義經略中國北部並向太平洋北岸西岸伸展勢力的通路；而中國則爲了堅固北部的疆域，爲着本身的安全，也不得不盡力於外蒙古的經營。這就是過去外蒙古成爲國際戰略鬥爭的中心的原因。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者雖然利用外蒙以深入俄國西伯利亞的計劃失敗了，但仍企圖以外蒙古的占領，「大蒙古國」的建立，作爲他們的「大陸政策」中的初步目標。另一方面，蘇聯爲了保障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建設，絕不容許外蒙古受任何帝國主義者染手，而以外蒙古作爲自己西伯利亞的側防上的要區。蘇聯遠東紅軍在西伯利亞的最重要戰略線，是西伯利亞鐵路及附近的汽車路。他們要求這一條路線的絕對安全，同時使戰爭時期有獨立自給的可能性，也非保障這一條路線的安全不可。而外蒙古的動靜，對於這條戰略路線的安全，就有極大關係。從攻擊性的防禦地位來看，站在外蒙古的外線，可以把滿洲作馬蹄形的包圍，構成爲最優勢；特別是突出在東南的一部泰姆斯克·索蒙方面，是襲擊滿洲的心臟部——長春的捷徑，處於進逼天王山與安嶺之側背的絕好地位。

外蒙古在戰略上可分爲山嶽地帶和砂草地帶兩部，砂草地帶又分爲大草原和純沙漠地帶。東部及北部都是大草原，南部是沙漠地帶。大草原原有水草，而沙漠及戈壁地帶的給水量極少。蘇蒙國境一千公里間，一向沒有重要的交通路線，有的也完全是最近幾十年內新建設起來的，大體上已有很顯著的改善。外蒙的經濟以畜牧爲主，近來更積極從事可以維持現代化部隊的重工業資源的調查和開發，而外貝加爾方面的資源運輸已極便利，兵工廠及其他軍需工業也積極在發展起來了。因此，外蒙古的國際戰略地位，更因爲它本身各種條件的改革而顯得特別重要。

外蒙古的地形，大體上都是空曠的荒野，這正是現代化快速部隊的戰場。不過在沙漠地帶，有一部分地區，對於機械化部隊的行動，比較的困難些。因此，在軍用卡的車胎方面，蘇聯已替蒙古研究成一種特別原料，以適合在沙漠戈壁行駛的特殊條件。在蒙古的國防政策上乃至經濟政策上，暫時放棄鐵路政策而採取無限制的汽車交通政策，這是極可重視的一點。據日方報告，當諾門罕事件發生之時，蘇聯從遙遠的烏拉爾向外蒙古東南前線增援，曾在極短期間，駛到了五千輛以上的運輸汽車私用汽車，除了高度的機動性之外，又對於汽車路破壞的修理，及建築也比較便利。因此，曾保障了短時期內打擊了日寇的侵略計劃。

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戰略地位，不僅沒有減低，而且是更加提高了。這不只是由於中國中央政府已經正式允許其獨立，而且由於國際反動派與法西斯殘餘之勾結，企圖製造第三次大戰，而特別以中國問題——東北問題爲發火點。對於這種反動派除險謀的粉碎，外蒙古的戰略地位和中蘇蒙古間的合作，是具有極鉅大的作用的。

(二) 蘇聯紅軍與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國依據蘇蒙互助協定，在戰時有互相援助的責任。所以抗日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威脅蒙古的時候，據日方報道，蒙古境內的蘇聯軍隊，大有增加。大體上除了空軍兩個旅團以上，騎兵一個師團

、追擊團二個以外，並且派遣特別遠征機械化兵團，後來又增加追擊師團二團。機械化軍團以駐紮在三音希揚達到烏台方面爲主，直接對張家口方面戒備；別的部隊，則派遣到泰姆斯克·索蒙方面。這一方面，還派遣出幾個獨立的機械化部隊。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全部兵力約達四、五個師團。空軍有二——三旅團，約有飛機三百架，戰車亦約有三百輛。

後來因爲諾門罕事件，蘇聯陸續向蒙古增兵，一時計追擊師團三個、機械化軍師團四個，其他師團約七、八個。飛機一度集中達一千架以上，戰車的集中數字，也打破以前紀錄。第二次歐戰爆發後，爲防日寇進侵，蒙境蘇軍兵力幾乎時有增加。直到一九四一年四月，蘇日中立協定成立，集中這一方面的蘇聯兵力，才逐漸向蘇境撤退。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他們這種兵力才可以從容調到前線，並有蒙古軍隊出發援蘇。當然，那時蒙古國內已經沒有蘇聯軍隊存在。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蘇蒙互助條約是怎樣切實平等地實施的了。

第二十一章 社會和文化

第一節 教育事業的進展

(一) 革命及人民政權初期的教育

蒙古在革命以前，可說沒有什麼教育設施。多少能够讀些書的，只是少數王公官吏的子弟和喇嘛，然而，喇嘛大多數又不學蒙古語文，而是學習西藏的經文。至於蒙古一般人民大眾，都是沒有學問的文盲。

外蒙古到一九一一年開始創辦平民學校，那是設立在庫倫即今烏倫·巴都爾市的；一直辦到一九二二年。

校長是布里雅特的進步的學者伽姆札拉諾氏。以後成爲人民革命中心人物的伽·達姆巴、達姆巴·德爾第、鮑德、喬巴山等，都曾在這個學校求學。後來在伊爾庫茨克、特羅伊哈薩夫斯克及赤塔等地的俄國學校留學，還有雖未在這個學校讀書，但多少受到伽姆札拉諾氏的思想的影響的，如哲倫德爾第、阿摩爾等人物。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恰克圖召開第一次全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在綱領第一條中，規定提高民族文化到世界的水準，這並不是偶然的。

隨着革命的進行，特別重視教育刷新設施的擴充，但是，因爲政局的混亂不安和國庫的窘竭，一直到一九二四年，還只有學校十六所，學校總數不過男女生四百餘名，教育費預算總額只有十一萬墨西哥銀元，說不上什麼顯著的發展。

因此，革命政府建立政權的時候，於了解文字的寥寥可數，大多數只好任用王公貴族及中等喇嘛，在他們的背後有着不可分裂的經濟的勢力，常常在黨及政府內部形成右傾的危機的根源。

所以，首先必須培養平民出身的本黨的幹部，爲保障政權堅固的主要條件，政府不得不急急用最大的力量，推進文字教育，開設小學校，以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

教育部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組織成立。一九二五年開辦以養成合作社從業員教師、司法官吏爲目的的人民大學及中學校，又爲撲滅文言而開設教育十歲到三十歲的人民小學校。接着，俱樂部、勞工俱樂部、學生及革命青年同盟的文化啓蒙運動也組織起來了。後來，還派遣數萬名青年男女到蘇聯的專門學校，勞工大學、高等學校、以及派遣到法國、德國、美國去留學。

爲着考察研究現代教育設施，人民政府首先派遣當時的教育部長艾爾台尼·巴杜汗到蘇聯去。又用各種獎勵方法，吸收下層喇嘛到小學校和特殊小學校裏去讀書。教育部在一九二六年確定了國民教育十年計劃，可惜因爲和人民共和國的財政的實情不合，終於未見實施。

一九二七年起，國民教育才有比較廣泛地實施，後來以非常急速的程度展開了，那是在極左派掌握政權的時代。但是當時只知置重於學校網的擴充和學生人數的增加，對於質的方面，不免太疏忽了。

爲了矯正這種缺陷，從一九二四年起，開始推進新的教育政策。這裏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一九三四年，規定了居住在寺院裏的未成年喇嘛的蒙古語義務學習法，爲着這些喇嘛，開設幾家專門的小學校，收容學生七百三十九名，這種少年喇嘛學生，後來增加到好幾萬人。

(二) 二次大戰期間的蒙古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有了新的發展。

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學制年度，計有小學校八十一所、中學校九所、師範學校一所、醫學校、獸醫學校、地理地質學校及合作社專修學校、通信學校各一所。此外，尚有修業年限二年制夏季畜產講習所（私塾）七十四所，收容學生一千二百三十六名。這些私塾，是從一九三四年以後組織起來的。在一九三八——三九年度，總數已達一百九十所，學生四千二百九十二名。其中四十二校轉變成具有冬季設備的常設小學校。此外又有收容學生至八十五名四年制的中心小學及一校收容學生一百七十五名的中心中學校組織，也開始創辦起來了。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校情況如下：

小學校數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九年
同上學生數	五九	九五
中學校數	三、一二五	七、五八二
同上學生數	五	一一二
私立學校	六〇〇	三、一二五
	四	一九〇

同上學生數

技術學校及特殊小學

同上學生數

小學校教師數

成人中之了解文字者

同上對一般成人之比率

國家教育預算(單位土格利克)

又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蒙古教育概況有如下表：

年 度

小學校

中學校

年 度	校 數	教 員	學 生	校 數	教 員	學 生
一九三〇	一一一	一二二一	五、九五〇	一一	三六	八一五
一九三三	五九	一二七	三、一二五	五	三四	六〇〇
一九三四	五九	一二七	三、一二五	五	三二	六〇〇
一九三五	七〇	—	—	六	—	—
一九三六	七五	—	—	八	—	—
一九三八	八三	—	七、七五〇	一二	—	一、〇〇〇
一九三九	九五	—	九、八六九	一三	—	一、三七五

一九四〇年度的國家教育預算為一千萬土格利克。第十次蒙古人民革命黨大會及第八次大「呼爾登」，都會通過了擴充國民教育的新方案，包括：(一)為在四——五年內使學齡兒童全部就學，展開小學校網；(二)

(二) 各「素蒙」一律開設小學校；(三) 動員全國教職員、知識份子、識字的牧民、及社會機關、肅清成年文盲；(四) 擴充師範學校、教員養成講習會、勞工俱樂部網等；(五) 增設十年制小學校，並着手創設高級學校。

教育費在原則上全部由國庫負擔，但是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以遊牧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學校學生不能實行通學，所以全體學生都要收容入寄宿舍的話，勢必增加牧民的教育費負擔。至於貧民子弟，則教育費以及宿舍費、服裝費等，一律由國家負擔。

(三) 最近的蒙古教育事業

據最近的統計，一九四四年度，全國共有小學校二百八十五所，中學三十六所，專科職業（技術）學校八所。除了固定的學校之外，還有巡迴（遊牧）學校一百九十所。文盲數已經大大的減少了，如果說革命前蒙古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文盲，那麼，一九四二年只有百分之六十五了，現在差不多已經沒有文盲了。此外，高級教育也有了發展，蒙古國立大學已於一九四二年在首都烏倫·巴都爾開學，分設五院。

一九四六年二月，蒙古人民共和國代表——副總理蘇倫甲布等一行八人到重慶，據該代表團發表，全國已有國立蒙古大學一所，中學五十餘所，小學五百餘所。全國已無文盲。學齡兒童都可以完全免費就學，新學制規定小學三年，中學七年，大學五年。從中學起學習外國語文，而以俄文為第一外國語文。蒙古大學分設文學、語言、農業、畜牧、醫藥及獸醫等五院，以政治及經濟為必修課目。大學教授，起初多為蘇聯人，現在已多蒙古人。中學及小學教員，已普遍聘請女性担任。

總之，由於人民政府政治設施的進步，經濟的發達，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教育事業，已有了飛躍的發達。這個從來無文化的大漠之間，現在可以使我們以「五千年文明」自誇的漢族教育家為之惶愧了。

第二節 文化與藝術工作

(一) 新聞雜誌與出版事業

正像本書第一部關於蒙古民族的一章所說，蒙古在革命以前，是愚昧的黑暗的枯燥無味的荒漠。當時沒有報紙和雜誌。所謂「文學」，也只是支配階層的獨占的寶物。一般大眾的精神生活，完全被喇嘛教所支配，並且只有從西藏、印度、及中國本部，由口頭流傳而來的神話、寓言、歷史故事等等，成爲滋潤大眾生活的唯一的精神食糧。

人民革命把外蒙古的政治和經濟煥然一變，對於民衆的生活和社會心理，也帶來了一大變革。在這新的社會心理的組織裏面，發生重大的作用的首先是新聞事業。蒙古最著名的報紙，是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Uner」(真理報)，人民政府的機關報「Aladin Udsene Eln」(民權報)，革命青年盟同的機關報「Fudsharta Zarnohivudin Uner」(革命青年真理報)，人民革命紅軍的機關報「Uran Wud-in」(紅星報)，蒙古職工聯合會的機關報「Soljin Thian」(勞工文化之路報)等五種蒙文報紙，此外尙有其他小日報、三日刊、週報半月刊等不少，發行份數，在戰前已有六七萬份，現在——一九四六年，單以庫倫發行的二十多種而言，發行總數約達十餘萬份了。

全國最著名的雜誌計有七、八種，發行總數約有五、六萬份。俄文雜誌最出名的是「現代蒙古」雜誌，本書有許多資料就是根據這種雜誌的。

通訊社事業也已發達起來了，最主要的是真理通訊社。

出版事業也有了飛躍的發展。除了蒙古語的各級學校用的教科書，教師及學生用參考書，專科書及地圖、年鑑、等等之外，一般人民的讀物也開始泛濫在牧民羣衆中間了。

(二) 蒙古藝術的新時代

由於教育的逐漸發達，造成了新的民族知識階層，在詩、文學、音樂、美術、雕刻、繪畫、戲劇和電影等方面，發生了許多新的果實，也湧出了新的人物。翻譯文學非常盛行，從恩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等各種論文及專著，一直到威爾斯的故事，巴爾扎克、普希金、安徒生、薄伽丘、高爾基、傅爾曼諾夫和其他世界成名作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有蒙古文的譯本。有許多國際名劇，先後用蒙古語來上演，如戈果里的「巡按」，始終在蒙古新劇壇上獲得觀眾的愛好。

當然，蒙古的劇場和中國及別國不同，那裏沒有正式的大規模的劇場。除了首都及大都市之外，最普遍的是游牧羣中的巡迴劇、流動電影場等等。

無線電廣播事業，在遠東沙漠和草原地帶，要算外蒙古比較發達，工人俱樂部等處也有了種種新的娛樂。劇場中，首都烏倫·巴都爾的中央戲院，從一九三〇年秋開演「人民之家」以後，逐年發達，成爲外國使節及旅客們回憶的對象，它的成就，曾經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劇場奧林匹克上獲得讚美。此外，一九三五年又建設了革命青年劇場。

政府在近年來，特別努力於電影的攝製和普及。烏倫·巴都爾有中央電影攝製場，有近代的設備，由蘇聯專家作技術上的援助，除了聘請外國專家、技師、攝影師等等之外，更努力於電影演員及電影攝影專家的培養事業。

蒙古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國產電影，都是以重要歷史事實的紀錄片及國家政策宣傳片爲中心，是些短片，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紀錄片等等。後來又向學術性的文化電影發展，有「鼠疫」、「羊皮」、「戈壁沙漠的征服」等。再進一步，又有向外國介紹人民共和國情形的電影，如「現代蒙古」，以及反封建抗日戰爭的電影等等。

在藝術電影片方面，首先有「第一課」的完成，博得全國和國外的榮譽。後來又和蘇聯列寧格勒攝影所合作，完成了一部提高人民革命的歷史片「蘇海·巴都魯元帥」（蘇海·巴都魯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有「蒙古之列寧」的尊稱）。在革命二十週年紀念日——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放映。此外如「蒙古之夏」等，由蒙古作家賴德那、巴柴爾、南範亭等和老作家范·賴平、諸·哈萊維契等合作，有了相當的成功。

此外，專為少數民族的藝術——尤其是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等，也已有相當的成就。在少數民族中，在軍隊裏，各種文化教育及娛樂工作，和廣泛的文化啓蒙運動，同時並進，使一般蒙古牧民的文化水準，大地提高了。

(三) 蘇聯對蒙古文化的貢獻

蘇聯對外蒙古的宣傳方法，大體上一方面由莫斯科的中央圖書出版局對蒙古遊牧大眾介紹布爾什維克論及各種重要文獻。中央印刷局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了拉丁字的布里雅特蒙古版及蒙古文字的蒙古版的「階級鬥爭史叢書」，其中包括單行本「英吉利的經濟發展與勞工運動」、「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從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法蘭西大革命」、「英國工業勞動者革命與基爾特主義」等等。此外隨時出版一般前共產主義文獻、聯共黨史，蘇聯共產黨會議上的報告及決議，都是用蒙古文、布里雅特蒙古文、卡爾摩克蒙文出版，顯然，這一方面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對象，不是蒙古一般平民（遊牧大眾），而是人民革命黨幹部和蒙古人民政府內的官吏、以及人民革命紅軍中的將士。

另一方面，是適應蒙古一般人民大眾及現實環境，在烏蘭·烏台創辦布里雅特蒙古學院，這當然以對布里雅特蒙古進行宣傳教育為主，而因為這裏有大部分農民過着定居的生活，所以學院的工作特別關注到農民和農業問題方面。學院附設的印刷所，有蒙古文及拉丁文的活字，出版各種通俗的書籍——小冊子，如「蘇聯的憲法和農民的幸福」、「勞農委員會與農村婦女」、以及對合作社等等的活潑的宣傳。也有以喇嘛和封建

領主爲對象的諷刺喜劇，作巡迴表演。

烏蘭烏台發行有俄文的和蒙文的布里雅特蒙古真理報，在外蒙古也負有宣傳教育上的重大任務。又於一九三九年四月，開始在布里雅特蒙古，將從來的拉丁字拼音改以俄文字母拼音，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習俄文的風氣也很盛行。

蒙古自己已在首都烏倫巴都爾創立「蒙古科學學術院」（學術院，日文譯稱翰林院，中國舊譯學士院），他們起初接受蘇聯科學學術方面的幫助，同時努力於蒙古學術人才及學術風氣的培養。而對於蒙古古典及現代文化的發揚與提高，盡了很大的力量。他們早在一九三四年編纂和出版了一部「綜合蒙古史」，遠從芬族說起，發揚蒙古民族意識，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及無產階級的解放連結起來，而強調對蘇聯合作的重大意義。一九三四——三五年又出版「蒙古語及蒙古文字獎勵講義」，確定了蒙古文法上最主要的問題——綴字的統一、新外來語的蒙古文化的標準。像這種具體的工作，都在積極進行。此外，世界著名的蒙譯工作，也早已開始有系統地進行和完成了。

第三節 人民革命與宗教

（一）革命前喇嘛教的勢力

蒙古文化生活中，具有強烈的宗教意義，這是在本書開頭已經特別指出了。然而在人民革命以後，宗教已不再是蒙古人民命運的支配了者。

喇嘛教在十六世紀的後半期從西藏傳入蒙古，爲佛教的一派——宗喀巴創始的黃帽派。清朝曾在一六九一年由康熙皇帝親臨多倫，授喀爾喀族各王公的封爵，使外蒙古從事實上成爲自己的屬領，因此採取特別優待喇嘛教的政策，又因此，使蒙古人紛紛歸依喇嘛教，而喇嘛在外蒙古的權勢也超過了王公。

由於上下尊崇，紛紛捐獻金物，喇嘛寺院日趨興旺，寺領各種特權，也因官方的支持而日益膨大，到處成爲曠野的牧民的經濟中心。從自治蒙古時代起，博格德·甘肯（活佛）更爲一國的君主，一手執掌外蒙政教大權，因此喇嘛人數日益增加，一時達十五萬人，占全國男子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寺院領有的家畜，有二百七十萬頭之數，占全國富力的百分之二十。以每一國民所有家畜來算，則平均平民有家畜二十三頭，而每一喇嘛則有三十三頭。這些不事生產的人物支配了生產大眾，結果對國家會招致如何不幸，是很明顯的。

（二）人民革命後宗教勢力的演變

因此，使喇嘛教和蒙古政治及蒙古人民分離，成爲必要的急務。一九二一年人民革命成功，才使舊的外蒙古爲之煥然一變。革命政府雖然暫時以活佛爲元首，但已採取政教分離政策，在宗教界承認活佛的最高主權，但政治上要求其放棄主權。到了一九二四年活佛逝世，革命的急進主義的一派，立刻宣布民主共和制，打擊了寺院方面推戴第九世活佛的計謀，並以憲法規定政教分離，認爲宗教信仰只是人民的私事。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政府實行右傾政策，在宗教界方面，也採取彈壓宗教、游牧上層喇嘛的財產及集體牧場的政策，承認未成年喇嘛脫離僧籍的自由，規定編入僧籍的限制。不過這種操之過急的政策，和在經濟部門的左傾政策一樣，遭到失敗，以舊封建份子及喇嘛爲中心的人物，策動了廣泛的反革命運動。後來政府改變政策，當時沒收財產的上層喇嘛共計五百餘戶，家畜三十五萬頭。以行政力使還俗的喇嘛爲四萬人。

一九三四年以後，政府專力以課稅政策以動搖寺院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動員下層喇嘛到產業戰綫和軍隊裏去，終於逐漸消滅成爲反革命勢力的巢穴的寺院及僧侶層的勢力。當局鼓勵少年喇嘛自動的或由雙親勸他們還俗，對還俗喇嘛分配寺院家畜，而對寺院則用捐獻方式加以限制，對喇嘛則獎勵接受職業教育，施行蒙古語教育。對喇嘛特定資格者，賦與選舉權，充許出任國家機關的下級官吏。此外，對於下層喇嘛，允許從事私營商業、運貨業、手工業及畜牧等，銀行業等對於這些喇嘛也特別融通資金，予以種種援助，使喇嘛深感人

民政府對他們的好處，而不要少數封建領主野心家的欺騙。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又根據喇嘛生產合作社組織法而成立合作社，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已有一百零八個社，參加的社員達五千五百四十九人。

(三) 科學和文化代替了宗教

從此以後，喇嘛教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已成為純粹的私人信仰中心，和國家政治完全被脫離關係了。而且，從前活佛的宮殿，現在也改變成為博物館了。此外由於人民共和國政治及經濟政策的成功，一般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與藝術工作的進步，使廣大人民再也不必向宗教方面去尋找安慰，逃避現世的痛苦了。所以，蒙古的喇嘛教信徒，也自然地日益減少，一九一七年有十一萬七千名，一九二八年為九萬五千名，一九三二年為八萬二千人，一九三八年為八萬人，一九三九年為六萬人，現在已不到五萬人了。

第四節 社會生活的改善

(一) 革命前的社會生活狀況

人民革命黨在恰克圖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已經規定了關於增進人民福利的衛生保健方案。因為在革命前，外蒙古人民中有百分之四十患有霍亂及其他花柳病，結核患者也有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癩疥等皮膚病、傷寒、天然痘、麻疹、獸疫等，也很猖狂。向來只靠幼稚姑息的西藏喇嘛的醫藥和禮禮，呪禁等等，毫無公家的衛生保健設施，因此，一回到想到革命以前的蒙古民族生活的陰暗，不能不令人為之毛骨悚然。

(二) 革命後的衛生保健工作

人民革命以後的情形開始轉變了，一九二二年最初在首都創辦了一家歐洲式的大藥房，一九二五年六月，內政部也正式成立衛生局。一九二六年，衛生局又在烏倫巴都爾創設第一家歐洲式的中央醫院。當時還沒有蒙

古人醫師，所以從醫師到看護，都由蘇聯聘請。後來才逐漸注力於蒙古人醫藥及看護人才的培養。

蘇聯對於外蒙古衛生保健方面的設施，有過很大的援助。蘇聯衛生人民委員部，會應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要
求，於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七——二八年，幾次派遣醫學調查隊，從事關於風土病的調查、當地保健設施的合
理的設計、母性及嬰孩保護計劃的建議等等，另一方面則開辦蒙古人醫療人員助手養成講習所，在各地方設置
診療及巡迴診療隊等等。

一九二九年開辦了二年制的醫士助產看護講習會。這所講習會從一九三五年起實施新學制，改組為三年制
的醫學校，一九三六年又改組成爲四年制的醫學校。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具有醫士助產的資格。學生的收容數
亦增加爲一百名。

衛生局至一九三〇年脫離內政部而爲獨立的一個部，保健衛生設施也因此迅速進展。一九二九年，首都
兒童保健館的設立，一九三〇年又有「嬰兒及母性之家」創立，一九三一年在各大城市設立託兒所、幼稚園、
兒童保健館等等，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主要地點，都有歐洲式的大藥房，國立醫療器具藥品站、國營
醫藥供應局等，也先後設立。

一九三三年，又有國立衛生細菌研究所創立，這個研究所裏設有瘋犬預防課、鼠疫預防課等，研究所除了
廣泛的學術研究之外，又向民衆展開了衛生啓蒙運動。

人民共和國在一九三四——三五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天然痘預防接種。依據當時的調查，國民中有百分之三
十爲天然痘罹病者，而這種罹病者的死亡率則達百分之五十。

(三) 衛生保健專業的躍進

衛生保健運動之正式的開展，是從一九三八年發動的，當然，這是和其他經濟及文化部門的建設運動共有
密切關係的。據蘇聯方面的報道，歷年衛生保健設施，統計：

(甲) 派出診療所，一九三四年三十五所，一九三五年四十七所，一九三六年七十二所，一九二七年八十一所，一九三八年三百十所，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三百七十八所。

(乙) 診療關係機關從業員，一九三四年只有六百六十二人，一九三九年已增加到二千四百九十二人。

(丙) 入院病人收容力，一九三四年只有五百九十三人，而一九三九年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九人。

(丁) 藥房，一九三四年不過四家，一九三九年已增加至十八家，平均每「盟」已有一家現代化的藥房了。

醫學校的在校學生，一九三九年為二百四十八名，派赴蘇聯留學的九名。這一年從各機關畢業的計有各種講習會的助產婦四十五名，藥劑師十五名，「索蒙」診療所看護婦三百二十三名，其他合計五〇三名。又有出席醫學講習會的，一九三八年有一萬七千名，一九三九年單只地方上的醫學講習會的出席者，已達四千八百九十名。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蒙古人民共和國所有「索蒙」（村，地方自治基層單位），都已設有派出診療所，這種派出診療所是經常設立的，有收容病人七人至十人的能力，可以應救急病。如有重病者，則由這種派出診療所轉送各地醫院分院，受嚴格的治療。地方醫院分院，大約每二、三個「索蒙」合辦一所。

一九三九年三月，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一次醫療機關從業會大員在烏倫巴都爾開會，討論人民保健問題及衛生設施等等，注意到歐洲式醫學的普及和醫療機關的擴充，為此而號召牧民自動地獻捐，合力促成。這一年的獻金額達二十萬蒙幣（土格利克），捐助的家畜也有五千頭以上。而國家保健費的支出，也從一九三四年之二、四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土格利克，在國家預算上佔有相當大的比率。

第十次人民革命黨大會又通過議案，調查全國鑛泉，設立勞動者休養院溫泉療養地等，而首都的中央醫

院，更在蘇聯援助下，完成近代化的全新設備，聘到各科專門的名醫。

由於保健衛生設施的完善、醫藥知識的普及，蒙古人口年年增加的死亡率減少了，相反的，人口已漸邊增加，一九二五年人口為六五一、七〇〇名，一九三九年為八四〇、〇〇〇人。一九四二年已達九、〇〇〇、〇〇〇人。

人民的政權，新的制度和政策，終於建立起和平幸福的新國家。

第九部 獨立和富強的路

第二十二章 中·蘇·蒙古關係的發展

第一節 蒙蘇關係的發展

(一) 革命時期的蒙蘇關係

蒙古和俄國的關係，一直是殖民地帝國主義的關係，這種關係繼續到了俄國大革命完成誕生了蘇維埃政權之後，才開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以後如蒙俄（蘇俄，和後來才擴大而為蘇聯）的關係，成為國際友善互助的最好的榜樣。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俄羅斯的人民大眾，推翻了自己的沙皇、大臣、大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權——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這個政權的民族政策，開頭就很明顯地表示和實施：解放一切曾經被沙皇壓迫的各民族，並進而與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係。早在一九一九年，蘇維埃政府已經向蒙古人民發出宣言：

「蒙古是自由的國家。蒙古必須驅逐出俄國顧問、金融家和財閥——這些曾經使用武力和黃金以支配蒙古人民而擠出他們最後的一滴血的。自由蒙古國內的全部政權和司法權，必須完全屬於蒙古人民。任何外國人都不得干涉蒙古國內的事情。蘇維埃政府特別把這一層意思向蒙古人民高聲宣布，請立刻和俄羅斯人民建立外交關係，派遣自由蒙古人民的代表來迎接紅軍。」

這個宣言是和對中國的相同的宣言在差不多同一時候發出的，雖然並沒有立刻獲得反響，但是對於蒙古人民大眾，曾經是一大興奮劑，催促他們起來和封建勢力及外國帝國主義者作戰以求自己的解放。到了一九二〇年，這種爲人民自求解放而組織起來的革命團體就開始組織起來。一九二一年三月，人民革命黨在恰克圖召開第一次大會，選出臨時革命政府，正式確定了黨和政府的戰鬥目的是驅逐外國侵略及掠奪者，爭取蒙古人民的獨立自由。而且，在大會中又一致決議，要求和蘇維埃俄國政權建立互助關係。終於，在不久之後由於蘇俄紅軍的援助，使人民革命勢力進佔首都，迅速地擊潰白俄及中國軍閥在外蒙古的勢力，推翻了溫甘倫男爵的專制政府，鞏固和發展了人民革命黨和人民革命的事業，肅清全國內外一切反革命勢力。

在蒙古革命政權爭取解放的時候，蒙古革命的政府爲了保障革命的果實，肅清反革命勢力，曾經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通牒蘇俄政府，表示在蒙古沒有完全消滅盤踞境內——東部蒙古草原的共同敵人及其組織新政府的威脅之前，請蘇政府暫勿撤退蒙古境內的紅軍。蒙古方面的這個要求，曾經立刻獲得滿意的答覆。這年八月十日，蘇俄政府覆牒蒙古政府，表示：爲着還沒有澈底消除對於蒙古人民自由發展的威脅，爲着還沒有消滅對於俄羅斯和遠東共和國安全的威脅，蘇維埃政府決定同意蒙古政府的要求。

十月十七日，蒙古人民政府又致牒蘇俄政府，請以共同行動，消滅集於蒙古西部的白衛軍的殘部。十月二十八日，蘇俄政府覆牒蒙古政府說：爲了實現蒙古政府的建議，爲了俄羅斯共和國的安全，命令自己的軍隊，和蒙古人民革命軍共同行動，對殘餘敵人，給予斷然的打擊，以求保證蒙古和蘇俄人民和平建設的條件。

(二) 建國初期的蒙蘇關係

當蒙古人民獲得解放的時候，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長徐采林又通牒蒙古人民政府，歷述一九二一年以來的蘇蒙外交關係之後，在這牒文中宣稱：「在這以後的幾年，在蒙古和蘇聯軍隊保護之下，由於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動，國內建立了真正的秩序，保障了進一步的民主化的條件，召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由於這種情形，和蒙古交界的俄羅斯共和國，以及依照人民的意志加入俄羅斯聯盟共和國的遠東共和國，也建立了強固的秩序。並且，又由於白俄羅斯匪軍的完全剷除，繼承俄羅斯聯盟共和國政府外交關係的蘇聯政府，認為蘇聯軍隊在蒙古共和國境內已無必要。

「蘇聯政府對於蒙古人民代表大會能够完成蒙古的國家建設，保障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表示充分的滿意。為此專誠奉達，並表深刻的尊敬。」

蒙古人民政府方面，當即由內閣總理崔林·杜基覆牒，表示以下三點：

(一) 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再度證實一九二一年會送致七月及十月牒文的事實，請將英勇的紅軍部隊暫時留駐，使與我國年輕的革命軍隊，共同消滅會使我國家受無數災難和損失的溫甘倫男爵巴基茨將軍等的白匪，對閣下通牒中所陳述的各點，完全同意。現在特別表示：同意現今駐在我國境內的紅軍部隊撤退。

(二) 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全體蒙古人民，完全一致認為向閣下說明下列各點，實是在自己愉快的義務：就是紅軍部隊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留駐蒙古的時期內，在指揮人員、政治人員和紅軍士兵方面對人民、對當局、以及對於我們鄰國的關係，特別是對於偉大中華民國，都顯示出有紀律、有教育、極忠誠的最高模範的最好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代表全國蒙古人民以最大的滿意和感激，聲明：在把蒙古人民從強盜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走上現代文化、經濟、法權自由發展真正人民政權的大道，紅軍在這一事業上，對於蒙古人民，具有不可忘懷的功績。現在請閣下將蒙古勞動人民的偉大謝意，永久感激和不變友誼的保證，轉致貴國的工人和農民，英勇的和世界唯一澈底地保衛被壓迫與被奴役大眾的紅軍，它的領導機構和政府。

(三) 蒙古勞動人民和他們的政府，認為從此以後，蘇聯和我們共和國的人民，將被一種不可分離的共同命運的利益和真正民治的偉大理想所聯繫着，兩個共和國的今後的生活，將在真誠的友誼中和勞動的相互援助中過去，我們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堅信：假使再發生類似一九二一年的情形，蘇聯紅軍必會來援助我們。

「人民委員長閣下，除將上述各點陳述之外，並請閣下接受最好的保證和尊敬。」

從此以後，十多年之中，蘇聯表示真正大公無私地在各方面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從蒙古的產業到蒙古的民族文化。就前者言，蘇聯會好幾次把恢復產業所必要的物資贈給蒙古，貸與不收任何利息和不用任何抵押的借款，在償還方式方面採取二十五年內分期償付的辦法。並且提供必要的人力和技術，恢復和改善蒙古的畜牧業、發展蒙古的羊毛業、新工業和機械運輸業。當各種企業建立起而且能够健全發展之後，就無代價地讓歸蒙古人民自辦。對於後者，在改善社會生活提高民族文化方面，蘇聯也盡了極大的助力，創設和發展醫藥衛生事業、獸醫事業、教育、新聞和出版事業，這一切，我們已經在以前幾章內詳細講到了。

(三) 二次大戰前後的蒙蘇關係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正當蒙古人民共和國以全力從事和平民主建國工作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推進大陸政策，積極向滿蒙侵略。年輕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形勢，因此又緊急起來。在這個時候，靠着保障蒙古的安全和擊潰了日寇的侵略的，主要的力量的來源，就是——蘇蒙互助協定。

如上所說，僞滿洲國在日本侵略者指揮之下建立以後，蒙古的安全與獨立就感到嚴重的威脅。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蒙古人民政府就和蘇聯政府之間訂立君子協定，禁止蒙古和僞滿之間直接的接觸，保證蒙古的安全與獨立。到了一九三六年春天，日本的侵略野心更見猖狂，蘇蒙間成立正式互助協定的需要更爲迫切了。三月一日，蘇聯民族領袖太林在對美國新聞記者霍華德關於日本準備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問題的談話中，聲明了蘇聯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國維護其安全與獨立的決心。在三月十一日，蒙古總理阿摩爾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委全體會議席上發表演說，表示「史太林的聲明，給我們灌輸了新的信心和力量，繼續爲蒙古反帝反對建革命的偉大理想而鬥爭。這些前提使我們堅信，日本奪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計劃，是永久不能實現的。」

第二天，三月十二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之間，在烏倫巴都爾簽訂了蘇蒙互助協定。

議定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根據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因紅軍援助而從白衛軍下獲得解放以後兩國間所存在的不變的友誼，爲了希望維持遠東的和平並且更加強化兩國之間所存在的友好關係，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後，兩國之間，又會爲了預防及警戒武力攻擊的威脅，及當第三個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或蒙古人民共和國加以攻擊之際相互實行援助，規定了雙方必須以一切手段相互援助的君子協定，現在決定成文化而爲本議定書，並爲下列目的而簽署議定書：

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蒙古人民共和國聯邦政府，在有受第三國攻擊之慮的時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立即對所發生的事態共同協商，並爲保證兩國領土的安全而採取必要的手段。

第二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如果締約國的一國受到武力攻擊的時候，決定相互實行包含軍事援助的一切援助。

第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當一國的軍隊爲履行第一條及第二條所記載的義務，得根據雙方同意駐兵於對方國境，到了已無這種必要的時候，當然應當依照一九二五年蘇聯軍隊從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撤退的事例，必須立即從對方國境內撤退。

第四條：本議定書用俄蒙兩國文字草成兩份，兩文同樣有效。議定書從兩方簽名的時候開始發生效力，以十年爲有效期。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二日

於烏倫·巴都爾·霍特

駐蒙古人民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全權代表

泰伊洛夫

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阿摩爾

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 甘都恩

從這個協定成立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蒙古的侵略計劃，遭遇到極大的打擊。當時關東軍少壯派曾不斷企圖挑釁，發生邊境衝突，並且利用種種手段，利用間諜和挑撥起蒙古國內叛變的陰謀，以圖破壞蒙古人民共和國，致有一九三七年的大叛變陰謀案件。而另一方面，又誤認蘇聯清黨肅軍運動是「蘇聯國力弱化」的表現，更企圖用軍事的冒險行動，一舉侵入蒙古，並博得「遠東反蘇反共先鋒」的徽號，使帝國主義列強諒解他們對中國侵略戰爭的合法。於是一面宣傳蘇蒙協定是蘇聯「赤色帝國主義併吞外蒙古」的手段，一面不斷在邊境演習示威和挑釁。到了一九三九年，更積極準備大舉進攻。這種罪行曾經引起世界的注目，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主席莫洛托夫，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次全體大會席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警告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時，日本法西斯軍部——尤其是關東軍，還認為這僅是蘇聯的虛張聲勢，所以竟在這年夏天發動了對外蒙古的侵略，可是，他們立刻遭受到蘇蒙聯軍的反擊，侵略的部隊，遭受到殲滅性的打擊，從此轉變態度，再也不敢冒犯蘇聯和蒙古。

第二節 中蒙關係的發展

(一) 革命以前的中蒙關係

中國和蒙古的關係，當然要比俄國和蒙古間的歷史悠遠得多了。遠古時代，且不去說它，十二世紀以後，從蒙古民族開始為世界聞名之時起，中蒙之間的關係，就發展成為國際問題了。十三世紀初，蒙古民族西進南下，制霸歐亞兩洲，且曾一度成為中國的外來統治者，雖然不過短短的八十年，但是對於停滯的封建的中國，却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文化上，給以極大的刺激和變動，那就是大元王朝。後來元朝的統治雖然被漢族的農

民革命軍所推翻，但是蒙古民族在北方，還是一大獨立的政治勢力。韃靼蒙古，還屢次侵略中國。後來喀爾喀民族別系的衛拉特族勢力膨大，而自明太祖打擊蒙古人以後四五十年，韃靼人又向中國邊疆活動，達延汗巴圖蒙克，統一今日內外蒙古各部，形成新的獨立的封建王國。和明朝不斷發生衝突。一直到崛起於滿洲方面的一「清朝」大舉西進，支配中國，才使蒙古人低頭服屬於滿清，達二百多年。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才和漢族的反滿運動南北呼應，外蒙古人首先在俄國人的指揮之下，實行獨立自治。

在蒙古實行人民革命以前，中蒙之間的關係，完全是一種宗主國和附庸者的關係，據蒙古人說中國是「帝國主義者」，而蒙古則屬於殖民地的地位。當時中國和蒙古都在滿清王朝的統治之下。滿清王朝對於蒙古人的支配，首先是利用喇嘛教的宗教勢力。他們特別獎勵喇嘛教，大興土木，建造喇嘛寺院，並賦與喇嘛以優越的特權——從經濟上社會上直到政治上的特權。結果蒙古人民要做喇嘛，消失他們祖先那種和異民族作戰的勇氣，喪失了民族繁殖和擴張的勢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因為喇嘛教重藏文而不研究蒙古人自己固有的語文，也使民族文化水準更降低了。滿清統治蒙古和蒙古民族的第二種方策，是利用封建貴族，尊重和支持蒙古民族的階級制度，從王公到平民，農奴階級，主奴層層相剋，削弱了為民族解放而團結的可能；第三就是盡力隔絕蒙古人和漢族的接觸，曾經有很長的時期，不許漢人入蒙古，並且盡力挑撥蒙漢兩族之間的感情。

滿清統治的末期，由於中國政局的混亂，滿洲人統治衰落，（中國人已實際掌握政權），及農民革命運動的抬頭，由於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帝俄向蒙古發展侵略行動，中國的北京政府，才開始了新的對蒙統治政策。那就是從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山西巡撫胡聘之首創的蒙地開墾之議，到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劉坤一之改變對蒙政策，獲得朝廷採納。從一九〇二年起允許蒙古王公放荒拓墾，並由清朝特派大臣督辦開墾事務，在科爾沁左翼中旗設立遼源州，後來又在土默特旗設立建平縣，喀喇沁旗設立阜新縣，（一九〇三年），札麥特旗設立大麥所，科爾沁右翼前旗設立洮南府（一九〇四年）。到了一九〇六年，又改內

蒙的熱河、察哈爾，外蒙古的庫倫，西蒙的科布多，阿爾泰爲行省，在沿邊各地改設巡撫兼陸軍侍郎，而在中央設立理藩部（原爲理藩院）附設調查編纂兩局，從事調查蒙古的狀況；規定了牧政、開墾、農務、礦產、森林、漁業、學校等十四條調查綱領。接着又在蒙邊各地建縣設治，如在科爾沁右翼前旗設開通靖安二縣，在科爾沁右翼中旗設禮泉縣，在科爾沁右翼後旗設廣安縣，在阿魯科爾沁東西札麥特二旗設開魯縣，在巴林縣設林西縣，在小庫倫及奈曼旗設綏東縣。這種開墾事務，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曾盡力推行。使漢蒙之間的關係突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一九一〇年，中國政府更進一步推進移民殖民事業，同時進一步撤廢漢蒙兩族之間的藩籬，即廢除漢蒙不得通婚的法律，獎勵漢人攜帶眷屬到蒙古，准許蒙古人學漢文、用漢名，並聘漢人爲書吏，用漢文爲公文。於是又把漢人的許多革新政治設施也搬進了蒙古，如設立衛生局、巡警隊、審判廳和商品陳列所等。但漢族的官僚資本和商業高利貸資本也開始向蒙古進攻，成爲蒙古平民一種新的桎梏。加以用人不得其當，昏庸無能而貪污橫暴；所有新的措施，如墾荒、設防、懲辦喇嘛奸細等，又都失諸倉卒操切，事前沒有充分的宣傳解釋運動，實施時就激起蒙古人民的懷疑恐慌和反抗，結果大局日非。到了辛亥革命以後，蒙古人民就起來反抗中國的統治，演變所及，甚至把一切和中國人來往的蒙古人士也當作奸逆來處辦，使中蒙關係陷於極度惡劣狀態。

（二）獨立運動與中蒙關係

蒙古以日俄兩國秘密活動及本身對中國統治的厭惡，乘辛亥革命後中國時局混亂，於一九一一年六月秘密召開四盟王公會議，派員赴俄與帝俄連絡，準備「獨立」。到了這年十月，就突然發動政變，宣布「獨立」，號爲「蒙古帝國」，改元共戴元年，推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甘肯爲蒙古帝國皇帝，同時以數千呼嘯而聚的蒙兵，驅逐滿清駐兵。並在俄國的訓練和裝備之下，編組蒙軍。不過還不致和中國軍隊作大規模的戰爭。當一九一二年二月中國宣布建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的時候，中國會由袁世凱函促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參加民主共

和民族平等的中國。但是這種紙面的交涉，也沒有什麼結果。反之，日俄兩國則積極對蒙展開攻勢外交，一九二二年七月有日俄聖彼得堡協定，接着又有俄蒙商務條約、俄蒙礦務條約（一九二二年）及俄蒙鐵路條約、電信條約等等。這種活動，傷害了中蒙之間的關係，不待說明的。因此，中國政府曾向俄國提出抗議，繼續和俄國進行談判。至一九一三年五月成立中俄協定，使俄國承認蒙古為中國領土的部分，俄國除領事衛隊以外，不得派兵到蒙古，並不在蒙古境內殖民；中國也承認外蒙古有地方自治權，有自編防衛軍及警察權，保證漢人等不到外蒙殖民。可是，這個約定後來並未實施。到了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又有中俄聲明文件公布，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那時中國實際上已完全喪失對蒙古的統治權，只保留毫無實際的「宗主國」的名義罷了。

在外蒙古實行「自治」時代，中俄蒙古之間，從一九一四年的恰克圖會議至一九一五年成立「中俄蒙協定」，除了追認一九一三年的中俄聲明文件之外，蒙古亦正式承認中國對外蒙有宗主權，中國對蒙古，在政治上有對外締約權，在經濟上則允許蒙古自由與外國訂約。俄國在蒙有領事裁判權，中國則有監視外蒙自治政府之權。後來中國會派大員（陳籙）駐在庫倫，並會派兵入外蒙剿匪。但因此又遭俄國抗議。以後中俄蒙之間不斷地發生爭執。

俄國大革命之後，曾經給中國政府以向外蒙古活動的極好機會。因為那時敗退下來的俄國白衛軍，企圖以蒙古為反革命軍的根據地，向外蒙著著進逼，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也盡力對外蒙展開攻勢，結果使自治政府方面的負責人有一部分動搖，願意和中國人言歸於好。北京政府方面，以左宗棠第二自命的野心家徐樹錚，以「西北籌邊使」名義，到外蒙活動，竟能很快地使蒙古的上層自願取消自治，把外蒙古重新劃進「中華民國」的版圖。可是中國太不爭氣了，內部軍閥都以外國帝國主義者為後台支持者，進行着不義的內戰，特別是直皖戰爭結果，以日本為背景的安福系就此崩潰，而這位外蒙古的最高統治者徐樹錚，也就在這一戰中給打垮了。

當然，以俄國白黨謝妙諾夫爲首的一派，立刻乘機掀起反革命運動，當時並有日本特務頭子鈴木少佐參加，號召建立所謂「大蒙古國」，成立新的獨立政府。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第二年九月，謝妙諾夫又在日本軍火和金錢的資助之下，開始排除中國在蒙勢力。至一九二一年二月而攻陷庫倫。至三月二十一日，即由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甘肯宣布蒙古獨立。然而不久之後，蒙古人民已覺悟帝國主義、白俄及本國封建勢力的罪惡，發動革命戰爭。

(三) 革命成功以後的中蒙關係

蒙古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二一年建立成功，首先於十一月間獲得蘇俄的承認。中國北京政府曾於一九二四年派王正廷和蘇俄方面進行交涉，但是毫無結果。到了五月三十一日，才由外長顧維鈞和蘇方成立「中俄協定」，當時蘇聯在條約中明白承認：「外蒙古爲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尊重蒙古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並聲明：「等到有關撤退蘇聯駐蒙軍隊問題，就是撤兵期限和彼此邊界安籌辦法商妥之後，蘇聯即將一切軍隊全部由外蒙撤退」。但是同時，中國方面則默認一九二一年蘇蒙修交條約，及依據這個條約而發生的蘇蒙之間的外交。以後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發生戰亂，各方面都在「自顧不暇」的情形之下，所以對於外蒙古的一切，也沒有力量顧到，只是始終不承認外蒙的獨立，不放棄對外蒙的宗主權，是中國政府一貫的方針。

中國革命的勢力，對於外蒙古問題的方針，就比較的明確，從國民黨、共產黨到其他黨派，都採取比較合理的政策。孫中山先生在他自己的各種演說和文件中，論到蒙古問題，曾經盡力提倡漢蒙各族應該在絕對平等的立場上，彼此互助，建立獨立自由的國家。當中山先生在廣東準備北伐，推進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時期，在廣東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機構裏，就有蒙古人參加。孫先生自己說過，蒙古人是贊成他和幫助他的主張實現的，如果三民主義實現，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蒙古可能發達爲中華民國境內主要的共和國體，或是說中華民國的共和邦之一。國民黨從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雖然沒有直接和外蒙發生關係，但是在邊疆政策上也曾規定了依據

「五族共和」和「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確定過相當公正的民族政策，設立蒙藏委員會等，容納蒙古人參加政治。所可惜的是由國內外種種局勢的限制，一直沒有對外蒙表示積極的態度，也沒有一個人敢斷然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進而建立和平互助的關係，來穩定我們北方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內「少數民族」，（但是有一部分所謂知名學者一直到現在還企圖抹煞的，否認國內少數民族存在的事實，而誇大地宣傳所謂「大中華民族」）一向有比較更明確的態度，他們在黨政機構內設立有「國內少數民族部」，由少數民族推舉出來的代表，主持有關少數民族利益的事務。對於外蒙古，中共一向主張公開承認其獨立自治，並進而和他們訂立平等互惠的條約。當然，將來如果中國自己政治上軌道，強盛起來，那時國內各小民族的自治體——從民族縣區民族省至民族共和國，聯合起來，建立像蘇聯一樣的中華聯邦，也未嘗不好。那時當然可依照蒙古人民自己的公意，歡迎蒙古人民共和國參加聯邦組織，但是在這種遠景還沒有接近的時候，就應該切切實實地和外蒙平等合作，像蘇聯和蒙古合作一樣，共同保衛遠東的和平與安全。

第二十三章 獨立和富強的前途

第一節 中蘇合作與蒙古獨立問題

（一）中蘇兩國關於蒙古問題的新協定

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蒙古在國際上的地位日見增加。當中國抗日戰爭初期，蒙古抗日戰爭的勝利，吸收住東北和華北方面相當大量的兵力，對於中國的抗戰，實際上盡了很大的助力。當蘇德戰爭之後，蒙古人民共和國更以人力物力援助蘇聯。特別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與蘇聯配合，出兵察哈爾熱河方面，使日本的關東軍迅速崩

潰。在忠實履行對外條約的過程中，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也更受人尊重。當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成立的時候，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也獲得更鞏固的保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成立，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會同時政陳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委員莫洛托夫：「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那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對中國王外長的覆函中宣稱：「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上項照會，業經奉悉，表示滿意，茲並聲明：蘇聯政府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二) 中國當局承認外蒙獨立の方針

八月二十四日，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正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和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時，發表演說，更正式發表承認外蒙古獨立體制的意義，他說：

「我今天代表本黨的同志，根據國父的遺教，說明我們今後實行民族主義，以及保障世界和平，與國家確定的方針如下：第一須說明者，是外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問題。原來外蒙古和西藏，本自有其悠遠的歷史，且其民族聚居一處，與其他宗族雜居已經設省之邊地，迥然不同。我們中國國民黨自民國十三年改組以來，外蒙古就派代表來參加祝賀，當時我們國父已視之為兄弟之邦，禮之為上賓，其事載於遺教，當為世人所共見。我們從沒有視他們為藩屬的意念與態度，決不像北京政府時代那樣的壓制。我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僅對於外蒙古如此友愛相處，就是對於西藏也莫不如此。我全國同胞必須知道，如果我們忽視民族平等的意志，抑制其獨立自治的發展，不僅違背我國民革命的精神，且足以增加我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糾紛，貽誤我建國的百年大計，亦影響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外蒙古自北京政府時代民國十一年起，事實上已完成其獨立的體制，如今已屆二十五年，當此世運一新

之會，正重啟舊好之時。我們必須秉承國民革命的原則，和本黨一貫的方針，用斷然的決心，經合法的程序，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建立友好的關係，使得這個問題能够完滿的解決；否則使中國與外蒙古之間，永無親善之可言，其對於國內安定與世界和平，更將因此而發生重大的影響。」

第二節 公民投票一致決定獨立

(一) 公民投票的情形

中蘇蒙古三方面協商決定，以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決定外蒙古是否採用獨立體制。結果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國國民政府派內政部長雷法章氏親到蒙古督導投票。雷氏於十月十八日帶領隨員十一人，由北平乘飛機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首都烏倫·巴都爾，受到蒙古內政部長蕭克達朝普、外交部次長納沙曾及首都市長包木顯等在機場的熱烈歡迎。

在投票以前，蒙古各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工作，到了二十日這天，由蒙古獨立公民投票委員會指導，在蒙古十八個盟部一律準期舉行公民投票。中國政府大員雷法章氏並親自監視首都兩區的投票。他對於投票手續表示滿意，認為是根據嚴格的民主原則，使蒙古的公民，凡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公民，不分職業，都有投票權，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大體上以戶為單位，於每戶所屬區內舉行。投票方法採取記名法，除了填寫姓名之外，分贊成獨立與反對獨立兩欄，任意填寫，毫無約束。以首都一市而定，依照一九四五年調查，全市人口約十萬以上，這一天參加投票的即有二萬餘人。據中央社庫倫二十日電稱：「記者隨我政府代表電法章，曾巡視庫倫城內投票地區二處，參加投票者至衆。我政府另一部代表，則赴離城一百三十哩之鄉鎮，參觀投票工作，至二十日午夜完竣。」而合衆社二十一日重慶電又稱：「內政部長雷法章在外蒙稱：予已二十五年未至此間，此行目的乃在解決外蒙投票，如外蒙人民同意獨立，則中央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予此來承外蒙古當屆熱烈

招待，深表感謝。」

關於投票的情形和結果，可以看看中央選舉委員會副主席楚倫柴勃氏在十月二十四日於整理公民的投票之後所發表的談話，他說：「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以資決定。依照我國憲法，凡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論性別、宗教及民族，都可參加投票。根據各盟委員會的名單，全共和國內應有四十九萬四千〇七十四人參加投票。截至十月二十二日所得初步統計，國內八個盟內，投票贊成獨立的共計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九十一人，即佔全數百分之九十七·八，其餘為棄權者。這四十八萬多人，完全投票贊成蒙古獨立，沒有一個人投反對票。我們人民一致贊成國家獨立，是再度向全世界表示：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自由公民，熱望保持他們祖國的主權，這項主權，是在對敵人的艱苦鬥爭中得來的。今後蒙古人民共和國將在全世界獨立進步的國家中獲得一席榮譽地位。」

(二) 各方面對投票獨立的讚揚

蒙古人民一致投票贊成實行獨立，獲得國內外各方面的讚揚。

蒙古各報廣泛地展開宣傳與討論，首都的真理報用「我們人民的偉大節日」作為社論題目，它說：我們人民奮身為自己獨立而鬥爭的希望實現了。我們人民衷心的，早已懷抱着的願望，就是使自己的祖國能够獨立、自由、強大，受各國人民尊敬的思想，終於實現了。我們所獲得的勝利愈是偉大，愈是壯麗，我們對於我們多年的老友——蘇維埃人民的感激也愈是偉大無限。」

蒙古的無線電台也熱烈廣泛地報道各地投票的情形，舉出投票中許多表現愛國情緒的事實，許多動人的場面。例如遊牧人民數百人，到投票櫃前投票時，攜帶許多禮物，送給政府的官員和人民革命軍。

在投票完竣之後，人民共和國總理喬巴山元帥於十月二十三日設宴招待中國國民政府督導投票大員雷以章氏，宴會後並舉行音樂會等。雷氏在對塔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公民投票揭曉一事

，本人與蒙古人民同感滿意。蒙古人民現已再度表現其獨立的願望，這正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基本目標符合，這種目標有兩個：第一是獲得中國本國的獨立和解放，第二是保證中華民國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

中國和蘇聯的輿論，蒙古人民之投票一致贊成獨立，也都表示滿意和祝賀。歐洲和美洲各地進步人士及報章雜誌，也一致認定，蒙古的獨立，中蘇蒙古的友好合作，是保證遠東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美國新聞處華盛頓電，說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將承認中蘇政府間關於外蒙地位的決定。這表示美國有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準備。

蘇聯是早已承認外蒙古獨立的國家，現在對於蒙古人民投票一致贊成獨立，自更表示滿意。蘇聯報章並指出：「蒙古人民的獨立，也正是亞洲其他民族的希望，亞洲要在民族基礎上建立和平，首先要擺脫各個民族不平等的地位，不再受外國的干涉。從各方面看來，蒙古人民共和國正是可倣效的模範。」

(三) 光輝的文獻——獨立議定書

當公民投票完成之後，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長喬巴山元帥，就把國書一件、人民議會主席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通過的命令一件，以及中央委員會有關蒙古人民共和國公民投票決定獨立的議定書一件，分別送致中蘇兩國政府，其內容如下：

致送中蘇兩國外長之國書：

(銜略)：本人由蒙古人民共和國授權，謹將人民議會主席團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通過之命令以及中央委員會有關蒙古人民共和國公民投票決定獨立之議定書送呈，並根據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送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之照會，將上述文件送呈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作為中華民國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之正式文件，謹請閣下接受本人最高之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喬巴山

有關公民投票決定獨立之議定書

蒙古人民議會主席團命令：（一）批准中央委員會有關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公民投票結果之議定書，作為證實蒙古人民共和國要求獨立之文件。（二）將此項議定書在報上發表，並送呈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俾根據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之照會，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之正式文件；（三）准許中央委員會之請求，將在公民投票中自蒙古人民共和國公民接獲之禮物、信札與文件，移交蘇克希托拉博物館，作為證明蒙古人民要求獨立之堅決意志的歷史文件；（四）指出公民投票中央委員會及各地分會工作美滿，現鑒於職權已告終了，即將此委員會解散。

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布瑪存特，祕書貝伊爾

第三節 中蒙友好關係的新時代

（一）中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中國國民政府派往外蒙古督導公民投票的代表雷法章及隨員楚明善、簡樸、馬瑞圖等十二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由蒙古首都飛返北平，後來返至重慶，報告外蒙全體人民贊成實現獨立的情形。國民政府即準備實踐中蘇條約，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發表，正式承認外蒙獨立的文告：

「外蒙古人民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會派內政部長雷法章前往觀察。近據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務人員之報告，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民贊成獨立，茲照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審議，決定承認外蒙古之獨立。除由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將此次決議，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蒙古人民共和國在接到了中國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的一天，立刻召集人民政府部長會議，人民議會（即大國民會議）及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席會議，通過決議案如下：

「蒙古部長會議、人民議會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聯席會議，在聆聽及討論總理喬巴山宣布中華民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權與獨立後，深為滿意。一致認為蒙古人民為爭取獨立與自由而進行的艱苦，流血和悠久的奮鬥，結果已經完全勝利。這可以從蒙古人民共和國主權與獨立之被承認而看見。蒙古人民共和國即是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實行革命的結果。人民政府及人民黨指出：蒙古人民之獲得主權與獨立，不僅為悠久爭取自由的結果，而且是蒙古人民努力建設的成就。蒙古人民之獲得主權與獨立，全靠人民共和國的領袖與組織者，創立蒙古共和國的蘇海·巴都魯，及其最密切的戰友蒙古人民領袖喬巴山元帥。蒙古人民之獲得主權與獨立，也是偉大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慷慨援助蒙古人民的賜予，蘇維埃政體創設者列寧和史大林愛護蒙古人民的結果。中華民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日，適逢偉大人民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黨和政府號召全體遊牧人民、工人及職員、知識份子、士兵、人民軍隊將領及蒙古共和國公務人員，繼續奮鬥，進一步鞏固並發展我們的故土，以期獲得經濟、文化、國防各方面的新的成就，來迎接這個光榮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當時全國各界，一律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之下，舉行慶祝大會。

(二) 中蒙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中蒙關係，至此乃展開和平友好的新史頁。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蒙古人民政府派遣內閣副總理蘇龍甲布，及外交部次長拉木蘇龍、助理部長納路山博、內政部長多爾道格、外部專員馮尼、林清蘇諾穆等一行七人，從首都烏倫·巴都爾起飛，經北平赴重慶，十日抵達，先後晉謁國民政府主席，政府各部長官及蘇聯大使領事負責人。十三日並進而與中國外交當局會商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十四日中蒙之間作最後一次會議，終於完成任務。蒙古首席代表並擬十四日下午對記者發表談話，申述：蒙古代表已於二月十三日與中國商安建立中蒙外交關係，互換外交代表，說明蒙古為與其他國家建立和平關係，特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尙未談及通商問題。他並答覆記者稱：外蒙與蘇聯從一九二一年即已建立外交關係，兩國互派公使。根據一九三六年蘇蒙互助

協定，蘇軍可以留駐外蒙。至外蒙與內蒙則並無關係。外蒙這次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第二次對外國建立關係。

中蒙兩國的友好條約，就在雙方和諧的空氣中簽訂了。不過原文在中國方面未見公布，所以無法獲悉。而中國輿論界，除少數民主進步派的報紙以外，竟對此事未加重視，不能不令人遺憾。反而還是海外的華僑報紙，關心着祖國少數民族的利益，連日用大字標題紀載中蒙會談事件，二月十二日的香港「華商報」，就在「祝中蒙國交永睦」的題目下面，鄭重表明對中蒙兩國永久和平合作前途的願望。

「中蒙唇齒相依，親睦是應當的而且必要的。兩國在和諧相處之下，必有助於復興貿易與生產事業的發展，而收經濟上互助互惠之效，此其一。外蒙民族既得自由發展，其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必能在其固有的傳統和基礎之上，有更大的進步，行將成爲堅固有力的國家，這對於鞏固亞洲之和平，當有其偉大的貢獻，此其二。世界終要走向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境域，亦惟有如此，才可以使世界糾紛完全息滅，我們助成外蒙之獨立強固，實可以影響其他各地弱小民族問題的合理解決，而直接間接有助於世界和平，此其三。中山先生終身倡導中蘇親善，並是最理解中蘇親善之必要的人，而蘇聯之立國精神和中山先生的遺教，一樣是以平等博愛扶弱反強爲基礎，我們依照中山先生的遺教來與外蒙相處，當能由此而更增進中蘇之間的親善，此其四」。

第四節 蘇蒙友好關係的新發展

(一) 蘇蒙互助與經濟文化條約

完成了擊潰全世界法西斯勢力的重大任務以後，蘇聯和蒙古的友好關係，更轉向於保障及發展遠東國際和平與安全這一個新的任務。一九四五年，蘇聯發動對日宣戰之前，中蘇兩國舉行莫斯科會議的時候，蒙古總理喬巴山等也同時抵達莫斯科，會商對日作戰及中國承認蒙古獨立等問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以後，蒙古人民投

票一致贊同獨立建國，以後喬巴山等一行又飛抵莫斯科，進行種種談判，其中最主要的成功之一，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簽訂第二次「蘇蒙友好互助條約」。全文如下：

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自從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由紅軍援助，在一九三一年，從白衛部軍隊的羈絆之下，獲得解放的時候以來，就存在着的堅定的友誼，蘇蒙兩國政府，以熱望支持遠東和平事業，並更進一步加強他們之間現存的友好邦交為指針，已決定把他們之間現存的君子協定，用條約的明文，簡明地表達出來：

第一條 倘遇蘇聯的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有被第三國攻擊的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保證，立刻共同討論發生的攻勢，並採取為了保衛他們的領土完整，而必要的步驟和措置。

第二條 倘遇本約締約國的一方，遭遇武裝攻擊的時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保證用他們所可自由使用的方法，包括武力援助在內，以互相協助。

第三條 雙方默契，為實行本約第一條所陳述的義務，由於此默契，駐在對方領土上的本約締約國的一方的武裝力量，一待留駐的必要性不再存在之時，當立刻撤出，就像一九二五年蘇軍從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上撤退時一樣。

上述條約，當儘可能從速批准，批准後就發生效力，批准證件將在烏倫巴都爾霍特交換。本約有效期限為十年，除非締約國的一方在本約滿期前一年通知另一方願意廢約的話，本約在現行有效期滿期的日期以後，有效期限當再延長十年。

本約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成立於莫斯科，用俄文及蒙文各繕兩份，兩種原文具有同等效力。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代表

莫洛托夫

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代表

喬巴山

除了這個新的友好互助協定之外，蘇聯又同時與蒙古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蘇蒙經濟文化合作協定：

- (一) 締約國雙方同意發展與鞏固蘇蒙兩國間在國民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已有的合作。
- (二) 根據本協定，並為其實行起見，在蘇蒙兩國相當的經濟機關、科學文化教育機關，簽訂單獨的條約與協定。

(三) 本協定在簽訂時起即發生效力，有效期限十年，如締約國某一方面在協定期滿前一年未聲明取消本協定時，得再繼續十年。

(二) 蘇蒙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在這些新約成立的日子，發表評論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俄羅斯聯邦和蒙古之間，建立友好關係的協定，以後二十五年間，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不斷地鞏固，不斷地發展，這種以互相尊敬彼此的獨立為基礎的友誼，發展為兩國民族雙方有利的形式，援助年輕的共和國穩固地站定，鞏固其獨立，完成了重大的經濟與文化上的進步。雙方民族為忠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互助議定書內友好關係的義務起見，在嚴重試煉的日子裏，不惜竭盡一切，彼此協助。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想破壞人民共和國獨立的時候，蘇聯的軍隊，依照議定書，開抵蒙古，援助蒙古的軍隊。蘇蒙兩民族的友誼，在哈勒欣河之役，找到了新的明證。在偉大衛國戰爭中，蒙古人民對蘇聯民族反德國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盡了友好的幫助，以六萬餘匹的馬、四萬七千件羊皮外套，五萬一千件皮緊身，六萬雙靴鞋以及其他許多有價值的東西，送給紅軍，人民並且另外為我國的官兵預備了二萬八千件個人的禮物。在整個戰爭期間，蒙古勞動人民培植「革命蒙古」坦克旅和「蒙古牧人」空軍大隊。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們又捐贈五百萬土格利克（蒙幣）為衛國戰爭殘廢和孤兒的基金。會遭德軍佔領而蒙損害的各區域，已從蒙古人民共和國獲得牛羊四萬頭以上。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國在蘇聯人民的友好情緒的導引之下，並「爲愛好自由的各民主國蒙僉早實現世界和平的期望所鼓舞」（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議會和政府宣言），對日本宣戰，蘇蒙友誼在爭取自由和獨立的聯合戰鬥中再度加以鞏固。喬巴山元帥麾下軍隊的戰績，杜齊柏倫將軍、貝頓薩希和蒂爾齊上校以及其他軍官所率部隊的英勇，充分表現於察哈爾區，這是愛好自由國家勝利中不可分的一部分」。

「消息報」在評論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蘇蒙新約時說：「蒙古人民在慶祝他們共和國二十五年紀念的時候，在外交政策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蘇聯的友好的協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文化合作，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已證明對於兩國的利益極有幫助。」「消息報」強調蘇蒙經濟文化合作協定的意義，對於蒙古人民的經濟文化的更進一步發展的貢獻。「協定中規定國民經濟、文化和教育方面合作的發展和鞏固，並簽訂有關經濟、科學、文化和教育的個別協定」。「消息報」論及蘇蒙關係前途，結論說：「今天發表的文件，乃是更進一步發展蘇聯人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間歷史性的友誼的文件，它們是過去二十五年中蘇蒙友好關係發展的持續，而對於蒙古人民獨立的更進一步鞏固，經濟文化水準的更進一步提高，以及蘇蒙人民友誼和更進一步發展，將大有貢獻。」

第二十四章 革命及政治的領袖

第一節 開國元勳——蘇海·巴都魯

蘇海·巴都魯 (Sohai Badurnu)，這位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古人民革命軍，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創造者，一向有「蒙古的列寧」的榮譽。

他是今日肯特盟巴音·蒙海族出身的達姆廷氏的第三個兒子，於一八九四年誕生在阿姆格蘭市。因爲家境

清寒，所以，蘇海·巴都魯從十六歲起，有好幾年在恰克圖——庫倫驛道上當驛遞使。

十八歲，他才進入寺院裏的學校，學習蒙古語文法和算術。

蒙古實行自治運動的時候，蘇海·巴都魯奉旗當局之命服兵役，在夫奇爾布倫的兵營入伍，後來因為成績超羣，被拔擢而為「特什渾」。那時，他和楊奇第瑪結婚。

後來他又學習機關槍，担任軍士（班長），在喀爾喀、戈爾和西部蒙古，屢次作戰獲勝，建立功勳，升任「貝子」。解役後，他在蒙古印刷所裏當排字工人。

當徐樹錚打進外蒙古，和溫甘倫男爵統治時代，他和喬巴山（現任蒙古總理）及別的同志，逃出庫倫（現在的烏倫巴都爾），就為着從外國帝國主義者、軍閥及本國封建壓迫者的統治下，解放蒙古民族，就在恰克圖創立人民革命黨，建立蒙古人民革命臨時政府，帶領了從人民革命黨內挑選出來組織成功的游擊隊——人民革命軍，各地奮戰，終於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俄國帝制派遣軍勾結成立的溫甘倫政府，完成了蒙古人民革命。肅清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派的最後的支柱——溫甘倫軍之後，蘇海·巴都魯會經偕同哲倫德爾第、鄧桑、西林達姆廷等，到蘇京莫斯科去，和列寧會面，至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成立蘇蒙修好條約，欣然返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他的功績之偉大，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舊曆正月初五日）因病逝世，那時還只是一位二十九歲的青年！顯然這是蒙古民族莫大的損失。他富於決斷力，有強毅的意志，性好清潔，是一位溫良的統帥。

第二節 現任總理——喬巴山元帥

繼承了蘇海·巴都魯的偉大事業的，是現任總理、外長、國防部長及國軍總司令的喬巴山元帥（Chunbat-San）。

喬巴山元帥於一八九五年誕生在高珠音·阿契特·瓦恩旗的克魯倫河畔，一個叫做札加恩·達爾貝諾爾地方，是牧民鄧爾樂氏的兒子。家境也很清寒，靠着畜牧維持生計。他從八歲起到十三歲，會跟喇嘛僧學習西藏語，成績很好，可惜因故中途輟學。

十六歲的時候，喬巴山到了庫倫，爲着養活自己，他從事過許多職業。一九一二年底，他爲着學習蒙古語文及俄文，到當時庫倫唯一平民學校去，向該校主持人哲倫德爾第及伽姆札拉諾懇求援助。他在伽姆札拉諾的學校讀了一年書，就得到了到伊爾庫茨克的俄國學校去留學的機會。在俄國普通學校讀了三年書，他已完全學會了俄語俄文。由於和進步的思想家伽姆札諾接近，又在俄國學校讀書，這些事，對於他後來的思想行動，有極大的影響。

一九一四年回到庫倫之後，他一度在電報局裏工作，但是，不久去職。此後有好幾年，他從事許多職業，如俄文通譯、小商人、自治蒙古政府的小公務員等等。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中國地方軍閥的軍隊再度侵入外蒙古，博格德·甘肯離開王位，又出現舊時代的軍閥專制統治。喬巴山像其他蒙古青年志士一樣，參加了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地下組織，後來他逃出庫倫，在國外策劃蒙古獨立革命戰鬥。在掃蕩白俄男爵溫甘倫政權及其軍隊的戰鬥中，他和蘇海·巴都魯一同擔負着中心指導者的使命。

革命成功以後，他因爲殲滅白衛軍的功勞，從蘇俄政府方面獲得紅星勳章。

一九二三年，他被派遣入莫斯科的陸軍大學，在那邊又用功了一年。

蘇海·巴都魯逝世之後，他就繼任爲蒙古人民革命紅軍的總司令，後來好幾次被推選爲大呼爾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民議會）主席團的委員，小呼爾登（中央行政執行委員會）的主席，畜牧與農業部長，以及黨、政府、軍隊方面的主要職務。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原任蒙古國防部長台米揚元帥逝世，後來又肅清了總理甘都恩等反革命領袖，及一九三九年春，舊民族及民主主義派的首領阿摩爾總理被免職，他就起而兼攝總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軍司令等要職，總攬軍政大權，對舊封建階層的餘黨、喇嘛、民族主義的反蘇反民主份子，大刀闊斧地加以肅清，向親蘇和民主主義的政策之階邁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在鞏固和發展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犯，協助蘇聯的衛國戰爭，和與中蘇英美等民主共和國最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方面，盡了極大的力量，建立光榮的功績。一九四五年夏，當中國行政院長宋子文飛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也緊跟着到了蘇京，受到蘇聯盛大的歡迎。在決定中蘇蒙古合力對日總反攻計劃及實踐上，他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而且也因此取得中國國民政府最後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一九四六年春天，他又到莫斯科去，談判成立蘇蒙互助新條約，對於保障遠東和平的安全，具有重大的貢獻，他在莫斯科接見記者時，曾很堅決地說：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以及今後它和蘇聯的友誼的全面鞏固，是我國進一步的繁榮的保證。」



附錄

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

本憲法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舊曆十月三十日）四時十七分，經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大「呼拉爾登」（全國人民代表議會）第十四次會議中通過，一九四〇年修改。

第一章 關於制定共和政體的原則

適應奮起反抗驅逐外國壓迫者，而在十一年革命中表現自己的熱誠的民衆的利益，陰曆四月十七日國府元首博克特汗逝世後，爲革命民衆所選舉的政府，通過如下決定：

- （一）博克特汗的印璽移交政府掌管。
 - （二）實施沒有國家元首的大總統的共和制，全部主權屬於大「呼拉爾登」及其所選舉的政府。
 - （三）以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紀念日爲蒙古建國節日，並於每年陰曆六月六日舉行紀念儀式。
 - （四）廢除「共戴」年號，即日起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某年），自今年爲十四年起順次稱呼之。
- 遣次召集的大「呼拉爾登」，通過上面所說的政府的原則，通過下列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法。本法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布，在各公署內揭示。

大呼拉爾登委任政府與各學校及軍隊研究本憲法之原則。

第二章 蒙古勞動人民權利宣言

第一條 蒙古人民共和國是消滅帝國主義與封建壓迫的勞動者（畜牧者、工人和知識份子）的獨立國家，一切權利屬於勞動人民，國民把統治權交由大呼拉爾登（全國人民代表議會）及其所選舉的政府實行。

第二條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根本任務，是要在打破封建神權的殘骸及完全民主化基礎上，鞏固新共和國制度，保障國家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以便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

第三條 爲了在國家統治上鞏固上述政權，爲了實現真正的民主，決定下列根本原則：

（一）蒙古人民共和國內一切土地、地下埋藏物、森林等富源，屬於根據適合現行制度之主義的蒙古現行習慣法的一般人民所有，對於這些，不容許私有的存在。應該爲着全部勞動人民的自由而加以處理。

（二）十一年（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蒙古政府所締結的一切國際條約及債務，是被強迫的產物，一律廢除。

（三）個人及機關在外國人統治時代以連帶責任而成立的外國高利貸債務，成爲國家及民衆過於沉重的負擔，所以追認十四年（一九二四年）政府關於廢止上述債務殘額及其連帶責任制度的決定。

（四）國家以執行國家單一經濟政策，爲開放民衆及確立民權的條件之一，因而實施國營外國貿易。（備考）國營外國貿易，當儘可能的順次施行。

（五）爲了保護勞動人民的主權，排除一切恢復內外榨取者主義的可能，組織蒙古人民革命，並對勞動青年，實施全部軍事教育。決定實行勞動人民武裝。

（六）爲了保障勞動人民的信仰自由，使寺院和國家分立，宣布宗教只是公民的私事。

（七）爲了保障勞動人民發表意思的真正自由，蒙古人民共和國組織新聞雜誌事業，用來提供給勞動人民。

（八）爲了保障勞動人民的集會遊行等等的真正自由，在人民集會用的房屋內作相當的設備，提供給勞動人民使用。

（九）爲了保障勞動人民的結社自由，蒙古人民共和國對貧苦勞動民衆（「阿拉特」）及職工，提供給合作社及組織所必要的物質和其他援助。

(十) 爲了保障勞動人民真正的知識的啓發，蒙古人民共和國負責供給勞動民衆以完全免費的普通教育機構。

(十一) 蒙古人民共和國承認不分民族、宗教、教育、及男女，其公民權一律平等。

(十二) 蒙古人民共和國願勞動人民的利益，但爲防各個人及團體侵害共和國的利益，對於他們的權利在行使之時，可以剝奪或限制其權利。

(十三) 廢除以前支配階級即王公、貴族（台吉）的爵位、稱號，以及呼圖克圖呼弼爾汗等的支配權。

(十四) 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爲根除資本主義根柢及完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努力，勞動人民的人民共和國，亦應當使自己的外交和全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及革命勞動民衆的根本任務一致。

〔備考〕但是，在實際上必需之時，不排除與外國建立親善邦交關係，只在侵害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的時候，當斷然實行抵抗。

第四條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最高主權，屬於大「呼拉爾登」（大國民會議即全國人民代表議會），大「呼拉爾登」閉會期內，屬於小「呼拉爾登」（小「國民議會」即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小「呼拉爾登」閉會期內，同時屬於小「呼拉爾登」主席團及政府。

第五條 蒙古人民共和國最高機關的職權如左：

(一) 國際關係上爲共和國的代表、外交上的交涉、和外國締結政治通商等條約。

(二) 蒙古與外國國境的變更、宣戰、議和及國際條約的批准。

(三) 外債公債的募集、債務利息及償本的償付、上述公債的延期。

(四) 外國貿易的監督及國內商業制度的確立。

(五) 共和國國民經濟計劃的組織、利權專賣權的賦與、變更及廢棄。

(六) 運輸及郵政電報事業的組織。

(七) 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的編成及指揮。

- (八) 共和國歲計預算的批准、租稅及收入的規定。
 - (九) 通貨及金融制度的規定、紙幣的發行及貨幣的鑄造。
 - (十) 土地使用上一般原則的規定、「盟」及「旗」的境界的設定、地下埋藏物、森林、及其他富源使用規則的制定。
 - (十一) 共和國內審判機構組織法、訴訟法及民刑法之基礎的制定。
 - (十二) 國民教育法的制定。
 - (十三) 國民衛生上一般方策的制定。
 - (十四) 度量衡法的制定。
 - (十五) 共和國之統計的組織。
- 第六條 共和國根本法律之批准及變更，由大「呼拉爾登」專職掌管。

第三章 大「呼拉爾登」(大「國民議會」)

- 第七條 大「呼拉爾登」(即「大國民會議，或「全國人民代表議會」)由「盟」及「市」的居民和軍隊的代表組織成立，其議員人數依照選舉區的人口比例決定議員的任期為一年。
- (備考) (一) 如果「盟」大會因故不成立，可以由「旗」選出代表；(二) 大「呼拉爾登」選舉，依照大「呼拉爾登」選舉法實行。
- 第八條 大「呼拉爾登」通常會議，依照小「呼拉爾登」的決定，每年召開一次。
- 第九條 大「呼拉爾登」臨時會議，經小「呼拉爾登」建議及大「呼拉爾登」議員三分之一之請求，或由代表共和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各「盟」選舉人的請求，實行召集。
- 第十條 大「呼拉爾登」選出小「呼拉爾登」議員三十人。
- 第十一條 小「呼拉爾登」完全對大「呼拉爾登」負責。

第四章 小「呼拉爾登」(小「國民會議」)及其主席團

第十二條 小「呼拉爾登」(即「小國民會議」或人民議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公布法律、決定及命令，綜理政府最高機關監督事務，決定小「呼拉爾登」主席團及政府的業務範圍，指示政府業務的一般方針，監督共和國根本法律及大「呼拉爾登」各種決議的實施。

第十三條 小「呼拉爾登」每年召集二次以上。

第十四條 小「呼拉爾登」臨時會議得由小「呼拉爾登」主席團的決議、政府的提議及小「呼拉爾登」議員三分之一的請求而召集。

第十五條 小「呼拉爾登」在會議中選出由五人組成的小「呼拉爾登」常任主席團，必要的時候可以選出實務委員會

第十六條 小「呼拉爾登」須對大「呼拉爾登」提出關於業務成績報告，一般政務及各項問題的報告。

第十七條 小「呼拉爾登」議員，依主席團的委任，執行主席團及其他職務。

(備考) 關於小「呼拉爾登」的權限，由主席團公佈特別規定。

第十八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指導小「呼拉爾登」。

第十九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為小「呼拉爾登」準備資料。

第二十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得在小「呼拉爾登」中審議提出命令案。

第二十一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監視小「呼拉爾登」決定的實施。

第二十二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關於地方及其他問題指導政府，經過政府與各該機關——緊急之時得直接和他交涉

第二十三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得解決關於大赦及特赦問題。

第二十四條 小「呼拉爾登」閉會期內，主席團得批准法律及決定，並得修改之而發回，停止政府的決定，暫交下次小

「呼拉爾登」大會審議，主席團任命各部部长。

第二十五條 各部之間發生的問題及紛爭或對各部的請願事項，得由小「呼拉爾登」主席團解決之。

第二十六條 小「呼拉爾登」主席團對小「呼拉爾登」負責，向它報告有關自己的義務。

第五章 政府（部長會議）

第二十七條 政府執行蒙古共和國的一般行政。政府人員由政府總理（部長會議主席）、副總理（部長會議副主席）、軍事會議主席、經濟會議主席、總司令、國務檢查長（國家監察院長）、內政、外交、軍政（國防）、財政、經濟、司法、教育、衛生各部部长組成。

第二十八條 政府掌管關於屬於自己權限以內的法律所規定的一般問題。

第六章 經濟會議

第二十九條 為求經濟上及產業上政策的協調，在政府直轄之下，依特別規定，設立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會議。

第七章 地方自治

第三十條 「盟」、「旗」、「索蒙」、「巴克」、及「阿爾本」（十月）及「市」等地方「呼拉爾登」，依照關於地方自治的法律而組成。

第三十一條 為處理當地行政經濟事務，地方「呼拉爾登」選出「盟」、「旗」、「索蒙」、「巴克」、及「阿爾本」機關等地方權力的執行機關。

第三十二條 執行機關對選出的各地方「呼拉爾登」負責。

第三十三條 「盟」、「旗」、「索蒙」、「巴克」及「阿爾本」的會議及其執行機關有地方自治制所記載的權利義務。

第八章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三十四條 凡是在選舉日以前年齡達十八歲的男女的共和國公民，都有對（大、小及地方）「呼拉爾登」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一） 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獲得生活之資的，和由自己勞動而從事經濟事業的。

（二） 人民革命的「契利克」（兵士）。

第三十五條 有下列各項之一的，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一） 顯然以營利爲目的而榨取他人，靠此獲得生活之資的；

（二） 靠着他人的勞動，和靠着資本及收入利息爲活的人及高利貸者；

（三） 舊王公及呼圖克圖，以及事實。經常居住在寺院裏的；

（四） 按照一定手續證明爲精神病者及殘廢者；

（五） 因自私自利喪失廉恥而受審判之宣告的，

第三十六條 選舉依照另定的選舉法實行。

第九章 預算編成權

第三十七條 蒙古共和國的歲入及歲出統一於一般國家預算。

第三十八條 國家預算必須提經大「呼拉爾登」或在特別場合提經小「呼拉爾登」通過。

第三十九條 國家預算須在會計期間開始前二個月以內提交統治機關通過。

第四十條 若是國家預算未能在會計期前通過，政府應該依照該案通過以前的上年度預算而支付，但不得經歷新會計年度四個月以上。

第四十一條 國庫對於未經預定的項目，非有國家預算表所規定及特別法律所公佈者，不得作任何支出。

第四十二條 國家預算表所規定支出的費用必須在確定預算及預算之項目的範圍之內之直接項目實行支出，凡非政府特別決定，對於任何項目不得挪用。

第四十三條 大、小「呼拉爾登」應規定可以撥入一般國家預算的收入、租稅和作為地方自治經費的種類。

第四十四條 一般國家的經費，以一般國庫資金充用。地方自治機關，當依中央政府所決定的一定範圍以內，向人民課稅，作為各該地方的經費。

第四十五條 地方機關編成地方費的半年度及一年度的預算。「索蒙」的預算須在「旗」委員會、「旗」行政公署的預算須在「盟」委員會，「盟」委員會的預算須在中央政府，分別作為一年度及半年度的一般國家預算而獲得批准。

第四十六條 地方機關在預算外支出不足的時候，得向（政府）各該部長申請追加預算額。

第十章 國徽及國旗

第四十七條 大「呼拉爾登」、政府各部、及其他公署的徽章，須在地形上在徽章面的中央作「索優恩巴」符號，並在兩側鐫刻各該公署的名稱。

第四十八條 國徽也須有上述「索優恩巴」的符號，下面設置「巴德馬林霍」花紋。

第四十九條 國旗為紅色，中央加綴國徽。

第五十條 大、小「呼拉爾登」須在烏倫·巴都爾·霍特（紅色英雄之城，即庫倫市）召集。

後記

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存在，這已是鐵一般的事實。這個國家不僅最先獲得蘇聯的承認，而且也已經獲得中國的正式承認。然而，由於一般知識份子的傳統的觀念，由於一般人民對蒙古實情的缺乏了解，同時也由於蒙古在國際宣傳活動上的欠缺，國人對於中華民國地圖上突然在北部「失去」這一大塊，在感情上似乎不能不受到極大的刺激，因而對政府的承認外蒙獨立，提出種種非難甚至指為「喪權辱國」。雖然，當國人在長期的戰亂和貧困之中，有時會羨慕蒙古的「置身事外」，而且也有人認為「顧全大局」，不能不擁護政府對外蒙獨立的承認，而幻想「有朝一日」再用武力收回。但是，對於蒙古之缺乏真正的認識及不願蒙古人民大眾自己的利益的要求，卻可以從這裏獲得反證。但無論是反對，是幻惡或是其他阿Q式的表現，對於中國民族，中蒙關係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前途，都足以引起危險的結果，所以認識蒙古是非常必要的。

關於蒙古問題的許多文獻資料，無庸諱言，還以蘇聯所出版的比較有科學的根據。這並不是由於著者「親蘇」的感情，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日本對蒙古有野心，曾經公開和秘密派遣探險隊及攷察團到蒙古去，並且曾經直接參加蒙古的政治活動；在學術方面，也出版過許多研究蒙古問題的書籍，還曾經在日本和在中國僑佔期發行過許多研究蒙古的報章雜誌。但是如果純就學術研究的角度去觀察，日本人在這一方面的工作，還不能望從前俄國人現在蘇聯人的項背。帝俄時代過去了，我們不必去提它。蘇聯對於蒙古及東方各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集中於蘇聯學士院。若干個人及機關團體雖然也有些研究及成績發表，但其價值及被重視的程度，要差得遠了。

蘇聯學士院東洋學研究所的蒙古系，自從蒙古學的世界的權威碩學符拉第米爾卓夫逝世以後，努力繼承他的遺業，積極活動，繼續出版了「蒙古的遊牧封建制度」等蒙古問題專書。蘇聯東洋學研究所以研究東方各國

爲基礎任務，共有十二所研究室，採取世界上最新穎的科學研究方法，從事研究。蒙古學就是主要的科目。這個研究所從一九三六年的大會以後，積極開始工作，在蘇聯固然是對東方各國作科學的研究的最高機關，在全世界的東洋學研究事業中，也有它崇高的地位。它的工作，大致分爲東方各國一般的歷史、公民史、經濟史、語言、文學、傳說、民俗、哲學、哲學史、思想等等的研究工作。研究所是一種聯合研究室（*Association Cabinet*）的組織，適應科學學士院（*Akademiya Nauka*）的一般的任務，由各室的負責人指導工作。這個東洋學研究所，共分爲十二所研究室，在裏面從事研究工作的，有學士院會員（學士）及通訊員，教授團等等。這種研究室是研究所的基本構造。研究所有研究「小組」（*Yachetka*）各「小組」互相密切聯合，對東方某一國家全體或這一國的某一部門如歷史、哲學、文學、語言學等，從事周到的研究。原有的研究部門，包括：（一）中央亞細亞系，（二）高加索系，（三）中國系，（四）日本及朝鮮系，（五）蒙古及布里雅特蒙古系，（六）印度及西藏系，（七）土耳其系，（八）伊朗系，（九）阿拉伯系，（十）古代東方研究系，（十一）紀錄系及（十二）原稿整理系等等。第三次五年計劃實施中，又創設了：（一）波爾加地方及巴基爾人民研究室，（二）克里米亞、韃靼研究室，其中又分闢（甲）北部高加索及（乙）中國系附屬滿洲研究室。研究所裏尙附設有科學的東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裏所藏有關東洋的圖書，在五十萬冊以上。東洋博物陳列室以及各種標本展覽會，也經常舉行。原稿系保存有基本的東洋語文的草稿約四五萬種，記錄系的資料當然特別豐富。這個研究所利用了五十五種東方語文寫成的原始資料，這一部門有七十五個專家及科學上的從業員（其中包括學士院會員及學士院通訊員）。研究所研究的結果，首先在「科學學士院通訊」上發表，其次即在「東洋學研究紀事」、「東洋圖書解題」及「東洋學研究所所報」上發表。

在東洋學研究所工作而在世界的東洋學研究上出名的學者，有蘇聯科學學士院會員馬拉·巴爾特利德·奧利登堡、符拉第米爾卓夫等，可惜都已逝世。繼承他們事業的，是史乞巴茨基、克拉乞可夫斯基、亞歷山也夫

(B. M.)、卡可夫卓伏、魯班利等學士院會員，和孔拉得、魯潘、俾爾伊魯等學士院通訊員，以及巴倫尼可夫、班爾台里斯等各位博士。這許多人，構成了蘇聯研究東洋學的領導勢力。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不單對於東方各大國的歷史和現狀作科學的探究，獲得輝煌的成績；而且對於許多小國及在世界歷史上世界地理上不占地位的小國家和小民族，也從事嚴肅的研究。因此，關於蒙古的學識，達到了世界蒙古學研究上的最高水準。

著者所以要特別提出蘇聯對蒙古的研究及其成績，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國對於這一方面的知識太缺乏了！我們沒有蘇聯那樣的科學學士院，也許中央研究院具有相同的性質吧，但中央研究院的對東方學術研究上的設施、事業和成功，在目前似乎還談不上什麼。我們沒有像蘇聯東洋學研究所蒙古系這樣規模的組織，從事於蒙古或任何其他邊境及邊疆民族學的研究，這一方面的工作，似乎只有少數私人團體及個別學者，憑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而從事研究。一切都顯得是局部的、粗淺的，甚至按照着主觀觀念而把學術來遷就他，如某些「民族領袖」甚至有教的「地理學者」之胆敢否定國內少數民族的存在，而執拗所謂「宗族」等等名詞，替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作宣傳，甚至對蒙古民族也有這種錯誤的觀念，很顯然，結果只能增加國內少數民族的對立，削弱兄弟民族間的團結力量，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永久和平的民主的事業，是有害無利的；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也是有害無利的。因此，加強對這一方面學術上的研究，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事業。

本書在編著上最主要的資料來源，是蘇聯·邁斯基氏的「現代蒙古」，蘇聯卡利尼可夫氏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魯易奇克氏的「建設途上的蒙古」，日本·石山喜內司氏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日本·三島康夫與後藤富男合著「外蒙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年鑑」、「世界年鑑」其他蘇聯、日本、英美雜誌關於外蒙古的記載。由於原著者對蒙古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不免影響到他們所有材料的取捨及處置，甚至不能不令人懷疑到他們所引用的材料的真實性問題，編著者爲了多方發證，比較這些材料，確曾費些工夫，企圖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初版

今日的外蒙

附錄

編者 潘公昭

蒙古人

卷七

楊孝述

本憲法於
未及開採

第一章

適應奮起反抗驅逐外國賊

世世通權應起反抗驅逐外國賊

(一) 適應奮起反抗驅逐外國賊

(二) 適應奮起反抗驅逐外國賊

公在運致各條約內指拉拉爾登

公在運致各條約內指拉拉爾登

附錄

六日(舊曆十月三十日)四時十七分，經蒙古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大「呼拉

於制定共和政體的原則

而於十一年革命中表現自己的熱誠的民衆的利益，陰曆四月十七日國府元首博克特汗

通達各干流定業命申委親自主持的議決的民衆的利益，陰曆四月十七日國府元首博克特汗

南京 廣州 漢口 重慶 北平

平隊研究本憲法之原則。

二

7
32/680
+



5

(SS 6)

基價320